

目录

[導讀 一個普通人的常識 11](#_Toc54606931)

[國際版序 16](#_Toc54606932)

[第一章 入伍之前 19](#_Toc54606933)

[一、從北海道到東京 20](#_Toc54606934)

[二、謙二的小學記憶 22](#_Toc54606935)

[三、升學時代來臨 33](#_Toc54606936)

[四、走向統制經濟與愛國教育 35](#_Toc54606937)

[五、戰時就職 40](#_Toc54606938)

[六、我出發了 42](#_Toc54606939)

[第二章 前往戰俘營 49](#_Toc54606940)

[一、那種事我辦得到嗎？ 50](#_Toc54606941)

[二、沒跟著原部隊走是我的幸運 54](#_Toc54606942)

[三、赤塔流放地 58](#_Toc54606943)

[第三章 西伯利亞 62](#_Toc54606944)

[一、每個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樣 63](#_Toc54606945)

[二、國家應負起的責任 67](#_Toc54606946)

[三、飯盒是活命的基礎 69](#_Toc54606947)

[四、對某位青年的追憶 71](#_Toc54606948)

[第四章 民主運動 76](#_Toc54606949)

[一、不同的管理體制 77](#_Toc54606950)

[二、《日本新聞》與壁報新聞 79](#_Toc54606951)

[三、氣氛改變了 81](#_Toc54606952)

[四、檢舉反動分子 83](#_Toc54606953)

[五、歸國竟然就是這么回事嗎？ 86](#_Toc54606954)

[第五章 輾轉的生活 91](#_Toc54606955)

[一、西伯利亞歸國者的處境 92](#_Toc54606956)

[二、滾石般的日子 96](#_Toc54606957)

[三、無論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100](#_Toc54606958)

[第六章 結核病療養所 106](#_Toc54606959)

[一、失去一半的肺葉 107](#_Toc54606960)

[二、最難熬的時期 111](#_Toc54606961)

[三、無能為力的小市民 115](#_Toc54606962)

[第七章 經濟高速增長 120](#_Toc54606963)

[一、下層的下層 121](#_Toc54606964)

[二、最重要的是判斷誰有權限 122](#_Toc54606965)

[三、當時就是可以賣出這些商品的時代 125](#_Toc54606966)

[四、搬入都營住宅 128](#_Toc54606967)

[五、結婚生子 131](#_Toc54606968)

[六、自立門戶 133](#_Toc54606969)

[第八章 戰爭的記憶 140](#_Toc54606970)

[一、“一億總中流”的社會想象 141](#_Toc54606971)

[二、安定還是停滯？ 143](#_Toc54606972)

[三、是戰爭我就討厭 146](#_Toc54606973)

[第九章 戰后賠償審判 152](#_Toc54606974)

[一、社會性活動時代 153](#_Toc54606975)

[二、非戰兵士之會 156](#_Toc54606976)

[三、重訪赤塔 158](#_Toc54606977)

[四、只撫慰、不賠償 161](#_Toc54606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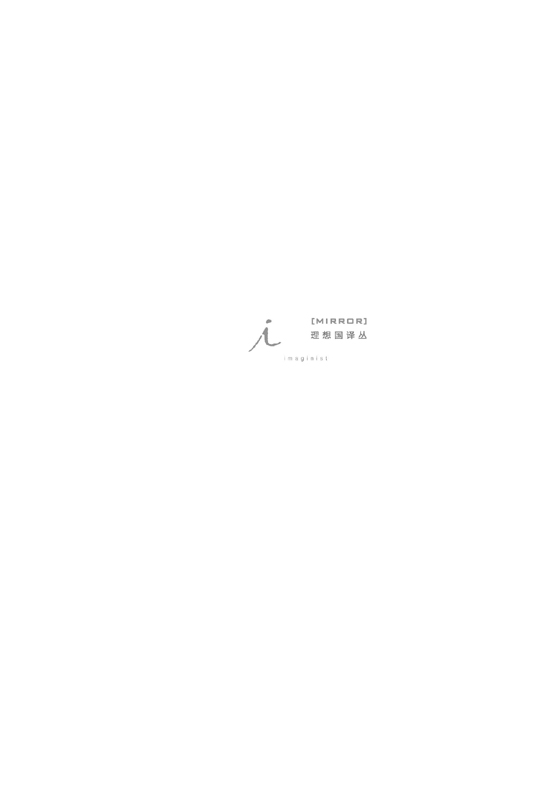
[五、殖民地征兵問題 163](#_Toc54606979)

[六、我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評價 165](#_Toc54606980)

[七、國民的良心 167](#_Toc54606981)

[八、只要還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169](#_Toc54606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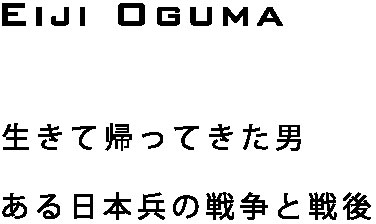
[后記 173](#_Toc54606983)





[日] 小熊英二 著

活著回來的男人： 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后生命史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桂林•

IKITE KAETTEKITA OTOKO: ARU NIHONHEI NO SENSO TO SENGO by Eiji Oguma 　　©2015 by Eiji Oguma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5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譯稿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授權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活著回來的男人 : 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后生命史 / （日） 小熊英二著 ; 黃耀進譯. -- 桂林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7.1（理想國譯叢）

ISBN 978-7-5495-8922-7

Ⅰ. ①活… Ⅱ. ①小… ②黃… Ⅲ. ①社會生活－生活史－日本－現代 Ⅳ. ①D731.38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49429號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桂林市中華路22號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張藝兵

責任編輯：魏　陽　羅丹妮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龔碧函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本譯叢獲理想國文化發展基金會贊助支持

# 導讀 一個普通人的常識

梁文道

吳雄根，我試著在網上搜索這個名字，除了“百度百科”錄有他的履歷，剩下的訊息幾乎全部都和《活著回來的男人》這本書有關。我看不見有任何中文媒體采訪過他，也看不見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網民討論過他的事跡，如果只有在互聯網上存在才叫作真正存在的話，那么吳雄根就是一個差一點便不曾存在過的人了。這也難怪，這位朝鮮族、中國籍，有過一個日文名字“吳橋秀剛”的老人，生在當年的偽滿洲國，又在日本東京念過書，一九四五年的時候還被強征入伍“關東軍”第515部隊，戰后又為蘇聯紅軍俘至西伯利亞的赤塔地區戰俘營勞役，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被送回已經變了天的中國。這樣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經歷不夠美好，更是因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廣為流行的主流論述都很難恰到好處地容下他的一生。從戰后的政治運動角度來看，他是個問題相當嚴重的人，不只留學過日本，而且當過“偽軍”，或許這是他那代東北朝鮮族人常常遭逢的命運；但是革命面前，是沒有身不由己這回事的，所以戰后他肯定還是要被判定為一個漢奸。雖然他早在蘇聯做俘虜的時候就已經心向共產主義，一回來就獻身革命建設新中國，可中蘇交惡之后，像他這種在蘇聯待過的人則又有了替蘇聯當間諜的可能，必須反復檢查交代好好監視。當然他是個受害者，他不是自愿跑去蘇聯，不是自愿加入關東軍，更不是自愿生為“滿洲國”國民。可是這種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夠純粹干凈，不像那些被戰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電影電視劇的凄涼角色，因為他畢竟在敵人那邊待過，黑白不夠分明。假如他生來就是個日本人，戰后就應該和其他仍然生還的西伯利亞日本戰俘一樣，最后會被蘇聯遣送回美軍占領的日本，于是又會惹起另一種疑慮，怕他其實是遭到洗腦改造特地歸日潛伏運動的“赤化分子”。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他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過許多人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尋求正義，討一個說法，至少讓他這輩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個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話，他該向何處尋覓？

于是一九九六年，吳雄根到了日本，訴訟日本政府，要求賠償。這該是個大新聞，可是很奇怪，不僅保守的日本媒體少有報道，今日回看，當時便連中國媒體也似乎無人關注這個消息。比起九十年代開始大量涌現的“慰安婦”索賠事件，其實來自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原日本軍人申訴數目更多，只不過這些人的訴求會使得熱血簡單的國族主義尷尬，不像“慰安婦”那么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對待，當他們不存在似的。

吳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終失敗。日本建制的說法是很簡單的，它不只不賠償這幾十萬當年被它強征入伍的外國人，甚至也不賠償土生土長的日本兵，理由一貫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活著回來的男人》的作者、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解釋道：“如果只針對特定被害者進行賠償，將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不過實際上，日本政府擔心的恐怕是，即便對一小部分受害者進行賠償，往后便像掀開冰山一角，接著來自國內外的賠償要求將永無止境……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立場。”所以，無論是“慰安婦”，還是被強迫從軍的日本軍人及其軍屬，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問”的方式了事。那么它為什么不“慰問”像吳雄根這樣的外籍士兵呢？他們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這種大話打發？

另一方面，出于冷戰時期詭譎的國際局勢，且別說外籍士兵，就連“慰安婦”也不一定會受到韓國、中國臺灣乃至于大陸等亞洲地區政府的支援。吳雄根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虜與遺族，同時要求日本負責。可是這個團體的活動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停了下來，因為“當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復邦交二十周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

所以，沒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沒有媒體關注的吳雄根，一個人來到了日本。不過他居然找到一個日本人愿意和他共同起訴日本政府，成為亞洲各地對日賠償訴訟的首位日籍并列原告，這個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親，同為蘇聯戰俘營歸來者的小熊謙二。在法庭上，他說：

他（吳雄根）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他于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卷入戰斗中并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士兵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于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著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合并朝鮮，一度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身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征兵，之后成為關東軍士兵并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征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后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

雄辯滔滔，小熊謙二還在他自己撰寫的講稿里引用了前歐洲殖民帝國與納粹德國的案例，痛陳日本政府之過。這么看來，他應該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可他卻只有初中文憑，是一家小體育用品行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話講，甚至是“底層中的底層”。這位小熊謙二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他到底是個怎么樣的人呢？

大家也許會在日本電影里面見過類似的場面：一個鄉村少年應召從軍，出征那天，他穿著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頭挺胸地對著送別親友大聲宣布：“我定會堂堂為國盡忠。”然后他的家人、鄉親和鄰居則會鼓掌叫好，一副興高采烈的模樣，很多人還會揮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國旗，替他打氣壯行。這些參軍青年，在我們的印象之中，總是規規矩矩，嚴守軍紀，無論何時都不忘“皇軍”威儀。而養成這種年輕人的土地，是一個陷入狂熱情緒的社會，人人愛國愛到頭腦發昏；好消息從前線傳來的時候，張燈結彩，鞭炮四響；若是壞消息開始浮現，他們就一臉肅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準備。這就是戰時日本社會的典型圖像之一，將愛國、愛天皇以及戰爭這三者毫無困難地等同了起來，并且把這三位一體當成個人生命意義的寄托。如果你不贊成戰爭，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愛國；如果你不愛國，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還讀過一些研究，指出當時日本最愛國最忠誠同時也是對戰爭最狂熱的，竟是一批低下階層的年輕人。一來， 戰前日本貧富差距極大，這些條件不利的青年苦無出路，眼前即是盡頭，也許會渴盼軍需經濟帶來的一時榮景可以惠及己身。二來，他們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誦讀充滿著皇國思想的“教育敕語”，洗腦洗得徹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他們的人生實在沒有更大更完滿的意義了，而戰爭，不只能令他們投入到一個非常壯闊的戲劇敘事當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補足；還能讓他們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變得更加“平等”，因為到了最后要是戰死，不管背景貧富，所有士兵的亡靈都會被供奉在靖國神社當中，正是生殊途死同歸。

然而，小熊英二這本《活著回來的男人》卻糾正了我長存的偏見，讓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戰時日本底層畫像。他這本書不只是他父親小熊謙二的口述史那么簡單，更是一部以個人為經，以大量政治、社會及經濟背景析介為緯的歷史社會學佳構。于是讀者能在其中發現其時日本社會那被遺忘甚至被壓抑的角落。

就說應命參軍的那種儀式吧，原來小熊謙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后，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 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余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 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么送行會了。”

自己的丈夫、兒子，又或者是孫子上戰場，這無論如何都不該是件開心的事，在生離也許就是死別的這種情況下，哭泣流淚自然不過；不過，絕對而神圣的愛國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認自然不接受現實。比如謙二一位早逝的室友，為了征兵體檢回到老家，結果驗出當年絕癥肺結核，征兵軍官看到報告之后破口大罵，斥責那個離死不遠的青年“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結核病）”。一九四〇年開始，日本政府又規定國民在經過東京皇居的時候必須“宮城遙拜”。已經從鄉下來到東京謀生的謙二，有一趟搭電車經過皇居，聽到乘務員高叫“現在通過宮城前”，便跟著全車乘客一起彎腰朝著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擠得實在轉不過身，于是“只好以屁股朝著宮城行禮”。他說：“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了。”

愛國主義有時確是一種形式，套在紛雜混亂的現實和自然之上，它或者會對后者提出一些遠離常識、玄而又玄的解釋（比方說一個人在當兵前被驗出肺結核是因為他不忠）；又或者干脆遮蔽大家耳目，讓國民用灌進腦子里的興奮劑去代替他們用感官接觸到的世界（比方說監控審查新聞媒體，拿掉一切不利的新聞，換上些振奮人心的故事）。問題是當你活在那樣的時代，面對著由于戰爭而日漸殘破的生活，苦苦掙扎；可是當一切本來可以用作解釋這種生活、這個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觀都被抽掉奪去，只余一套愛國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識形態的時候，你還可以怎么辦呢？明明一個人最大的問題是怎么樣養家活口，怎么樣在物資短缺的情形下經營生計；但國家卻告訴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為國犧牲，謀求一個非常遠大崇高但也因此永遠看不清的目標。你失去了憑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時勢的能力，疲倦得動不了大腦，那形式至上的愛國主義則是唯一剩給大家的思想工具。這時你不會去反省這場戰爭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對不對；你也不會去反抗那要你笑著送親人去死的主義，拒絕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勞形于生活壓力與包圍著你的宣傳口號之間。

自從日軍侵華，每有重要勝仗，日本各地鄰組町會都要舉辦“提燈籠游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們的反應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層，人們就愈是無感。終于到了美軍攻克塞班島，“從宣告‘玉碎’的廣播播音員陰郁的聲音中，可以感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不過謙二周邊的人當時都沒有這么推測，因為大家都太累了，“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

小熊謙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層的底層”，他的母親在他七歲那年離世，他的父親干的是隨著時局而起伏的買賣，他有五個兄弟姐妹，其中一個早夭，另外兩個沒活過二十，他自己中學上到一半就要提早畢業，小時候家里一個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紀稍長則開始工作分擔家累，一路走來都是奔走捱苦。戰爭末期，終于輪到他這個身體本應過不了檢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沒有被日本軍國主義的“圣三一”劫持，沒有把希望寄在“圣戰”之上，因為他是一個更加貼近自然和現實的人。就和他所見過的其他底層一樣，他的關切在于今天晚上有沒有東西吃，而不是國祚是否恒久。他被剝奪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沒多大用處，他只能被嚴酷的國家機器推來推去。真正使得他與別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沒有忘卻現實生活的本相，即便戰后。于是他能養出基于現實的常識，至少知道一個人前赴戰場告別家人，并非一件值得歡慶的事。

謙二到了前線沒多久，日本就宣布無條件投降。按照規定，留在中國東北的軍隊要向蘇聯投降。這批駐在中國東北的軍人不只是戰俘，原來更是日本賠償蘇聯的物資。在“關東軍”交給蘇方的陳情書里便有非常客氣的這么一句話：“（受俘日軍）返回（日本內地）之前的時間，將極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于是謙二就得跟著大伙前往西伯利亞，與當時全蘇境內那一千多萬成分不好、政治上不可靠的奴隸勞工一樣，成為蘇聯惡名昭彰的勞改體系的一員。在物資短缺、天候嚴寒的情況下勞動，有不少日本戰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謙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開始患上夜盲癥，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著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場地時，他必須牽著我的手前進。不這么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于開始出現失禁癥狀……”京坂死前幾天，正是日本在過正月的時候，虛弱的京坂喃喃自語“好想吃麻薯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狀況又是怎樣，謙二全都不記得了。“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過的，并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

是誰令他墮入這種非人境地？是誰在戰敗早已注定的時刻還要把這些年輕人無謂地投到前線？那些決定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語言和信仰來迫使這些青年在告別家人時必須高喊“我將堂堂為國盡忠”，讓無數家庭支離破碎，更剝奪了人們正常思考和行動的能力。經歷了這一切的謙二不像那些學歷比較高的軍官，會因為某些“抽象的問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憂郁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辦法吃，想辦法睡。他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一個活得很具體的人；唯有一個活得這么具體的人，才會在沒有毛巾的時候把“日之丸”國旗當作洗浴時的浴巾來使用。又唯有一個會把國旗當成浴巾的人，才會在事后醒悟：“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看起來這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從自己的體驗開始便好，不需要針對“皇國”思想展開縝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教育來裝備自己；你看見自己的家庭因為戰爭而破敗，而國家依舊要求大家繼續犧牲；你發現柴米油鹽的供應一天比一天緊張，而報紙和電臺卻依舊頻傳捷報；你到底還需要些什么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名字叫作“國家”的神話底下呢？這難道不擺明了是個謊言嗎？

不要以為苦難必定會使一個人清醒，也不要以為最實際的生活經驗就必然會產生最起碼的常識。有一些和小熊謙二一樣上過戰場，像他一樣遭受過戰爭打擊的日本兵在后來會變得特別“對青春無悔”，特別懷念那段全國上下“都很有信仰”的軍國主義歲月。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運動荒廢了青春，明明遭逢過家庭的淪陷，但后來卻居然懷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覺得那個時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應該是自主的抉擇，當你只有一種信仰可以追隨，并且必須追隨的時候，這還能叫作“有信仰”嗎？同樣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沒有半分選擇余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憑什么對這被奪去的青春感到“無悔”呢？

《活著回來的男人》里頭還有一則更加可笑的故事。話說謙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〇年代移民巴西，初時尚與家里來往書信，但自戰爭爆發就沒了音信，此后一直失聯。后來他們才曉得原來二戰結束之后，“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戰勝組”的領袖之一，“對于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采取不足為信的態度”。

回到日本之后，小熊謙二打過好幾份工，載浮載沉，許久才在一家體育用品店扎扎實實地干了下去，趁著日本經濟起飛，自己也當上了小老板，但始終是個平凡而具體的人。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為生活忙碌，不關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會看一點書，為的只是更加了解自己活過的時代，于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憶錄，也看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由于做過戰俘營奴工，所以他成了“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員，關心世界上其他處境和他相似的人，在組織寄來的抗議聯署信上簽上自己的名字。由于他覺得當年戰俘營的情形和納粹的集中營有點像，所以他一直很關注集中營的狀態，于是在他退休之后，終有余裕能夠出國旅行，就立刻跑去波蘭看看奧斯維辛。他吃過戰爭和國家主義的苦，認為裕仁天皇和當年一批戰犯都沒有負上該負的責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歡對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黨，長年是左翼政黨的選民。就是這樣子的人，才會在知道吳雄根的消息之后，決定陪那個來自中國的陌生人一起起訴日本政府。

我在《活著回來的男人》里面看到的小熊謙二，他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都是來得這么自然，仿佛一切合該如此，盡皆常理而已。你只需要認清現實，在有點能力的時候試著了解形成自己所處的現實的力量，同時再加上一點點同理心，你就會自然而然地變成這樣一個常人。誠然，在他兒子小熊英二的筆下，小熊謙二就只不過是個最凡常的普通人罷了。不過我們全都曉得，一個普通人的常識有時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就連許多學養深厚的知識分子都不一定能夠擁有。比如說，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你能把一塊被大家叫作國旗的布只當成是條布，拿它來洗澡抹身嗎？光是這么想，都好像十分危險。



新兵受訓期間寄給父親熊次的照片（一九四五年二月攝于牡丹江）

# 國際版序

致各地通過本書而有幸結識的諸位：

不知各位聽到“日本兵”一詞時，腦海中會浮現出何種意象？是否就像亞洲各地人們共有的印象一般，覺得他們是一群自大且殘忍的人？

我并不打算否認這一點。只要是人，多少都會有欺軟怕硬、殘忍、好色的一面。日本兵也是人，他們自然也會帶有這些側面。而且把人們放到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的狀態下，人性中的這些層面會更強烈地展現出來。我個人認為，這種事情與所謂的“民族”“人種”并沒有多大的關系。

不過，評判人的時候，只看這個層面，則有欠公允，也稱不上是正確的認知。在戰場上雖然是殘忍的士兵，在家鄉卻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單看任何一個方面，都無法正確理解一個人。

因此，為了正確理解人類，只看戰爭時期，是不夠充分的。對于日本，或者日本人，也是同樣的道理。他們前往各種戰場之前究竟過著什么樣的生活？思考些什么事情？如何離開故鄉來到戰場？戰爭結束回到日本后，他們又過著什么樣的生活？如果不綜合各種面向來看，就無法正確地理解。

我這本書撰寫的是我父親的生命史。他出生于一九二五年，被卷入戰爭之前，我父親在小商店工作，接受征兵后被送往中國東北，后來遭蘇聯拘留于戰俘營，在西伯利亞度過三年強制勞動的日子。回到日本后，在不斷更換工作之間，還染上了結核病，一直過著在底層掙扎的生活。在此之后，他開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寫的，就是極其平凡、一介小人物的生活。

借由這本書，我希望讀者們可以從中讀到兩件事情。

其一，希望讀者不要把我父親想成一個特殊的人。他在人生晚期，曾與中國朝鮮族的原日本兵共同對日本政府發起了訴訟。聽到這段故事時，有些人會說：“像這種有良心的人，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人吧。”可是，因為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父親并非圣人。

人類的社會，不是由一小部分“好人”與大多數“壞人”組成。只要是人，無論是誰，都有好的一面與壞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對方當圣人來對待，就和只看壞的一面，就把對方當壞人來對待是一樣的，都不是正確的認知。

我父親采取的行動，潛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動。比起贊揚一個人的行動，更重要的是把這種可能性擴散到更多人身上。如果把我父親當成一個特殊的人物，因而把他與其他大部分的人們區分開來，便會妨礙這種可能性的擴散。

其二，希望讀者能夠注意到對社會背景的分析。這本書與其他的傳記不同的是，我針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狀況、法律與政策、外交關系等等，對父親的人生軌跡造成了何等影響做了分析。畢竟我是一位歷史學者，也是社會學者，因此即便是撰寫自己父親的傳記，也一樣留心以公平的態度分析處理。

為什么必須進行這樣的分析？先前我說過，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一般而言，當人們處于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等壞的情況下時，也就容易暴露出人性丑惡的一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若要維持人性美好的一面，個人的努力將會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如何才能創造一個讓更多人都能發揚人性善良面的環境。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思考如何才能消除戰爭或殖民地統治，消解貧困與不平等的狀況，因此，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這本書，并非只是單純記錄下我父親體驗過的“戰爭”與“生活”。所謂的“戰爭”與“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價、收入、社會狀況等要素共同構成的。為了刻畫這些情況，在父親不同的人生時期，國家施行了什么樣的政策與制度？這些措施對人們的生活與經濟造成了何種影響？其結果是否帶來苦難、貧困與相互不信任等苦果？在書中都以分析的角度來撰寫。此外，對于我的父親試圖改進自己人生的努力之中可能受惠于哪些政策或制度亦有提及。在這一點上，本書不僅只是說明過去的歷史，希望也能給當下社會帶來一定的省思。

最后，我想稍微說明自己尊敬父親的哪一點。這本書是通過對父親進行長期訪談后寫成的，在父親所說的諸多事情中，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對他者抱持的想象力。

例如，當我訪談他最痛苦的時期，也就是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體驗，當時在饑寒交迫下，他的朋友不斷死亡，他也一度處于瀕死的狀態，但是當他敘述這些經歷時，我父親卻未曾出口罵過俄國人，說出他們宛如惡魔一般之類的話語。相反的，他卻談起當時蘇聯社會處于如何貧困的狀態，缺乏民主化，可能也存在不公平的現象。而這些也影響到了他們這些戰俘的境遇。對我父親而言，俄國人與自己一樣，都只不過是不好的制度與政策的受害者罷了。

我的父親并沒有顯赫的學歷。不過即便擁有學歷或具備知識的人，也不見得能有如我父親那樣的見解。有知識的人，可能會夸耀自己的偉大，或者使用知識只是為了責罵他人愚蠢，指摘他人是惡魔。父親當時對俄國人會有如上的看法，靠的便是他持有的對他者的想象力。父親擁有這種想象力，是我非常尊敬的部分。

而這種同理心的想象力，正是當下這個世界最需要的。當下的世界，因為國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學歷不同、經濟形態不同等等因素，被不斷地切割區隔。如果我們想要突破這些區隔，想要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種對他者的想象力便是必要的。而為了拓展這種想象力的可能性，知識和分析就很重要。我通過本書想傳達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通過描述父親這樣的人物，向讀者展示這種想象力的可能性。

我們都是人，即便國籍不同、言語不同、階級不同，但同屬人類。如果能喚起大家注意這個理所當然的事實，讓本書對大家有所助益，筆者將深感榮幸。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七月

# 第一章 入伍之前

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東京市中野區早晨七點半。天氣：多云。

十月三十日剛滿十九歲的小熊謙二，自家門前圍繞著親友，這天他將以陸軍二等兵身份入伍。前一天是二十四日，東京開始遭到空襲，一整群美軍的B29戰略轟炸機，飛過謙二家的上空。

五天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入伍通知書送達。除了打電報請人在新潟縣的父親來，幾乎沒有任何準備的時間。

幾年前町內會或國防婦人會還會舉辦揮舞“日之丸”國旗的壯行會，現在已經不舉行了，因為入伍召集逐漸頻繁，大家都變得不再關心。加上前一天的空襲，東京被一股緊迫感籠罩著，聚集過來送行的親友不到十名，誰也沒表現出振奮人心的壯行氣氛。

穿著卡其色國民服的小熊謙二，以當時慣用的語句宣告：“我會堂堂為國盡忠。”與大家打過招呼后，他回頭向祖父母報告：“我出發了。”祖父感極生悲，放聲痛哭了起來。這在當時是極為不尋常的，甚至可以說是禁忌般的舉止。祖母對他說：“去吧，謙（謙二的昵稱）！”仿佛推著他一般，送他出門前往中野車站，祖父則返回家中。

當小熊謙二結束在西伯利亞被俘的日子，再回到日本時，已經是四年后的事情了。

## 一、從北海道到東京

小熊謙二，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于北海道常呂郡佐呂間村（現在的佐呂間町）。佐呂間這個地名，起源于愛努語的SAROMAPE（葦原）。一九一一（明治四十四）年栃木縣谷中村的礦毒受害者們[[1]](#m1)，全村被搬移至此墾殖，以形成栃木聚落而知名。

小熊家原為新潟縣中蒲原郡的素封家[[2]](#m2)，但謙二的祖父因為操作稻米期貨失敗，賠上了田產，家道中落。當時小熊家有三男兩女，生于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的次男小熊雄次，便是小熊謙二的父親。

小熊雄次擁有小學學歷，十八歲時前往札幌，在金井吳服店做學徒，打雜學習。后來因為征兵體檢，又回到新潟，成為衛生兵，并加入當時戰火正熾的日俄戰爭。戰爭結束后的一九〇五（明治三十八）年，他在新潟結婚，再次回到札幌開了一家書店。不過經營失敗，而且受到附近火災延燒波及，書店遭焚毀。到了一九一二（明治四十五）年，他妻子也過世了。雄次帶著當時兩歲與一歲的女兒，于一九一三（大正二）年輾轉來到北海道的網走，在公所大門前開業的一家代書行覓得助手工作。

當時在北海道開拓地，要轉售土地時，得在公所辦理許多手續。但是幾乎沒有人能夠自行填寫表格，所以在公所近旁往往有許多代書行執業。許多讀者應該都還有印象，即便到一九九〇年代，仍然留有許多這種代書行。成長于素封家的雄次，雖然只受過小學教育，卻已擁有這種知識勞動階級具備的能力。



片山旅館（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攝）

當時有許多人長期住在日式旅館或飯店，雄次也是如此。在旅館主人的照顧下，雄次將次女讓給對方當養女，但是此后生活也沒有什么改變。過了一段時間，雄次終于得知網走附近的佐呂間新開拓地即將設立新的公所，他推斷公所成立后，該地區顯然需要代書行，便于一九一四（大正三）年移居到佐呂間。

在輾轉來到北海道的人當中，不乏擁有技能與才智的人，他們各自投身木工、商人等技術行業。如此一來，這些人便在開拓地公所周遭，形成了新的市鎮，其中之一便是中佐呂間，這個區域比農民所住的邊陲地區更富庶。好不容易來到佐呂間的雄次，住在中佐呂間的片山旅館，并在公所前新建的事務所小屋上班，做代書業務。

片山旅館的主人名為片山伊七。伊七在一八七六（明治九）年出生于岡山縣，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移居北海道。在新開拓地佐呂間的建筑熱潮中，片山旅館也熱熱鬧鬧地聚集了從各地集合而來的木工、牛馬販子與商人。伊七本人也當過開拓地農民，后來轉為經營建筑業，并以建筑業所得資金興建了旅館。伊七的妻子小千代則擔任旅館的經營者。

雄次在一九一四（大正三）年十二月，與片山旅館的長女芳江再婚。結婚時雄次三十二歲，芳江時年十八。

聽說芳江的雙親伊七與小千代當初很反對這樁婚事。因為片山家只有兩個女兒，所以希望芳江能招贅一個女婿，日后可繼承經營片山旅館。現在芳江卻想嫁給一個帶著孩子四處漂流的三十多歲的異鄉男人，這實在不是什么太好的選擇。最后的解決方法是，約定兩人婚后生下的小孩中，長男可以作為小熊家的繼承人，次男則必須成為片山家的養子。

話雖如此，后來雄次順利出人頭地，靠著代書業務獲得了資產與人脈，當上了佐呂間“購買組合”的理事長，最終還成為北海道東部地區“產業組合”中具有相當權勢的人。

所謂的“產業組合”，是在政策層面上為了幫助小戶農家對抗貧困而成立的協同組織。《產業組合法》于一九〇〇（明治三十三）年立法后，農村便成立了農業性的、都會則成立了消費性的“購買組合”或“產業組合”。這些便是現在日本“農業協同組合”與“生活協同組合”的起源。由農政官僚柳田國男推動，為了拯救農村脫離貧困而采用“產業組合”為施政手段的事跡，至今仍頗為人稱道。

雄次與芳江夫婦，共育有三男三女。男孩們起名輝一、政一與謙二，女孩們則是光子、泰子與秀子。現年八十八歲的謙二說明如下：

長男與次男的名字，是由岡山的戰國大名“池田輝政”中各取一字而成，而謙二的謙字，則是由新潟的戰國大名“上杉謙信”而來。岡山是片山家的故鄉，新潟是小熊家的故鄉。輝一是小熊家的長男，政一是片山家的長男，謙二則是小熊家的次男。如果又生了四男，大概名字就會叫作“小熊信三”吧。當時庶民百姓的命名方法，大概就是這種樣子。畢竟不管是父親還是外祖父，都只有小學教育[[3]](#m3)程度。

在這些孩子當中，長女光子出生后大約一個月便死亡，剩下的五人當中，如后述，其中兩人在二十歲左右都死于疾病。

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片山伊七與小千代放手旅館生意，前往東京經商。放棄的理由不明，但根據謙二的說法，似乎是因為伊七的建筑事業失敗，背負了什么欺詐的罪名，所以才被迫離開的。

一九三〇（昭和五）年前后，謙二的母親芳江染上結核病，一九三二年七月病逝，享年三十五。當時結核病還屬于沒有治療方法的絕癥。

患病的原因是過度勞動與營養不足。在沒有家用電器產品的年代，生產與養育六個孩子是莫大的負擔。芳江的母親小千代事后回憶：“芳（芳江）告訴我：‘媽，最近我覺得身體好疲憊。’那是讓她生了六個小孩，還過勞操持家務之故。”對此，謙二則表示：

父親雄次大概認為自己讓太太過度操勞，因而導致了她的死亡吧。不過當時的日本，大家都處于過勞狀態，要以此責怪父親，其實也不太公允。加上父親長期過著貧困的生活，即便累積了一些聲望，似乎也從來沒想過可以雇個幫傭來幫忙。

即便芳江生病，雄次仍忙于事業，完全沒有余裕照料孩子們。雄次在芳江過世后又有了第三次婚姻，后逐個將孩子們送往住在東京的伊七處所。大概是判斷自己在佐呂間既無龐大產業，而“產業組合”中的職缺又有限，如果讓孩子們留在當地，往后大概不是變成農民就是從事畜牧業，與其如此，還不如將他們送往東京。

首先是在一九三一（昭和六）年把高等小學校畢業的長男輝一送往東京，隔年連剛進小學的謙二也去了；稍后政一與泰子也被送往東京，最后只有幺女秀子留在佐呂間。雄次好像與片山夫妻達成了協議，由雄次寄養育費到東京，讓片山夫婦撫育這些孩子們。

他們被送到東京時，正值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日本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增長與衰退，市場經濟正式滲透到社會各階層，而金融貿易也進入國際化的時期。一方面來說，可以看到都會區中產階級市民抬頭，成為日后消費文化的起源；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時期也發生了農村人口急速外流、都市人口大量膨脹的狀況。“農業組合”與“購買組合”也是因都市與地方貧困不安定，以及出現貧富差距問題為背景而興起的。這些狀況正預告了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即將到來。

## 二、謙二的小學記憶

謙二還住在佐呂間時，就幾乎沒有任何關于母親的記憶。從他懂事起，母親已經結核病發，被隔離療養。在謙二的記憶中，只有似乎是母親的女性坐在廊緣上的身姿這樣模糊的印象，而父親總是忙于事業，幾乎沒有父子共處或受父親照顧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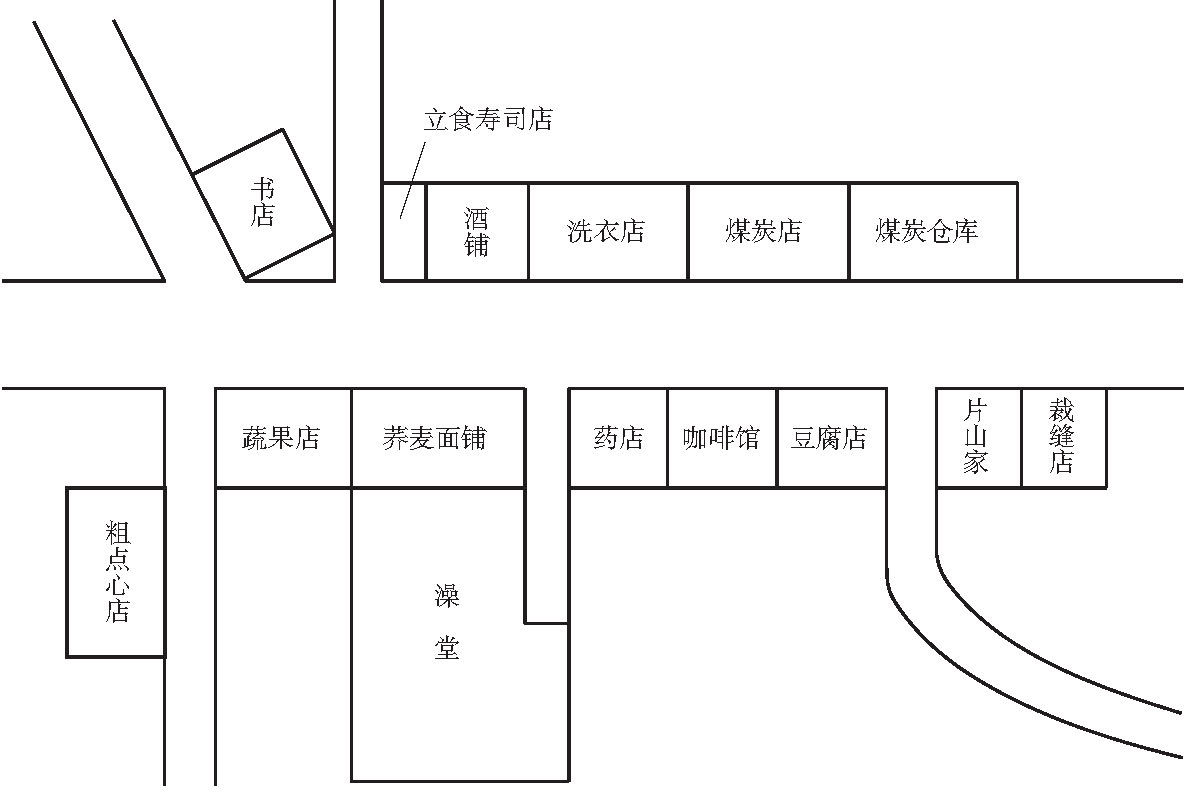
謙二實歲六歲，母親芳江剛在這一年的七月病逝（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攝）

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外祖母小千代終于來到佐呂間，她是為了女兒臨終的照護與其后的喪禮，以及帶走謙二而來的。

當時年僅六歲的謙二，對自己要被送往東京一事完全不知情，說自己“帶著好像要去遠足般的輕松心情”。日后聽小千代說，當時搭公車從佐呂間前往火車站途中，謙二曾說了句“還是別去了吧”，讓小千代感到相當困擾。至于初次到達東京的印象，則是“總之是人很多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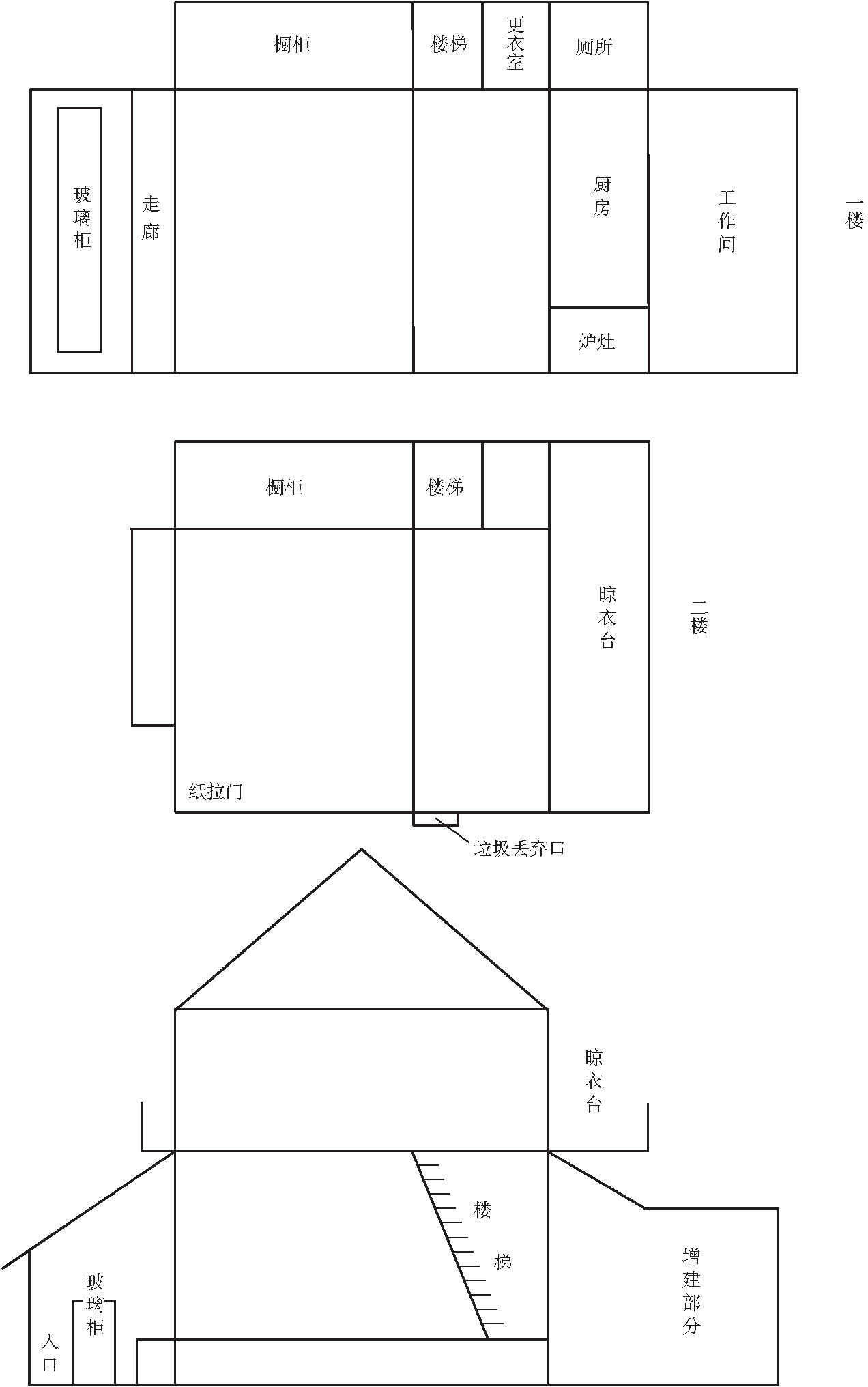
外祖父片山伊七在東京市杉并區高圓寺的蠶絲試驗場（現在的“蠶絲之森公園”）附近，經營一家糕點店。對于前來東京卻既無學歷又無技能的人而言，許多人都選擇經營零售商店。糕點店是其中最不需要技能的商店之一。

在這個時代，還沒有政府認定的調理師證照，所以可以自由開業。但也因為如此，離開農村來都市創業的人口過多，零售商店也過度密集。一九三〇年代初，東京市內平均每十六戶就有一家糕點店，每二十三戶就有一家米行。經營狀態也同樣不穩定，同一時期浦和市的小商店，平均營業年限為一年十一個月，即便是鬧區銀座，也僅有四年左右。



高圓寺自家周邊

根據謙二的回憶，片山伊七是一位“干練的人”。雖歷經了開拓地農民、建筑業、旅館業后，來到東京，但他完全沒有學過如何制作糕點。除了在高圓寺租屋處自制豆沙包外，伊七也從錦系町的糕點批發商購入糖飴與餡子玉等便宜點心，陳列于店頭售賣。年幼的謙二也曾數度跟著伊七前往批發商那里。附有抽獎的點心則是附近孩童最喜歡的人氣商品。



高圓寺住宅格局

伊七他們一家租住的房屋是一棟兩層樓的房舍，隔成兩戶租給兩家商店。以現代的詞語來說明，兩戶都是樓中樓那樣的形式。面對一樓入口的是大約三疊（三張榻榻米）大小的店面，并排著批來的糕點。接著以日式拉門隔開，后方是六疊（六張榻榻米）大小的起居間和三疊的廚房，再往里走就是伊七增建的工作間，可在此蒸豆沙包。二樓有晾衣臺與店鋪看板，一樣隔為三疊與六疊兩房。

在這個租屋中，先被送到東京來的長男輝一睡在二樓，一樓則睡著外祖父母與幼小的謙二。家具大概只有櫥柜，不過伊七頗喜好新奇的產品，聽說一九三四（昭和九）年前后，家中就有了收音機。

大約十戶共用一管自來水，要向管理人借鑰匙才能打開。洗衣服則靠一八七七（明治十）年出生的小千代以大臉盆手洗，但因家務勞動頗多，所以大概是四至五天才會換洗一次內衣。要等到進入經濟高度發展期，洗衣機普及以后，日本的庶民才開始每天更換內衣。洗澡則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錢湯[[4]](#m4)去一次。

飲食方面“只要有米飯與帶有咸味的東西就可湊和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漬物與米飯為主。謙二回憶說：“幾乎沒有吃魚或肉的記憶。”因為物流不發達，魚肉多為曬過的魚干，鮮魚大概只有沙丁魚，而且并不真的新鮮。

一個月不見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大多以豬肉為主。偶爾得到一只雞，就會與左鄰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鮮雞肉，在沒有冰箱的社會，分享是保存鮮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購買，魚或肉則到蠶絲試驗場附近的市場購買。小千代平時忙于家務，完全沒有時間烹煮精致的料理。

根據謙二的說法，當時家境“大概恩格爾系數達到60%吧”[[5]](#m5)，即便如此，“也有自來水，飲食感覺比在佐呂間還來得好”。小熊家在佐呂間已經處于上層階級的位置了，即便如此仍感到上述東京生活狀況優于佐呂間，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城鄉的巨大差距。

順帶一提，佐呂間村是一個面海的行政區域，但當時缺乏將魚運入內陸的物流手段，所以謙二在佐呂間幾乎不記得有吃過魚肉。當時的佐呂間也沒有自行車，人力以外的輸送手段就是馬或馬橇，但馬需要飼養，也須雇用馬夫，相當耗費成本。要以這種手段將鮮魚運到佐呂間，價格必定奇高無比，以佐呂間居民的收入，大概不會有人購買，因此更無魚肉流通。

租下他們隔壁房舍的一家人是西服裁縫師。附近的居民包括片山家，日常穿著上，女性是和服，男性是工作服和和服。不過男性為了參加婚喪喜慶，會備有一套西裝。當時鮮少事先做好可掛在店面任人選購的“吊掛成衣”，大部分都得靠裁縫師。根據謙二的說法，當時仍穿著普通內褲，“兜襠布是征兵體檢與入伍后才被命令穿著的”。

鄰居裁縫師養有六個孩子，生活似乎也非常辛苦。這一家人原本住在東京東部一個叫作深川的下町（現在的江東區深川），關東大地震后才移居到現在的處所。當時的東京庶民一般都是租屋而居，許多人居住的下町在地震中被燒毀，也有不少人移居到東京西部的世田谷或杉并等農村地帶。

根據謙二的回憶，他家附近就是一個小商店街。街上有蔬果店、豆腐店、煤炭店、藥店、澡堂等等，大部分都是賣日常用品的商店，不過也有洗衣店、壽司店、咖啡館、書店等。這個時期，除了如片山家開業的這種零售商店外，由于要到東京市中心上班的中產階級上班族也開始住在高圓寺周邊，所以洗衣店、咖啡館等就是為了服務這些中產階層的客戶開設的。

謙二自己說，因為片山家本身不是中產階級，所以沒利用過洗衣店，也不曾在壽司店吃過一餐。

當時的庶民，既沒有年金制度也沒有健康保險，為了給生病或老年生活做準備，都省吃儉用地存錢。店里的出納與家計狀況都由我外祖父（伊七）記錄，每到夜里就會問外祖母（小千代）：“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錢啊？”當時的小銀行數量比現在多上許多，家附近就有中野銀行、不動銀行等等。老居民之間，則還有互助會的習慣。

根據謙二的回憶，當時附近的農地也在逐漸消失，其上不斷蓋起新的房屋。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日本國有鐵道正式在高圓寺設站啟用，加上連接新宿與荻洼的西武軌道也開通（二戰之后變成都電杉并線，后與地下鐵丸之內線競爭，一九六三年此路線廢止），因此，到市中心上班的人們便不斷移居到這些郊外住宅區。

當時的高圓寺一帶混居著好幾個類型的人，一是像隔壁裁縫師一家那樣，因為地震，房屋被燒毀，從東京東部轉來此處者；二是像片山家一樣出身于全國各地，移入東京的人；三是到東京市中心上班的中產階級，因此人口也急速地膨脹。本來這個區域過去屬于東京府豐多摩郡，謙二移居過來的一九三二年，剛好遇到市郡合并，此地被編入東京市，改制為杉并區。

順帶一提，附近的咖啡館，白天會提供咖喱飯與炸豬排飯等所謂的“洋食”，所以小千代管它叫“洋食屋”。一到夜里，會有兩三名女服務生端酒出來服務。當時還是小學生的謙二，曾經偷偷掀開店門口的遮布，向內窺探——店內裝飾著人造櫻花，在彩色燈泡照耀下的昏暗店內，可以看到女服務生與顧客們。

住處旁有主要干道青梅街道，附近其他道路的寬度大概都只能勉強供兩輪的人力板車通過。當時馬路上跑的有自行車、人力拖車、公車巴士、有軌電車等等，偶爾也會有大卡車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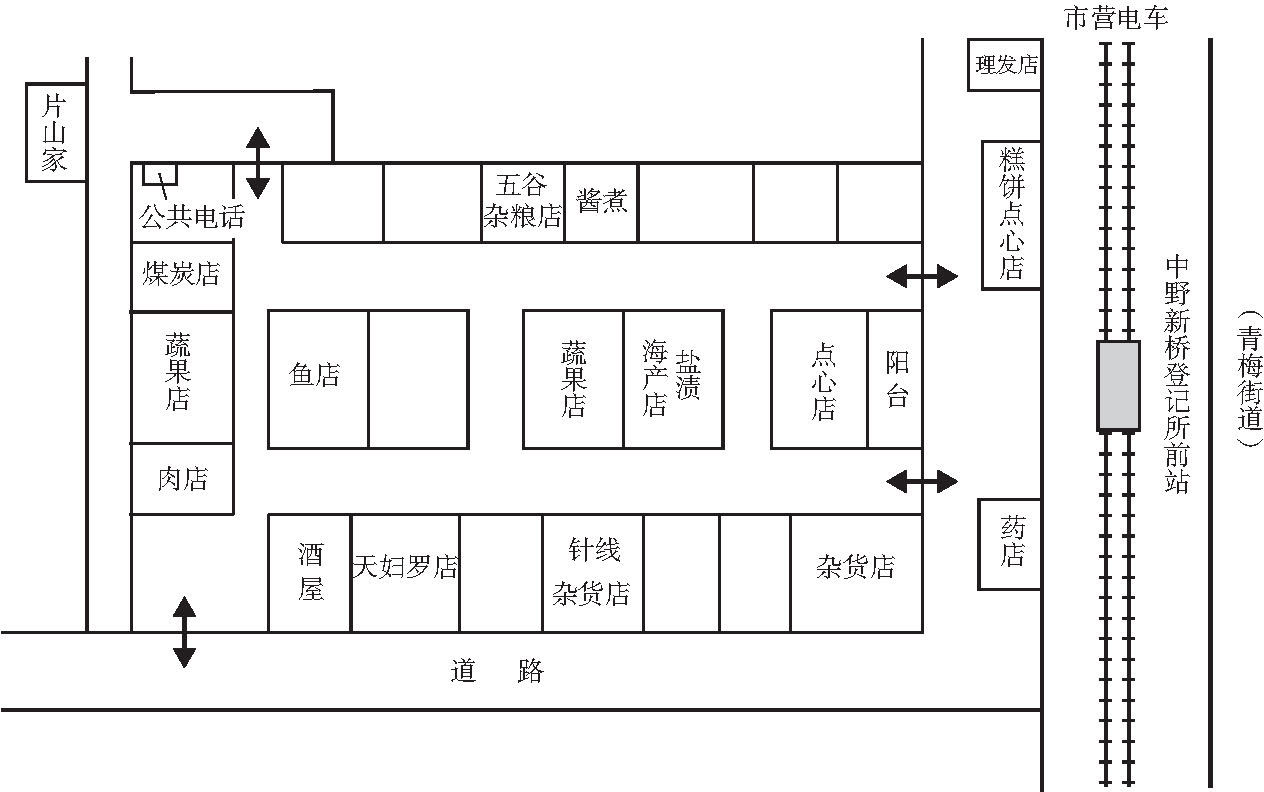
私人轎車尚未普及，出租車也幾乎都是左駕的外國汽車，由駕駛員與攬客員兩人一組共同做生意，駕駛慢慢開著車，攬客員與路旁行人搭腔聊天，招攬顧客乘車。日語稱為“大八車”的多人拉的大板車大多被單人的人力拉車取代，當時已經不常見到，但聽說日本快要戰敗，對都會居民執行強制疏散的時期，卻不知從哪里又冒出了令人訝異的大量“大八車”，被人們拉著滿街跑。

在謙二的記憶里，伊七的身影從未出現在集會或社區大會等居民組織上。謙二說不知道是否因為該地區屬于新興區域，“所以還沒有出現類似居民組織的團體”。

一九二五年，日本施行普通選舉法，伊七身為二十五歲以上男性，按理應該也有參政權，但謙二完全不記得伊七去投過票，或者被特定候選人拉票的情形。謙二只依稀記得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左右，看過大規模拒絕買票與賄賂的“選舉肅正”活動，并依稀記得那些標語。

謙二來到東京時，長男輝一已經十五歲，比起謙二，看起來已經是個小大人了。輝一在伊七的手下幫忙買賣，大概兩年之后便在被稱為“大中野市場”的中野公營市場里開店賣天婦羅。不過這并非料理餐飲店，而是為來公營市場購物的婦人們（也就是“上班族”“商店主人”“臨時雇員”的“太太”或“飯店女老板”們）——提供炸好的天婦羅這一家常的晚餐配菜。

伊七把輝一放在自己身旁，讓他學習商人該理解的知識，希望借此幫助他往后能夠自立。根據謙二的說法：“不管是父親雄次或者是外祖父伊七，當時的庶民百姓，完全沒有讓孩子接受教育的想法。心中單純的考慮就是該如何讓孩子學會養活自己而已。”



中野公營市場格局

大中野公營市場面朝著西武鐵道路線的“登記所前”站。謙二說：“入口處有糕餅點心店與藥店，市場內有天婦羅店、酒鋪、蔬果店、陳列裁縫工具的日用雜貨店等，各式各樣的店鋪，足以應付各種需求。入口處有類似陽臺的夾層，每個月一日與十五日的促銷日，會有扮裝藝人在上面敲鑼打鼓促銷。”

西武鐵道路線沿著青梅街道通過，馬路對面有一處叫作中野新橋的“三業地”。藝伎中介屋、包廂茶室、日本料理餐館（料亭）等，集中了這些需要向政府申請營業許可才得以開業的“三業”店家，成為娛樂街區。“有錢人來找藝伎飲酒作樂，那邊屬于另一個世界。”

輝一經營天婦羅店的公營市場，由當時的地方政府所設置。現在發展中國家也能看到許多類似的市場形式，由公家機關提供建筑物，讓小商店聚集開業。日本各地都還保留著這類市場，特別是沖繩的那霸市牧志公營市場最具名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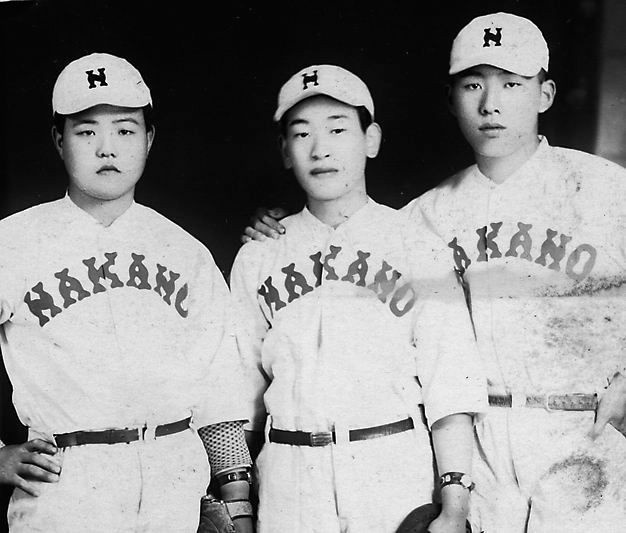
由個別零售商店銷售給個別消費者的經營形態，往往無法與大資本進行對抗，小商店經常處于經營不穩定的狀態，很容易發生非法銷售或者價格大幅波動的情形。特別在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因為發生“米騷動”，稻米價格暴漲，進而引發都市居民暴動，事件之后如何穩定商業買賣的價格，變成政府的重要課題。在這個背景下，公家機關帶頭領導，試圖讓商人們達成共識，并且在“米騷動”的隔年，在東京的六個處所設立公營市場。輝一開天婦羅店的中野公營市場，正是這項政策的一環。這與農村的“產業組合”一樣，都是通過引導大家相互協調，獲得一致共識，從而實現市場秩序穩定的一種嘗試。

同樣屬于這種協同一致嘗試的另一種形式就是城鎮商店街。距離片山家最近的車站是西武線山谷站（現在的丸之內線東高圓寺站附近），車站附近就有名為“共榮會市場”的商店街，街道上方搭有可遮風避雨的拱頂（Arcade）。街道寬度可讓行人通過，兩側都是一樓為店面、二樓為住家的住商混合店鋪，林立著魚店、蔬果店、針線雜貨鋪等商家。當時的東京，零售商店的店家們為了與百貨公司對抗，也出現過聯合出資搭設拱廊街道、共同籌組商店街的案例。

依據謙二的回憶，經營天婦羅店的輝一，擁有庶民的開朗性格。他參加了由公營市場青年們組成的棒球隊，還留下了穿著棒球制服的照片。此外，在高圓寺舉辦盂蘭盆會舞時，他還會在臨時搭建的高臺上，配合《東京舞曲》的祭典音樂，負責敲打太鼓。

譜于一九三二（昭和七）年的《丸之內舞曲》，隔年更改標題與歌詞成為《東京舞曲》，并錄制成唱片發行，成為東京的“當地歌謠”。

根據謙二的說法：“對隔壁裁縫師一家這種土生土長的東京人而言，一邊唱《東京舞曲》，一邊跳納涼舞蹈，實在充滿了鄉下人的俗氣感，他們其實很看不起這種活動。這種祭典會風行起來，或許也說明了東京市內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了吧。”



穿著棒球制服的輝一（中間）

一九三二年七月，從佐呂間被帶來東京的謙二轉學進入杉并區第三小學校，成為一年級學生。小學內男女分班，每一學年四個班級當中，兩班為男學生，由男老師指導；兩班為女學生，由女老師指導。謙二也買了日式的雙肩背書包（ransel），但其實是里面夾著厚紙板、外面包上人造皮的產品。

學校的班級里混有零售商店、工匠職人、臨時雇傭等家庭背景的孩子們，當然還有被稱為“月薪族”的中產階級的小孩。在謙二的記憶里，同學中已經沒有父母親是農民的人了。至于“月薪族”學生所占的比例：

記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有四成吧。若能對照畢業紀念冊，光看服裝與臉孔就可以分辨出來。

當時的學校，不像今天這樣采取平等主義。我到畢業為止，從來沒參加過才藝表演會。擔綱演出的大抵都是“月薪族”的孩子們。現在的話都是全班學生共同分配任務，當時卻沒有這種考量。戲劇演出是為了讓地方上有權勢的來賓觀看，而非給自己雙親參觀。何況自己的外祖父母都忙于工作，原本就不可能來參加這種表演活動。

大概是五年級的時候，孩子們在校園內玩耍后去洗臉，只有“月薪族”的孩子們才拿得出手帕擦手。路過的女老師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某某君很有教養喔。”而我們這些非中階級的孩子們也只是想著“有手帕就是好的嗎”，其實也沒什么自卑感。

臨時雇傭或擺地攤的家庭，比起片山家這種開店鋪的零售商人家更貧窮。謙二也曾看過攤販的孩子們跟著雙親一起拉人力拖車的場景。隔壁裁縫師一家人原來居住在深川的老家，附近有許多朝鮮人，是二戰之前唯一有朝鮮人當選眾議員的地區。不過居住在高圓寺的謙二，卻沒有見過朝鮮人或中國人的印象。

沒有店鋪的地攤商人，沿著附近的青梅街道，每逢周末就擺攤成為夜市。周末以外的時間，就去應聘臨時雇傭賺錢。這些攤販們靠著一張嘴叫賣香蕉或者鋼筆，邊拍著攤位木板助威邊叫賣，叫賣方式如下：“來喔來喔，這鋼筆，因為工廠遭火災，搶救時半路掉進水溝泡了水，賣相看來不好，實際上是貨真價實的高級品。買到賺到喔！”

“因為大家都還是孩子，所以同學們對雙親職業上的階級差異，并不太在意。”雖說如此，但商人及工匠職人的孩子們并不與“月薪族”的孩子一起玩。謙二與家中經營小商店的孩子們玩在一塊，一起打陀螺或玩“啪嘰”（一種舊時供兒童玩樂用的紙牌），也會玩一種叫作“水雷艦長”的戰爭游戲。玩耍的場地不是在棄耕后尚未蓋上新住宅的“空地”，就是在自行車無法通過的商店街內側巷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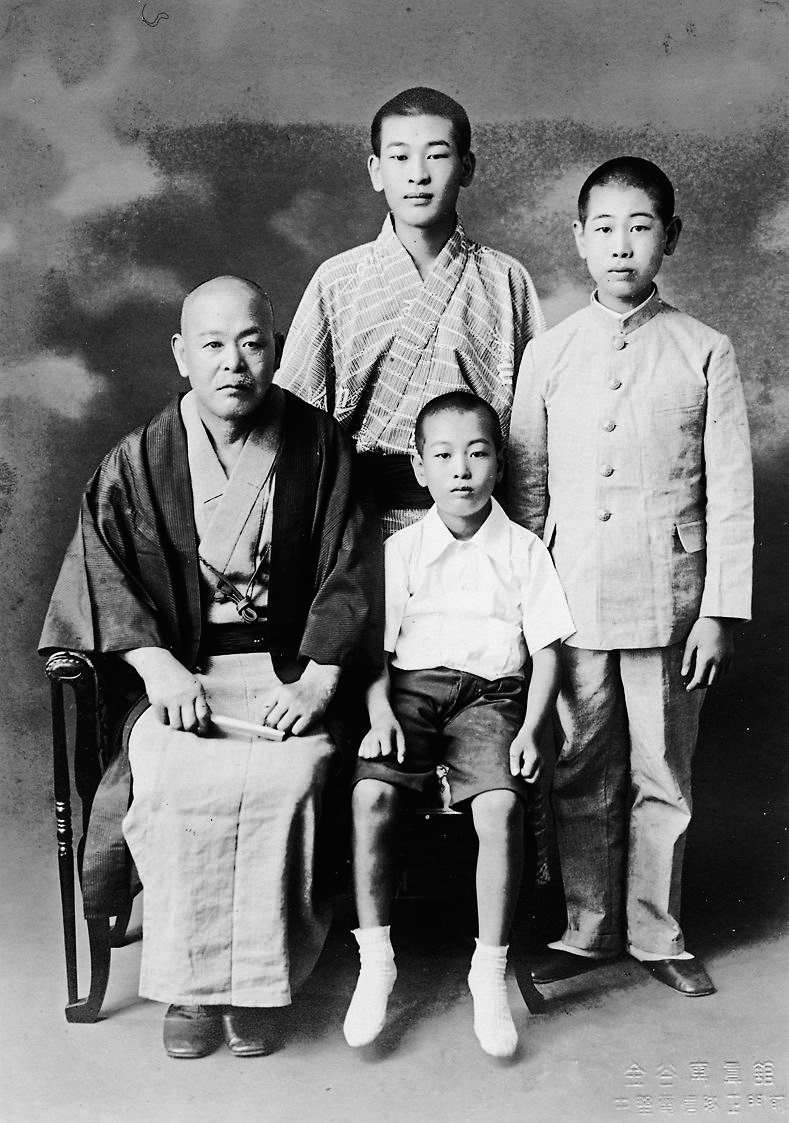
伊七與小千代叫謙二時都只喊“謙”，聽起來好像很憐愛這孩子，但其實因為工作與家務繁忙，根本沒時間照料小孩。如果老纏著外祖父母，就會被罵“煩人”而被趕到外頭去，放學回家也沒在讀書，只是忙著和附近的孩子們玩耍。

小孩子們會以五年級學生為領袖形成集團，以周圍一百米內的方形區塊為“地盤”，一群孩子就在此范圍內玩耍。如果迷路跑出自己的“地盤”，就會被隔壁“地盤”的孩子集體驅逐。所以即便父母親沒有照看著自己的孩子，較年長的孩子也會監督自己集團的成員，不至于出現被孤立、獨自在街上徘徊的狀況。而六年級以上的學童，會自然離開這群孩子，開始為今后獨立工作進行準備。

“月薪族”階層的孩子們，往往可以讓父母為自己購買《少年俱樂部》之類的雜志，而商人與工匠職人的孩子們就只能輪流傳閱。謙二與隔壁裁縫師家的男孩一起與“家中有氣派大門，父親工作是買賣股票的男孩”成為好友，這個好友會唆使自己父母為他買書或雜志，他們就輪流閱讀。謙二除了購買自身必要的物品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零用錢，也從未自己買過書本。

“月薪族”階級的孩子之間雖然也會有所交流，但光是居家的形式就截然不同。商人的住處往往店面后方就是起居間：“‘月薪族’的家庭，房屋會有圍墻、大門與玄關，自己家中也有浴室。孩子們也具有較好的教養。”

好不容易盼到巡回來到附近的紙戲說書人，謙二說：“紙戲大概都是一次講三個故事，開頭是搞笑漫畫，接著是悲劇式的少女故事，第三個就是類似‘少年老虎’與‘黃金蝙蝠’等動作戲的故事。”



前排由左至右為外祖父片山（五十七歲）、謙二（滿八歲）、政一（十六歲），后排為輝一（十八歲）（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攝）

伊七與小千代都喜歡看戲，也曾為了看歌舞伎，把謙二一起帶到數寄屋橋附近看表演。在杉并線山谷站附近的共榮會市場中，有一處叫作“光風亭”的小戲館，也兼有寄席表演[[6]](#m6)，外祖父母會帶著謙二，到這個戲館去看俠義英雄的武打戲劇。另外也曾經帶著謙二搭杉并線去新宿的伊勢丹百貨。

除此之外的娛樂就是電影了。在中野鬧區的鍋谷橫町有一家叫作城西館的電影院，屬于松竹電影系統；另外還有一家城西館電影院，屬于日活電影系統。外祖父母也喜歡看電影，經常帶著謙二前去觀賞。因為當時沒有針對兒童拍攝的電影，所以謙二跟著外祖父母去看了由當年大眾小說 《人妻椿》 改編而成的電影[[7]](#m7)。隨著電影的普及，電影院逐漸取代郊區的劇場，就連共榮會市場的“光風亭”也于一九三七年前后改名為“光風電影劇場”，成為播放電影的戲院。



謙二（左）攝于杉并第三小學運動會

小學生時代的其他娛樂，便是附近神社的祭典：“當戴著阿龜與火男[[8]](#m8)跳舞的祭神音樂響起，神社也會開辦夜市。平常并不會去神社參拜，但有夜市時就會跑去玩。當時與現在不同，孩子晚上能出去玩的地方，只有神社祭典的夜市。”

可是，像這樣都會底層的庶民生活，也隨著戰爭的腳步聲逐漸產生了變化。

## 三、升學時代來臨

謙二進入小學的前一年——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中國東北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當他轉入杉并區的小學時，孩童們之間正流行著“肉彈三勇士”[[9]](#m9)這個詞匯。大家傳閱的書籍大多是類似山中峰太郎的《亞細亞的曙光》，或平田晉策的《昭和游擊隊》這種書。

雖然如此，“當初的戰爭，并非如往后那樣荒唐無稽”，根據謙二的說法：“戰爭變得詭譎，是從中日戰爭[[10]](#m10)爆發之后開始的。”

例如一九三二年五月號《少年俱樂部》雜志刊登了一篇由軍事評論家平田晉策撰寫的戰局推演文章，題名為《日米もし戦はば》（日美如果發生戰爭）。當這篇文章以單行本出版后，謙二也向同學借來閱讀，內容是根據日本與美國之國力、軍事力，以及當時兩國的基本戰略計劃為基礎，推估未來將會在西太平洋地區發生會戰。但到了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夏天，偶爾讀到的一篇戰局推演文章，內容卻寫著日軍在美國西岸登陸，并且攻陷美國首都華盛頓。

一九三〇年前后，雖然開始強化愛國教育，但也沒有往后幾年那樣的高壓方式。雖然教育敕語[[11]](#m11)“重復不斷，聽到耳朵快長繭了”，教師也教導學童歷代天皇的名號，但謙二只記得四五代天皇的名字，而且也不記得需要向“日之丸”國旗敬禮，或者得進行宮城遙拜[[12]](#m12)。

小學五年級還是六年級的時候，學校蓋了收藏天皇照片“御真影”的奉安殿[[13]](#m13)。當時只是覺得“蓋了一座好奇怪的建筑物啊”。至于上下學時得向校園中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敬禮，是中日戰爭開始之后的事情。昭和十三年二月，小學六年級時參加了前往伊勢神宮的畢業旅行，記得搭火車很開心，其他就沒留下什么印象了。

原本正月、紀元節、天長節、明治節等四大節日時，一定會舉辦儀式，由校長奉讀教育敕語。奉讀的時候，學生們必須低頭列隊聆聽。當時的小孩經常流鼻涕，而且大部分人都沒有帶手帕或面紙的習慣，所以校長讀教育敕語時，總是可以聽到此起彼落吸鼻子的聲音。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二月，謙二小學四年級時，日本發生了“二二六事件”[[14]](#m14)。不過大家更有印象的，卻是發生于同年五月的“阿部定事件”[[15]](#m15)，附近的大人小孩，大家都以此為話題。“局所”[[16]](#m16)這個詞匯，也在孩童之間流行開來，雖然小孩根本不了解這個詞匯的意思。

即便戰爭的腳步迫近，但庶民百姓的生活依然悠閑。甚至與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不景氣相比，“九一八事變”后出現的軍需景氣，反而促成了經濟上的好轉。

片山家也從這個景氣中得到了好處。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伊七從屯駐于中野的第一電信連隊“酒保”中取得商機。所謂的“酒保”，是指軍隊內的小賣部，士兵們休息時會到此處購買飲食，伊七不知從哪里獲得了在此售賣豆沙包與烏龍面的權利。自家制的豆沙包拿來此地，保證可以賣得出去。能夠在公家部門做買賣，對零售業者來說是相當安定的差事。伊七還雇用了三個員工，為此擴大了事業。

另外在一九三三（昭和八）年，次男政一從佐呂間小學畢業，終于來到了東京的伊七身邊。政一在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17]](#m17)覓得“技手”一職。技手是由小學或者高等小學畢業生中招募而來，受聘者像徒弟一般，是一種培養下級軍官的方式。雖然無法晉升到中堅干部以上的職位，卻是相當安定的職業。至于政一是通過什么方法獲得這個職缺，謙二說他也不清楚。

輝一與政一雖是兄弟，個性卻迥然不同。輝一是庶民性格，相當開朗，對謙二而言是無話不說的好大哥。與此相對，政一就有點難以取悅，根據謙二的說法，是一位“有志于成為知識分子的人”。

依照謙二父母結婚時的約定，已經決定讓次男政一成為片山家的養子，所以他的名字成為“片山政一”。不過諷刺的是，政一與輝一不同，他并不想成為商人。與完全不關心升學的伊七和輝一相反，政一進入陸地測量部，一邊工作一邊到中學夜校上課。

另一方面，輝一跟著喜歡圍棋的伊七學下棋，政一則在夜校上課之余，自己獨力學習棋譜，夜里一個人與自己下棋。日后謙二看到輝一的日記中寫道：“自己與政一宛如‘水與油’一般，互不相容。”

兩個人的差異，大概是因為原本的性格就不相同。但與從事零售商的輝一相對，政一在學歷直接關系到薪資與職位的官僚組織中工作，這種不同的境遇多少也造成了影響。

一九三五（昭和十）年，次女泰子從佐呂間的小學畢業，終于也來到了東京。泰子從杉并的高等小學畢業后，通過身為“產業組合”大佬的父親牽線，進入位于丸之內的農林中央全國組織任職，成為事務員。泰子個性溫柔，一邊工作，晚上也到女子商業學校上課。

如此乍看之下安定的生活，卻在謙二升上小學四年級的一九三五（昭和十）年被烏云籠罩。就在泰子來東京后沒多久，長男輝一結核病發。

當時結核病尚無療法，只能提供讓病人靜養與補充營養的處理方式。在還沒有健康保險制度的那個時代，家中出現結核病患者，對庶民而言是相當大的負擔。所幸，靠著雄次的經濟能力，輝一得以進入江古田的療養所，但輝一仍在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八月，滿二十歲這年過世了。

輝一死于結核病，或許與遺傳自母親的體質有關，但營養狀況與都市環境也有影響。可是外祖父伊七卻不這么想。伊七似乎認為輝一花費心神研究圍棋到深夜，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損害，因為這個理由，伊七非常后悔教輝一下圍棋。伊七把自己的棋盤與棋子都送給了別人，此后再也不下圍棋了。輝一的衣服等遺物，也全都被處理掉。

在輝一過世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初夏，片山一家由高圓寺移居到中野區租屋。伊七在辭去“酒保”的工作后，為了接續輝一在中野公營市場經營的天婦羅店，因而遷居至此。為此，原本開在高圓寺的糕點店也關門了。開業之后經營了五年，在當時的零售商店來看，也算經營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中野的租屋是平房，有六疊的客廳與廚房，另外還有四疊半與三疊的兩個隔間。大小其實與高圓寺一棟兩戶的房舍差不多，但廚房有瓦斯爐與自來水，比起舊屋有所改善。

在北海道干過建筑業的伊七，靠自己的力量擴建了這個家，另外設置了約八疊大小的工作間與浴室。他更發揮與生俱來的精明干練，在五十八歲之齡還掌握了如何炸天婦羅的技巧。八疊大小的工作間內有一個冰柜，可以放置炸天婦羅用的沙丁魚和烏賊，冰柜使用的冰塊則由賣冰的商家送來。

天婦羅店的日常經營狀況如下：早上六點到七點之間起床，整個上午先在自家的工作間準備天婦羅的食材，也就是切菜、剖沙丁魚拔骨等作業。接著將這些材料帶到公營市場的店面，下午就在店鋪炸熟，讓傍晚來購物的顧客可以買到剛炸好的配菜。下午四五點炸天婦羅作業大致結束，之后便輪流看店。一邊工作一邊上夜校的政一與泰子，兩人都很晚回家。因此全家人團聚共享晚餐的機會也非常少。

賣剩的天婦羅，隔天就在店面便宜出售。購買的顧客也都知道這是前一天賣剩的商品。當時貨物流通不易，天婦羅用的沙丁魚鮮度不高，據說事先拔骨時，骨頭與魚肉很容易分離。至于商品的品質，就由買方自行判斷了。

政府方面的行政管理，對這些買賣也不至于太啰唆。某次，東京市保健衛生課的人員來到店面指導伊七，提醒說為了防止陳列于店面的天婦羅被掉落的灰塵污染，應該設置一個玻璃柜來盛放炸好的商品。但伊七抗辯說，將炸好的天婦羅放進玻璃柜，熱氣會充滿整個柜子，顧客就看不到商品。從此之后就沒有再接到任何管理方面的指導了。

售賣價格方面，蔬菜天婦羅每個日幣一錢，沙丁魚天婦羅每個兩錢到三錢。因為單價便宜，所以若不準備足夠多的數量就無法賺錢。公營市場并沒有休市的日子，如果休息，就等于少去一天的收入，因此只有遇上私人婚喪等事宜才會休業一天。

移居中野后，小千代的外甥，當時十六歲的時岡精也立刻來到東京。他住在片山家，并成為天婦羅店的雇員。

時岡生于小農家，只有小學畢業，但他自行購買市面上售賣的早稻田中學授課錄，自學成才。當時失去輝一的小千代向時岡提議，請時岡到東京來一同居住，并且來做天婦羅店的店員，但一心想到東京求學的時岡，卻對這樣的提議不太感興趣。時岡希望成為作家，撰寫以農村為主題的小說，聽說連輪流看店的空閑時間都會拿來寫作。

移居中野后的一九三七年，謙二升上小學六年級。搬家后，謙二仍舊搭電車回杉并第三小學上課，是個毫不起眼的學生。成績大約中等，并不擅長運動。既沒有值得夸耀的特殊技能，對將來也沒有特別的期望。在家也不太讀書，與立志成為作家的時岡相反，只讀過《怪杰黑頭巾》[[18]](#m18)這類作品。

雄次與伊七都認為，小學畢業后再讓謙二讀兩年高等小學，之后便可以找工作賺錢。謙二本人也這么想。可是最后謙二竟成為兄弟姊妹中，第一個進入日間部中學就讀的人。

就學的契機是次男政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前后，政一告訴伊七：“今后不就讀日間部的學校是沒出路的。”強力勸說讓謙二升學。如前所述，政一擔任陸地測量部的“技手”，在學歷決定能否升遷的世界中，一邊工作，一邊上中學夜間部。

想要進入不屬義務教育的舊制中學就讀，必須負擔不少費用。一九二九年時，小學教員的月薪是四十六日元，而東京市立中學在這一年的入學學費，光基本所需的直接費用就要一百四十六日元十九錢。即便考試合格入學了，也有許多人因為經濟上的問題而中途退學。即便升學到這個層級，除了進入政府或大企業的極小部分人員以外，這學歷在其他職場中幾乎沒有什么作用。只讀過小學、靠著自己白手起家的伊七或雄次會認為升學只是浪費金錢與時間，也并非毫無道理。

但是，時代正在遽變。在一九三七年這個時點上，中等教育的升學率有百分之十三，只看舊制中學則有百分之七的升學率，不過都會區域的升學率卻猛然上竄。在謙二的記憶中，杉并第三小學的同學們，從五年級左右就開始準備升學考試，同學年的學生有近半數都準備升學。

造成這種情況的背景，是戰爭所帶來的景氣促使軍需產業抬頭，日本經濟的重工業、化學工業隨之發展。白領階級的學歷與職位升遷息息相關，而隨著白領階級雇用數量的提升，能夠籌措學費的工薪階層也開始增加。今天的謙二也說：“伴隨升學率的提升，在東京，連像我這種成績不佳又沒有清晰人生目標的孩子，也能夠升學了。時代已經逐漸走到必須繼續升學的階段了。”

伊七接受了政一的建議，與雄次商量，讓雄次提供學費。雖然說這段時期經濟景氣，但只依靠伊七的經濟實力，斷不可能供應謙二升學所需的費用。在謙二的記憶中，同學年的升學班學生中，“月薪族”的孩子們占了大多數。

就這樣決定了讓謙二繼續升學，但他開始準備升學考試已經是六年級的十一月份暨第二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升上六年級后，準備升學的學生坐到教室黑板的正前方，不升學的學生就被安排到教室兩旁的位置，升學組每天下課后還有兩到三個小時的補習授課。

謙二也參加了補習，但與早就參加的學生們相較，程度差距頗大。國文課姑且不論，算術課還有特殊的“雞兔同籠”問題，以他的程度根本無法應付。

最后謙二報考了“早稻田實業學校”[[19]](#m19)。因為周圍的優秀兒童大多瞄準東京師范中學（現在的筑波大學附屬中學）或府立六中（新宿高中）那種學校，謙二怎么看也考不進這些學校，所以干脆報考“早實”：“當時的早實只是間職業技術學校。外祖父也認為，既然是商人的孩子，進早實其實也是適合的選擇。”

結果，謙二成功考上了早實。可是：“入學后一看，明明是職業技術學校，卻沒幾個學生想鉆研職業技術。幾乎絕大部分的學生都跟自己一樣，缺乏明確的人生目標，只是程度剛好到這里，便考了進來。”謙二從中野搭西武杉并線到新宿，開始了早實的走讀時光。

接下來暫時持續了一陣平穩的日子。與同學一起到神宮球場看東京六所大學的棒球聯賽、出外遠足踏青等等。到中學三年級時，謙二喜歡上了西洋電影，每周兩次，前往新宿的二番館，看過《望鄉》[[20]](#m20)、《午夜花的世界》[[21]](#m21)等電影。謙二進入中學后依然不太愛讀書，每當想成為作家的時岡拜托謙二針對自己寫的小說給予評論時，他就回答：“我只能幫你抓抓錯字而已。”不過他逐漸也開始關心報紙上的國際新聞，甚至會注意西班牙內戰的消息。

可是，大家以為很快就能獲勝的對中戰爭，卻一直沒有結束的跡象。最初只是看到新聞報導時會略感焦躁，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終于給日常生活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 四、走向統制經濟與愛國教育

根據謙二的說法，日常生活發生變化的第一個征兆，是從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開始，街頭逐漸看不到出租車。在此之前，為了能夠買到更新鮮的魚來炸天婦羅，伊七還會與公營市場的魚販合搭一輛出租車去筑地市場買魚。不過，從這年五月起，隨著施行《國家總動員法》，汽油也改為配給制，沒有油票（政府公認的購買許可證明）便無法購得。

汽油售賣的管制，對天婦羅店造成了直接的影響。公營市場的店鋪并沒有接瓦斯管，所以炸魚時使用的燃料就是汽油。無奈之下，伊七勉強改用焦炭來生火，但焦炭火力不僅弱，而且點火后還得一直注意不讓火熄滅，使用起來非常辛苦。

軍需景氣與物資不足造成了通貨膨脹，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價格等統制令》。除了政府規定的約十萬種商品的公定價格外，只能由“業者組合”商議并通過官方許可設定協定價格，販賣者不得自行設定價格。這個政策導致了物資流通的停滯，謙二還記得，一九三九年后半，連炸天婦羅的油與魚，都變得難以購得。

公營市場在統制經濟之下沉寂。但另一方面，與公營市場隔街相對的中野新橋娛樂街區，卻聚集著發了戰爭財來此找藝伎飲酒作樂的人們，呈現出一段時期的繁榮景象。

昭和十三年，市場門前的西武鐵路線車站名稱，由原來的“登記所前”改為“中野新橋通”。聽外祖父說，對面的娛樂街區因為“戰爭景氣”，攢了一筆權利金付給西武鐵道，所以才改成他們街區的名稱。

謙二周圍街道的商店，連紅豆湯都買不到。同年十一月，配給制度在全國施行，連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都開始實行配給。

伴隨戰爭的長期化，計劃性配給也逐漸失去功能。因為物資本身不足，加上汽油也不夠，物流體系陷入停滯狀態。隨著時間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給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給所卻無物可供配給，這樣的事情頻頻發生。

一九三九年秋天，外國進口米開始出現在日本人的餐桌上。二次大戰前，日本并未實現國產稻米完全自給，對都會區的下層民眾而言，食用從朝鮮、中國及臺灣地區進口的米，是極其普通的事情。可是從這年起，輸入的米糧不足，日本甚至開始進口東南亞的長米。

日本政府從該年開始發出《白米禁止令》，禁止販賣去除70%以上雜質的精米，并獎勵食用芋頭等“代用食”。

同時，管制經濟的基層組織，也就是各種“組合”，也隨之集結而成。如果不加入區域性的“菜肴天婦羅組合”（屬于餐廳系統的“料理餐館天婦羅組合”則另有組織），就無法取得食用油與燃料。加入這些“組合”的商店，原本都是敵對的競爭商家，現在卻變成不共同加入便無法維持營業。

到了一九四〇 （昭和十五）年六月，東京等六大都市，連砂糖與火柴都引入了配給制度。各種物資的票券就等同購入許可證明，但仍得自備購入費。

另外，家庭消費方面，如果不加入“町內會”或“鄰組”，就無法獲得配給。對伊七他們而言，這是他們在東京首次體驗到被編入町內會組織的感覺。

但與實際家戶數相比，配給量往往不足，而且也發生許多需要的物資無法取得、卻配給了不需要的物資的供需失衡狀況。外祖母小千代會前往“鄰組長”家的集會，轉達附近居民們的各種不滿。一九四一年，稻米實行配給制，人們也開始食用小米與麥子。謙二說：“對庶民而言，比起關心戰爭輸贏的新聞，這些日常所需帶給人們的沖擊更大。”

伊七的老家雖在岡山，但因運輸力不足，加上主要谷物類都被納入國家經濟管制，所以無法請老家寄來糧食。老家能寄來的，頂多就是一些雜糧食物。

糖類與汽油等稀少物資會優先送給軍隊。都會區除了糧食不足，也缺乏運輸能力，各地方的物產往往只能留在產地，無法流通。當物資分配不平均時又導入了管制經濟，必然會造成“拉關系”與“黑市買賣”橫行。當時以“闇值”這個詞匯，來指以管制外的高價格進行買賣，而這個詞匯大概從一九三九年前后開始廣為流傳，與公定價格的走向不同，“闇值”呈現出劇烈的通貨膨脹狀態。

戰爭當中與戰爭結束后不同，戰前仍覺得以“闇值”買賣東西是有違道德的，因此不敢明目張膽地干。但實際上，通過鄰組長或組合長，物品仍以高價在黑市中流通，或者“有頭有臉的人物”會出面，大肆進行物資買賣。這種情況更招來人們的強烈不滿，街頭巷尾甚至流傳著“這世道有星星（陸軍）有船錨（海軍）有關系就有頭有臉，只有笨蛋們才需要排隊”這樣的川柳[[22]](#m22)。

雖說只要有米谷存折就能夠買米，但稍后去米店，店家卻推托說我不認識你，所以無法賣米給你。街上四處貼滿了“浪費是大敵”的標語，但暗地里卻有人能夠四處鉆營。“有頭有臉”與人際關系變成社會上最重要的事情，雖然物資不足很苦，但這種窘迫的身心狀態與各種不公平，更被大眾所討厭。

依據謙二的記憶，附近居民對戰爭的反應大概都很冷淡。即便有鄰組或者町內會組織，也僅是傳閱一下“回覽板”[[23]](#m23)應付一下，幾乎沒有人認真地進行什么活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攻陷南京時雖然舉行了“提燈籠游行”大會，而且是由在鄉軍人會與町內會組織辦理，但謙二周遭卻無人參加。

高層扯了許多理由來告誡我們，但愈往底層傳達，反應就愈冷淡。

到了一九四〇年，開始了“新體制運動”與“宮城遙拜”等要求。電車通過半藏門時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乘務員宣布“現在通過宮城前”，接著電車乘客全部都行禮如儀，但站在背對宮城那排電車吊環下的乘客，因為車內太擠無法動彈，只好以屁股朝著宮城行禮。這種形式上的東西，大家都沒當一回事，逐漸地就自然消失了。

能夠聽到的戰爭新聞，都只有戰勝的消息。在學校里，當攻下南京、侵攻武漢時，就會在教室內掛著的地圖上，于該地區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戰爭總是不結束。

“菜肴天婦羅組合”這方面，過了半年到一年，也就停擺了。到了一九四〇年中，即便通過“組合”訂購，也買不到燃料或食材，伊七在當年底，不得不關閉了天婦羅店。

因為無法取得物品，愈來愈多商店都處于雖然開店但實際停業的狀況。附近還能正常開張的，大概只有賣棕刷與掃帚等物品的雜貨店。想上街吃頓飯幾乎不可能。一聽到消息說哪里的商店進貨了，大家的眼睛瞬間都亮了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商店都倒閉了。除了糧食生產或販賣生活必需品等，屬于國民生活不可或缺產業的勞工之外，其他勞工都被迫轉換至軍需產業，勞動力重新配置。受到這種沖擊，高圓寺附近的咖啡館與洗衣店等，原本服務都市中產階級的服務業商店都消失了。隔壁的西服裁縫店也已倒閉，得靠著長大成人的孩子們去工作，才能維持全家生計。

根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布的《企業許可令》，所有的民間事業都采許可制，任何企業都必須獲得政府認可，一九四二年五月依據《企業整備令》這則行政命令，展開對企業的整理合并。這些條例不斷被引入民眾生活中，其結果造成非軍需企業不是轉業就是倒閉，而財閥系統的軍需企業，則朝著整并與統合邁進。一九四二年四月發布《金融事業整備令》，打著“一縣一行”的口號，各地方為數眾多的銀行都被大銀行吸收整并。片山家附近的小銀行，也在這個時期消失了。

隨著社會上的這些變化，片山家也不斷遭遇不幸。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末，在陸地測量部任職的次男政一，因為腦瘤而倒下。政一入院與病魔纏斗了約半年，于一九四〇年六月過世，年僅二十一。當時中學三年級的謙二，與比他大一歲的姊姊泰子，為此落淚哀傷不已。

為了埋葬政一，伊七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在東京多摩靈園建了“片山家”墓。多摩靈園最初是東京市公園科因應東京人口膨脹而設立的規劃性墓園，于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啟用，其用地跨越現在的府中市與小金井市。伊七拉了兩位一樣從北海道移居到東京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規劃區內購買了使用許可。在這個陵園內，日后也陸續安置了在中日戰爭中戰死的士兵與軍官的墳墓。

或許因為失去了兩個哥哥，剩下的姊姊泰子對謙二更加疼愛。可是隔年的一九四一年三月，換成泰子結核病發。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某日謙二一如往常從早實下課回家時，剛收掉天婦羅店生意的伊七，突然腦中風倒下了。

片山家狹小的租屋中，躺下了泰子與伊七兩個病人。伊七雖然留下右半身麻痹的癥狀，但總算撿回一命。但是泰子病情逐漸惡化，一九四一年十月，便以十九歲之齡過世了。

從佐呂間送來東京的兄妹四人中，三個人都病死了。一邊工作一邊到學校夜間部上課，加上戰爭體制下的營養不足與生活不安定等等，都可能是造成他們死亡的原因。“哥哥與姊姊接連過世，我也思考著不知何時會輪到自己。果真如此，那外祖父母應該是最難過的。”



謙二滿十六歲，外祖母小千代六十四歲（一九四一年夏天攝于岡山）

可是，生于明治九年的伊七，雖然女兒留下的子女接連死亡、自己也因中風而半身不遂，但他從來沒有狂亂或哭泣過。

大概認為在孩子面前，不應該表現出這種態度吧，外祖父一直都隱忍著。外祖母多少有些抱怨，但外祖父總斥責外祖母：“抱怨這些無濟于事的事情，還是于事無補啊！”

擔任天婦羅店的店員，與片山家一同居住、立志成為作家的時岡精，也因為結核病倒下。他來東京后有一陣子身體狀況不佳，醫生診斷是患了胸膜炎，他照樣繼續工作。天婦羅店關閉之后，時岡為了征兵體檢回到岡山老家，在體檢時才發現自己染上結核病。當時的征兵軍官對著因結核病而體檢不合格的時岡破口大罵：“因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結核病）！”他就這樣留在岡山老家，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也過世了。

此后，家中就只剩下六十五歲的伊七與六十四歲的小千代，以及十六歲的謙二。能夠幫忙賺錢的幫手全都過世了，天婦羅店也不得不關閉，這一家人就靠著伊七做生意賺來的存款，以及雄次送來的生活費勉強糊口。

謙二就讀的中學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九三七年展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后的一年左右，各種口號開始變多，一九三九年左右起，空氣中的氛圍逐漸改變。”

即便如此，在謙二中學二年級左右，舊制中學內部仍然留有一些自由空間。國語教師針對日俄戰爭中的乃木希典大將，曾說：“乃木先生在日本被描述得很偉大，但在外國，特別英國等國家，則被批判身為軍人卻因為自己統帥能力不足，造成大量士兵犧牲。”等于間接地進行了批判。貿易課程的教師，總是穿著和服，經常閑聊，批評時局。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開打，謙二說：“聽來感覺好像事不關己。”

不過到了一九四〇年德國戰勝法國后，“不落人后的風氣逐漸增強”。同時，學校中也開始受到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影響。

謙二也參加了現今稱為社團的活動，那是只有四名團員的商業經營部，但從這年開始，文科社團的人被命令全部都得轉到體育性社團。無奈之下，謙二只好選了看來最輕松的籃球部，但他一次都沒去參加過，為此還被校方叫去，吃了兩記耳光作為處罰。

戰爭愈是進行，就離生活與經濟現況愈遠，空洞的口號與精神主義四處橫行。一九四一年，早實的班級名稱由原來的“ABCD”變更為“忠孝信義”。社團原本稱什么“部”，因為這個詞來自英文的“俱樂部”，此后也改為軍隊式的“班”。

總是穿著國民服[[24]](#m24)的公民課教師，授課時只是重復不斷說明要對天皇竭盡忠誠之心，最后甚至獲得一個風評：“大家都說在他的考卷答案最后，只要加上‘天皇陛下萬歲’就可以拿到滿分。”每周有兩小時的軍事訓練課程，謙二的朋友只因為在訓練教科書上蒙上了精美的書套，分配到校園授課的預備役軍官便感到歡喜不已，為此就給了謙二的朋友很高的成績。

謙二喜歡的西洋電影，也受到國家管制的影響。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首映的《華府風云》（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最后一部美國電影，此后便禁止進口美國片，可放映的西洋片只剩下以前進口的法國電影或德國電影。由于這些舊電影膠卷被四處傳遞播放，畫面毀損得相當嚴重，膠卷斷片再重接也不在話下，因此經常出現故事跳接的狀況。

姊姊泰子過世后一個多月的十二月八日，謙二在家中準備上學時，從廣播中聽到公告：偷襲珍珠港成功。美日戰爭正式爆發。

## 五、戰時就職

謙二在美日開戰當天到早實上課，公民課教師穿著往常的國民服，滿臉笑容地進入教室，說了句：“干得好啊！”學生稍微附和一下，他便一直興高采烈的樣子。之后，昭和天皇的《宣戰詔敕》被報導出來，這名教師立刻到校園里大喊萬歲。

但是大部分的教師都表現得相當平靜。特別一名叫作塩清的貿易課程教師，當時課堂上有學生提問“為何九軍神只有九個人”，他直截了當地回答：“啊，那是因為一個人被俘虜了。”

偷襲珍珠港時，日本從接近夏威夷的航空母艦上派出了五艘續航距離短、每艘只能乘坐二人的袖珍潛艦進行攻擊。因為派出的這十人都沒能返航，所以報導時強調他們是不抱生還期望、勇敢出擊的“九軍神”。可是“九個人”這個沒頭沒腦的數字，讓中學生們不由得心生疑問，所以才有人提出上述的問題。但當時被俘這種事情，都被當作一種不可告人的禁忌，因此塩清教師如此直截了當的回答，反而讓學生們大吃一驚，謙二的朋友甚至喃喃地說：“老師這樣回答，不會出問題吧？”

這位叫作塩清的貿易課程教師曾撰寫過股票投資的書籍，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如前所述，他總是穿著和服，絕對不穿國民服之類的服裝。或許他從經濟指數上早就看出這場戰爭是沒有勝算的。謙二回想，這位教師曾說，“我講課的內容你們終究會遺忘。比起這個，我的雜談閑聊反而還會留在你們心中”，因此總是在教室中閑談與評論時事。

這位老師的雜談之中，特別讓謙二印象深刻的是“報紙得從下方的欄位讀起”這句話。因為戰爭時期實行言論管制，報紙版面中這些躍然紙上的標題，每則都想強調日本與德國的勝利。但是，如果“依照塩清老師建議的方式”閱讀，就會看到不同的面向。

國際版特別是如此。報紙上方欄位所看到的大標題，寫著德國勝利的消息。可是，底下不起眼之處，卻小小地寫著對德國不利的消息。大概記者們也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傳達真實的報導吧。老師告訴大家：“要讀懂新聞內在的真實，不要被新聞牽著鼻子走。”這樣的習慣，我之后一直記在腦子里。

這位塩清老師，在謙二畢業后的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夏天，辭去了早實的工作。辭職的原因是——與派到學校負責軍事教育的軍官們有著緊密關系的“教練班”學生爬到“相撲班”視為神圣場所的相撲土俵（比賽時的圓形擂臺）上，兩班學生起了沖突，“相撲班”的學生被當成“主謀”，遭受處罰，學生們因為不滿這樣的處置，發起了罷課行動。

“教練班”的學生們倚仗著學校教官的權威，一副唯我獨尊旁若無人的樣子，以前就曾引起其他學生的不滿。學生們看守住從車站前往學校的上學路段，呼吁大家不要去上課，發起罷課活動，最終，事態竟然發展到沒半個人去上學的狀況。

戰爭期間發生這種特殊的情況，讓學校教官們震怒不已，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早實還殘留著“自由主義風氣”，并且在一連串反擊罷課的手段中一并清算塩清老師，結果逼著塩清老師辭去教師職務。

太平洋戰爭開戰后半年左右，官方持續發布著日軍勝利的消息。但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四月，東京首次遭遇空襲。美國海軍的航空母艦鉆過了大意的日軍警戒網，接近東京近海，并派出了雙引擎轟炸機隊。

這次空襲以轟炸機隊指揮官杜立德中校之名命名，被稱為“杜立德空襲”（Doolittle Raid），共有十六架轟炸機攻擊了東京、名古屋、大阪、橫須賀等地的軍事設施。其中負責攻擊東京赤羽第一陸軍造兵廠的飛機誤炸了早稻田中學與早稻田實業，造成了兩名早稻田中學的學生死亡。

當天是星期六，謙二剛好輪值擔任掃除，早實下課后他仍留校打掃。十二點半左右，突然發出了驚人的聲響，震波沖擊之下全校的玻璃窗都碎了。但很幸運的，直接打中校舍的燃燒彈并未爆炸，只撞穿了二樓天花板，然后卡在一樓天花板與二樓地板之間，就這么停了下來。附近的醫院也因空襲發生火災，包含謙二在內的早實學生們，都跑去協助患者避難，幫忙撤出醫院物資。

炸彈直接打中校舍時，我人在一樓，幸好只是嚇了一跳，逃過一劫。如果炸彈爆炸，大概就死掉了吧。因為誰都沒想到會真的發生空襲，所以也沒有發出任何警報。結果第二天變成過度反應，敵機根本沒來，卻從一早就響起警戒警報，甚至還發出了空襲警報。

這次的空襲與隔年的正式轟炸相比，規模還算小，但仍造成八十七名日本人死亡，四百六十六人受傷，二百六十二戶房舍遭毀損。比起實際受害，心理上受到的震動更加強烈。

“竟然讓帝都遭受空襲！”海軍極為重視此次襲擊，認為應該加強警戒范圍，進而強行攻擊中途島，但日本海軍反而在中途島海戰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艦，吃了個大敗仗。當局隱瞞事實真相，只公布了日軍被擊沉一艘航空母艦、一艘受損嚴重，但早實的學生中也傳出了“其實好像被擊沉了兩艘航空母艦”的謠言。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比原來的舊制中學五年課程縮短了一年三個月，謙二從早實“提早畢業”了。國家為了確保勞動力與兵力，開始執行縮短學業期限的政策。在畢業典禮上，從校長到諸位老師，幾乎都沒人講任何鼓舞大家的豪言壯語。

畢業后的謙二，于一九四三年一月進入“富士通信機”任職。該公司的前身是富士電機，是由德國的西門子公司與古河電機工業兩家企業合并而來，其中通信機部門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切割獨立出來，成為富士通信機。

當時的富士通信機（Fujitsu），屬于軍需產業的新銳企業。提早畢業的謙二等人，與其他因為轉業或倒閉而被轉職到軍需產業的零售業者們一起，在征兵年齡之前被分配到這家公司。謙二原本也沒有自覺已經被分配到軍需產業里：

招聘啟事送到學校后，我也沒有考慮太多，朋友說了句“能去這公司不也挺好”，我就去應征，而且也被錄用了。同期進入公司的約有二十人，其中十二人是早實畢業的，而且有五個人都是提早畢業班的學生。可以說糊里糊涂地被好友帶進公司。錄取之后還因為上下班距離遠而有點后悔。

不過，發生這種狀況的背后，仍然有國家政策的影響。中日交戰之后，因為勞動力不足與勞動力再分配之故，過去由市村町等地方行政單位經營的職業介紹所，從一九三八年七月開始便全部移交國營，企業的招聘活動或送達學校的招聘啟事，也都在國家的管控之下。

隨著國家接手管理勞動力分配，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發布《賃金統制令》（薪資統管令）。這是為了避免員工自軍需產業離職，以及防止因勞動力不足與物資管制造成薪資與物價交互螺旋上漲的狀況。最初適用的對象是軍需相關、擁有五十名以上從業人員的礦工事業所。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二次改正法令后，幾乎所有產業的事業所，只要擁有十名以上從業人員，都有向國家提出給薪規則的義務。一九四〇年一月，為了調度軍事費用，模仿納粹德國的制度，開始施行自“事業者”[[25]](#m25)直接征收稅金，稱為“就源征收”的制度。

依據《賃金統制令》的規定，謙二初次任職的薪水，與就職企業無關，中學畢業的月薪就是日幣四十二日元，第二年起調升至四十五日元。因為政治管制的原因，這種相同學歷就給予相同薪資的“官廳型系統”，從過往就廣被民間采用。每個月得到會計科去領取月薪現金袋，不必打卡，只要申請就會發給加班費，但謙二說在他周遭幾乎沒有因為想要加班費而留下工作的人。

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位于京濱工業地帶，神奈川縣南武線的武藏中原站是最近的車站。在早實學過貿易與初級會計的謙二被分配到財務部會計主管的手下，在鄰接制作交換機與通訊機器工廠旁的事務樓上班。

在事務樓中工作的人被稱為“職員”，另一方面，工廠的從業人員就被稱為“工員”，分成熟練的工人“職工”，以及高等小學校畢業、從各地方前來的“幼年工”，都在工廠內上班。事務樓的職員是月薪制，工廠的工員則為日薪制。

雖然富士通電信機不至于如此，但當時許多企業的職員與工員不僅薪資有差別，甚至連進公司使用的大門都不同。日本戰敗之后，廢除“職工差別”成為日本勞工運動的重大課題。

根據謙二的說法，事務樓的職員組成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由大學出身的人擔任干部職員，類似謙二這種中學出身的是事務職員，另外還有高等女學校出身的女子職員，比例上大概各占三分之一。財務部的部長是東大畢業，會計科的主管則是慶應大學畢業。謙二說：“我自己穿的衣服，就只有這么一套萬年國民服，到公司之后只是把上衣換成事務工作服。大學畢業的那群人，每個都穿著西裝。”

因為是軍需產業，陸軍與海軍的監督官各自有自己的辦公室。“軍人們不懂實際業務，我想應該只是形式上的監督，不過公司的干部為了讓他們開心，經常會去噓寒問暖。”像這樣的官民勾結，成為軍需物資橫流黑市的溫床，同時，也成為二戰結束后人民與“監督官廳”[[26]](#m26)間關系的基礎。

謙二現在成為片山家唯一正在賺錢的人。賺來的薪水全部都交給伊七。原本就不在臉上表露情感的伊七，對于謙二可以開始賺錢一事，從他臉上照樣還是讀不出開心的樣子。

就這樣，謙二成為片山家與小熊家中，第一個“中學畢業的月薪族”。早上六點四十分起床，帶著外祖母小千代做的便當出門，每天搭乘電車、轉乘一個多小時，過著上班的生活。伊七與小千代，從六歲起就一直以昵稱“謙”來叫喚這個唯一平安成長的孫子，對他憐愛有加。

謙二身為一位事務員，表現十分優秀，工作也處理得相當穩妥。如果從西伯利亞回來后，沒被富士通信機趕走的話，戰爭結束后或許也會繼續“上班族生活”。可是因為征兵之故，這種公司員工生活也只持續了不到兩年的時間。

## 六、我出發了

謙二開始就職于富士通信機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已經由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撤退了。這次撤退的公開說法是“轉進”。就算是年僅十七歲的謙二，也覺得這是個“詭異的詞匯”。廣播上的評論家們也這么說：“轉進實在是很好的一個詞。要是沒通過升學考試，就轉進其他學校吧。”

這一年的五月，阿圖島（Attu Island）守軍全數被殲滅，官方公開說法為“玉碎”。從夏天開始，謙二自家附近，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家庭收到裝有戰死于南方的丈夫遺骨的小木箱，實際上許多只是裝著戰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還留有當時某位遺孀帶著三個小孩回鄉下的記憶。

大約同時期開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來。不過，再也沒見到穿著烹飪服的愛國婦人會揮舞“日之丸”國旗送行的場面。

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后，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余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地送家人上戰場。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么送行會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學文科生不能再緩征，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們在車站喧囂嘈雜。因為如果遭到征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學生們會到車站歡送將搭車回本籍地的同學。從公司下班搭車通過新宿車站時，可以看到車站對面聚集了二三十個人圍成一圈，或唱軍歌，或唱些摻雜猥瑣內容的民謠、艷曲，虛張聲勢地逞強喧鬧。看起來彌漫著一股異樣的氣氛。

富士通信機公司里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來愈多，最初公司還會舉辦壯行會，到一九四四年的后半幾乎都不再舉辦了。地區的町內會活動等呈現低迷狀態，防火演習也只是走走過場虛應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會跑出來參與接力傳遞水桶的訓練，但在上班的謙二則從未參加過這種演練。



上方為一九四三年富士通信機為入伍員工辦理送行會，下方為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所攝，中央斜披帶子的人就是出征者，公司員工已明顯減少許多。兩張照片的前排右二均為穿著國民服的謙二。

隨著物資調度愈來愈窘迫，配給米減少，麥子、小米、芋頭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隨之增加，帶有鹽分咸味的東西就被當副食配菜，配著扒飯進食。精米被禁，政府宣傳糙米更有營養，但直接吃的話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戶都準備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后，再插入棒子搗成精米。

特別是糖類，幾乎處于完全缺乏的狀態。謙二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某日從富士通信機回家的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賣刨冰，便與友人一同買來吃，雖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顏色，但吃來一點甜味都沒有。即便如此，仍然從四十五日元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錢買下一碗。以現在大學畢業生首次就業的平均薪水來換算，等于一碗刨冰大概要日幣兩千日元。那一年的秋天，謙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還吃過干柿子，價格也同樣是五十錢。

物資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類或煙酒等非生活必需品，如果不靠關系就無法獲得。軍隊還有配給糖類，所以如果有認識的人，還可以從這方面獲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通過附近熟人的關系，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漬（日本奈良風味的泡菜）”，謙二都還記得那時的感動。在新丸子吃到的干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通過某些關系，偶然之下取得后拿出來銷售的。

因為無法取得作為燃料的煤球，所以沒辦法在中野自己家的浴室燒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換熱水，晚上去洗澡時，熱水都散發出一股惡臭。夏天用的襯衫也沒有新品替換，破掉就以補丁縫上將就著穿。富士通信機的大學畢業職員，大概從一九四四年夏天開始也不再穿西裝，換上了國民服、打上綁腿。

雖然生活上有不安與不滿，但連表達的手段或余裕都缺乏。一方面謙二還沒有參政權，另一方面謙二也不記得伊七是不是參與過選舉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贊會”推薦候選人，是由政府拿出臨時軍事費充作選舉資金，舉行了所謂的“翼贊選舉”，但謙二卻不記得周遭有任何關于選舉的話題。

另一方面，父親雄次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辭去了“北海道產業組合”的工作，回到故鄉新潟。雄次在組合中獲得相當的成就，借著“產業組合”的公事仍有機會來東京，一年可與謙二見上幾次面。但是依據謙二的記憶，雄次辭職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賴的一個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組合的經費，而且被察覺，雄次只好以私人財產填補這個財務空缺，并且負起責任辭去組合的工作。

已經六十歲的雄次，存了一筆在當時算相當充裕的存款，帶著這筆錢回到老家新潟。但從戰爭時期開始一直到戰爭結束，飛快的通貨膨脹早就讓雄次這筆財產云消霧散。謙二如此說明：

當時，非官僚或高級軍官的庶民，并沒有所謂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間必須盡量存錢，以備退休后的花銷，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與父親也是如此。但卻因為通膨，這種人生規劃全部破滅。父親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后會如此，當時應該會決定繼續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臨這種連國家都可能隨時破滅、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妥善應對。大部分人，都只能憑著過往經驗來思考應該如何規劃人生而已。

無法應對大時代的變化，任誰都是一樣的。謙二與富士通信機的同僚們，偶爾會談起戰爭情勢，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帶著點希望的觀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島守軍也“玉碎”了。從宣告“玉碎”的播音員陰郁的聲音中，可以感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到這個時候，大家終于察覺到敵人正在急速地接近東京。

如果照這個情況下去，美軍以塞班島為基地便可以空襲東京，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可是“不管是自己還是周遭的人，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種資訊，或許讓大家都不愿去想結果了吧”。

報紙上一成不變地仍在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后，東條英機內閣雖然垮臺，但“既沒有內部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么狀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說如此，當時的報紙也不是全面性地只有迎合上面的報導。《每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于走到這一步》與《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了》為標題來解說戰局的報導，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首相，事件甚至發展到對執筆的三十七歲記者處以懲罰性征兵的地步。

可是自己家中應該有拿到《每日新聞》的謙二卻不記得有讀過這篇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余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余裕的上層，或許讀了會有點什么想法吧。”

塞班島失守后，為了對預期中的東京空襲有所準備，大家開始沿著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雖說挖防空壕，也不過是在人行道上挖個能讓人屈身進入的洞穴，平時就在上面蓋上木板撒上土，只是這種程度的防御工事而已。

后來收到各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們的住處是租來的，幾乎沒有庭院，因此也沒有可挖掘的場所。沒辦法，只好把一樓起居間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襲，就把榻榻米與地板掀開，跳入洞中。可是，如果當時真的遭遇空襲，屋子被燒掉，跳進這種防空洞內，大概也會被燒死或悶死吧。空襲時會發生什么狀況，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達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應付一下，大概也就是這種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艦隊接近臺灣海面，日本的海軍航空隊發動總攻擊。日軍方面大概損失了六百架飛機，整體航空戰斗力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而美軍方面只有兩艘巡洋艦嚴重毀損。但是大本營海軍部卻宣稱擊沉了十一艘美軍航空母艦，對于這個相隔許久的大勝仗，國內甚至還舉辦了提燈籠游行大會。

不過隨后，已經被軍方宣布擊沉的美軍艦隊卻出現在菲律賓海面上，美軍登陸了雷伊泰島。日本政府與軍方認為這是擊滅美軍的大好機會，呼吁進行“決戰”。但出動的日軍聯合艦隊在戰斗中卻一面倒地被美軍擊潰，增援的地面部隊也因為補給斷絕，幾乎全數陣亡。

根據謙二的回憶，這時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中也以戰況作為話題。作為員工特殊配給的芋頭輾轉送抵事務樓，同僚們一同前往食用的時候，東大畢業當時約三十五歲的科長還說：“我軍是不是被美軍設計陷害了？”

因為沒想到大本營發表的戰果是虛假的，所以才會猜測，是不是被美軍的佯攻作戰給騙了？大概是這樣推測的吧。當時就連一般民眾，也多少察覺了不自然之處。

自己既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雖然政府提說有重大戰果，但局勢反而更加惡化，總覺得非常詭異。但是沒有深入追究的習慣，也沒有可供探討的資訊。像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處于這種狀況。

從雷伊泰島的戰斗開始，航空部隊便出現了“特攻”。謙二說：

在平民的立場上，既無法站在否定的立場，也無法站在肯定的一方。從搭上特攻飛機的人的心情來想，當然無法否定他們的報國心，但戰況是否已經走到不這么做就毫無辦法的地步，在這層意義上，也無法肯定這種戰術。我自己因為受到塩清老師影響，報紙都習慣從下方欄位開始閱讀，所以理解戰況正在惡化。雖說如此，因為信息極度缺乏，所以也沒辦法具備準確的判斷能力。

到了戰爭末期，戰局開展十分迅速。從官方宣布上述“臺灣沖航空戰”獲得重大勝利的報導后，大約經過了十天，十一月一日，東京上空就首次出現了B29轟炸機。那是從塞班島基地飛來的偵察機型，為了正式空襲做準備調查，因此只來了一架飛機。

B29轟炸機裝備有加壓艙與渦輪螺旋槳，在一萬米高空高速飛行。與此相對，日軍主力高射炮有效射程高度不過僅有七千米，戰斗機雖然可以爬升到這種高度，但需耗時約一個鐘頭。B29轟炸機就在沒有受到任何阻擊的狀況下，完成偵察任務返航。

那時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機上班。當天天氣晴朗，高空中一條白線似的飛機云前端，可以隱約看到B29轟炸機。雖然發出空襲警報，但同僚們都跑到戶外，抬頭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飛機，為何日本軍隊卻沒有任何迎擊動作，大家在不可思議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說：“為何不擊落它？”但大多數人都失去思考未來情況的能力。雖然不至于相信“神州不滅”這種說法，但也沒想過日本就要戰敗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謙二也接受了征兵體檢。結果是第二乙種體格，若是在平時，這是不會被征召的體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剛滿十九歲的謙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陸軍寄來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機的事務員們，已經陸續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時也該收到的謙二說：“當時只是‘啊，終于收到啦’的感覺。”伊七與小千代，什么話都沒說。

學歷只有中學畢業的謙二，既沒有像理工科學生般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學生般會以海軍預備學生資格被錄用、當作軍官來對待。除了被當作最底層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入伍通知命令謙二在五天之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到世田谷區的駒澤練兵場（現在的駒澤公園）報到。謙二急急忙忙地打了通電報給在新潟的父親雄次，之后就忙于整理自己的隨身物品，連到附近與近鄰打個照面的時間都沒有。

為了領取入伍者的特別配給品，謙二拿著配給票前往配給所一次領回整套配給。配給品有“日之丸”國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約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經到了這個時期，因為物資不足，連“日之丸”國旗都無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實的同年級朋友家中，幾個人分著喝了。至于“日之丸”國旗，原本是在入伍時讓親友集體寫下鼓勵的話語，但謙二的周遭已經沒有這種習慣。富士通信機也沒有舉行什么壯行會。“只有五天時間，不過就像平日一般度過而已。”謙二自己回想著說。

入營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轟炸機終于首次正式轟炸東京。他們轟炸完目標“中島飛機武藏制作所”后，曳著飛機云通過了片山家的上空。謙二還記得整群的飛機云，讓他奇妙地覺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終于來臨。多云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伊七與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親友來送謙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懼空襲，且對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經習以為常，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穿著卡其色國民服的謙二，說出“我會堂堂為國盡忠”這句應景般的招呼語后，轉頭跟外祖父母說：“我出發了。”

這個時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聲大哭。一起生活的三個外孫接二連三地病死，最后留下來的謙二就要被軍隊征召離去，而且恐怕沒有什么生還的機會。不管是外孫們的死亡，還是商店倒閉，甚至連自己中風也都沒一句抱怨，只是不斷堅忍著的伊七，到這個時候終于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

為入伍者送行時，家屬哭泣這種事，是當時不可能看見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說了聲：“去吧，謙！”然后推著伊七回到家中。

謙二入伍后，他在中野生活時所住的房子，為了防止空襲時造成火災蔓延，被列入街區整理標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毀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與小千代在強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生地岡山縣的某親戚家里。賺來的存款因為通貨膨脹而消失，只能住在農家庭院內的“土藏”[[27]](#m27)倉庫中勉強地過著生活。謙二與他們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結束西伯利亞強制勞動拘留，終于返回日本的時候。那已經是四年后的事了。

[[1]](#w1) 譯注：谷中村位于栃木縣利根川及其最大支流渡良瀨川交會點，上游足尾銅山的礦毒（硫酸銅）溢流后因無法清除，明治政府選擇谷中村作為蓄水沉淀池，該村因而廢村。

[[2]](#w2) “素封家”意指有相當資產者，或地主階級。

[[3]](#w3) 譯注：明治維新至二戰前日本學制之一，相當于小學后期至初中二年級階段，一九四一年改為初中。

[[4]](#w4) 錢湯：一種日本特有的公共浴池，需支付一定費用后方可進入。

[[5]](#w5) 譯注：恩格爾系數60%，表示收入的六成都花費于飲食，屬于極度貧困狀態。

[[6]](#w6) 譯注：傳統曲藝或說書、講相聲等表演。

[[7]](#w7) 小島政次郎撰寫的《人妻椿》，一九三五年連載于《主婦之友》雜志，一九三六年被松竹電影公司改編成電影。

[[8]](#w8) 譯注：阿龜是高頰凹鼻的女面具，火男是歪嘴的男面具。

[[9]](#w9) 譯注：在上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中，三名日軍以爆破筒炸毀上海中國軍隊的鐵絲網并且身亡，日本人稱其為“肉彈三勇士”。

[[10]](#w10) 譯注：又稱為八年抗戰、抗日戰爭，特指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后的戰事。

[[11]](#w11) 譯注：天皇頒布的教育詔書，是日本二戰前揭示教育基礎理念的敕語。

[[12]](#w12) 譯注：朝天皇居所方向行禮。

[[13]](#w13) 譯注：天皇照片日文稱“御真影”，“奉安殿”則是建于學校內、專門供奉“御真影”的建筑，外側可防火，內里襯有高級木料，建筑結構非常扎實。

[[14]](#w14) 譯注：由日本青年軍官中的皇道派發動的政變，號稱要為天皇“清君側”。事變失敗后，軍事大權落入統制派軍人手中。

[[15]](#w15) 譯注：女服務生阿部定與情人幽會，在性交中勒死男方，并切下男性生殖器后逃亡。

[[16]](#w16) 譯注：此處指“陰部”，當時報紙以“局所”或“下腹部”等較隱晦的字眼表達。

[[17]](#w17) 二戰結束后改為國土地理院。

[[18]](#w18) 譯注：高垣眸著，一九三五年發表的青少年豪杰小說，后數度被改編成電影與電視劇。

[[19]](#w19) 譯注：簡稱“早實”。實業學校類似職業技術體系學校。

[[20]](#w20) 譯注：Pépée Le Moko，一九三七年法國導演杜維爾（Julien Duvivier）的作品，又譯《逃犯貝貝》。

[[21]](#w21) 譯注：Too Hot to Handle，日文譯名《地球を駆ける男》；一九三八年美國導演杰克康威（Jack Conway）之作品。

[[22]](#w22) 譯注：日本的諷刺短歌。

[[23]](#w23) 譯注：傳閱的板報。

[[24]](#w24) 所謂“國民服”，是依照一九四〇年《國民服令》規定制作，類似軍服設計的男性標準服裝。

[[25]](#w25) 譯注：包括自然人與法人。

[[26]](#w26) 對各種行業各自具有監督權的政府主管機關。

[[27]](#w27) 譯注：筑有厚墻、外涂泥灰，防火防盜的日式倉庫。

# 第二章 前往戰俘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小熊謙二以陸軍二等兵的身份入伍，前往駐扎于東京都世田谷區駒澤的野戰重炮兵第八聯隊兵營報到。兵營里入伍較久的老兵告訴他：“這里只是暫時的宿舍，你們要去‘滿洲’。”

軍隊是另一個世界。換上軍隊發的軍服后，除了內褲之外的私人衣物，都要交給家人帶回。入伍幾天后的探親惜別日，新兵們一面把換下的私人衣物交給在兵營前空地等待的家人們，一面惜別。

謙二的父親雄次與外祖父片山伊七都來了。外祖父自從腦梗塞之后，右半身便不太聽使喚。謙二說他永遠忘不了拖著右腿來送他的外祖父的身影。

父親聽到謙二得前往中國東北，立刻脫下自己的背心遞給謙二。不過謙二告訴父親，“我們禁止攜帶私人衣物”，拒絕了父親的背心。在與父親和外祖父最后的惜別中，謙二內心暗自落淚。

回到兵營，謙二等人于該處滯留數天后，十二月三日早上從澀谷站搭上火車，往西前進。四天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九日，東京首次遭到夜間空襲。

## 一、那種事我辦得到嗎？

謙二搭乘的軍用列車，途中在名古屋接受了婦人會的茶水接待，稍后在深夜通過神戶，十二月四日抵達門司港。他們暫時在兵營中等待，十二月八日登上貨船，被送往朝鮮半島的釜山。

在海上迎來十二月八日的謙二，跟著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見習軍官站在甲板的最前端進行訓示（類似精神訓話）。偷襲珍珠港、發布日美宣戰詔敕的十二月八日，被稱為“大詔奉戴日”，每年的這天各地都會舉行訓示，而今年則是最后一次的“大詔奉戴日”。“那個年輕的見習軍官是運輸指揮官。這個時期應該已經相當缺乏軍官了。海面風浪大，船艏載沉載浮，見習軍官也就跟著浮沉上下。訓示時，光是要站著都很辛苦。”

謙二一行人于八日傍晚抵達釜山，在釜山港西邊的學校中度過一晚，再搭上貨運火車，繼續前往中國東北。這些軍用列車因為運輸時刻表調度的關系，途中停下好幾次，在車上睡了好幾夜之后，大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謙二抵達了屯駐于牡丹江（現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的電信第十七聯隊。

與謙二一同受到征召的新兵們，大致來自福島、新潟與宮城等地。父親雄次仍把戶籍的本籍登記在新潟，因此謙二的本籍地也是在新潟。舊日本軍依照本籍所在地駐扎的聯隊實行部隊征召，謙二本籍的新潟縣新發田屬于第十六步兵聯隊管轄，而此部隊屬第二師團所管，師團司令部設于仙臺，因此福島、宮城、新潟的新兵們都在一起。謙二說：

早實的同學們隔年都被東京的部隊征召。與我同期進入富士通信機的“早實組”也是。他們留在本土，于極短的時間內，為所謂的“本土決戰準備”挖掘了許多防空洞，日本戰敗之后便立刻返回故鄉了。自己偶然地因為本籍地設在新潟，所以被派到中國東北，日后又被扣留在西伯利亞。所謂人的命運，有時候一點微小的差異就會造成重大區別。

入伍的時候，軍隊老兵告訴我：“你們得去‘滿洲’。”并且特地宣布：“這些家伙很辛酸，先讓他們去和家人道別。”原本部隊的調動目的地是軍事機密，不應該告訴我們，可是面對著我們這些十九歲左右的新兵，大概是同情我們吧。畢竟老兵自己也是與家人分別，待在軍隊里面。

抵達牡丹江時，謙二等人只穿著軍裝，卻沒有配備槍支或其他裝備。從東京的軍營帶來的，只有一個粗竹筒，上頭命令以此代替飯盒與水壺。

抵達牡丹江時，我們脖子上用繩子掛著竹筒，當地老兵稀奇地看著我們，其中一個人還說：“內地物資已經缺乏到這種程度了嗎？”實際上，也正如他所說的，我們是只穿著軍服、沒有武器的集團。

謙二一行人被送到電信第十七聯隊，隸屬屯駐于中國東北的關東軍，是“第一方面軍”的直轄部隊。過往號稱陸軍最精銳部隊的關東軍，早已把精銳部隊都調往南方戰線，為了填補這些空缺，才補充第一年入伍的新兵，進行緊急的部隊編成與訓練。

在軍隊駐扎地，軍官與士官們可以分配到個人房間，剩下的士兵則在被稱為“內務班”的單位過著集體生活。會檢查個人信件，也檢查個人物品，除了在廁所之外沒有個人隱私。平常內務班有十幾名班兵，受新兵教育的“初年兵”與入伍較久的“老兵”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但大量動員的時候，新兵數量大為增加。謙二所屬的電信第十七聯隊的中隊，有五個“內務班”，里面大概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銳部隊已經調往南方，關東軍只剩下骨架。雖然我們不是年紀較大的召集兵，總還算是年輕現役兵，但類似我這種體質不佳的人很多。”

在謙二受到征召的一九四四年，連征兵體檢時屬于第三乙種體格者也被納入征集對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齡由四十歲提升至四十五歲，征召年齡則從二十歲以上降低至十九歲以上。謙二正是因為這項修正而被征召入伍。謙二所屬的中隊共有五個內務班，其中第四、第五班內以體格不佳的現役兵居多，謙二配置在第四班。

當時日本陸軍入伍后，需要在內務班接受被稱為“新兵教育”的新兵訓練，然后根據在軍隊內的成績與入營前的學歷執行選兵，施行方式大致如下：

擁有中學畢業以上學歷者，入營三個月后接受干部候補生考試，合格后即成為一等兵。接著再根據接下來三個月的勤務成績，分成可升軍官的“甲種干部候補生（甲干）”與可成為士官的“乙種干部候補生（乙干）”，入營滿一年時各自就任所屬軍階。

只有高等小學校或更低學歷者，如在三個月新兵訓練中表現優秀，可于“一選拔”成為一等兵。再過三個月的第二輪選拔中，優秀者會被拔擢為上等兵，打開自己晉升士官的大門。

在三個月后的新兵選拔中落選者，再過三個月可接受第二輪選拔，此時相當比例都可以升為一等兵。兩次選拔都落選者，入伍一年后全部自動升為一等兵。但是執行勤務狀況惡劣、被視為反抗上級命令者，之后就成為“萬年一等兵”，永無升遷希望。軍隊除了是學歷社會之外，同時也是競爭主義的社會。

謙二自中學畢業，所以擁有接受干部候補生考試的資格，他早在東京入伍的時候就已經被委托擔任六名新兵的“指導”。謙二在富士通信機上班期間是個優秀的事務員，工作上也相當迅速勤快。

可是在中國東北時，因在嚴冬時期長時間坐車，他出現了嚴重的腹瀉癥狀，體力非常差。

體力變差了之后，判斷力也遲緩了，腦袋里面一片朦朧。雖然一開始就被派任“指導”任務，但自己接受命令時反應卻非常遲緩，一點都不機靈，還犯了許多錯。對軍隊而言，我就像毫無用處的豆腐渣一樣。

謙二的勤務狀態不佳，當三個月的新兵教育結束后，他仍參加了干部候補生的考試。每個中隊都會派出幾個人參與競爭，這也是原因之一。“參加干部候補考試的人，考試當天都前往聯隊本部，大家依照著成績高低順序，并排成四列縱隊，我自己大概排在倒數第五個。”

謙二當然沒有通過考試，成為被稱為“干落（干部落選）”的人。六個月之后第二輪選拔他又落選，結果帶著二等兵的身份迎向日本戰敗。兩次考試都失敗的人，大概只占全體的四分之一，算是相當糟糕的士兵。

負責訓練新兵的，照理來說是下士班長，但實際情形卻是由在軍隊時間較久的“老兵”君臨一切。內務班的生活，從聽到號音起床后，接著更衣、點名確認人數、用餐、訓練、掃除、就寢等，都有一定的規定，只要動作遲鈍，步槍保養得不好，或者單純只是老兵心情不好，便會立刻遭到毆打。“沒有一天不被打。狀況糟到要計算這是自己今天第幾次挨打了。”

老兵的毆打被稱為“私人制裁”，軍方當然是禁止的，但實際上這種狀況卻四處橫行，這也反映出當時日本軍的狀況。

中日戰爭之前，只要服役兩年便可退伍，但當時隨著戰事擴大，退伍變得相當困難，甚至出現許多“三年兵”“四年兵”等。因為不知何時才能退伍，被困在內務班的這些老兵們開始變得狂妄，這種狀況下，比起在意階級，老兵之間形成更加重視年資的風氣，這也是造成“學長們對學弟嚴苛訓練”的原因之一。

根據謙二的說明：“并非所有老兵都打人，但他們之中許多因為無法提升官階而性格扭曲的人，動不動就揍新兵。對于遲遲無法晉階的一等兵，我們都不稱呼他們為一等兵，而叫老兵大人。”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二月底，軍方發出禁止“私人制裁”的通告，但“二年兵、三年兵還是鬧得很兇，雖然禁止了，卻沒什么效果”。戰爭擴大與戰況惡化，也是造成“私人制裁”橫行的原因之一，只靠形式上的通告無法達到任何遏止的效果。

讓謙二印象深刻的，除了這種老兵對新兵的霸凌之外，問題更大的其實是日軍的“形式主義”。他如此說明：

我們需要記誦一種叫作“典范令”的《步兵操典》與《作戰要務令》，以及所謂的《軍人敕諭》，而且必須一字一句完全按照原文背誦，至于是否理解內容，則完全不予考慮。老兵們說：“軍人應該遵守的有哪五項，都寫在《軍人敕諭》里，被問到的時候，不能回答‘報告：是忠節、禮儀、武勇、信義、樸素五項’，而必須要按照原文背出‘第一，軍人需以盡忠節為本分；第二，軍人應禮儀端正 ……’。”記錄戰斗要領的《步兵操典》中的“警戒四周”也不準說成“警戒周圍”，所有都是形式主義，把上邊交代的事項按完整的形式做出。

裝備品方面，要以檔案登載“額數”的部分非常啰唆，但只要檔案上形式完整，往后就不會出問題。在內務班內如果缺少備用品，便會產生責任問題，所以需要到其他中隊偷來補齊額數，偷竊問題層出不窮。

例如，在日語稱為“物干場”的曬衣場，除由新兵負責晾衣服之外，還得派出擔任“物干場監視”的兵員，否則自家中隊的衣物很容易遭他隊竊走。吃完飯后洗餐具，萬一餐具掉了千萬不能就這么彎腰去撿，因為一彎腰，其他還放在洗手槽內的餐具就可能被偷走。為了防止這種狀況發生，得先以腳踏住掉下去的餐具，等洗完餐具后，請附近的同伴幫忙看守，這時才能去撿拾。

我自己的汗衫也被偷過，最后靠老兵幫我偷了一件回來才得以應付過去。這些雖然稱不上是大事，但也因此讓人無暇思考。總之，只要不讓上級來追究責任就好，滿腦袋只能考慮這件事。

進入軍隊后，謙二也開始抽起配給的香煙。新兵幾乎沒有自由時間，在上廁所時抽根煙，是唯一能喘口氣并不受責罵的時光。

新兵訓練期間，謙二把自己的照片寄給父親雄次。“當時的軍隊很重視表面功夫，新兵的時候必定得拍張照片寄回給家人，證明自己‘精神鼓舞、勤勉軍務’。而且因為有檢查制度，所以沒辦法在信件中提起自己每天挨打。”伊七年紀已經大了，能夠委托收取信件的只剩下雄次，因此軍隊寄出的信件都寄到雄次住處。

謙二受完三個月的新兵訓練后，便被派駐到位于牡丹江西南約二十公里處的寧安，分配在第二航空通信聯隊，該聯隊隸屬于負責該區域的第二航空軍，主要負責機場與飛機間的無線電通信，以及機場內外的地面通信等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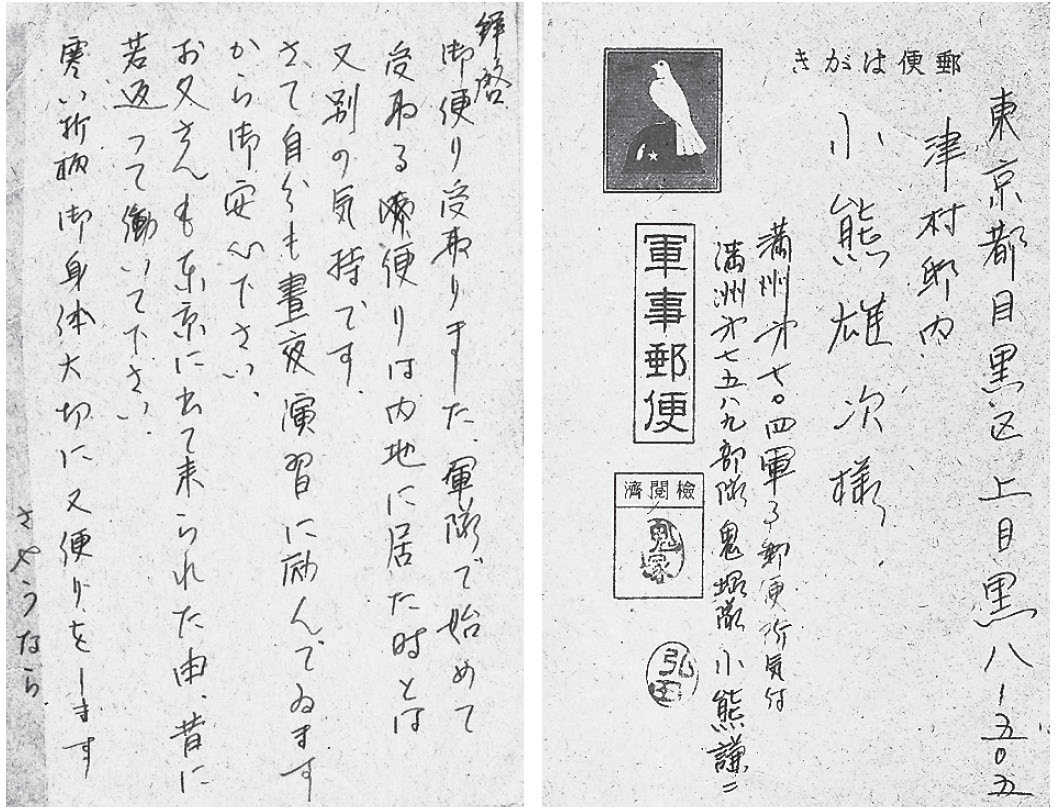
因為體力不佳導致成績低下的謙二，仍然是二等兵的身份。東京入伍時與他一同擔任新兵任務指導的同期，都已經成為干部候補生，這更讓謙二倍感凄涼。在第二航空通信聯隊里，優秀人才都配置在第一中隊，謙二則配置在第八中隊。

謙二被送往距離寧安火車站東部兩公里位于原野中的兵營，火車站旁有座小型飛機場。經過三個月緊張不已的新兵教育期、令人眼花繚亂的繁忙之后，抵達寧安卻突然有了大量空閑。他們這個區域已經沒有飛機，通信聯隊幾乎沒有什么像樣的工作需要處理。

我只看到過一次飛機。昭和二十年五月左右，好不容易來了一架單引擎飛機，但立刻又起飛離開。就見過這么一次。因為不能讓軍隊就晾在一旁隨意玩耍，所以偶爾會派大家去機場做一些整備性的土木工作，其他時間幾乎無事可干。另外也干點農活，或去采些可食用的野生灰菜。

就當我們每天過著閑晃的日子時，四月從其他中隊送來了來自日本內地的新兵，又狠狠地訓練了一段時期，我們也差不多，簡直就像為了當俘虜才被送來一般。

第二航空通信聯隊的士兵雖然以正值役齡的年輕役男為主，但也有不少像謙二一般從日本內地調來補充的新兵。因為缺乏軍官，原本需要上尉才能擔任中隊長，但謙二所屬的第八中隊則由受速成教育升上來的少尉擔任。至于大隊長，則征召已經退伍的軍官再度“回鍋”，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少校。“當我們從事農作時，曾經看過年紀一把的大隊長騎馬經過。只見過大隊長這么一次，而聯隊長什么的，見都沒見過。”



一九四五年二月從中國東北寄給父親雄二的明信片，因為軍隊有信件檢查制度，只能書寫定式化的內容，其中有“因為晝夜勤于演習，請勿掛心”的字句。

雖然受過暗號通訊與衛生兵的初步訓練，但沒什么機會進行實際演練。受新兵訓練時還有一把自己的步槍，但在第二航空通信聯隊，大概四五人才有一把步槍。配給我們的武器，只有一把被稱為“牛蒡劍”的步槍刺刀。印象中從來沒戴過鋼盔。

新兵訓練時有教導大家如何操槍，但從未做過射擊訓練，一直到戰敗之后都沒有開槍的機會。謙二唯一的射擊經驗是在早實三年級時，當時作為中學教育的一環，有接受軍事訓練學習射擊的義務，只限于那么一次。新兵禁止外出，連寧安附近的各種商店都沒去過。既沒去過慰安所，也完全沒接觸過中國人。

如前所述，關東軍為了填補主力調往南方戰線后的軍力空缺，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起新設了大量部隊。大致是以現存部隊的基礎干部搭配日本內地調來的新兵與當地征召的老兵，補充成新編部隊。不過從實際狀態來看，裝備與訓練都十分缺乏。

謙二所屬的第二航空通信聯隊是歷史較久的部隊，他們一方面送出基礎干部，一方面也補充新兵，但實際狀況就如上所述，即便戰況逐漸迫近，他們卻連挖掘戰壕進行防衛的準備都不做，謙二認為這肇因于他們完全沒受過較正規的訓練，他說：

軍隊就是一種“公務機關”，上頭交代編成部隊，命令駐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沒命令，便啥都不做。說穿了，新兵訓練時如果不依照命令動作就會挨打，既沒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們思考。這種狀態下如果敵人進攻，該如何應對，我們自然從未想過。

上面這段感想，在當時士兵的回憶錄里經常出現。即便在塞班島或雷伊泰島等激戰的南方前線地區，敵人攻到眼前時也沒做什么防衛準備，屯駐部隊“無所事事”的例子層出不窮。謙二的處境，并非什么特殊的例外狀況。

這期間，日軍的戰況持續惡化。菲律賓戰線徹底崩毀，二月是硫磺島，四月是沖繩本島，美軍陸續登陸。東京則在三月十日受到大規模空襲，造成了十萬人死亡。

對于戰爭情勢，一般士兵更沒機會了解狀況。一九四五年三月，謙二從早實時代的同學處收到明信片，上面寫著“最近艦載機在東京上空盤旋”。指的是二月十五日美軍以艦載機空襲東京一事。因為寄到軍中的信件都必須通過檢查，“在當時這算是很可能會被軍方攔下沒收的寫法”。四月時謙二收到另一封明信片，告知祖父伊七因為強制疏散而前往岡山。

自從分配到第二航空通信聯隊后，謙二多少有了點時間，可以前往“酒保”（販賣部）讀報紙。當時“酒保”已經沒有食物，“頂多就賣點衛生紙而已”。好歹是中學畢業的謙二，總還能在“酒保”閱讀些新聞內容。

但報紙上通篇寫的都是日軍在沖繩靠著特攻戰術擊沉敵方航空母艦與戰艦的消息。日本戰敗之后才知道當時這些消息全是“說謊”，讓謙二確實吃了一驚。

日軍已經不能客觀報導情勢，即便謙二從中學時期便關注的國際新聞，也只優先報導對日本有利的部分。一九四五年七月，英國保守黨在下議院選舉中輸給工黨，丘吉爾率領內閣總辭。這個時候第二航空通信聯隊的軍官集合屋的前方黑板，也寫上“丘吉爾內閣總辭”的大字。

三月十日，東京大空襲，這天也是紀念日俄戰爭中奉天會戰勝利的日本陸軍紀念日，正在接受新兵訓練的謙二等人，于禮堂中接受中隊長的訓示。畢業自陸軍士官學校、已快三十歲的上尉，告訴大家：“我們在人生最后關頭，絕不可成為‘捕虜’，應該選擇自殺。這種時候就帶著手榴彈沖進敵陣中，盡量多帶幾個敵人一同上路。”順帶說明，日本的官方文書中雖然采用“俘虜”（Furyo）這個字眼，不過包括軍隊等大部分場合，一般都采用“捕虜”（Horyo）這個詞匯。

即便如此，年僅十九歲的謙二，仍缺乏客觀判斷當時情勢的能力。對于自殺時帶幾個敵人上路這樣的訓示，他只能在回兵營的路上不斷想著：

那種事我辦得到嗎？應該沒辦法吧。

成為俘虜就必須死，在這種大前提下，各種想法都卡在這點上。所以要么自殺，要么被敵人所殺，又或者帶幾個敵人一起上路等，只能在這幾個想法上打轉。

五月的時候，聽到希特勒戰死、德國投降的消息。希特勒實際上是自殺的，但當時德國政府發布新聞，說希特勒在總統官邸前與蘇聯軍隊交戰時戰死，傳到謙二耳邊的正是這條新聞。謙二對此的感想是：“希特勒還算是個堅持理想、首尾一貫的人。”卻沒想過德國輸了之后，日本將會如何。

七月二十六日，聯合國發表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謙二在“酒保”讀到報紙報導，內心如此暗忖：

雖然是小篇幅的報導，不過仍記有可以保留日本原領土四個島嶼的字樣。當時讀了覺得“竟然可以保留中日甲午戰爭之前的領土，在這種條件下饒過日本啊”。連續幾年不斷聽到“鬼畜美英”、“所有日本人都會被殺光”等宣傳之后，他們竟然能留下日本這個國家，這種處置讓人感到異樣的寬大。

這種狀態下，謙二的平穩日子在八月九日遭打破。這天天未亮，蘇聯軍隊就越過國境了。

## 二、沒跟著原部隊走是我的幸運

蘇軍帶著壓倒性的兵力進入。因為德國已經投降，蘇軍調度原本駐扎歐洲的兵力來到亞洲，集中了一百五十八萬兵力，五千五百五十六輛坦克、自行火炮、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飛機；相對于此，關東軍只有約七十萬兵員，坦克與飛機合計不超過兩百。

蘇聯的行動完全出乎關東軍的意料之外。根據關東軍高層的評估，蘇聯應已在歐洲戰線上消耗許多軍力，即便要發動作戰，最快也得等到九月之后，慢則得等到第二年。即便如此，七月十日起，關東軍為了進一步擴充兵力，開始“徹底動員”二十五萬名居住于中國東北的日本人，但這也只是在名目上增加部隊人數，其實這些人都沒有適當的軍備。

因為關東軍中央沒有預測到蘇軍進入，因此前線部隊也未采取該有的戰斗態勢。到八月三日為止，前線部隊已經傳來蘇軍開始大規模集結的消息，但關東軍中央仍未改變判斷，其結果就是八月九日的行動對日軍而言變成了一場奇襲。

這一天，謙二擔任兵營的夜間守衛。清晨五點時，他結束了一個鐘頭的輪班，并對接下一班的人報備沒有異常狀況，然后便回到寢室，打算在起床號響起前稍微補覺。就在這個時候，喇叭突然響起。雖然這個響聲其實是警告發生非常狀態的喇叭聲，但因為沒人知道發生什么事，謙二仍以為這只是普通的起床號，大叫著：“起床！”

被叫醒的班兵們也跟著吼：“起床！”全員醒來后，準備一如往常到兵營前方列隊接受點名，不過終于傳來不準外出的命令。大家在營舍里等待時，才理解那是緊急號音。六點半左右，大家終于知道蘇軍已經進入。

過了許久，傳來新的命令，要大家把糧秣與通訊設備等物資都運到寧安車站去。處在最底層的士兵們也不會判斷情勢，就照著上頭交代的命令開始行動。

部隊的物資與裝備，不管大小都塞到貨車上。全體總動員，利用板車或人力搬送。軍隊里面嚴格要求“整齊秩序”，原本進入營舍內要換穿拖鞋，絕對禁止穿軍靴踏入，但從十日開始大家都直接穿著軍靴踩踏，能夠感受到非常時期的一股緊迫氣氛。

謙二等人受命搭上開往牡丹江的列車，時間已經來到八月十日的下午，關東軍發出退至“南滿洲”的命令。“有屋頂的火車貨車上載滿了物資，物資的上方再坐著士兵。我身上既沒有步槍也沒有頭盔。干部們大概是搭乘客車車廂。”

火車來到牡丹江前，前方傳來市區正遭受蘇軍攻擊的訊息，列車便停了下來。謙二趁著火車停下時跳下貨車觀察狀況，可以看到緩緩降低高度轟炸牡丹江的蘇聯軍機。列車在空襲過后才駛入車站內，市區在雨水中燃燒，火焰將夜晚照得有如白晝一般。

牡丹江約有六萬名日本人居住，許多人都帶著家眷擠到車站來想要避難。但日本軍卻完全沒有讓“地方人”——當時日本軍方對民間人士的稱法——搭上火車前往避難的想法。“至少我們搭的貨車沒有搭載任何避難民眾。幾乎所有的避難民眾都被拋在車站，當時連考慮他們的想法都沒有。”

當時的“滿洲國”大概有一百五十萬日本人。關東軍從最初便認為不可能阻擋蘇軍，計劃一邊撤退一邊在朝鮮半島邊界前進行防衛作戰。若事先通知日本僑民避難，退卻的民眾會讓蘇聯察知日軍的后退戰術，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該想法未被采納。事實上等于在戰斗展開之前，就已經放棄保護日本僑民了。

蘇軍進入后，關東軍雖曾運送日本人逃離，但實際上都以軍人與官僚的家屬優先。“滿洲國”當時的“首都”新京 （現在的長春市）約有十四萬名日本人，自八月十一日凌晨至正午為止，發出十八班列車，運出了三萬八千人，其中軍人家屬占了兩萬零三百一十人；大使館相關家屬七百五十人；滿鐵關系家族占了一萬六千七百人。[[1]](#m1_1)簡單地計算一下，其中一般市民還不滿三百人。

像牡丹江這類位于國境附近的城鎮，因為狀況更加急迫，詳細情形至今不明。牡丹江于八月十三日遭蘇軍占領，發生了殘殺日本人的事件。住在牡丹江的作詞家中西禮（音譯），以自己當時的體驗為基礎，寫了一本小說《赤月》，內容便提及軍人及其眷屬到車站搭乘特別安排的列車逃離，而一般民眾卻不準搭乘這些班車。

謙二等人搭乘的軍用列車，遵照關東軍的指令，經由哈爾濱于十五日抵達奉天（現在的沈陽市）。他們雖然沒有聽到昭和天皇宣告終戰的“玉音放送”（《終戰詔書》），但也聽到日本投降的傳言。不過其他軍官們矢口否認，“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在這種情況下，謙二一行人在位于奉天與安東之間的鳳凰城等到八月十七日。謙二從長官處聽到戰敗的消息，就是在這天。關于當時的感想，謙二如此說明：

聽到通知時，不覺得日本戰敗了，感到一陣懊悔。不過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內心開始想著：“等等，這么一來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見家人了嗎？”漸漸感到開心。這種心情不能表現出來，只能沉默著，但大家內心都這么想。

除此之外謙二的另一個想法是，“哎呀呀，如此我就不用帶著萬年一等兵的身份活下去了”。

當時日本的在鄉軍人會影響力龐大，在地方社會中，大家仍相當看重從軍時的軍階。特別是在農村，“那個人好像在‘一選拔’中就獲選為上等兵，如果想要嫁新娘的話，果然還是要選這種人啊”，大概就是這種調調。像自己這種劣等兵，即便退伍回到日本，也只是“見不得人”的角色。現在日本戰敗了，往后大概就不會有這種想法了吧。

當秩序激烈變化時，人們既無法預見將來，而且經年累月的思考模式也難以改變。從戰敗后的日本社會來看，預測今后無需背負“原劣等兵”身份便可活下去的安心感，只是延續二戰前日本社會的思考方式來預測未來，既無法成立，預測也失準。

但另一方面，謙二在這個時間點上預測日本內部的軍隊型社會將會消失，則是正確的想法。當我們觀察歷史可以發現，庶民的判斷往往會在細節上出現錯誤，但對整個大環境的判斷卻屢屢正確。

后來，謙二隸屬的第八中隊長、那位年輕少尉，于第二天中午試著以軍刀切腹自殺，但卻沒能成功。人類腹部有脂肪堆積，刀其實不易通過，遑論要整個切開腹部。江戶時代的切腹，只是形式上以刀刺向腹部后，立刻由“介錯人”[[2]](#m2_1)負責把切腹者的頭砍下。不知道這種情況的年輕少尉，雖然試著切腹，結果只是負傷，而且花了兩周才痊愈。

被告知日本戰敗后，謙二等人移動至鴨綠江河口北方的遼寧丹東，分散開來住宿。謙二他們住在當地日本居民的公司員工宿舍內，因為無事可做，只好與附近居民閑聊。從當地居民處，謙二才得知廣島與長崎遭原子彈轟炸，而日本聯合艦隊已經毀滅，只剩下“長門”等船艦。謙二聽說原子彈具有驚人的破壞力，但并不十分理解情況究竟有多嚴重。

大家一直在員工宿舍等候，大約八月二十八日，日本軍的長官下令，要大家把武器拿到宿舍一處繳交。謙二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刺刀，不過事實上這就是對日軍的解除武裝。

等待期間，中隊本部發給士兵八月份的軍餉。從軍期間，士兵的軍餉都以郵政儲金的方式存入個人戶頭，隨著郵局機能崩解，首度以現金方式發放。士兵們沒事可干，便拿著領來的薪水向中國人買食物吃。“因為連儲金簿都沒看過，這時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每個月十五日元。因為軍隊也是行政機關，從薪資明細檔案到中隊長印章，連撤退時都帶著一同離開駐地。”

從居住處的員工宿舍，可以清楚看到連接中國東北與朝鮮、橫跨鴨綠江上的火車鐵橋，但幾乎沒有列車通過。士兵們吃完晚餐后，會閑聊“如果列車可以通過那鐵橋，我們就可以回家了”。中隊事務股比較資深的準尉對拿錢買食物吃的士兵們說：“你們啊，這樣會沒有回家的車錢喔。”謙二當時只想：“反正國家會把我們接回去，為何話題會扯到得自費回家？”

在安東等了一陣子之后，大家照例搭上時刻表狀況不定、走走停停的軍用火車，九月十五日左右來到當時的奉天。在奉天街上，謙二首次見到蘇聯士兵。

九月二十日左右，包含謙二在內的日軍俘虜，都被集合至位于奉天北陵某所帶圍墻的大學校舍里。這里似乎是醫科大學或是師范大學，但不清楚是什么校舍。

來到該處的不僅有謙二所屬的第二航空通信聯隊，附近以部隊為單位的俘虜，或者零散的個人等等都被集合至此。“跟往常一樣是由部隊長官直接下達命令，恐怕是蘇聯軍隊為了維持日本軍隊的形式，所以仍由部隊長官下達移動與集結命令。”

好不容易把集結的俘虜們編成一千人左右的“大隊”，準備移送到某處。謙二說：

編組工作應該是日本軍自行完成的，在北陵校舍中，關東軍的軍官們處理事務工作。大家都以為這是為了移送歸國而進行編隊，完全沒有任何情報，士兵之間也沒聽說過要移送西伯利亞的謠言。集結地雖然有蘇聯軍隊步哨，但日軍軍官既然沒有下達命令，大家也無法想象將被送往西伯利亞。

關東軍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對蘇聯方面提出的陳情書中，有關受俘日軍的處置一章，有這樣一節記載：“返回（日本內地）之前的時間，將極力協助貴軍之經營，敬請盡情調度使用。”[[3]](#m3_1)

原來，近衛文麿受天皇之命于七月底簽訂了《和平交涉要綱》，將居住于“滿洲國”的日本軍人、軍屬（為軍隊工作但非正式軍人）當作賠償的一部分，為蘇聯提供勞務服務。戰敗之前，日本政府還希望蘇聯能居中調節，幫助日本與聯軍諸國展開和平交涉。

蘇聯方面在二月的雅爾塔會議上向盟軍陣營承諾，對德戰爭結束后，將在二至三個月內對日宣戰，但實際上德國投降三個月后蘇聯才發起進攻。日本投降后，斯大林發出一份日期為八月二十三日的極秘指令，要求依照過去已經計劃好的方式移送日軍俘虜。日本方面的對蘇交涉，根本只是一廂情愿，不過當時的謙二根本無法得知這樣的內部信息。

集結于北陵的俘虜們，許多都是在日本戰敗前遭“徹底動員”來的在中國東北的日本居民。根據謙二的回憶，九月中的某天，出現了一群混雜穿著日本木屐的民間人士，來到了北陵。

“喂，還混著‘地方人’啊！”士兵之間立刻傳言四起。與這些人交談后，才知道他們是在當地受征召的日本居民，戰敗之后他們便除去兵籍返回家中，稍后突然又接到通知，說要發退伍證明書，請曾經擁有軍籍的人到當地警署領取，這些人到警局后就被武裝的蘇聯士兵押送到北陵來。大概是為了達到蘇軍要求的移送人數定額，日本軍方為了確保人數，再次動員征召。這些民間人士到北陵后，日軍便要求他們換上發給他們的日本軍服。

有人甚至只因太太托自己跑個腿，順道去趟警署領退伍證，就這么被帶來北陵集結地，接著又被送到西伯利亞。這些人非常痛恨通知大家前往領證的町內會長或鄰組長，叫罵著：“你們自己不去，竟抓我們替死！”還有人說：“等回日本一定告死你們！”有些人比較敏銳，察覺該通知有異而不予理會，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愈是認真誠實的人，往往就愈信任上級，所以才會中計被帶走。

謙二與這群被集合帶來的“滿洲國”日本居民談起軍隊在牡丹江把日本居民留在原處，自行繼續撤退的事情。大家紛紛反映“軍隊就是這樣”，然后擔心起自己的家人。然而，這次移送，“應該有人因此便與家人永別了”。

包括謙二在內，大部分的俘虜都沒打算逃離北陵集結地。

蘇聯士兵在每個重要處都設下監視，晚上還可以聽到槍響。居住在東北接受征召的日本人，有些能說中文，在當地又有家人，部分人似乎就此逃走了。可是我不懂中文，離開軍隊就等于沒飯吃，在這樣的考量下，還是跟著編成大隊的眾人一同行動。即便如此，還是沒想到自己會被送往西伯利亞。

集結后經過一周左右，謙二搭上移送列車，離開了奉天。第二航空通信聯隊的士兵們先編成部隊后出發，但謙二因痢疾復發，體力衰弱，所以軍隊把他與其他二十名同樣身體狀況不佳的人留著，先行離去。“軍隊是官僚組織，理所當然把礙手礙腳的人棄置一旁，因此大家也深知他們不會保護民間人士。”

不過對謙二而言，這卻是一種幸運：

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我活下來的理由之一。如果跟著原本編成的部隊前往西伯利亞，因為不可能再補入新兵，所以在集中營內將會成為萬年新兵，永遠遭人任意使喚，配給食品時也將排在最后領取。當我閱讀二戰之后各種西伯利亞回憶錄，讀到很多這種例子，最下層的新兵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隨著原編成部隊移送，自己既笨手笨腳，體力又差，搞不好活不過第一個冬天。

謙二等第二航空通信聯隊的殘留士兵們，進入了新編成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隊”。這個大隊由大隊本部以及六個中隊組成，謙二隸屬第四中隊。這支隊伍由雜多的小部隊、類似謙二這樣的脫隊士兵，加上七月、八月遭“徹底動員”的“地方人”等，集合而成。

“地方人”的年紀大概都在三十到四十幾歲，他們把像我這種第二航空通信聯隊的脫隊士兵當作小孩來對待。因為他們直到不久之前都過著民間生活，軍隊內的習慣或特權對他們不通用，因此即便移送西伯利亞的戰俘營，軍隊長官也不能光明正大行使特權，也不能在食品分配上亂動手腳。這大概是我能活下來的理由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左右，謙二所屬的第五十二大隊從奉天北部的皇姑屯車站搭上火車貨車。謙二搭乘的這輛列車，前方由蒸汽機關車頭拉動，幾乎都是有蓋的貨車廂，只有兩節車廂是有椅子的客車，由大隊司令部人員搭乘。其他人員則擠在以板子隔成上下兩層的貨車廂內，每節車廂約有一百人。貨車屋頂上另外有木板走道，擔任監視工作的蘇聯士兵便乘坐其上。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滿月，謙二還記得出發前一天的晚上，在大學里眺望月亮的美麗景色。

謙二搭乘的列車由奉天出發，當時他們還相信這是一輛要將他們送回日本的列車。

## 三、赤塔流放地

列車出了奉天后朝北方前進，如果要遣送回日本，理當往南走。即便如此，俘虜們仍想象不到將被送往西伯利亞。

列車北行后，大家就想，應該是要通過哈爾濱轉往海參崴港。可是列車通過哈爾濱后仍繼續往北，這時又有傳言說是因為作戰破壞了鐵橋，所以必須改由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轉往海參崴。人類不太愿意相信事情進展逐漸惡化，寧可滿懷期望地觀察周遭狀況。

俘虜們在貨車廂內的兩層底板上三三五五地坐著。因為是在極短時間內編成的隊伍，不具備真正的部隊機能，“只是把互相認識的人湊在一起的烏合之眾”。

運送俘虜的列車，在鐵道路線上連綿前進。因此當更前方的列車塞車時，后方列車便經常得停下等待，并借此補充煤炭與水。場景大概都是在遼闊原野中的某個火車停車場，停車后可能幾個鐘頭都不動，一旦發車，又會奔馳不停，不知何時才再停車。

貨車上沒有廁所，所以得忍耐至下次停車，或者在地板的縫穴中解決。而且不停車就無法煮飯。搭乘火車時領到兩公斤的黑面包，一開始因為太酸，誰也不愿意吃，即便肚子漸漸餓了，大家一開始還是先從發配的米與雜糧吃起。

利用蒸汽火車頭補水停車的時機，可以炊煮雜谷，日本的米飯只要沒水沒火，就束手無策。當時是我第一次見到俄羅斯黑面包，當發覺只要有水和這種面包就能活下去時，還覺得相當方便。列車不停的時候，大家便生啃谷類，最后終于也吃起黑面包。

毫無預警停下車時，大家便趕緊奔走取水燒飯，在火車停車場有幫機關車補水的水箱，因為沒有水桶，俘虜們便拿著飯盒在水箱內取水。這些水是為了下次停車之前做好準備。

停車煮飯時，籌措燃料是一大難事。因為這支隊伍不是真的軍隊，無法有效依軍紀行動，所以幾個談得來的人便結伙到四周尋找枯草、柴薪或脫殼后的谷物外殼，權充燒飯燃料。但因前方列車的俘虜們也同樣在火車停車場周遭采集燃料，許多時候木、草料都遭采盡，他們只好前往更遠處搜集，有些俘虜甚至因此遭遇盜匪。當列車發出發車訊號時，總會讓離列車較遠的人大為慌張。

現在回想起來，面對要把自己送去西伯利亞的火車，因為它即將離開而感到著急心慌，也是相當奇怪的事情。但是處在那種資訊有限的環境下，也只能做出此種程度的判斷。謙二說：“當時完全不知道會發生什么狀況。因為言語不通，即便逃走也不知接下去該何去何從，因此只能保持與大家一同行動。”翻閱西伯利亞拘留記錄資料，可以看到許多人指稱蘇聯士兵提供假資訊，告訴日本人他們搭乘的是“Domoy（俄語“歸國”之意） ”的列車。據說因此許多日本士兵不加抵抗，而任蘇軍運送。不過根據謙二的說法：“沒有從監視兵那里直接聽到消息，當時大家一心一意想要回家，到處充斥各種充滿希望的謠言，這些傳言廣布的程度恐怕超過大家想象。”

根據謙二他們奉天第五十二大隊于二戰后發行的會刊來看，從奉天出發后，逃離大隊的合計有數十名[[4]](#m4_1)。根據謙二的回憶，剛從奉天出發時逃走的人數最多，到北安（現在的黑龍江省黑河市北安）出現了最后的脫逃者：“蘇聯士兵在貨車頂上架設自動步槍，因為曾在夜里聽過開槍的聲音，推測應該有人打算逃走吧。猜想逃走的是能說中文、在東北當地征召的日本人。”

火車停車期間，當地的“滿人”紛紛前來，與俘虜們以物易物。謙二也拿軍隊發的皮腰帶和當地人換了食物，類似煮玉米或豆沙包，交換這類可以立刻食用的物品。至于被集合到北陵的民間人士，有些也拿自己換上軍服前的私人服裝與當地居民交換食物。

對因為腹瀉而遭部隊拋棄的謙二而言，在體力極差狀態下的這趟列車行程，顯然痛苦不已：“火車停下大家取水時，頗得要領的機靈人很快就可以確保自己的飲用水，而我總是慢半拍。加上這個剛編成的集團也沒什么團體感，自己如果不做點什么求生，也不見得會有人伸出援手。”

終于，列車經過哈爾濱來到北安。列車停在此處，大約等了一周時間。接著在十月十日前后終于來到國境上的小鎮黑河（現在的黑龍江省黑河市），謙二等人于此下車。

在北安曾與往南送返日本居民的列車擦身而過，黑河已經沒有任何日本居民。黑河街道上的建筑物已經遭受蘇聯軍隊的炮擊破壞。從此處渡過黑龍江（阿穆爾河），便是蘇聯阿穆爾州的海蘭泡。

蘇軍命令俘虜們開始將物資堆上駁船，準備渡過黑龍江。這些物資是蘇聯軍隊從中國東北掠奪來的戰利品，有各式各樣的物件，不過最大宗的仍是大豆與高粱等糧食作物。在俄國人的駁船上，由俘虜們背著每包大約五十公斤的物資爬上駁船階梯后堆放。

這樣的作業持續了快一周，最后俘虜們也搭上駁船渡河，那天是十月十四日，因為是俘虜朋友的家鄉舉辦慶典的日子，所以記得很清楚。

抵達對岸海蘭泡的那天下著雨，但蘇聯沒有準備任何住宿用的建筑，俘虜們只好在其他建筑物的廊檐下站著撐過一晚，第二天開始在原野中開挖壕溝。大家把手邊的營帳集中起來設置屋頂，周圍做好排水溝，一面搭建避雨的場所一面忍耐寒冷。接著在這里又花了一周左右進行作業，將駁船上的行李全部卸下。

從海蘭泡有開往西伯利亞鐵路干線的火車。在黑龍江兩岸上下貨作業了十天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隊，乘著十月二十五日的夜間列車，深夜從海蘭泡出發。

出發的第二天早上，俘虜們一邊觀察太陽的方位，一邊討論現在正在往西北抑或朝西南前進。但因列車路線不斷變換方向，所以難以掌握前進的方位。不過當天下午，大家終于從太陽的方向，知道列車正往西行。

進入蘇聯領土后，警備格外森嚴，俘虜除了下車上廁所之外，都禁止離開列車。進入蘇聯領土后換乘的列車連接有炊事車廂，從該處向各車廂提供裝有熱粥的金屬制圓鍋分食，因此也不可到車外去煮飯。在奉天分發的黑面包早已吃完，手邊即便還有雜糧，也無法炊煮。如果發生什么狀況導致糧食配給停頓時，就只好生吃雜糧。

被原本部隊棄置的第二航空通信聯隊脫隊士兵，因為長程移動而體力不支，有些人就這么從列車上消失了。謙二說：

大概離開海蘭泡三天后，有個入伍四年的“萬年一等兵”——會成為“萬年一等兵”，大概都是思想或行為上有問題，屬于很糟糕的士兵。這個人被列為“萬年一等兵”的理由是他智商不太夠，對部隊而言帶著這個人相當麻煩，所以也把他拋棄了。而且關于確保食物、作業分攤等，他全部不需參加。

這個人既不會打水，也無法收集燃料，更不會煮飯，光是在貨車車廂內睡覺。俘虜同伴會多少照顧他，不過遇到情勢緊迫的時候，往往自顧不暇，只能擔心自己的事情。最后，他的存在感日益稀薄，大家幾乎都不記得有這個人，某天他終于從列車上消失了。講得好聽一些，有人說他下車“入院”去了，不過列車在大荒原上奔馳，根本沒看到有醫院的小鎮。在沒有任何體制幫助這個人的情況下，他大概沒能夠生還吧。

再往后的西伯利亞時期也是如此，謙二從未親眼見過人員死亡。“大概就是那么回事，跟電影、小說不同，他們總是在不知不覺間就消失了。”

離開奉天大約一個月，十月二十八日的午后，列車通過一個大市鎮的中央車站，最終停在離市鎮一段距離的火車調度場。俘虜們受命在車上等了約一個鐘頭，當天色昏暗下來，便開始依序下車，并分成三個集團。第一集團有第一、第二中隊；第二集團有大隊本部與包含謙二的第三、第四中隊；第三集團則有第五與第六中隊。

火車通過市鎮的中央車站時，俘虜們才知道這個市鎮名為赤塔。赤塔為西伯利亞聯邦管區赤塔州的首府，十九世紀為俄羅斯帝國的流放地。在日本軍的地圖上看來，離開海蘭泡之后便無都市，直到赤塔之前，沒有任何稍具規模的市鎮。

下車之后，聽到告知下午五點的汽笛鳴響。處于不知未來會如何的狀態下，謙二說，這聲汽笛聽來是一陣“非常悲涼的聲響”。

當天雖然有配給早餐，但沒有發放午餐、空著肚子的俘虜們，奉命走在寒冽陰暗的大雪中，當時謙二身上僅有一只背包，里面裝著飯盒、水壺、用得又舊又薄的軍用毛毯，以及少許的日常用品。

經過一個月的列車運輸，抱著空腹走在寒冷陰暗中，實在非常痛苦。可以聽到日本軍官喊著“還剩幾公里了”，激勵大家繼續往前。這里面也包含了運送死于貨車上同僚遺體的小組。

讓俘虜搬運遺體，可能是為了確認人員數量吧。蘇聯軍隊中的運輸指揮官，應該確實有收到將俘虜移往戰俘營的命令。包括遺體一同確認送達，必須讓戰俘營的所長明確人數，然后才能領取“受領證書”。不管是日本軍隊還是蘇聯軍隊，只要是軍隊就是這種情況。

大陸城鎮的空曠大道上，僅偶爾出現幾盞路燈，幾乎沒有汽車與行人的影跡。隊伍經過不知名的巨大銅像與水泥建筑物前，步行了大約兩個鐘頭，終于抵達一處木造建筑。這段大約五公里的路程，此時卻令人感覺如此遙遠。謙二所屬的集團在此停下，其他集團還需走到更遠的地方，而且，此后再也未曾見過他們。

那時已是深夜了，累壞了的俘虜們也沒有余力思考其他事情。他們在終于抵達的安心感中，分配決定各自要睡在三層床鋪的哪個位置，吃過配給的食物后，立刻睡下了。

對謙二而言，從這一天開始，展開了他待在赤塔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三年時光。

[[1]](#w1_1) 半藤一利，《ソ連が滿洲に侵攻した夏》，文藝春秋，一九九九年。

[[2]](#w2_1) 介錯：日本歷史上指為切腹自殺者斬首，以讓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的行為。

[[3]](#w3_1)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平凡社，二〇一〇年。

[[4]](#w4_1)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會會報”》，第三號，一九八二年。

# 第三章 西伯利亞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第五十二大隊的第三、四中隊，以及大隊本部的俘虜們共約五百名，終于抵達赤塔第二十四區戰俘營第二分所。兩天之后，謙二正好滿二十歲。

一個已經在車廂內過世的俘虜，由同伴們扛著他的遺體，一路運送到戰俘營。這位死者在戰俘營全員的目送下，包著席子由推車送往墓地。

后來，因為勞動日益繁重，饑餓感也愈來愈強烈，大家不再有余裕舉行這樣的葬禮。深秋之后流出傳言說，每當有人死去，守靈時大家會供上一碗插著筷子的白飯，但第二天天亮時白飯就會消失。饑餓與極度寒冷的西伯利亞之冬，已經悄悄降臨。

## 一、每個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樣

日本戰敗之后，遭蘇聯帶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員（“滿鐵”職員、“滿洲國”官吏、警官、軍屬等），人數上有各種說法，但大致有六十四萬人。分散收容于西伯利亞（約四十七萬二千名）、外蒙古（約一萬三千名）、中亞（約六萬五千名）、蘇聯歐陸部分（約二萬五千名）等處，約一千二百處戰俘營，以及約一百處監獄與其他特殊戰俘營。分布幅員寬廣，東起堪察加半島，西至第聶伯河，北到北極海沿岸，南至帕米爾高原山麓西部。

理所當然地，俘虜們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區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亞需面對零下四十五度的極度酷寒，中亞得面對四十度的高溫炎熱；濕地區域會遭遇大批蚊蚋，干燥地帶則得忍受口渴，俘虜們被迫面對各式各樣的苦難。除此之外，還得在饑餓之下開采礦山、鋪設鐵軌、進行土木工事與采伐森林等重度勞動的工作。

赤塔是赤塔州首府，也是鐵路與道路干線集中的要沖所在。既是帝俄時期的流放地，也是蘇聯軍隊外貝加爾山脈軍團司令部的軍事重鎮。俄國發生革命后的內戰時期，曾遭白軍占領，日本為了干涉革命政權而出兵西伯利亞時也到過此地。謙二曾經在赤塔郊外親眼見到過往日本軍第五師團建立的紀念碑。

赤塔市郊的松樹林中有兩棟并排的建筑物，據說被當作日本與“滿洲國”的領事館來使用。

那是西洋式的雅致建筑物，外出勞務作業時經常會經過。過了一年左右，才聽說那是領事館。

回國之后，曾讀過在該領事館工作過的人所寫的回憶錄。接近日本戰敗的時候，他們拿著雙筒望遠鏡從這個領事館向東側監視西伯利亞鐵路的軍用列車。回憶錄中還寫到日方在戰爭期間從領事館開汽車到城市內搜集情報，結果遭蘇聯的汽車緊緊尾隨妨礙、最后被擠到砂地的道路上陷在路中的困窘情境。赤塔市中心街道雖然是石板路，但稍微離開市區就都是砂子路，還記得當時我們連走路都感到相當辛苦。

俘虜的戰俘營依據地區進行區分，在赤塔周邊有第二十四區（赤塔）與第五十二區（卡達拉）。根據日本厚生省撤退援護局的統計，第二十四區中的三十四個分所，共收容了“一萬人以上”，而死亡者約有三千二百人。[[1]](#m1_2)被帶往西伯利亞的約六十四萬人當中，通說死亡人數超過六萬，但這有許多派說法，正確的數值至今依然不明。

謙二等人拘留于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日常起居大致如下：從早上六點起床開始，起床的信號已經不是鐘聲，而改以鐵錘敲打一段掛在衛兵所的鐵軌，借此發出的響聲叫醒大家。

起床吃完早餐，七點半到八點左右，為了出發進行勞務作業，會在出口整隊成五列。從秋天到冬天，西伯利亞這個時刻既黑暗又寒冷。

在衛兵所前排列整齊，警衛兵為了確認人數開始計算。可是因為蘇聯人沒有背誦九九乘法表的習慣，不采用列數乘以列數的點名方式，而以五個人五個人加算的方式計算。因為實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著腳保持列隊狀態。當時內心不斷想著，這些家伙怎么頭腦這么差。

接著分配各作業班的任務，出發進行勞務作業。來到戰俘營最初的任務就是維修戰俘營。這個木造的戰俘營雖是為了大量收納俘虜而搭建，但設施建制并不完善。大家持續修蓋廚房，整修臥鋪，還更進一步在戰俘營周圍搭設柵欄。

最初的工作是搭建柵欄把自己關起來。可是周遭都是嚴寒的荒野，沒有食物便饑餓到體力不支倒地，不管有沒有這道柵欄，腦袋中根本沒想過能夠逃走。二戰結束后有讀過一些人的故事，說他們自戰俘營逃脫，那是受惠于相當良好的條件與自身擁有強健體力。即便如此，也沒有人就這么逃回日本國內。大家都在脫逃途中被捕。

經過了約二十天的整備作業后，開始派遣大家從事各種勞役工作。

工作分配，由蘇聯交代給日本的大隊本部，然后層層移交給中隊、小隊、各班。班長再從二十名左右的班兵中，指名幾個人為一組，分配工作。今天去那邊執行土木作業，明天去那邊從事農務，有各式各樣的派遣，指定了各式各樣的工作內容。

戰俘營就像把俘虜當作勞工，派遣到各企業去，本部則類似獨立計算酬勞的勞工派遣企業。依據當地的各種企業團體的要求，把戰俘營的俘虜當勞役派遣，提供使用。各企業團體依照蘇聯的勞動規定計算薪資，支付給戰俘營。戰俘營將俘虜的餐費、照明與瓦斯等燃料費、醫療費用扣除后，剩下的才發給俘虜們。整體的運作體系大致如此。但扣除的餐費與其他費用所占比例甚高，只有一部分擁有特殊技能的俘虜，從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之后，才能真的領到勞動薪資。

在蘇聯不只有日軍和德軍的戰俘，連蘇聯內部的政治犯與一般囚犯也被當作勞動力來使用。日本從明治時期之后也曾把囚犯當成勞工來利用，如果沒有這些囚犯的勞動力，就不可能出現北海道的道路建設與三池煤炭的開發。[[2]](#m2_2)雖說如此，但蘇聯活用囚犯勞力的規模，是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據說一九四九年當時，在蘇聯的“奴隸勞動者”共超過一千萬人。謙二等人也被編織到這個體系當中。

這個系統與其他國家處理俘虜的狀況相當不同，但日軍從將至兵都不理解國際法。以謙二的例子來看，他被當作劣等勞工使喚，根本沒有依照正常規定支付酬勞，所以也沒想過自己可以領取勞動薪資。

有很辛苦的工作，也有很輕松的工作。采伐樹木、在風吹日曬的荒野進行土木作業等，屬于辛苦的工作。讀過其他戰俘營回憶錄之后，才知道這還是比開采礦山或鋪設鐵道來得輕松些。

至于輕松的作業，大概就是溫暖的室內作業或是農務作業，因為莊稼長得好，就可以收成馬鈴薯，獲得食物。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前往蘇聯軍官的家中，幫他們丟棄冬天結凍的生活廢水。赤塔沒有上、下水道，生活廢水全都傾倒家中，冬天很快便結凍成山，所以必須在春天融化腐臭之前，把這些冰塊敲碎，丟進河川里，這就是工作內容。工作輕松，又可以從軍官夫人那里獲得食物。類似這種“爽缺”，大家都想做。

會周濟食物給俘虜的俄國人，大多是女性，特別是阿姨們。許多人也在戰爭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與孩子。這些阿姨一定會問俘虜“幾歲啦”，以只字片語的俄文回答說“二十歲”后，對方便悲傷地搖著頭說：“年輕吶！”，“爸爸或媽媽都還在嗎？”被這么一問時，內心不禁悲從中來，現在還記得那時的景況。

送到赤塔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人員，是奉天第五十二大隊的第三中隊與第四中隊。大隊長是植苗駒雄上尉，大隊副官是隈部會上尉，幾乎所有的管理業務都由隈部上尉執行。少校以上的軍官另外收容于軍官戰俘營，所以此處以上尉為最高階軍官。謙二隸屬的第四中隊第二小隊中隊長為浦山上尉，小隊長為田下中尉。

只不過，在大隊的軍官們，大概只有半數是現役軍人，其他都是日本快要戰敗時，召集而來的當地日本僑民，算是應召的預備役。

中日戰爭開始之前，日軍預算有相當限制，因此員額也不多。大致由陸軍士官[[3]](#m3_2)學校出身的現役軍官，以及甲種合格現役兵組成，士兵服役兩年后便可退伍。類似謙二這種體質不佳的第二乙種體格的士兵竟然也受到征召，代表當時戰局已經相當嚴峻。

隨著戰局惡化，一些已經退伍的士兵與退役的軍官，又再度被征召加入部隊。這些人較為年長，被再次征召之前已經過著一般的社會生活。受到“徹底動員”集合而來的當地日本僑民，大概都是這樣的人。

謙二隸屬的第五十二大隊軍官中有許多都屬于此類再度征召的軍官。大隊長植苗上尉與大隊副官隈部上尉，是原隸屬機場大隊的現役軍官，但第二小隊長田下中尉，則是一九二〇年代軍事限縮時期的短期志愿軍官，后來成為預備役；當他成為“滿洲國”僑民之后在當地受到征召時，大約四十多歲。

第四中隊長浦山上尉，原本是女子學校的英語教員，后來負責管理位于奉天的戰俘營。第四中隊的第一小隊長也與第二小隊長一樣，同為被再度征召的當地日僑居民。第三小隊長為現役中尉，第四與第五小隊長皆為二十歲左右的少尉軍官。

而且，因為日本戰敗，日軍全員都形式性地升了一級軍階。謙二因此成為一等兵，田下小隊長從少尉升為中尉，浦山中隊長從中尉升為上尉。對于這樣的升等，大家都稱“波茨坦中尉”“波茨坦上尉”等等。

在奉天臨時編成的第五十二大隊，抵達戰俘營之后才完成整編。謙二所屬約有二十名班兵的班，大概有以下成員：首先是班長高橋，他是現役軍曹，曾待過從華北移防東北的部隊，是擁有戰斗經驗的老士官。日本戰敗后，他與那些遭“徹底動員”的人一樣，暫時離開了軍隊，但又在奉天受到征召并被送往西伯利亞。

班里面有丸谷伍長，他是當地征召的日本僑民。丸谷伍長周遭還有五六名住在奉天的日本僑民好友，大家都是當地征召而來。另外班內還有兩位《“滿洲”日日新聞》的記者，也在當地受到征召前來。

班內尚有一名原本應該是中尉的人，卻隱瞞過去，以一等兵身份入隊。這位佐橋原中尉，趁著戰敗后的混亂離開部隊，在過去身為他部下的丸谷伍長家中“接受寄居照顧”。

另外，有一位與浦山上尉一同在奉天戰俘營工作的日裔第二代、叫作飯冢上等兵的原翻譯，也成為俘虜進到這個班來。他出生于洛杉磯，回雙親故鄉廣島短暫停留時，卻因戰爭爆發無法返回，之后還受到征兵的召令。但上級將他從普通部隊中調出，送到奉天戰俘營去當翻譯。飯冢雖然有時候不太能準確掌握日語的情境，不過在戰爭初期日軍占領新加坡，俘虜了白思華中將（A. E. Percival）與溫萊特少將（J. M. Wainwright）時，他曾經擔任過他們的翻譯。他還說“白思華很小氣”。

在大隊本部里，也有一位出身夏威夷的川村伍長，是略為年長的原翻譯，現在則擔任炊事班長。如前所述，浦山上尉擔任過女學校的英語教員，現在是飯冢與川村的長官。

在黑河執行物資搬運作業時，加入了另一位山本翻譯，他擔任對蘇軍的聯絡職務。傳言山本曾在中國東北的公司從事貿易相關工作，所以能夠講俄語。五十歲左右的山本個性溫和，是一位深受敬重的“人望者”。

翻譯這種工作，為了迎合蘇聯方面，可以把俘虜們想表達的意思略過不譯，但山本卻很忠實地翻譯。通過他的口譯，供食與勞動條件有很大的改進。雖然他是非常溫和的人，但如果蘇聯方面有蠻橫的舉止，他也會委婉地訓斥對方，詳加說明應有的正確做法。這位“人望者”絕不會說什么豪言壯語，但任誰都會對他敬讓三分。

這些人的經歷，都是謙二在戰俘營里閑聊中聽到的，缺乏資料佐證。高橋軍曹歷經什么樣的轉折才來到奉天集合，又或者佐橋中尉為何隱瞞身份埋沒人群中，這些事實都不甚明了。

都是閑聊時談到進入軍隊前大家從事什么，無意間脫口而出的事情。不過大家最熱衷的話題仍然是食物。“回到日本內地后想要吃什么”啦，“鄉下紅豆湯與御膳紅豆湯有什么不同”啦，大概都是這類話題。而且這種閑聊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之后，稍有余裕時的事情，最初的那個冬天大家都累垮了，回營舍只想睡覺。

蘇聯方面也針對俘虜進行身家調查，特別針對原關東軍特務部隊出身的人，都會進行嚴密的監視。不過根據謙二的推測，“一般部隊的人，即便偽造自己的軍階，只要不影響整個管理運作，蘇軍也不怎么關心吧”。謙二自己也僅在抵達戰俘營時接受過一次身家調查，之后完全沒有追蹤調查。

第五十二大隊因為是混合編成部隊，所以混雜了各式各樣的人，不過也因為這種多樣的編成，此處的上下關系不像一般軍隊那么嚴謹。日本戰敗之前才征召而來的當地日本僑民許多彼此都認識，名義上掛著士官或軍官，但分配食物與勞役時，并沒有發生蠻橫或偏頗的狀況。“不管是輕松的工作還是辛苦的工作，能夠賺點好處或沒啥好處可撈的工作，身為班長的高橋軍曹，都盡量做到公平分配。”

謙二所在的戰俘營，軍官們也是收容在其他建筑，擁有不同的待遇。不過這是因為蘇聯遵照過去于一九〇七年批準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海牙第四公約）規定，軍官與士兵享有不同待遇，而且不可驅使軍官進行勞役。

因為不懂國際條約，當時感到很不公平，不過除此之外，因為自己所處的戰俘營并沒什么階級差別，這算是相當幸運的一件事。在其他的戰俘營，新兵不管糧食或勞役分配，都處于最差狀態，許多人都因而死亡。

雖說如此，戰俘營的人際關系大致還是相當冷酷淡薄。即便視同一班的班兵，因為大部分人白天沒有一起作業，大家感情沒那么好。加上該隊內沒有階級與類似部隊的固定上下關系，“不得要領”的人，勞動作業手腳緩慢的人，就容易被當作“包袱”。

例如在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們被派遣至某丘陵地帶達三個月，執行樹木采伐勞務。兩個人一組以鋸子伐樹。每一把鋸子的銳利程度不同，判斷錯誤選到鈍的鋸子，就難以砍斷樹木。那些懂得選出好工具的人、有體力的人、靈巧的人等等，到現場時就會組成團隊。而像我這種既不得要領、又沒有體力，而且不具技能的人，只能與狀況差不多的“殘渣”們組隊。當時與我組隊的是同樣來自第二航空通信聯隊的新兵，兩個人同樣既沒體力又不得要領。有能力的團隊總是能夠達成規定的作業量，我們卻老是苦于達不到規定量。三個月后回到戰俘營，大家都說“你瘦了好多”。如果這發生在最初的那個冬天，我大概早就死掉了。

度過了最初的冬天后，俘虜中具有經驗及知識的人，開始擔任電工、木工、理發師等技術職位，這些工作大多在室內，蘇聯方面也因為技術勞動者不足，對他們頗為禮遇。技能職務的業務達成率較體力勞務高，一九四七年以降有些人已經可以領到薪資，也有人能到赤塔市內的市集購物。

為了能夠從事這些職業，有不少雖然沒有經驗但手腳靈巧的人，靠著自學與能力也成為臨時的技術人員，他們被通稱為“西伯利亞木工”“西伯利亞泥水匠”等。謙二說：“在戰俘營內，原本就有一些過去從事泥水匠、木工與農民等各式各樣職業的人。”

這些技能對俘虜生活也有所幫助。謙二所待的戰俘營，在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左右曾經發給大家蘇聯從中國東北掠奪來的帶殼稻谷。俄國人沒有稻米脫殼與精米的知識，因此把工作委托給俘虜，而出身農民或木工的人們，以大棵松樹做成磨臼，還制作了將米殼吹走的手搖風扇機。俘虜們在出品率上做了點手腳，成功增加產量，之后大概三個月期間，大家幾乎都能吃飽。

但反觀謙二，過去不過是個下級事務員，剛滿二十歲，既沒有特別技能，也沒有農業或土木工作的經驗，而且辦事往往都不得“要領”。

那是一九四七年春天，我被派到面包工廠運送燃料時發生的事情。類似這種有好處可撈的工作，在中隊中大家都是照順序輪流擔任。面包工廠里大多都是中年女性，俘虜中辦事機靈又得要領的家伙，會用俄語隔窗叫喚：“女士，快給我！”女人們就會丟出一些面包。我對這種事情充滿抗拒感，所以完全辦不到。俘虜同伴都期待出這項差的人可以偷拿一些面包與小麥粉，當作“土產”帶回戰俘營。我大概只能把面包切成薄片塞在襯衫里帶回來，頂多只能分配給兩個人。

有些人竟然能從工廠帶回兩公斤左右的完整面包，他們把面包裝入袋子后掛在脖子上，垂下來藏在外套的衣擺內，回到戰俘營身體檢查時，面包連著外套整個脫下，騙過蘇聯士兵的眼睛。甚至還有把小麥粉藏在帽子里面躲過檢查，在戰俘營內烤來吃的人。擁有在底層累積的經驗與生活能力的人，在這種狀況下有更強的生存能力。

缺乏經驗的謙二，屢屢遭遇失敗。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在戶外作業途中找到了一處長有茂密野生灰菜的地方，他特別把早飯留下來與灰菜一起丟進飯盒中煮，卻過于苦澀無法食用，只能哭著把飯菜都倒掉。煮灰菜時得先去掉苦味才能食用，這種鄉下出身的人都知道的常識，謙二卻完全不懂。

理所當然，俘虜們的勞動欲望并不高，工作效率相當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開始，開始建造磚造集體住宅，從馬鈴薯田整地開始，全都靠人力作業，一直到謙二一九四八年夏天回國時，該建筑還僅搭到二樓。

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日本俘虜在俄國建造歌劇院的節目，我個人不太相信這種表面上的說法。恐怕俘虜們只是曾經在該處工作過而已。后來日本的經濟與技術獲得國際上的好評，俄國方面才做出這種“日本人搭建”的傳說吧。

不過上述帶有某種幽默或余裕的狀態，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后的事情。“最初的冬天實在非常難熬。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的例子，大概都出現在這個時期。”

## 二、國家應負起的責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冬天，處于最惡劣狀況下的不限于謙二所處的收容所，幾乎所有拘留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載。出現這樣的狀況其實有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戰敗之后，蘇聯的經濟也處于相當窘迫的狀態。德蘇戰爭中蘇方的陣亡人數，從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說法都有。蘇聯人口于一九四〇年有一億九千五百九十七萬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則為一億七千三百九十萬人，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陣亡者約有三百一十萬，約占一九四〇年日本內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萬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蘇聯領土西側的工業地帶與谷倉地區因為德軍占領后采取焦土戰術而遭到破壞，雖說蘇聯最終戰勝，但經濟狀況也陷入窮迫之中。因為陣亡者過多，許多村莊的男子出征之后幾乎無人生還。在一九四〇年，集體農場的男女勞動力比率大約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則轉為一比二十七。[[4]](#m4_2)

需要將日軍俘虜當成勞動力帶走，或出現這么多同情謙二這種年輕人的俄國女性，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謙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為了作業，曾經與幾個俘虜伙伴一同住宿在俄國的某戶民宅。一位應該是戰爭寡婦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孩，過著二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舊了的那一套，令人驚訝的，真的是家徒四壁，房內沒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間竟沒有床鋪，睡覺時他們只把外套披著躺下。好歹總算還有個壁爐，除此之外就是幾樣煮飯用的鍋與餐具而已。他們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從戰前到戰后，在日本還沒見過這種生活狀態。

因為如此，原本應該供給給俘虜的物資，便遭俄國人盜賣。已經不足的糧食與燃料經過盜賣后，送到俘虜手中時數量更為稀少。

送來戰俘營的燃料與糧食遭到盜賣，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送往戰俘營的燃料與糧食，文件上雖然都記有運送噸數，但貨車或卡車的司機會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這些物資，剩下的才會送到我們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幫忙運送煤炭，還幫忙盜賣這些物資。俄國人司機利用我們，在自己家與有協議的其他住戶處卸下煤炭。至于減少的數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廠時不要減少過多，領取一方也不至于有意見。戰爭時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為統制經濟的緣故，難以取得物資，大家都在盜賣與偷取物資。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發出過命令，必須送達規定量的糧食給俘虜[[5]](#m5_1)，但實際狀況則如上所述。

何況，蘇聯這個國家在對日戰爭時，也掠奪了大量物資。謙二曾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貨物場，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整理工作。

掠奪物資堆積如山。關東軍軍需物資的電纜線、鋁條、電話機等等，由貨車整車運來，就這么卸下來堆放著。當我找到裝在進貨用箱里、多達數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門用把手時，只能感到一陣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吧。

我們也偷走了一些鋁條去制作湯匙。當時俘虜的干部曾經交代，如果看到鋁條就拿些回來，送到鍛造房后，那邊的俘虜便鑄做成盤子等餐具。不管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俄國人，大家都把盜竊視為理所當然。

在整理堆積如山的大量物資時，有人就說：“就是靠這些才打贏德國的吧。”蘇聯士兵做法蠻橫，但充滿干勁，上級下達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沖勁完成。如果是在日本軍隊，上級胡亂給了辦不到的命令，下級絕對不會有那種干勁去完成。

對照民眾生活的窘迫，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也給謙二留下了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東方駐扎著蘇聯的坦克部隊，停駐著體積龐大、炮身修長的T-34坦克。“被派出工作時有機會接近一看，內心覺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坦克不僅小，而且只是用鉚釘把鐵板釘在車上當裝甲而已，根本完全無法戰勝對方。”

而且蘇聯的軍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受到盟國美國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蘇聯軍隊的卡車時，對于他們使用這么大的卡車感到非常驚訝。前面是兩個轉向輪，后面則是負重的八個輪胎，在后部車廂下兩個一組，共四組。十個輪胎的卡車輕輕松松便爬上山坡，相較之下日本卡車實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卡車，引擎蓋上印著USA STUDEBAKER字樣，才知道這是美國援助的物資。“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蘇聯應該會輸給德國吧”，俘虜間聊天時經常互相恨恨地這么說。

對于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蘇聯人似乎也充滿不滿，只是表面上沒說出口。

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個表情嚴峻的俄國人，在我們作業時靠過來攀談，用俄語說：“斯大林，不好。”他與我們也沒多熟悉，會對我們說這些，大概是因為無法與俄國人討論這些事情吧。在斯大林時代，說這種話如被告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

此外，蘇聯方面對于接收俘虜一事，并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等戰俘抵達之后才開始整備戰俘營即是一例；且不僅發生在謙二的戰俘營，在其他各種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蘇聯在沒有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下，便強制帶走這些人，當作本國的勞動力。

俘虜們在戰俘營雖然有領到冬季衣物，但其實這些是蘇聯軍隊從日本軍擄獲的防寒衣物與防寒靴，在西伯利亞根本不夠保暖。

日軍的冬季衣物跟蘇軍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為了防滑在靴底打上鉚釘，但寒氣卻會隨著鉚釘直傳腳底。蘇聯的防寒帽都有兩層，日軍的僅有一層。蘇聯人常說，在西伯利亞如果額頭受寒，就會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著這種裝備與蘇聯軍隊作戰。日軍曾經出兵西伯利亞，理應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真搞不懂軍部的人究竟在想什么。而蘇聯方面似乎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從隔年起，大家都想換用蘇聯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再三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不耐寒，竟然造成了這么多人犧牲。”

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的待遇之下，自然出現俘虜們不想勞動且效率低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千三百萬盧布的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6]](#m6_1)

提出這個數字，并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時，就應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劃，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其導致的結果，除了俘虜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分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的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于俘虜待遇，因為蘇聯并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公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7]](#m7_1)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糧食，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這并不能成為否認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使用的理論根據。

不過同樣，這樣的批評也適用于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并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落在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 三、飯盒是活命的基礎

在這種狀態下，被擺在窘迫的蘇聯社會最底層的俘虜們，他們的生活也達到一種極限狀態。根據謙二的說法：“完全就是活在原始時代。”

抵達戰俘營時，謙二還穿著日本軍服，身上帶著的物品只有飯盒、水壺、用舊的軍用毛毯以及背包中稀少的日用品。雖說是日用品，但既沒茶杯也沒牙刷或餐具，連換穿的內衣都沒有。

當時帶些什么東西，已經不太記得，但有軍用襪與裁縫袋。裁縫袋是外祖母小千代在我入伍時讓我帶在身上的，后來起了非常大的功效。因為沒有任何換穿衣物，衣服破了就得自己縫補。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亞寒冬中，衣服穿不好是會要人命的。縫線沒了之后，就從不穿的軍用襪上拆線來用。

特別是縫衣針，在戰俘營算是貴重物品。一九四六年夏天之后，有些手巧的俘虜會利用打火石自行制作，也有人利用得到的鐵絲磨針。不過將鐵絲磨尖雖然不難，但該如何在后端打洞讓線穿過，卻沒那么簡單。因為自己帶著針線，所以無須苦惱這些問題。

破布也算是貴重物品。衣服破掉時，如果不加上一塊補丁就直接縫補，很快又會再度破裂。可是可以當作補丁的破布在戰俘營中難以找到，大概都是大家外出作業時，與其他可能對生活有幫助的東西一同撿拾回來。

另外在謙二的雜物背包中，除了幾件僅有的物品之外，還有一面日本國旗。那是入伍的時候特別配給的物品。在移送往西伯利亞途中，謙二一直把這面“日之丸”國旗“當作洗澡時的浴巾”來使用。

那面“日之丸”，在抵達戰俘營約十天后，就被蘇聯兵沒收了。蘇聯士兵之間一直認為日本士兵帶有值錢的物品，不斷以檢查的名義進行沒收。

原本他們也是窮人，擁有的東西大概不會比俘虜多。當我們外出勞務作業時也發現，蘇聯境內的人們似乎連像樣的衣服都沒有，甚至有些蘇聯女性還穿著從中國東北運來的日軍軍服。沒收“日之丸”國旗也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考慮，大概只是被他們拿去當成圍巾或頭巾吧。

我們這邊對于沒收，也不會去聯想什么思想問題。不少日本軍的軍官回憶錄中寫過自己的手表被蘇聯士兵拿走，我從開始就沒戴表，畢竟新兵連看表的時間都沒有。

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中有兩幢木造建筑物。謙二等人入住的兵營是天花板較高，類似倉庫的平房建筑物，里面大約收容了五百人。另一幢建筑則有大隊本部、廚房、醫務室、食堂、蘇聯方面的辦公室等，是一幢較小的建筑。但謙二一行人剛到此地時，只覺得這些建筑物“就像廢棄物放置場一般”，根本不具備任何功能。因為食堂無法使用，用餐時都將雜燴粥裝在木桶中，拿到兵營內分配。

謙二入住的兵營中備有讓俘虜們睡覺的木造居住空間。完全沒有個人空間，只有像“養蠶架”的大型三層床。俘虜們便擠在上面，爬上去后若不盤腿坐著，頭會立刻碰到天花板。兵營中的照明，只靠著一顆無罩外露的電燈泡。

兵營中有兩組三層床，一組可以睡上一個中隊，約兩百人。每個臥鋪分給七八人使用，每個人大概只有五十厘米寬的空間，肩并肩便會互相擠碰，所以俘虜們彼此都頭腳交錯著睡下。

臥鋪由圓木背板組裝而成，背面搖搖晃晃，這種只是由背板排列而成的三層床并不牢固，只要一個人翻身，周圍其他人的背板都會跟著搖晃。雖然集合了大家手邊有的毛毯鋪上，冬天仍冷到無法忍受，必須穿著外套才能入睡。謙二一開始睡在臥鋪的第三層，后來搬到第一層，上層的木屑與灰塵老是灰撲撲地不斷落下。

西伯利亞的晚上，溫度會降至零下四十五度，如果沒有暖爐便無法存活。戰俘營的兵營雖然也備有壁爐，但又小又缺乏燃料。他們度過的第一個冬天，每個人擁有的寢具只有一張毛毯與一件外套，感到寒冷的時候，得靠著旁邊俘虜的體溫彼此取暖。

服裝就那么一套，無可替換。最初的冬天為了御寒，會將裝水泥的紙袋切出可以伸出手腳的洞后穿上取暖。紙具有隔熱效果，多少能夠保暖。襪子破得很快，需要拿破布等物品包纏以防凍傷。

赤塔沒有上、下水道，俄國人也從流過市鎮南邊的河川汲水使用。先以大桶到河川裝水，再以雙馬車載往市鎮巡回分配，各個家庭以此作為生活用水。在戰俘營也設有大桶存水使用。家庭用水的廢水都丟在家中，但隆冬時節往往迅速結冰。

因此水也屬于貴重物品，如果沒水，俘虜連臉都沒辦法洗，喝的只有早上提供的熱湯。第一個冬天只能任頭發與胡須不斷生長，得等到翌年夏天較有空閑時，才能到赤塔南邊的河川去清洗內衣。謙二說最初的冬天沒有清洗過衣物的記憶。雖然如此，因為濕度很低，幾乎沒有流汗，加上營養不良導致新陳代謝緩慢，幾乎也沒什么體垢。

因為只有一套衣服，所以開始出現虱子。星期天是唯一不須勞務作業的日子，因此上午除虱子成為例行公事。在謙二所在的戰俘營，雖然沒發生過因虱子傳染斑疹傷寒的狀況，但其他戰俘營的確有許多俘虜因傳染病倒下。

抵達戰俘營沒多久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的一個夜晚，在完全沒有通告的情況下，大家都被趕出戶外，在不安中，被帶到一處公共澡堂。該處有一個大型熱氣消毒室，將俘虜們脫下的衣物進行滅菌消毒，同時大家也利用水龍頭流出的一點熱水擦拭身體。但因收容所的衛生環境并無改善，所以這種除虱作業也只有短暫的效果。而且當大家回到戰俘營，立刻發現所有行李都遭蘇聯士兵翻搜過，鋼筆等值錢物品都被拿走。“自己的東西幾乎都沒被偷走，不過兵營整個被翻得一團亂。”

謙二的視力大概只有0.5，進入軍隊后經常需要看清遠處，因此他戴上了眼鏡。但在西伯利亞時眼鏡破了，之后便沒有眼鏡可戴。不過，謙二說：“這種事情還算不上辛苦，比自己視力更差的大有人在，也不記得聽過有人抱怨不便。”

在戰俘營最初的兩個月，飲食幾乎都是由水與高粱做成的俄羅斯麥片粥（Kesha）。謙二說它是“粥的親戚”。其他的食材還有稻米、小米、玉米等，謙二說：“大概都是從中國東北來的戰利品，畢竟自己也在黑龍江畔幫忙裝卸，親眼見過。”第二年開始，除了谷類的雜燴粥之外，也會放入咸魚一起熬煮，有一段時期還出現過支援蘇聯的美制腌牛肉罐頭，最初的冬天完全沒有這類物品。

進入一九四六年之后，除了早餐與晚餐的雜燴粥之外，還能領到黑面包作為外出勞務作業時的午餐。但因早餐分量很少，大部分時候會把黑面包與早餐一起吃掉。有時想忍耐著不吃，但禁不起誘惑心想咬一口就好，最后終究停不下來，全部都吃掉了。

雜燴粥由俘虜們組成的炊事班調制，大家各自拿著飯盒去盛領。蘇聯方面并未提供餐具，俘虜們拿著自己帶來的便當盒，以及外出作業時偷來的鋁條、木片制成的湯匙食用。靈巧的人制作的湯匙相當好用，連黏在飯盒上的如糨糊般的部分都可刮起，但謙二的湯匙卻只是個像小破片那樣的東西。

飯盒是活命的基礎，什么都可以舍棄，但大家絕不會放棄飯盒，甚至到了自己要回日本時都還想帶著回家的程度。其中有些人回國后也一直保存著自己的飯盒。第二年開始配給美國制的腌牛肉罐頭，大家也拿著空罐當餐具。前往蘇聯軍官家中幫忙清掃排水時，經常會清出空罐，有不少人也會撿回來當餐具使用。

日軍的飯盒有被稱為“single”的單層式，以及可以放副食稱為“double”的雙層式兩種。兩者的容量有差異，不管如何公平分配食物，總會有差異。在一些西伯利亞回憶錄中可以讀到，許多俘虜會敲打飯盒底部使其隆起，希望多少增加飯盒的容量。

謙二待的戰俘營，關于糧食配給采用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大家不是拿著各自的飯盒去盛粥，而是集合大家的飯盒后，全部分盛好，再分配給每個人。

分配餐飲時，大家眼睛都睜得像銅鈴那么大。所有人的餐盒都聚集在一處，接著由炊事班運桶子來到小隊上分配雜燴粥。雖然分配時都盡量公平，但所有人都張大眼盯著，因此總會有人抱怨分配少了，在食物分配上，紛爭從未少過。春天之后想辦法偷了些蘇聯的物資，替每個人都做了鋁制餐盤，大家都有了相同的餐具。畢竟不讓大家自己從炊事班手中拿到糧食，紛爭永遠不會結束。

即便如此，在謙二戰俘營的俘虜們，并非維持原本部隊的形態，而是混合編成的聯隊，所以糧食分配算是相當平等。依照原部隊編成進入戰俘營的部隊，軍官或士官們手中握有糧食配給的權力，下級士兵特別是新兵——往往最后才能領到食物。這種狀況也成為俘虜間“民主化運動”抬頭的背景，這會在下一章中說明。

## 四、對某位青年的追憶

如前所述，死在列車上的俘虜，全員都還目送他到墓地安葬。但之后俘虜們便不再有這樣的余裕。

隨著氣候逐漸嚴酷，大家也開始了幫火力發電廠挖掘溝渠的作業。火力發電需要從河川汲水，煮沸后推動發電渦輪機，但在水循環期間取水溝與排水溝會凍結。為了讓水能流動，必須挖掘溝渠，打碎結冰。為此當地動員了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五百名俘虜中的三百名，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持續在野外進行作業。

大家在河邊的土地上以鐵制圓棒敲擊冰塊，但是土壤與砂礫混合凍結，狀態就像混凝土一般堅硬，不管怎么敲打，一天頂多只能敲出十厘米左右。零下四十五度時，沒有什么濕氣，呼出的水蒸氣立刻凍結，變得如鉆石粉末一般。在荒郊野外極度寒冷下作業，加上空腹與營養失調導致的寒冷與疲勞，陸續造成了人員死亡。

為了抵抗饑餓感，有些俘虜之間會利用一點雜燴粥，灑上不知從哪弄來的食鹽就這么食用，想要享受僅有的一點吃飯樂趣。為了促進食欲，需要把味道調濃一些，這種狀況下變成營養不良加上食鹽攝取過量，許多人都因此出現浮腫癥狀。

某次當大家列隊進行戶外勞動，通過赤塔中心街道的某餐廳前時，有人發現廚房流出的排水溝中，混著凍結的面包屑。當時俘虜同伴為了面包屑離開隊伍，卻遭監視士兵怒斥，謙二看到這一幕，內心倍感凄涼。

在這種狀況下，另一個痛苦的回憶便是上廁所。因為房舍內部沒有廁所，所以即便是在夜晚，也得走到戶外。從房舍門口到廁所大概距離五十米，那只是挖掘了一條細長溝渠的露天廁所。

營養不良后變得尿頻。如果身體狀況再差些就會拉肚子。最糟的時候，還沒走到廁所就會尿出來。夜晚大家都頻繁起身去小便。就算睡覺的時候，也會發生營養不良的人的尿液從木板搭組的上層臥鋪縫隙中漏下來的狀況。

自己也曾有過每隔不到一小時就得去廁所的經驗。兵營內有輪值站崗的人，站崗者身上拿著從大隊本部領來、未遭蘇聯軍隊掠奪的手表，就站在壁爐旁看守。我問了輪值那個人才知道，距離自己上次去廁所還不到一小時。

在零下四十度的夜晚走出戶外，并不會感到寒冷，而是感到疼痛。不過去露天廁所只露出屁股，因為屁股是圓的，還不至于凍傷。會遭凍傷的是突出的如鼻子或手指部分。如果鼻子凍紅了，不小心翼翼取暖回溫，鼻子就會掉下來。

堆積在廁所的排泄物立刻結凍。如果放任不管，凍結的排泄物便會堆成小山，甚至扎到屁股。之后這些凍結的排泄物就會溢到踩踏的地板上，整個地板都是凍結的大小便。半途漏出的小便也會立刻凍結，體力不好的人，踩上這種冰便會滑倒。營養不良后會出現夜盲癥狀，走到暗處更容易跌倒。

上完廁所后也沒有草紙可以擦拭。大家原本以為“俄國人吃的東西不一樣，他們本來就不需要廁紙擦拭。過一陣子我們的大便也會變硬，也就不需要擦拭了。戰俘營并非特例，當時俄國人的廁所普遍都設在屋外”。話雖如此，“最初的冬天實在辛苦。拉肚子的人，只能以手邊的衣物或破布擦拭屁股”。

在這種情況下，因營養不良與過勞，人員陸續死亡。“有時會發生早上大家起床時，才發現某個人死掉了的狀況。不過只有最初過世的人有葬禮，之后大家為了自己活下去就費盡心思，根本沒有余裕去理會別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俘虜們在戰俘營迎接正月。根據《“赤塔會”會報》中原軍官俘虜們寫的回憶錄，他們當天早上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庭院，朝著皇居方向唱頌了三次萬歲。

可是謙二說“完全不記得這件事情”。

軍官們即便外出勞動，也只是負責監視，生活比較輕松，可能還有那種余裕。不過那大概也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行為，不過是想念日本，依照著大戰前的習慣做相同的事情罷了。就像新年初次到神社參拜一樣。第二年之后，就幾乎沒有這樣的舉動了。

這個正月，謙二記憶最深刻的是前往探望營養不良的俘虜好友“京坂君”。京坂是駐扎新京第八航空通信聯隊的新兵，與謙二一樣，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于東京入伍，接著直接送往中國東北。在隊上大部分都是較年長且居住于中國東北的日本人的狀況下，謙二與京坂因為年齡與境遇相近，進入戰俘營之后成為好友。

謙二本人幾乎沒有寫下任何西伯利亞時期的記錄。他唯一寫的一篇，就是對京坂的回憶。下文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時，他發表于居住的新興住宅區自治會志上的文章：《對某位青年的追憶》，《紫陽》第二號，一九八六年。

昭和二十年八月。我以現役新兵的身份，待在中國東北牡丹江近郊之處，日本對蘇聯無條件投降后我成為戰俘，十月下旬遭遣送至西伯利亞東部的赤塔戰俘營。

正如大家經常看到拘留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照片一般，大約五百人如沙丁魚一般擁擠，睡在三層的通鋪上。

對于未知的未來充滿了精神上的不安。不僅得負擔重度勞動，而且糧食不足，大家幾乎都處于饑饉狀態。一天比一天冷的空氣，預告著即將到來的酷寒，簡言之，那是一種接近恐怖程度的寒冷。望鄉、饑餓、寒冷。僅靠著“或許某天仍可回家吧”這樣的期望支撐著自己的生命，活過每一天。

十一月下旬，已經出現了好幾位死者，另外有幾十個人也奄奄一息。與我同期的京坂君也開始出現營養不良的癥狀。他開始患上夜盲癥，清晨整隊出發作業，沿著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場地時，他必須牽著我的手前進。不這么做的話，在天轉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會滑倒。那段期間他的腳開始水腫，每每悲傷地對我說，他的腳套不進鞋子，我總是努力幫他把腳塞進鞋子，打理整齊。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終于開始出現失禁癥狀，上頭免除了他的勞動，讓他進入醫務室修養。雖說如此，自然沒有任何醫療處置，只是放任他休息睡覺而已。

新的一年到來，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這天蘇聯也休假，當天午后我前往探病。病房中排列了七八張病床，壁爐中燃燒著稀少的煤炭，根本提升不了溫度。溢出的水在地板上結凍，三層玻璃窗除了中央部分，全都結了一層厚冰。我從窗戶向外望，看到了俄國人的大人小孩走在路上，家家戶戶的煙囪冒出炊煙。現在我處在一個遙遠的世界，這里沒有所謂家庭這種東西。

看他衰弱的程度，任誰都知道大概來日無多，我與他說了什么話，幾乎都忘記了。當時也沒有任何好消息可說，無非就是說些老套的安慰話語罷了。

可是他卻雙眼看著不知名的遠方喃喃自語，說出“現在，日本也在過正月吧”“好想吃麻薯啊”這兩句話，至今仍然殘留在我記憶的片隅當中。

幾天后他過世了。我自己也因為連日的重度勞動，加上寒冷與四五天的腹瀉，變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幾日什么時候死的？過世時大概是什么狀況？我究竟問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記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則傳聞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關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情感。當然，沒有守靈儀式也沒有葬禮，畢竟當時我們過的，并不是人類該有的生活。

如這段文章所寫一般，此時謙二也因營養不良，開始出現腹瀉癥狀。一月開始的發電所壕溝挖渠作業中，他也發生過拉在褲子里、直接穿著臟褲子回到戰俘營的狀況。至于弄臟的內褲，只能靠著火力發電所排水溝的溫水勉強洗凈。

到了二月，腹瀉狀況愈加嚴重，在蘇聯軍醫的判斷下，他被免除了戶外勞動作業，但還沒到必須入院的程度，所以謙二留在戰俘營兵舍內休養。同樣留在兵舍的俘虜伙伴，勸誘他一起在營舍內翻找糧食。外出作業的俘虜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給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謙二受不了引誘，也加入他們，找出這類食物吃掉，但卻留下很深的罪惡感。

如果是偷蘇聯的食物或物資，完全沒什么好猶豫，但對同樣餓著肚子的俘虜，拿走他們珍藏的面包，自己卻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該這么做的，因為寒冷、饑餓與健康狀況不佳，自己連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戶外勞動僅是暫時性的措施，沒多久謙二又被趕出兵舍，繼續執行溝渠挖掘作業。如果繼續保持這種狀態，謙二很可能會步上與京坂同樣的命運。

不過這時候，謙二的幸運派上用場了。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很快就開始改善體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蘇軍的亞夫馬德林上級中尉開始擔任第三任的戰俘營管理長官。謙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長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長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務。恐怕是因為物資盜賣事發，上級察覺管理體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現人事調動。俘虜同伴間有人看到前任所長被銬上手銬帶走的情況。亞夫馬德林通過翻譯對俘虜們發表訓示，表明將改善至今為止的違法情狀。確實，在那之后糧食分配的狀況有所好轉，當時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內還提供超過規定的糧食量。

我自己能夠活下來，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進入了混合編成的部隊，在戰俘營當中相對沒有位階差異；另一個就是戰俘營體制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戰俘營位于蘇方軍團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鎮內，因此情況很快地有了改善。遠離城鎮散布各地的戰俘營應該會出現更多的死者吧。

謙二認為自己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為這些客觀條件在偶然之間湊齊的關系。他并不認為能活下來是因為自己的判斷力好或者足夠“用心”、擁有驚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認為死于這個時期的人們，并沒有什么特征或傾向。例如精神上較衰弱、入伍前從事什么工作等，我不認為是這些條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畢竟軍官們無須勞動，因此士兵這邊死者較多，這是擺明了的事實，任誰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據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手記，有許多人描述，記得年輕時太過無所事事引發了焦躁感，或者因為自己悲慘的命運而幾乎發狂等回憶，但謙二卻如此表示：“我沒想過這些事情。光是要活著就耗盡心力了。那種抽象性的思考，應該是原本就屬于更高層級的人，或者只有無須戶外重度勞動的軍官們才會有那樣的想法吧。”

不只是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驗，關于戰爭體驗的記錄，不管是學徒兵的，還是預備軍官的、高階軍官的等等，大多是擁有學歷與地位優勢的人所撰寫的。這些記錄自然是貴重的文獻，但同時也是站在特定立場寫下的。生活缺乏余裕，識字能力低落的庶民，并沒有留下自己描述的歷史記錄。

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虜人數，相較之下非常少。根據大戰之后由俘虜們組成的同友會雜志《“赤塔會”會報》所載，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該所死亡人數“約四十五名”。[[8]](#m8_1)謙二回憶道“記憶中應該更少一些”，不過四十五名死者，大約占收容人數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亞的拘留戰俘大約有六十四萬人，其中死亡人數大約六萬，從這個角度來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謙二的戰俘營不見得如他所說擁有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隨著冬季過去，發電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虜們的作業改為整理擄獲物資或幫忙蘇聯軍官家庭進行排水整理等較為輕松的工作。戰俘營的待遇也逐漸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戰俘營兵舍也通過俘虜們的勞力得到擴建。三層臥鋪改為兩層，居住環境較為改善。不過，同時期也開始設置三重鐵絲網、配有探照燈的衛兵樓等設施，警戒變得更加嚴密，但至少此后這個戰俘營再也沒出現過死者。

當大家精神上開始多少有些余裕后，關于可以歸國的希望性觀測、謠言，便開始四處傳播。戶外作業時看到載著俘虜的卡車，完全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就說那會不會是移送日本人歸國的車輛？類似這種穿鑿附會的傳言，不斷在戰俘間擴散。可是，距離謙二實際回到日本，仍有兩年以上的時光。

[[1]](#w1_2)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體験記6》，ソ連にをける日本人捕虜の生活體験を記録する會，一九八八年。

[[2]](#w2_2) Daniel Botsman,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w3_2) 編注：日本的“士官”意為他國軍制的“軍官”，日本的“下士官”“軍曹”才是他國軍制的“士官”。

[[4]](#w4_2)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

[[5]](#w5_1) 維克多·卡爾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北海道新聞社，二〇〇一年。

[[6]](#w6_1) 維克多·卡爾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7]](#w7_1) 愛蓮娜·卡達所諾娃，《関東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抑留されたのか》，社會評論社，二〇〇四年。

[[8]](#w8_1)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會”會報》，第三號。

# 第四章 民主運動

一九四六年春天，赤塔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俘虜們待遇得到改善。這一年的九月，多增設了一棟兵舍，原本的三層臥鋪也隨之改為兩層，用餐也得以改至食堂。這年夏天開始出現的臭蟲，讓人煩惱了一陣子，增蓋兵舍時也曾短暫睡在堆積的木材上，不過這都算不上大事，畢竟酷寒與饑餓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為了處理俘虜身上長的虱子，戰俘營內特別準備了一個大鍋，把大家的衣服都煮沸了一次，借此除去了蟲害。早晚的雜燴粥，也逐漸混入了咸魚與美制腌牛肉罐頭，與谷類一同熬煮而成。蘇聯方面配給的砂糖，由俘虜炊事班保管，甚至還有剩余的糖煮出甜味的小米粥，當作正月的特殊配給。

不過，“最初的冬天要與饑餓和寒冷戰斗，但第二年開始也逐漸出現其他令人痛苦的事情”。俘虜之間基于共產主義思想，開始互相檢舉糾彈，出現了所謂的“民主運動”。

## 一、不同的管理體制

在說明俘虜們的民主運動之前，需要先說明謙二見到的蘇方管理體制，以及描繪一些人物的樣貌。這些是為何民主運動會以如此形態發生的大前提。

日本的俘虜們，分別由蘇聯的內務部俘虜管理局管轄的俘虜營，與軍方（國防部）管轄的勞動大隊管理。謙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屬于內務部的管轄范圍。內務部擁有國境警備隊與管理犯人及重要地區的國內警備隊，這些警備隊與軍隊擁有相同的位階組織制度。內務部管轄的戰俘營，由國內警備隊的軍人們擔任管理者角色。

謙二待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從所長以下共有約十名高階軍官與下級軍官管理，他們居住在戰俘營外的官舍，每天到第二分所工作。此外警備隊兵營就在戰俘營附近，來自警備隊的士兵負責監視俘虜們往來營舍與工作場地。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中旬，大概因為物資盜賣的關系，所長接二連三地更換，此時第三任所長亞夫馬德林上級中尉上任了。亞夫馬德林有著一副黑發圓臉的長相，大概是中亞血統。

關于這一點，謙二說：“對于亞夫馬德林東亞臉孔般的長相，我們并沒有特別的想法。我想蘇聯方面也不是因為什么特別的理由，才將他派到這里。基本上，在蘇聯感受不到什么人種歧視，因為蘇聯人本來就混雜了各式各樣的種族。”關于在蘇聯感受不到人種歧視的描述，不管贊成或反對蘇聯體制，在各種西伯利亞回憶錄中，這點倒是共通的。

在謙二的俘虜營，實際上負責與蘇聯方面交涉各種實際事務的是第五十二大隊的副官，隈部會上尉。根據隈部回國后所寫的回憶錄，亞夫馬德林個性認真嚴謹，他在掃除黑市盜賣、改善戰俘待遇的同時，也更嚴格執行勞動基礎定額的規定。

蘇聯軍官當中有一位警備軍官，名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虜之間深具人氣。根據隈部的回憶錄，塞思塔可夫“說他曾經在德蘇戰線中成為德軍俘虜，那種痛苦滋味他也嘗過，因此對日本戰俘的處置，都盡量保持寬大為懷。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幾乎沒有出過任何麻煩，也絕對不會拿不合理的要求為難大家”[[1]](#m1_3)。

謙二從一九四六年除夕到一九四七年正月，曾經在塞思塔可夫指揮下進行將木材堆上貨車的作業。“我記得回戰俘營的貨車因為路面結凍無法動彈，他說‘大家一起下車推’，自己也跳下來加入一起推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為德軍俘虜的蘇聯官兵約有五百七十萬。其中一百萬人在受德軍奴役后獲釋，但在前線遭虐殺或在戰俘營中處境惡劣而身亡者，達到二百萬到三百萬人，死亡率高達六成。

另一方面，遭蘇聯軍隊俘虜的德國官兵約有三百三十萬人，其中死亡約一百萬人，死亡率達到三成。至于拘留西伯利亞的日軍戰俘，在拘留六十四萬人中約六萬人過世，死亡率約一成。成為日軍俘虜的英美軍官兵，死亡率約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成為德軍俘虜的蘇聯官兵即便存活下來，也必須面對蘇聯內部的殘酷對待。斯大林于德蘇開戰后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下達“遭俘虜是對祖國的背信行為，是一種背叛，應該處以極刑”的命令。[[2]](#m2_3)獲釋的俘虜，因為替德國工作過，有協助敵人的嫌疑，必須送往再教育集中營與懲罰大隊，有許多人因而死亡，而詳細的狀況，至今未明。

根據隈部的回憶，塞思塔可夫“原本是蘇聯軍方的精英軍官，卻因為遭俘虜而一夕之間命運巨變，此后對于人生與其說不敢奢望太多，倒不如說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根據謙二的說法，警備隊內部都稱塞思塔可夫中尉“馬有爾”[[3]](#m3_3)，似乎他原本官拜少校。而塞思塔可夫的太太，也一起在俘虜營中工作。

隈部認為塞思塔可夫“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蘇聯里面竟然還有這等人物”。謙二也回想說：“是一位三十歲上下的中尉，總是面帶微笑，是個好人。我們這些俘虜與他錯身而過時，如果對他行禮，他也會微笑著稍微舉手回禮。”其他俘虜也會用簡單的俄語稱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謙二還記得如做會計工作的中尉、高瘦的軍醫中尉以及他的軍醫少校夫人，還有一位俘虜們謔稱“螳螂”的高瘦細臉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亞戰俘營對蘇聯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因為每天得與他們碰面，即便不交談，大家也能夠知道他們是什么樣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像管理俘虜作業的少尉，為了出人頭地，往往會催促俘虜們進行作業。

謙二待的戰俘營中，俘虜沒有義務向蘇聯軍方敬禮。塞思塔可夫因為會對俘虜們回禮，所以俘虜們與他錯身時也會向他行禮，雖然這并非義務。聽說也會有體罰或毆打俘虜的人。

謙二本身也回想說“蘇聯軍比日本軍來得好”，他如此描述：

蘇聯軍人在不執行任務的私下場合時，軍官與士兵都能和樂談話。五一勞動節等休假日，還會帶著家人到戰俘營來，大家一起跳舞。勞動節時軍醫夫婦很親熱地手牽手走在一起，因為太太的軍階更高，大家都說“他家里一定是老婆當家喔”。長官不會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對長官進行抗辯。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我們大約有十個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廠，旁邊就是羊皮的鞣皮作業場。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羅斯老爺爺，從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頭。自己工作時被那位老爺爺捉弄了，當時他還哼著歌。雖然我也有不對，不過因為聽過如果在作業當場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報上去，進行抗辯。隈部上尉、翻譯的山本先生、所長亞夫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業場，老爺爺雖然也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最終仍向我道了歉。之后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氣地對亞夫馬德林所長說：“都是因為那個俘虜的態度不好。”不過即便如此，日軍俘虜能這么做，還是令人難以想象。

在拘留期間遭蘇聯人毆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來看，就只有這么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選卷心菜。冬天結凍保存的菜當中，有些解凍后壞掉無法食用，我們的任務便是把壞掉的菜挑出。當時，在作業之中，我差點被揍。那會兒，俘虜們會趁監視者不備，偷走挑出來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監視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勢要打人，我立馬跪下，雙手合十道歉求饒，還好逃過一劫。

準許俘虜抗辯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亞回憶錄中也有記載。回憶錄中還出現過在戰俘營受到虐待的俘虜，向來自中央的監視官告狀后，該負責官員遭到調職的例子。[[4]](#m4_3)從這點來看，謙二覺得“比日本軍來得好”的感想，似乎不僅是他個人的感受而已。

不過，蘇聯還存在著秘密警察。從俄國革命后的國家保安局（GPU），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改稱國家保安委員會（KGB），有不少名稱與組織結構上的變遷。謙二在西伯利亞期間，蘇聯的秘密警察與強制集中營一樣，都受內務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管轄（一九四七年起獨立成為國家保安部）。

蘇聯軍中存在著所謂“政治軍官”（political commissar）的隱藏勢力。革命后的蘇聯為了強化軍力，仍舊采用舊帝俄時期的軍官，但因為對他們的忠誠有所質疑，所以又配置了國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員，這就是所謂“政治軍官”的起源。特別在斯大林體制下整肅紅軍之后，“政治軍官”擁有凌駕一般軍官的權威，甚至會介入作戰指揮，屢屢造成指揮現場的混亂。

在謙二等人的戰俘營，“政治軍官”也屢屢出現。特別是一九四七年末到來的“政治軍官”，他因長相被俘虜們戲稱為“進藤勇”[[5]](#m5_2)，大家都怕這號人物。他們與戰俘營的警備部隊似乎是相互對立的關系。在隈部上尉的回憶錄中，描寫到亞夫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時總是帶著好意，對這些“政治軍官”卻寫著“國家保安局的軍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維的人物”、“滿腦子都是陰險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當然的，俘虜們不太可能有機會去詳細了解蘇聯方面的內部組織結構。在當時的戰俘營，除了負責管理的內務部國內警備隊之外，還派有國家保安部軍官、內務部俘虜管理局政治部軍官等駐扎。“進藤勇”究竟確切屬于哪一單位，現在已經無法確認。以下的描述便是基于俘虜們這種有所局限的觀點而構成的。

## 二、《日本新聞》與壁報新聞

謙二所在的戰俘營在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發起民主運動。不過戰俘們在此之前并非完全沒有自發性的活動。

生活脫離最糟狀態后，一九四六年八月，戰俘營的中庭樹立起高臺，舉行了盂蘭盆節。戰俘們唱起北海道民謠，還有各種絕技表演，來自福岡縣的人還出演了博多仁輪加舞蹈。

負責整個活動企劃的，是出身板金技工、擁有自行制作水桶技術的俘虜。如前一章所描述的，擁有這些特殊技術的俘虜們，大多都以室內勤務為主，糧食等待遇也較佳，所以在體力與時間上更有余裕。

這年的九月，俘虜間成立了名為“五十二會”的敦睦組織。此時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舊軍階關系已然消失，互相以階級稱呼的習慣也不復存在，因此得以自發性地發展敦睦組織。

根據謙二的說法，這是一個“為了在秋日長夜話鄉愁而集結的組織”，為了紀念離開奉天一周年而成立。成員以各縣、各出身地為別，做成名冊，希望能通過這樣的各縣區分促進同鄉者的親睦關系。擔任干事的是隈部上尉與一位大阪出身居住于中國東北、年約四十歲叫作西田的溫和派人物。

謙二自己先出席了一次東京之會，第二次則參加了本籍地的新潟之會，但總不太自在。

還在服役時收到外祖父寄來的信，說位于中野的住處因為強制疏散的關系，已遭拆除，而且家人們也因疏散而移住岡山，東京已經沒有可以回去的家。所以即便歸國，大概也只能回到本籍地的新潟，所以返鄉之后的人脈，將顯得更為重要。但參加新潟之會時，畢竟從未在新潟住過，根本沒有共同回憶，跟大家談話也扯不上邊。

謙二已經成為喪失故鄉的人了。

謙二說：“這個五十二會，舉辦兩次之后便停止了。大概是蘇聯方面有所壓力，他們認為放任俘虜自發性地成立組織會產生問題。”雖然蘇聯體制下對自發性組織嚴加禁止，不過在后述的民主運動中，日本俘虜們卻產生了過度的“自主性”甚至“自主規范性”的行動。這個“五十二會”取締的詳細狀況與理由仍不太清楚。

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俘虜們更進一步組成了演劇團。如前所述，第二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起，清晨六點如果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會取消當日戶外作業，所以俘虜們開始擁有室內生活時間。

一開始這個劇團名為“黎明演藝團”，演出過《記憶中的母親》（《まぶたの母》）等大眾戲碼。團員主要是喜歡演戲的士官們、大學畢業喜歡音樂的年輕軍官加上扮演女性角色的年輕新兵等。一九四七年后，劇團名稱改為“民眾座”，改名后一開始演出的劇碼與之前并無太大差異。

作為西伯利亞拘留者民主運動的官方媒體，《日本新聞》（之后改用平假名《日本しんぶん》）這份報紙廣為人知。這份報紙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在蘇聯紅軍政治部的指導下創刊，由集合于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的日本俘虜們參加編輯；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停刊為止，共發行六百五十號（平均每周發刊三次），發行最多的時期，號稱高達八十萬份。這份報紙配送到蘇聯各個戰俘營，也組織了讀者團體，可以算是戰俘民主運動的發端。

謙二最初讀到《日本新聞》，是在移送西伯利亞途中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當時他們仍身處中蘇邊境的黑河一帶。偽裝身份自稱二等兵的佐橋中尉，用俄語對抱著一疊報紙的蘇聯軍官說：“阿金打歪。”[[6]](#m6_2)軍官便遞了一份給佐橋。謙二當時還心想：“原來如此，如果想要討東西，只要說‘阿金打歪’就可以了。”俘虜們傳閱了那份報紙，內容是用難以閱讀的日語不斷說明蘇聯紅軍取得重大勝利，讀來十分無趣，很快就被扔掉了。

第二次讀到這份報紙，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蘇聯軍官把報紙拿到戰俘營，說要讓大家傳閱。因為日本人評價這份報紙是“造假新聞”，大部分的人都采取無視的態度。不過除了通過這份報紙，其實大家也沒有其他方法得知日本的消息。

謙二閱讀此報紙，最初讓他留下印象的是一九四五年九月陸軍上將東條英機企圖以手槍自殺卻失敗，后被美國占領軍逮捕的消息。東條英機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下達《戰陣訓》的陸軍大臣，訓示內容包含了“生不受囚虜之辱”這句名言，東條也是美日開戰時的日本首相。

當時傳閱讀到這則新聞時，心中感到非常輕蔑。教導我們如果可能成為俘虜，就要自殺，并且帶幾個敵人一起上路，那種想法還停留在我們腦子里。只是因為天皇命令我們投降，所以可以勉強活下來當俘虜。可是那位命令我們不準成為俘虜的上將，卻自殺失敗遭俘，得知這消息讓我相當看不起這個人。真的想自殺的話，把手槍塞進嘴里擊發，肯定能夠真正死亡。因為之前聽到希特勒戰死的消息，更激發了我對他的蔑視。

其他讓他印象較深刻的報導，還有皇族之一的梨本宮遭收監的新聞。一九四六年二月送抵戰俘營的《日本新聞》，寫著瀨戶內海的日軍機場提供和平用途、現在成為鹽田的報導。這再怎么說，戰爭結束之前都是不可能發生的狀況。

畢竟謙二“在一九四六年之前，完全不懂民主化這個詞匯，也沒想過這件事情。雖然聽過‘民主主義’這個詞匯，不過只覺得這與日本的國體不相符合”。即便如此，原本對戰時新聞一直抱持懷疑態度的謙二，讀到上述報導時，也不由得產生“‘這世道真的改變了’的想法。這份報紙，除了宣傳之外，或許也記載了一些其他消息吧”。

當年春天的《日本新聞》報導，日本國內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一尾鮭魚要價數百日元。“一位來自北海道的俘虜說：‘有這么離譜的事情嗎？果然這是造假新聞啦。’自己曾經在中學時聽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遭遇通貨膨脹問題，雖然不是很理解，但知道日本確實可能發生這樣的狀況。”

一九四六年七月，俘虜們開始制作壁報新聞。當時屬于貴重物品的紙張和墨水，因為俘虜們的這項活動被輾轉送來。蘇聯完全不給俘虜任何紙張，甚至連上廁所擦拭都只能用草或破布，所以“很可能是通過政治軍官們的渠道取得的”。

當然這種壁報新聞，必須通過蘇聯方面的檢閱。不過，剛開始俘虜們制作的都以俳句等文藝性文章為主，這部分還算相當自由。七月推出的壁報新聞上，有篇稱贊塞思塔可夫中尉是“好中尉”的報導，這也是俘虜們自發寫的文章，但“據隈部說塞思塔可夫表示‘被這么一寫會遭忌妒，讓我立場很艱困，所以以后別再這么寫了’”。

大約從一九四六年后半開始，編輯傾向開始出現改變。英國首相丘吉爾使用“鐵幕”一詞發表演說，是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事情，之后美蘇對立氣氛逐漸高漲。

雖然如此，謙二的戰俘營日常生活，并沒有多大改變。《日本新聞》也只是刊載民眾在美軍占領下遭到“反動派吉田內閣”的壓迫，或者發生反美游行等反美報導。這種報導導致讀者減少，就算配給下來，也被拿去當卷煙草的紙張，或者當廁紙用掉。

第二年的冬天起，因溫度過低中止戶外作業時，大家舉行文化演講。不過這些演講也就是由過去曾任北海道大學副教授的士兵上臺講農業的話題，或者開設俄語初級講座等內容而已。壁報新聞從第二回開始，宣傳色彩加強，推出數回之后也被停掉了。演劇團從一九四七年春天起，開始上演講述勞資問題的《蟹工船》等劇碼，不過即便對故事的思想內容不表興趣，也不至于遭受處罰。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夏，開始發配日語寫成的馬列主義入門書，“必須在放置的場所閱讀，每個中隊大概只有一冊，但幾乎都是領到后‘單純被放置在那里’的狀況”。

依據謙二的說法：“一九四六年秋天開始，雖然民主化運動逐漸展開，但也沒那么嚴重。從一九四六年夏天開始到一九四七年中為止，下午五點工作完畢，六點用過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時間。大家玩著自己制作的花牌、圍棋或日本象棋等，這段時間是戰俘營生活最歡樂的時期。”不過這種狀況從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之后，便發生了慘不忍睹的變化。

## 三、氣氛改變了

綜合各種西伯利亞回憶錄，民主運動大致是混合了幾種要素后才得以興起的。其中之一，當然是蘇聯方面的策動，而俘虜之間也存在呼應蘇聯策動的條件。

俘虜之間的促成要素就在于舊日本軍的位階制度與私人制裁等陋習的進入。在糧食配給與作業分攤上明顯不公平，而且各地戰俘營都可以看到軍官還有“侍從兵”（陪在軍官身旁服侍的士兵）隨侍在側的事例。在民主運動初期，“積極分子”（俘虜中的民主運動家）針對糧食分配與訴求平等舉辦演說時，也有過大受喝彩的例子。

像這類事情，各戰俘營的差異極大，難以當作普遍現象。謙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從剛被收容開始便沒什么階級差別，到一九四六年夏天甚至連階級稱呼都消失了。不過，以位于烏蘭巴托曾發生“拂曉祈禱事件”（未達成勞動規定限額的俘虜遭日軍長官私刑致死）的“吉村隊”俘虜營為例，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為了返國抵達納霍德卡港時，還被目擊到穿著“亮晶晶長筒皮軍靴”的軍官，和幫他們背行李的“瘦巴巴士兵”的情景。[[7]](#m7_2)

因此，初期的民主運動大多以“反軍斗爭”的形態開始。具體來說，例如廢止軍官特權與敬禮、拆下位階章、取消食物分配與作業分配的差別待遇等等。

俘虜們發起的民主運動，一部分也是受到蘇聯軍的啟發，因為蘇軍當中并沒有不當的階級差別。此外，純粹受軍國主義教育培養出來的年輕學徒兵、青年軍官與出身“滿洲青年開拓團”的人，在這波民主運動中首次接觸共產主義，加上作為年輕人本身對社會性求知欲極強，也發生了特別熱衷于運動的例子。另外還有一些是從二戰之前便參與共產主義運動的人，他們之中當然也有人自發性地參與這波運動。

諸如此類，往往都是復合性交互作用下的結果。例如與《日本新聞》編輯關系匪淺的著名“積極分子”淺原正基，他還在東京帝國大學就學時曾遭檢舉，說他與共產主義運動有所關聯。遭到拘留成為戰俘后，針對糧食分配與階級差別向《日本新聞》投稿告發，之后加入戰俘營民主運動。他回到日本后也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上聲稱自己從事過這些活動。[[8]](#m8_2)

因為有這種情況，雖然戰俘營民主運動是在蘇聯影響下開始發展，但仍有不少論者認為，這些運動的開展其實具有一定的自發性與必然性。特別是類似淺原等組織民主運動的原積極分子們，他們的回憶錄中這種傾向較強。不過對于這樣的論述，謙二卻如此批判：

在生死關頭的第一個冬天，我能理解有階級差異的俘虜營生活會非常艱辛。不過若說這些人從那個時期便開始推動反軍斗爭，恐怕事實并非如此。如果他們真的在這個最需要反軍斗爭的時期推展運動，那確實很了不起，可是幾乎都是第二年生活狀態改善后，在蘇聯方面策動下才真的展開活動。

那些人為了辯解才寫下的文章，不足采信。淺原說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聞》投稿告發階級差別狀況，但在戰俘營當中俘虜們應該無法郵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蘇聯“政治軍官”反映，通過他們把文稿拿至《日本新聞》編輯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謊言。要做到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權階級不可。

實際上，據說因民主運動而晉升“特權階級”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據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禁止從事勞役的軍官，加上擁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發師、戲劇專長者，才是能夠獲得較佳食物分配與免除戶外重度勞動的“特權階級”。當時是否身為特權階級，直接關系著自己的生死。不過之后似乎有許多人抱持著參加民主運動就可以獲得室內勤務與增加食物配給的期待。

這部分的狀況，根據戰俘們的回憶，因為立場不同，表達的內容也各異。對民主運動抱持批判態度的回憶錄，形容積極分子們行使特權，借用蘇聯的權威對日本人頤指氣使，開心地參與這些活動。另一方面參加民主運動者的回憶錄，許多描述都說明，他們承認有些冒失的人確實以特權為目的而參與活動，但接觸新知識而大開眼界后，大家都熱心推動民主運動。恐怕，雙方的陳述都各自表現出了部分的真實吧。

無論如何，大多數的回憶資料對民主運動都采取批判的態度。而閱讀民主運動積極分子們的回憶錄，可以發現他們大多也只是參加室內文化運動，編輯報紙或者前往蘇聯方面設立的社會運動家培訓學校參加活動等。這些舉止看在必須于嚴寒中從事戶外勞役的多數戰俘眼中，對他們的怨恨，自然不難想象。

另外如下所述，俘虜們的民主運動，也有出現超過蘇聯方面意圖而呈現失控的趨勢。不管是批判民主運動的回憶，或者肯定民主運動的回想，幾乎都對這一點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謙二的回想，便是基于上述背景進行的描述。

謙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朝向民主化邁進”。因此這個單位沒有所謂自然發生的反軍斗爭這個要素，幾乎都是在蘇聯方面策動之下開始民主化運動。依據謙二的回憶，以及戰后組成之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同友會“赤塔會”做成的年表，綜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9]](#m9_1)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蘇聯的伊瓦諾夫少校如往常一樣來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聞》讀書會”的成立。“讀友會”是指各戰俘營中組成的《日本新聞》輪讀會。

第二分所內有西田、吉川、倉田等三人響應。倉田曾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獄，而吉川則是大學副教授，算是知識分子，而且大家都屬士兵階級。蘇聯在此時期似乎有以知識分子為中心推進民主運動的方針。

依照謙二的說法，“到了十月已經相當寒冷。西田原本就經常執行室內勤務，至于倉田與吉川，我不清楚他們參加的動機，但志愿響應便可在室內參與活動。能否待在室內，是關系死活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夏天結束的前后，大隊長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舊干部，都轉移至其他戰俘營。不僅沒有送別會之類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們是何時消失的”；“似乎是在我們白天外出作業的時間，把他們轉移走的。作業結束回來后，一時半刻還沒察覺。只有‘這么一說，好像沒見到’的感覺。之后的轉移，大概也都是這種狀況”。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監察官，終于來到第二分所。他以長官的身份，要求留下來的軍官們必須與其他士兵們共同勞動。命令軍官從事勞動違反海牙《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但規定中說明，如果軍官們自己希望從事輕勞動，則不在此限。因此許多軍官都以自愿的形式，參加了部分勞役活動。

但日本軍無論軍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國際法與國際條約，連謙二也認為軍官擁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輕的軍官們便在這種氣氛下成為“志愿”者，自動自發加入作業。

到了一九四七年，戰俘營內的秩序出現變化。首先在一月時，作為“民主化”的一環，原本軍事稱呼的“大隊”“中隊”遭廢止，改稱“作業團”與“分團”，由西田擔任團長。

幾乎所有軍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轉移他所。相對的，從夏天至秋天，勞工、農民出身的民主運動積極分子轉入隊上。高層改變了民主運動方針，從原本由知識分子與青年軍官擔任指導角色改為由勞工、農民出身的士兵擔綱領導。

因為這個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聞》讀友會”的原共產主義者倉田，以及大學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勢，必須跟大家一同外出參與戶外勞役。前一年轉來的監察官土井，也轉移往其他的戰俘營。

一九四七年秋天，從第二分所開始送出人員，前往積極分子培訓學校接受教育。有一位出身福島縣的農民士兵，被送至赤塔地區的地方學校，大約過了三個月，以積極分子的身份回到隊上。根據謙二的說法，“原本是個樸素的人，即便受煽動也不會隨波逐流。大概無法成為‘斗士’，因此不知不覺間又被黯然送回”。

不只是軍官干部被變更為歸俘虜營所屬，一九四七年四月，有六十六個人轉入第二分隊。他們穿著蘇聯軍隊從中國東北掠奪而來的黑色防寒“滿服”，被謙二等人戲稱為“烏鴉組”。“轉移變得頻繁，最初約五百名的俘虜中，截至自己一九四八年八月回國前，大概只有四分之一還留在原隊上。”

隨著移出與移入愈形頻繁，戰俘營的氣氛也隨之改變。“從北陵一起來的人們，許多是居住中國東北的日本人，彼此都認識。大家共同經歷這些辛勞，在某種意義上即便稱不上連帶感，至少也有一份安心感。可是對移入的人，就沒有這種感覺。”

在這種氛圍下強化的民主運動，反而讓大家彼此互相懷疑起來。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如果多說了不該說的話，就會被當成反動分子來處理，因為這層疑慮，大家逐漸變得不敢自在說話。參加俘虜營內的輪讀會時，過往大家因為作業完回來都很疲倦，許多人在會上忍不住會睡著，但之后這再也不被允許。

轉移頻繁之后，戰俘營的人們就無法團結。我回國之后讀到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才知道不只是對我們這些戰俘，在蘇聯的集中營里，這種人犯轉移已經算是常用的管理手法了。

以知識分子戰俘為中心的“《日本新聞》讀友會”不知何時解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基于蘇聯內務部的決定，從一九四八年起組成“反法西斯委員會”。與此并行，由移入的積極分子們主導，原本戰俘營的管理者、干部全遭解任與更換。

這個時期最驚人的人事異動，是炊事班班長川村遭到解職。川村是出身夏威夷的日裔第二代，于奉天俘虜營擔任翻譯，一位接近三十歲的士官。他是大家公認的有人望者，處事公允，公私分明，頗受好評，已經擔任炊事班班長達兩年。因為炊事班班長有許多好處，大家都認為不是川村無法擔任此職，即便如此，他還是被解任改派一般勞役業務。

川村不僅具有人望，因為能說英語，所以俄語也學得很快。領取糧食時他可以與蘇方交涉，努力抑止盜賣或防止有人打馬虎眼，能夠替戰俘們說明主張。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或許因為他是日裔第二代，在美蘇冷戰的波及下，因而遭蘇聯“政治軍官”盯上也說不定。即便大家都驚訝地說“怎么能將川村先生解任”，但卻沒人有勇氣抗議。反抗積極分子們，就等于反抗蘇聯，大家都害怕因此失去回國的機會。

## 四、檢舉反動分子

當時每天的行程是，早上六點起床，吃完早餐后七點半整隊，十二點于作業現場用午餐，下午五點作業結束，六點半用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時間。但從一九四七年后半起，晚餐之后到十點左右為止，需要舉行班內稱為“檢舉反動”的“群眾批斗”活動。到了一九四八年，甚至從早上六點起床后就開始，直至作業的午休時間。

“檢舉反動”大概依照以下的形式舉行。在俘虜營內找出約十人圍坐一圈，隨便找個借口檢舉“某某人”，氣氛逐漸變得激烈。晚餐之后大概持續二至三個鐘頭，最后由領導總結“今天也完成了戰勝反動勢力的斗爭”，在大家齊唱革命歌的歌聲中結束。

檢舉反動就類似在霸凌新兵。在日本舊軍隊內務班當中，晚餐后的時間隨便找個理由，比方沒有擦槍、態度過于囂張等，要求新兵反省自己“不懂規矩”，趁機毆打新兵等等。這種行為模式，就照本宣科在民主運動上重新搬演。

什么理由都可以。例如在民主運動上唱的《共產主義者的馬賽曲》，積極分子們說成《共產黨的馬賽曲》，對此某個畢業自外語大學的俘虜喃喃自語說了句“不是共產黨的，而是共產主義者的馬賽曲”就因而獲罪，成為檢舉反動的對象。這個俘虜應該沒想過要批評積極分子，也沒有多作考慮。

在西伯利亞回憶錄這類文章中亦有寫到，當工人、農民出身的積極分子演講時發錯音說錯字，例如“德川布府（幕府）”“維護（唯物）史觀”等等[[10]](#m10_1)，若對演講者提出糾正，就會被打入“反動”派。

根據其他戰俘營的記錄，包括憲兵、軍官、特務部隊、“滿洲國”警官等舊日軍隊特權階層，過去曾遭人怨恨的這些人，許多都成為被檢舉對象。不過這種現象似乎沒出現在謙二的戰俘營中。這大概是因為第二十四區第二分隊一開始就是混雜編成的隊伍，在蘇聯策進俘虜民主運動之前，他們已經相當民主化了，這段過去的經歷其實起到相當的作用。“我自己入伍前也待過富士通公司，也可能以‘曾在軍需產業工作，屬于反動派’而遭檢舉。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當作斗爭借口”，這是謙二的說法。

其他戰俘營的例子，還出現過在食堂內進行團體檢舉反動，將“反動派”綁在柱子上，再由其他人群體“突擊”，結果導致死亡的狀況。這樣的體罰雖然沒出現在謙二的戰俘營，但仍給大家帶來精神上莫大的痛苦。

民主運動雖然沒有出現毆打場面，但比起內務班私刑，精神上的苦痛更加可怕。內務班私刑是由老兵毆打新兵，打完了也就結束了，而且大家同為新兵，多少還算安心。可是民主運動中，萬一被打上反動分子的烙印，就會影響到所有的生活層面。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會被何人檢舉。誰可能是積極分子，誰應該不是，這一切都沒有清楚的界線。

在軍隊中，不管發動私刑或遭受私刑，雙方都認為做出這種行為很愚蠢。可是被指為反動，便可能遭列黑名單，導致無法回國。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還是要大表贊成？我自己即便沒有積極參與，仍然扮演起哄群眾的角色大喊：“沒錯！沒錯！”如果不這么做，自己也會被打為反動派。

不過，從北陵一起來的人，彼此內心都還有個分寸，但隨著移出的人愈來愈多，大家便愈發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營內大部分還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認為，到面包工廠作業后偷些面包回來分給營內的同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該年年底，“究竟是誰在盜取勞工祖國蘇聯的財產？”這種氣氛便逐漸醞釀起來。

幾乎民主集團的任何活動，都給人毫無意義的感覺。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開始輪流進行被稱為“十字路口演講”的街頭演說訓練。聽說是為了回日本之后，可以站在街頭對工人與農民表達訴求的練習。“不干的話就被當作反動派，所以只好把平常聽到的慣用字句拼湊著演說，但其實也說得很糟。我一邊想著回到日本我也不干這種事情，一邊形式上照做，應付了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勞動節，俘虜們在戰俘營內進行示威，在營區的圍墻內揭起打倒資本主義與打倒帝國主義的游行。

這簡直就是小孩的戰爭游戲。在示威游行時，年輕的積極分子穿越游行隊伍，隊伍內的人們以為偉大的指導者要通過，自然讓開一條道路，讓他們通行。這時候年長的積極分子，突然站出來訓誡不可以穿越游行隊伍。究竟該聽誰的才對，完全沒有標準可言，大家都無所適從。

一九四七年冬天，謙二也差點遭到檢舉。他睡覺時說了句夢話“民主運動什么的，只會出現在西伯利亞啦”，被附近的民主集團積極分子聽到，第二天被他召喚“喂，你來一下”，“阿熊，你說那些話，還好只是被我們聽到，自己要多小心點。那副德性可不行”。

對方來自東京，是個樸素的工廠工人，因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著馬克思主義。貧農與工人出身的積極分子中，有些人確實因此豁然開朗，終于理解自己為何不斷工作，仍然無法脫離貧困的理由。賀屋就是屬于這一型的人，我因為平時和他還有些人情往來，所以這件事就這么作罷了。如果檢舉我的反動行為，他應該可以賺取一些點數，但他并沒有這么做。自己非常感謝他的關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惡毒的積極分子聽到，脊背就一陣發涼。

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大概有幾種類型。首先就是出身農民或勞工，因為性格率直，終于遇到可以解釋自己處境的理論，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種人大多是年輕人。我也讀過一些回憶錄，知道部分年輕軍官與來自“滿蒙開拓團”的青年中，也有屬于這種類型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聞》連載上讀過帝國主義論。金融的寡頭支配、資本輸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學會這些從沒見過的名詞，就覺得理解另一種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戰前就學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俘虜所寫的文章。戰俘營的積極分子講課都無聊至極，我大概都裝出一副努力聽講的模樣，但其實一點都不在意講課內容，雖然聽說有些課程真的有值得學習之處。部分人真的相當熱心地在參與這些活動。

不過，不屬于這種類型的人也不少。成為積極分子后，可以免除勞役，獲得各種好處，在廚房安插一些與他們意氣相通的人，還能控制糧食分配；而且被容許離開戰俘營去培訓學校上課，這對一般俘虜而言，簡直是做夢般的待遇。所以有些看到機會便充滿斗爭心的人，就會趁著民主運動這個機會向上攀爬。另外還有一種，純屬喜歡霸凌別人的類型。可以說有各式各樣的狀況，人類的本性，就在這些情境下展露無遺。

至于蘇聯方面對這些運動參與到什么程度？從結論而言，蘇聯方面確實有加以策動，但日本俘虜們自己反應過度的情況卻占了絕大多數。畢竟蘇方在民主運動中禁止體罰，他們也不愿意大家過度熱衷于運動，而造成勞役作業效率低下。

以我所待的戰俘營為例，我認為蘇方對這些運動采取“事不關己”的態度。如果檢舉反動搞太晚，就可能影響到第二天的勞役作業，那時蘇方就會介入要求停止。“政治軍官”暫且不論，對戰俘營的行政管理部門而言，運動并非他們關心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積極分子們重新開始制作戰俘營壁報新聞，上面畫著從作業場偷取面包、藏于帽子中帶回營內的檢舉漫畫，似乎要整肅“背叛工人祖國的反動”。漫畫后方還畫著一位蘇聯軍官，這點讓亞夫馬德林覺得有問題。制作壁報的一伙，表示這幅畫“獲得袴田先生（在赤塔積極分子中具有領導地位，頗為知名的袴田陸奧男）的許可”，向亞夫馬德林抗辯。不過亞夫馬德林對他們怒吼：“這地方到底誰做主！”把他們都趕了回去。

實際上，也有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度會影響是否能成為返國人選這樣的說法，不過在謙二的戰俘營中，這僅止于謠言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四月開始遣送回國時，大家都知道的“反動派”也進入回國人選名單中。

事實上，當開始遣送回國時，似乎與運動什么的都沒什么關聯，大家也淡淡地理解到這點。可是內心又怕出現個萬一，疑神疑鬼之下，仍然照常舉行民主運動與檢舉反動。

自己雖然沒被警告過，但蘇聯方面應該有說過如果勞役態度過差“就不讓你回日本”這樣的話。對蘇聯人而言，應該只不過是激將法，但對我們來說確實感到戰戰兢兢。在這種氣氛下，積極分子們正好趁機借蘇聯權威擺架子。

戰爭結束后，積極分子們從來沒有出席過“赤塔會”。他們回國之后，也沒聽說誰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他們干的，純粹就是低劣至極的勾當，低劣到他們自己都覺得可恥，所以這些積極分子回國后，才會有人拼命寫什么他們其實要撤除階級差異、進行反軍斗爭等的辯白吧。

不限于西伯利亞拘留地，每個戰俘營的狀況都大不相同，無法將一個營區的狀況普遍化到所有地方。例如根據許多其他戰俘營的回憶錄記載，蘇方把勞動基本定額與糧食供給掛鉤，讓大家苦不堪言。而謙二所處的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也曾于一九四七年初導入這樣的制度，但卻無法起到什么作用，因此一個月左右就自然廢除了。

類似采伐工作這種可以正確測量砍伐數量、體積的作業暫且不論，像雜役這種工作，根本無法以勞動基本定額形式計算，加上木工或電工等技術職位的達成率總是高得驚人，以這種方式獲得自己可得的糧食，一方面關系到自己的性命，一方面也太過不公平，大家都抗議這種舉措。炊事班的班兵是自己人，站在我們這邊，所以當蘇方人員來視察時，炊事兵就給超過基本定額的部分人增加分配，等蘇聯人回去又恢復普通的配額。我所待的戰俘營，蘇聯人大概也只是聽從上面的命令做做形式，不是真心想要執行這樣的措施。

或許民主運動參與度會影響是否成為返國人選，但整個機制仍有許多不明之處。有些戰俘營也傳出先由積極分子們草擬人選，但事實真相如何，確實存有太多不明確的部分。不過日本俘虜們過度推展運動以至于超過蘇聯方面的企圖這點，倒是各回憶錄里共通的看法。

在這個時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名為“吳橋秀剛”的俘虜，一個人被轉移到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聽說他是朝鮮人日本兵，說得一口流利的俄語。當時謙二只是與他偶爾碰面。五十年之后，謙二完全沒想到會再度見到這個人。

## 五、歸國竟然就是這么回事嗎？

對俘虜們而言，歸國是他們最大的夢想。在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有關歸國的資訊，最初從一九四七年春天《日本新聞》刊載了開始歸國的消息之后，便逐漸傳開。

大約從相同時期開始，準許戰俘們寫明信片回日本，當年下半年起陸續收到回信。對俘虜來說，來自故鄉的信件，幾乎是除了《日本新聞》之外唯一可以取得資訊的途徑。

某個俘虜看了回信的明信片嚇了一跳：“小石川區變成文京區啦！”還有其他俘虜收到“正在準備盛大的夏日祭典”的回信，通過《日本新聞》一直以為日本人民痛苦地活在美國帝國主義暴政壓迫下，收到這樣截然不同的回信頓感不知所措。而且他們通過這些回信，了解到原本派往南方戰線或中國戰場的同鄉，幾乎早就全部返回國內。

謙二自己也寫了兩次明信片給伊七與雄次，但都沒收到回信。當時有郵件檢閱，不能寫裝進信封的信件，而且寫信只許使用片假名，據說寄達的幾率大概只有一半。

根據該時期的回憶錄，大部分都說因為信件檢閱與民主運動的關系，寫信的內容大致不脫“母親大人，身體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斯大林大元帥的溫情關照下，過著自由自在的每一天”[[11]](#m11_1)。

對此，謙二也說：“我自己也只能寫這種樣板書信。俘虜營的氣氛當然也有影響，而且過去待在軍隊，也只會寫這種內容。”自從他被日軍征召以來，已經過了好幾年，這段期間寫的信件全都必須通過檢查。

收到信的一方也大概能察覺為何只能以片假名書寫，所以回信的時候也只能寫可以通過檢閱的內容。我還在戰時的昭和二十年三月，曾經收到早實時代朋友寄來的明信片，上面寫著“最近艦載機在東京上空盤旋”，因為不能直接寫美軍空襲東京，所以采取這種寫法。對于這樣的方式，大家都習慣了。

謙二于一九四七年秋天開始在炊事班服勤。前一年的冬天也分配到炊事班，但當時只擔任廚房與食堂的清掃雜務，而且是因為蘇聯軍醫診斷他不適合從事戶外作業的緣故。這次并沒有健康上的理由，“我猜大概是沒有政治色彩、認真、無表里不一的行為等理由，受到積極分子們的好評才能調到炊事班去”。炊事班的工作較戶外勞役來得輕松，比起一般兵更不缺食物，如果沒有獲得好評價，往往無法擔任此處勤務。

炊事勤務采兩班制，二十四小時輪班。夜班負責制作早餐，隔天白天才睡覺。將谷物洗凈后放入大鍋，蓋上鍋蓋點火蒸煮，接著加入調味肉與蔬菜一同燉煮，如此便完成一道料理。簡單來說就是燉飯。

除此之外，還要把午餐用的面包切好排列，連同早餐一同交給大家。到了一九四七年后半，晚餐會有一道湯加上一道菜。因為材料受到限制，而且又是多人數大鍋飯，從這點來看，幾乎沒有可以展示廚藝的空間。

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二分所選定了第一批歸國人選。一九四八年六月，輪到第二批人選的選拔。謙二一邊躲避著愈來愈激烈的民主運動，一邊不斷期望能被選上。

第二批時，大約選了一百人。在戰俘營的中庭站著一個日本人一個蘇聯人，由他們唱名并確認人選，并加以分組。那天擔任炊事夜班，做好早餐讓大家吃過后，某個人大概搞錯了竟告訴我“你入選 ”讓我一直期待不已，但是排到最后都沒叫到自己名字，我感到非常失望。那時炊事班的某個人突然冷冷地說了句：“連做夢都在想被選上吧。”我還記得當時感到的那股憤怒。接著我變得自暴自棄，不再認真工作，惹怒了炊事班班長，沒多久我就被炊事班開除，轉回擔任一般勞役。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選出了第三批歸國人選。發表人選當天，大家紛紛在俘虜營中庭集合，等待著叫喚姓名。“蘇聯軍官喊了我的名字。知道自己能夠回國時，內心涌上了一股喜悅。被選上的人顧慮著其他留下來的人，還不至于高興到跳起來，但大家都開心不已。”

謙二說：“之后所有事情都無所謂了，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記憶。”進到戰俘營最初認識的人幾乎都已經不在了，沒什么人可以訴說內心真實感受，也沒有其他人來請托傳話給他們的家人。

離開的準備相當簡單，因為盧布禁止攜出，個人也沒什么行李。“也沒想過帶個蘇聯的東西回去做紀念。但是，飯盒與外祖母給的裁縫包是生存必需品，回到新潟老家前絕對不可放手。”

如前所述，民主運動的參與度似乎與能否成為歸國人選沒有多大關系。但日裔第二代的飯冢與川村，選了三次都沒被選上。俘虜們的感覺是，蘇方可能懷疑他們歸國后會幫助美軍，所以被繼續留了下來。

出發的日子，在人選公布的幾天之后。大家列隊出發時，蘇聯的人都站在戰俘營出口目送。

我想他們也為這些一同生活過，歡欣要回家的日本人感到開心。“螳螂”已經轉職不在了。亞夫馬德林仍然擔任所長，但當天剛好外出。塞思塔可夫曾經轉職，但于一九四八年初又回到第二分所，但在我們回去之前，傳出謠言說他好像犯了什么罪遭到逮捕，不過塞思塔可夫太太站在出口附近，目送著我們離開。

出了戰俘營，照例為了等待火車時刻安排，又在赤塔的火車調度場待了兩天。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命令，要他們裝飾返國列車，俘虜們便在板子上以油漆寫下“蘇聯同盟與日本國民之友好萬歲”字樣，并把這塊板子裝在火車貨車的側旁。

返國列車很順利地迅速抵達納霍德卡。列車移動中大家向共產黨立下誓言，還唱了革命歌曲。除《國際歌》《紅旗》之外，還有赤塔方面民主運動領導者袴田陸奧男作詞的歌曲（據說有“站起來，農民、勞工，把你們當奴隸的裕仁……”這樣的歌詞），此外當然有《共產主義者的馬賽曲》和《同志們，勇敢地前進！》等歌。“無論如何只想要平安回家。沒有深刻想過不聽命唱革命歌曲，就回不了家這樣的事情。只要能回家，不管是要唱歌還是要大呼萬歲，什么都愿意干。”

抵達納霍德卡后，依序等待，大概又轉換了三個戰俘營。他們在第三個戰俘營辦理離境手續后，前往港口途中，看到第二批離開的俘虜們正在防波堤工作，里面還有偽裝身份的佐橋中尉與曾和謙二搭檔伐木的新兵。“發生什么事了？”一問之下，他們回答：“收到命令停下來工作。”他們到隔年六月為止，在納霍德卡又多待了一年，被迫從事勞役作業。

屬于第三批離開的謙二一行人，平安無事地從納霍德卡港搭上回國船只大郁丸號。看到日本船只的最初印象，謙二如此描述：“看到船員，只感到‘（日本人）個子好小’。一直待在除了俘虜以外大家都是大塊頭的環境中，因此看到俘虜以外的普通人，突然覺得對方好小，感覺相當詭異。”

謙二說自己看到船上掛的“日之丸”國旗既沒有哭，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感慨。

我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就把日之丸拿來當浴巾了。當時為了活下去就已耗盡心力。當被告知可以回國后，還在各戰俘營間緩緩等待移動，所以看到日本船只時，也不記得自己突然有什么感動。而且，一直把回國當作一個夢想，夢想突然實現時，反而不知道該如何反應。不只我如此，大家似乎都有同樣感受。現實，果然跟小說或電影不同。

搭上船后，俘虜們一時半刻還無法適應環境變化。先前民主運動時，蘇聯方面的宣傳讓他們相信，遲遲不能歸國，是因為日本船不來接他們。

上船后，才從船員口中知道“根本沒這種事情”，可是大家仍覺得“之前是被這么告知的”，顯得半信半疑。甚至有些人還說，船員們都在騙人。不過相較之下，我們也只到這種程度而已。被拘留到隔年的人們，還發生與船員交惡、把船員當成“階級斗爭”對象的例子；下船之后搭上特別列車，整團人由舞鶴抵達京都時，也發生過與警察集體亂斗的事件（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京都事件”）。讀到這些報導時，總是一陣心痛。我以為，讓他們暫時在日本生活一陣子，大家就能冷靜下來。如果在日本的人也能帶點寬容的心迎接這群戰俘，或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搭了兩天的船，八月二十日抵達舞鶴港。舞鶴港灣內充斥著許多因戰爭而沉沒的船只，還可以見到桅桿或船艏冒出水面的悲慘狀況。謙二說：“可以看到日本時，感到非常開心，不過好像在看日本的庭園式盆景一樣。與大陸風情不同，一切都顯得狹小而緊湊。”

大家在舞鶴的臨時收容所待了大約四天。在該處有美軍前來調查，有日裔第二代軍官讓大家看赤塔的航空地圖，聽取戰俘營場所與赤塔蘇軍設施的狀況。謙二把自己記得的內容，都直率地回答了。

從舞鶴被放出來后，眾人各自領取了返鄉的免費乘車券，以及臨時的一筆現金，大概有幾千日元。因為不知道日本物價狀況，也不曉得這筆款項究竟是多是少。

謙二從舞鶴前往京都，再從該處搭上北陸線，回到父親雄次所在的新潟。在西伯利亞被當作“救命寶貝”的飯盒，到這個時候還帶在身上。離開日本四年，已經搞不清楚東西南北，依靠著沿線的站務員與在外同胞歸國援護會的學生義工幫忙，才能返鄉。當他搭火車看著窗外的景色，果然還是感覺非常狹小。

由北陸本線轉入信越本線，接著抵達荻川站。父親雄次與妹妹秀子來車站迎接，不過謙二并沒有感到特別的感慨。或許是因為幾乎沒有一起生活過的原因吧。

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就離開了父親與妹妹，父親來東京時偶爾還能遇到，至于妹妹與父親的繼室，也就是我的后母，只有一九三九年還在中學生時期，返鄉回佐呂間時見過一面。大家不知道該說些什么，彼此都有點手足無措。如果能回到中野的家，與外祖父母相會，那應該又會是不同的景況，只可惜東京已經不再是自己的故鄉了。

流淚出迎這種戲劇性的場面完全沒有出現。從荻川站步行約三十分鐘，來到父親故鄉的小村。新潟只有在當兵前來過一次，走在路上的村人，一個都不認識。

回到父親的住宅吃晚餐，謙二回憶：“端出來的是極其普通的餐點，對此也感到相當失望。因為是在鄉下，知道不可能端出太豐盛的大餐，但出現的卻是完全沒有任何特別準備的一般食物。當時心想，魂牽夢縈的歸國夢想，竟然就是這么回事嗎？”從西伯利亞歸鄉的喜悅非常短暫，很快地，謙二就被卷入大戰之后的艱苦生活中。

[[1]](#w1_3) 隈部會，《亞夫馬德林與塞思塔可夫》，《“赤塔會”會報》第二號，一九七六年。

[[2]](#w2_3) 維克多·卡爾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3]](#w3_3) 譯注：約為英文的major，少校之意。

[[4]](#w4_3)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齋丸（音譯）出版會，一九七九年。

[[5]](#w5_2) 譯注：江戶末期“新選組”的成員之一。

[[6]](#w6_2) 譯注：“給我一份”之意，原文以片假名拼讀俄語。

[[7]](#w7_2)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體験記6》。

[[8]](#w8_2) 淺原正基，《對抗流言·中傷》，《中央公論》，一九五六年十月號。

[[9]](#w9_1)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會”會報》，第三號。

[[10]](#w10_1)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11]](#w11_1)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 第五章 輾轉的生活

一九四八（昭和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歲的謙二回到日本國內。雖然回到父親雄次的家，但卻完全沒有什么戲劇性以淚相迎的場面。

之后，謙二在戰敗后的日本，卷入不斷更換職業的生活中。

## 一、西伯利亞歸國者的處境

謙二父親雄次的故鄉，在新潟縣中蒲原郡兩川村（一九五七年并入新潟市）一處叫作割野的村落。距離最近的火車站是信越本線的荻川站，此處是位于越后平原上一處平坦的農村。

割野正好在連結信濃川與阿賀野川的運河、名為小阿賀野川的附近，出了荻川站，越過橫跨小阿賀野川的鐵道橋梁，步行大約需要四十分鐘。當蒸汽火車通過鐵橋時，橋上行人必須先躲到橋梁邊側，等待火車通過。

一九〇一（明治三十四）年從割野移民北海道的雄次，重新回到故鄉新潟，已經是一九四二年了。雄次建于割野的住處，是將北海道住宅的木材拆卸后搬回新潟，再重新搭蓋起來的房舍。是僅有寢室、客廳與廚房的小型平房，墻壁以蒿草及土壤混合涂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修飾，這一家人過著何等貧困的生活，可以說一目了然。

謙二抵達自己父親的住宅當晚，晚餐是“極其普通尋常的餐點”，完全感受不到特別歡迎他回家的氣氛。不過當時的農村飲食生活本來就十分困乏，而雄次在北海道累積的財產，原本想當作養老金帶回故鄉新潟，卻因為從戰爭期間到戰敗之后的通貨膨脹，存款不斷縮水。謙二也沒有特別詢問父親雄次家中的經濟狀況。

提起在割野的飲食，幾乎沒有肉可吃。流動小販雖然會來賣魚，但只會去有錢人家中兜售，所以連魚都很少吃到。每天就是腌菜、味噌湯、蔬菜與米飯，偶爾加上咸魚而已。因為是農村，二戰之后雖然不至于完全餓肚子，但也沒比西伯利亞的俘虜生活好多少。在西伯利亞時夢想返鄉可以吃點紅豆湯，看到家中景況，也說不出口。如果是外祖父外祖母，或許還敢試著要求看看。

住處附近有小熊的本家，由雄次的妹妹，也就是謙二的姑姑所繼承，但她處于不問家事的隱居狀態，家中大小都由她的長子掌理，而他與雄次的關系并不親近——畢竟雄次十八歲就離開新潟，一直到六十歲才返鄉。那位姑姑偶爾會瞞著長子的太太，從家中偷運些糧食給雄次，但能幫忙的，也僅只于此。

謙二回到故鄉時，雄次已經六十五歲。雖然辭去“產業組合”的工作回到家鄉，但因戰爭中的通膨導致難以維生，他也做起將北海道的藥草引入內地，做中藥局津村順天堂承銷的生意。但日本戰敗之后，這個工作也隨之消失了。

失業的雄次，改于自家玄關開起一間叫作“漫畫堂”的租書店，為附近的孩子提供漫畫出租的生意。收廢紙的業者以一貫目（約3.7公斤）為單位買進漫畫，雄次則以每冊五日元的價格買入，出租一次收費二日元，大概以這樣的規模獲取一些收入。只是雄次單純把租書當成副業，并沒有因此賺大錢。

因為理解家中經濟困難，謙二立刻對雄次表示“我會去工作賺錢”。接著在八月時，跟附近的木工交涉后，他便到位于新津的土木建設公司擔任現場指導見習。那是一家從師父到木工總共只有五個人的小型建設公司。

我與介紹工作給我的木工一同到新津上班。步行越過鐵道橋到荻川站，不過距離實在相當遠，又沒有巴士可搭。當對我父親抱怨“太遠了”時，他卻只回答了一句“附近的人大家都走路啊”。雖然因此了解鄉下人的忍耐力超強，但實際說來，鄉下幾乎沒有需要通勤的上班族，大部分的人都在村落里生活，不管是農家還是公所職員，或是理發師等等。

當時的日本處于都市人口減少的時期。根據日本政府的統計，都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率，一九三〇年為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為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〇年快速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后，一九四七年又再次降回百分之三十三。

謙二從北海道移往東京的一九三二年，正值市場經濟滲透引起恐慌，農村地區受到貧困壓迫的時期。之后伴隨全面戰爭使得重化學工業快速發展，人口持續移入都會區。但是在戰爭期間因為遭受空襲，產業基礎被破壞，再加上人口疏散到鄉村后，鄉村糧食不易輸送到都會區，日本戰敗之后，都會區的人口比率又降回一九三五年的水準。

一九四八年謙二回到故鄉新潟時，便是處于這種時期。這個時期的農村地區并無足夠的產業基礎可以吸收都市疏散人員或從國外撤退回來的人，呈現農村勞力人口過剩的情形。謙二所在的割野村，也幾乎沒有可以獲取長期固定薪水的工作。

這些過剩的勞動人口，以及同時期出生的戰后嬰兒潮一代，于一九五〇年代之后流入都市，成為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不過那是稍后才發生的事情。而對于當時的謙二來說，還是必須先找到工作維生。

謙二當時二十三歲。雖然曾經在西伯利亞做過建筑工作，但沒有擔任現場指導的經驗。雖說是現場指導見習，但工作不過就是照看現場作業狀況而已。

不過過了大約一周，疏散到岡山的伊七寫了一封信過來。從舞鶴回新潟途中，謙二曾經寫信告知伊七他返鄉的消息。“自己離開日本一段時間，頭腦有點昏昏鈍鈍，不過當時猛然驚覺，自己非常想見外祖父母，而且也得讓外祖父母知道自己的狀況，當下立刻就想出發。”

他向公司的師父報告收到外祖父來信，而且馬上要啟程前往岡山。但因為這只是一家小建設公司，“沒有長期休假這種福利”，因此就算是離職了。當然，這一周的見習工作等等，也領不到薪水。

剛返鄉的謙二身上其實沒錢。回國復員時雖然有領到幾千日元，但回家之后馬上全部都交給父親雄次，且其實仍不夠讓他前往岡山。結果這筆旅費還是由雄次支援。“父親理解我與外祖父母的關系，雖然有所覺悟我可能會在岡山定居下來，但仍然出資讓我前往。”

從荻川站出發，花了一日一夜，經由京都前往岡山，一直來到伊七疏散的地點。通過京都之后，路過大阪與神戶時看到了空襲后被焚毀的廢墟。先前經過的新潟與京都都未曾遭受空襲，這是回國后第一次見到空襲后的景象。

阪神的重工業地帶遭到徹底破壞，只看到剩下的扭曲鋼筋，心想這景象真是凄慘。不過在西伯利亞通過《日本新聞》，已經知道日本都市遭轟炸焚毀，因此內心也只是想著，因為是戰爭，所以才落得這般地步吧。

抵達山陽本線的瀨戶站，然后步行大約兩小時才來到外祖母小千代娘家的吉田家。一九四〇年曾經跟著小千代一同返鄉過，謙二憑借著當時的記憶走到目的地。

出身岡山的伊七與小千代，最初是疏散到伊七的老家。但掌管老家的甥兒生活窮困潦倒，因此才改搬到小千代娘家。政府雖然命令都市居民必須強制疏散到鄉下，但疏散的去處卻必須由民眾自行負責找尋。

吉田家的房屋屬于中型農舍，但是住在這里的還有丈夫死于戰爭、帶著四個小孩前來的女性，以及由東京、京都、橫濱等地，因疏散前來的三戶親戚，大約有十個人。伊七與小千代已經擠不進主宅居住，所以只能住在距離庭院有點距離、八疊大小僅有一房的木造貯藏室。

四年不見的重逢，伊七與小千代親切地出來迎接謙二。謙二在九月上旬抵達，此后約一個月的時間，就與伊七和小千代在貯藏室共同生活。伊七與小千代仍舊叫喚他“謙”，比起新潟，此處更讓謙二感到安心。

不過此地的生活也非常嚴峻。在這個貯藏室內，雖然有從中野運來、讓謙二懷念不已的餐具架和佛壇，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沒有。其他留在中野僅有的一點家具，因為一九四五年三月東京大空襲后遭強制疏散，政府無法分配足夠的輸送力，因此無法運來。

伊七此時已經七十二歲，小千代則是七十一歲，而且伊七還半身不遂。雄次自己也因通貨膨脹，存款縮水，所以無法期待他的援助，只能極力節省現金支出，連鞋子穿壞了都無法購買，謙二與伊七一同將蒿草敲軟后，自己編織草鞋。

飲食方面，除了米飯與蔬菜之外，只偶爾吃點醬油煮魚。農家的廚房僅有灶，既沒瓦斯也無自來水。貯藏室內雖然有盞電燈，但除此之外處于“完全沒有文明器物”的狀態。金屬式的澡盆，也就是所謂的五右衛門風呂，必須去戶外水井以水桶打水運送數十次，接著撿拾蒿草或樹葉燒火煮水。加上謙二總共有十一個人要洗澡，到了后半段水都混濁了。謙二認為：

官僚或高階軍官們，即便戰敗，在停戰和約后仍可領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輩子存下來的錢，卻在戰后通膨中消失殆盡。發起愚蠢的戰爭、造成大量死亡、把父親與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絕境的那票人，應該要負起責任才對。

此時小千代也哀嘆聯絡不上自己的二女兒美登里。謙二的母親芳江是小千代的長女，已經死于結核病。對小千代而言，美登里是唯一活下來的孩子。

美登里大約在一九三〇年便與丈夫和兩個小孩一同移民巴西。一九三六年柏林奧運時，她還寫信回來說，一九四〇年會回來拜訪預定舉辦奧運的東京，但此后因為戰爭斷了音訊，盡管戰后不知寫了幾封信聯絡，仍然音信全無。

我還記得戰爭之前拿著寫有美登里姨媽地址的信封，靠著在早實學來的英文字母，幫忙寫下葡萄牙文的地址：“Asai, Santa Catalina, Parana, Brazil Asai”（Asai，圣卡塔琳娜，巴拉那，巴西）。巴拉那是州名，圣卡塔琳娜是鐵道路線的名稱，Asai是住有大量日裔移民的城鎮，據說是來自“朝日（Asahi）”這個詞。

吉田家的長男與次男都對美登里有所抱怨，“自己的爸媽處境如此艱難，竟然連一封信也不回”。吉田家長男目前是一家之主，次男則在附近經營一家收音機店，生意相當興隆，次男的兒子之一在岡山的日銀支行上班。謙二也曾經到岡山去拜訪這位次男的兒子，當地經歷過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空襲，當時正在復蘇重建當中。

大約與外祖父母生活了一個月，謙二開始思考今后的情況。究竟應該待在岡山陪伴伊七與小千代，還是回到新潟與父親雄次過生活。對這些上了年紀的人來說，只有謙二這么一個幫手。如前所述，雄次其實也擔心謙二就這么在岡山定居下來。

謙二對于自己應該回到新潟或是留在岡山，感到猶疑不定，而讓謙二下定決心的，是平時沉默寡言的伊七，若無其事說出的一句話。

外祖父對我說“夠了，可以啦！”讓我知道回新潟才是對的。外祖父無論如何至少跟親戚們住在一起，可是父親卻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而且當時也覺得，即便沒有共同生活，孩子奉養照顧父母，也是理所當然的。

十月初，謙二離開了岡山。在貯藏室前，伊七與小千代對他依依不舍。從結果而言，這是謙二與伊七最后一次見面了。

雖說如此，即便回到新潟，割野也沒有什么像樣的工作。離開岡山后，謙二先前往東京一趟。入伍前就職的富士通信機基于對出征士兵的義務，理應保障他到歸國復員為止的職位，而且他離開時間的薪水，應該也要依照入伍前的薪水基準，在不換算通膨的情況下，匯款給父親雄次。

當時因為糧食供給困難，對流入東京的人口數量有所限制。如果沒有東京的在職證明便無法領取米谷存折，沒有官方發給的米谷存折，就無法購買配給米糧，只能在黑市購買高價的稻米。當時的米谷存折，實際上就等于身份證明書。如果能在富士通信機復職，就可以領取米谷存折，謙二抱著這份期待，搭上了山陽本線。

看過了遭受空襲燒毀的神戶、大阪與名古屋后，來到東京果然也是一副廢墟景象。抵達東京后他先前往位于中野、伊七的侄女家借住。伊七事前已經寫信給侄女請托。這位侄女的住宅與謙二住在高圓寺時的“長屋”類似，都是兩層樓建筑，二樓目前空著。侄女的丈夫是一位性格爽朗的電器工人，因為戰后重建的需要，收入似乎還不錯。

在此處大約叨擾了兩周，雖然是遠親，他們一家還是熱情接待了謙二。謙二卻在半夜因忍不住饑餓，把家中整批蒸煮的芋頭都吃掉了，從西伯利亞返國還不到兩個月，看到食物就忍不住要吃掉的習慣，還沒徹底改掉。

首先，謙二先前往入伍之前居住過的中野的住處一探，但謙二原本居住的區域，因為空襲已經徹底變成廢墟。

這個區域的整理完全沒有進展，活生生就是被轟炸后的模樣。燒剩的木材與其他尚可使用的物資都被搬走了，只有垃圾被散亂地留在原地。原本那么大的中野公營市場，完全看不到痕跡，只留下焚燒過后的殘跡。當時無限感慨，我的故鄉已經完全消失了。

即便這種狀況下，戰爭之前我常去的理發店，搭個帳篷又開始營業了。讓人感到懷念的景象，也令人感到無限的欣慰。在西伯利亞也是，我一直認為類似理發師或電工等，擁有生活上必需技能的人們，生命力都非常強韌。

接著，他前往小學時居住的高圓寺一帶。這一區沒有遭到戰禍波及，令人懷念的商店都還留著。“拜訪當時隔壁的裁縫店，昔日的小女兒現在已經亭亭玉立，著實讓人吃了一驚。算算我離開高圓寺已經超過十年了。”

伊七的侄女看起來四十歲出頭的模樣，不過謙二的感覺也不見得精準。某天，伊七侄女突然問：“小謙，你覺得天皇陛下如何？”謙二回答說：“我認為天皇先退位一次比較好。”結果伊七侄女突然有點情緒化地說：“我不喜歡小謙這樣的回答。”

因為我自己當過兵，所以理所當然覺得，發布開戰詔書的大元帥為戰敗負起責任，是極其正常的。戰爭結束了，時代的氛圍多少有些變化，而且當時確實也出現了一些天皇應當退位的輿論。

可是年長者們的想法卻不同。當時如果講自己“從西伯利亞回來”，開始會被說“西伯利亞回來的人，因為受過共產主義教育所以都變成紅色的”。與不同對象說話時，如果不小心說溜了嘴，搞不好就會遇到很糟糕的情況。

在鄉下即便到戰爭之后，還是有人把天皇的照片“御真影”與祖先的照片并排，年長的人們依然質樸地尊敬著天皇。但是遇到節日時，卻不再掛出日之丸國旗。普通的人們，光是為了生活就費盡千辛萬苦了，對于這種儀式性的習慣，大概都抱持著怎樣都無所謂的想法吧。

順帶一提，謙二對天皇的想法，在當過兵的人之間并不算特別。特別是年輕士兵或低階軍官們，在軍隊中被嚴厲教導如《戰陣訓》：“不受生而為囚虜之辱”，或者艦長應該與船艦共存亡等價值觀，這些人對于自殺失敗遭俘的東條英機充滿了蔑視感。因此要求寫下開戰詔書的天皇必須以某種形式負起責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

舉個例子來說，參加過呂宋島戰役的原陸軍少尉神島二郎，或者搭上戰艦“武藏”的水兵渡邊清等人，他們在戰爭結束后都曾寫下文章，認為昭和天皇應該負起戰敗責任自殺。一九七四（昭和四十九）年在盧邦島（Lubang）被“發現”，之后以右派言論招惹眾人注目的原陸軍少尉小野田寬郎，也在歸國隔年的訪談中表明“天皇應該要負起自己的責任”[[1]](#m1_4)。

之后，為了達成此趟來東京的目的，謙二前往位于新丸子的富士通信機。該處工廠并未遭受空襲，仍可以見到過往的同事與上司。

可是，最終他仍無法于富士通信機復職。過往曾任財務部主管的人，目前擔任“人事或勞務科長”，謙二與他面談時，這位科長會在閑談間若無其事地打探：“你好像在西伯利亞受過‘教育’，感覺如何？”接著，又以戰后復員人數眾多，無法立刻復職，不過仍會照樣支付與先前一樣的薪水等理由，要求謙二先在家等候消息。

實際上，在戰爭之前謙二曾與這個科長發生口角。

當時那家伙擔任財務主管，屬于拍上司馬屁的類型。會在下班之后偷偷記錄比科長先離開的員工，自己一定等到科長下班后才離開，就是這種貨色。我自己算是善于工作的類型，所以總是趕緊把業務完成，時間到了就回家。這家伙會在下班前三十分鐘左右，突然拿會計業務的工作過來要我處理。我當時年輕，某次就在房間外向這個主管抗議。他只隨便找個借口含糊帶過，說：“因為你是優秀的課員，才想多交代一些工作給你。”當時就覺得他是個啰唆的家伙。

當我從西伯利亞回來，竟然是這家伙負責申請復職者的面試。如果申請復職就應當接受，這是制度規定下的義務，所以公司應該已經接納過先前從其他戰場回來的人員。只能說，人生究竟會如何發展，誰也不知道。公司果然匯來與過往相同的薪資，與入伍前的金額一樣，但因為通膨的關系，現在給這種薪水根本不夠過生活。

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亞的人們，因為是“西伯利亞歸國者”所以遭到警察監視，在地域社會中被歧視，求職時面臨不利的處境等等，許多人都表達過類似的經驗。謙二在這次面談之后，事實上就等于已經斷絕了進入日本大型企業之路。之后，謙二便開啟了宛如滾石般的日子。

## 二、滾石般的日子

不得已之下，謙二開始在東京找工作。很快地，他寄宿處的電工，介紹了一個從事掘井業務的挖掘公司事務員的工作。因為謙二擁有中學畢業學歷，曾任職富士通信機擔任會計業務，懂得初級會計，而且社長的兒子相當同情“西伯利亞歸國者”，這些大概是謙二受雇用的原因。

這家挖掘公司是一家大約只有三十名員工的小企業。謙二原本應該擔任事務性工作，但進入公司后，竟被命令前往山形縣米澤近郊，擔任掘井工作。

這個時期，為了日后將廢止蒸汽火車、導入電車的規劃，奧羽本線正在進行福島—山形之間的電氣化工程。作為此項施工的一環，位于奧羽山脈縣境的隧道福島與米澤之間也需要更新電氣化。可是當地位于山頂附近，缺乏工事用水，所以才委托開掘一口水井。

謙二前往現場，該地接近山頂，就在隧道出入口一旁。謙二從十月到十二月的三個月間，與現場工頭夫婦一起居住在工事附近的工寮里。這項工作就是加入燃料啟動挖掘探頭，當機器開始挖掘時需在一旁監視。

可是此時雄次卻從新潟寄來一封信。

當時我找到這項工作后，就寫信回報人在新潟的父親，告知自己的狀況，書信往返了好幾次。我打算在東京的公司找一個辦公員的工作，但父親似乎不太了解狀況，以為我是巡回各地負責探井的工人，便來信說，如果只能找到這種工作，還不如回新潟。確實，我也不太清楚這個工作實際要負責什么業務，所以十二月底領完薪水后便辭職了。先回中野外祖父侄女家收拾行李，接著返回新潟。

在新潟的老家，沒有任何特別的慶祝下，迎接了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的正月。因為不得不找份工作，一月時謙二看了報紙廣告欄，前往新潟市內一家叫作“今枝火腿”的公司應征，獲聘之后果然還是擔任辦公員的工作。

這家公司生產維也納香腸、火腿，法蘭克福香腸等產品，主要賣給位于新潟的美軍軍政部。謙二在該處擔任會計職務。

因為無法從割野直接到新潟上班，所以聯絡上了住在新潟市內、父親第一任太太的女兒。這位同父異母姊姊的丈夫，任職于新潟的日本輕金屬公司，住在公司宿舍，謙二便借住該處上班。這位姊姊的員工住宅，有兩間四疊半、一間三疊的房間，夫婦兩人加上兩個小孩，一家共四口人。因為謙二的搬入，十九歲的女兒把原本自己使用的三疊房間讓給了謙二。

謙二任職的這家公司算是新興企業，當時算是很時髦的小公司，有大約二十名員工。其中七名是事務與業務職位，其他則是火腿工廠的工人。社長好像住在六日町，把公司業務都交給原為陸軍上校的老戰友管理。

謙二任職的事務部門借用新潟市內繁華大街上一家公司的辦公室，是一幢兩層樓的店鋪建筑。一樓是火腿販賣店，二樓為辦公室。辦公人員多為中老年，有從中國東北回到日本的人，也有據說過去曾于銀行任職的人，看樣子都不甚忙碌，大家邊喝茶邊閑聊。似乎是離開公職的原軍人與原銀行員，靠著人脈集合一處成立的公司。

他們話題的中心，大多是撤退回國時有多辛苦，以及抱怨戰爭結束后的生活。我曾經為了公司的業務，拜訪了那位從中國東北撤退回國的經理人，租住在一棟破舊兩層樓房的二樓，沒有隔間，與太太和三個小孩一家五口擠在一起。聽說過去他們住在奉天，現在看來確實很貧苦。對戰爭之前過過好日子的人而言，戰敗之后的生活，確實讓人難以忍受。

當時因為大家生活上沒什么余裕，所以也不談戰爭時的話題。三十多歲的工廠廠長，曾經服役于重巡洋艦“那智”號，還記得在工廠閑聊時他說過自己的親身體驗。當“臺灣沖航空戰”結束后，因為收到日軍大獲全勝的誤報，軍方命令“那智”號出航，“乘勝追擊敵軍殘兵”，啟航后一看情勢完全相反，他們趕緊冒著危險逃了回來。不過即便是這位愿意談戰爭體驗的廠長，也絕口不提稍后的雷伊泰灣海戰，或者在馬尼拉灣遭受空襲導致“那智”號沉沒等非常沉重的話題。在那個時代，畢竟大家的戰爭記憶都還鮮明，所以盡量避開沉痛的話題，只挑有趣或可笑的戰爭體驗聊。

我父親在日本戰敗前后，因為從事自北海道引入藥草的工作，某次搭青函渡船時遭到美國軍機掃射，有過九死一生的經歷。不過這種話題只會在閑聊時附帶一提而已。我自己也幾乎沒說過在西伯利亞的經歷。因為我回國沒多久就明白，不管如何說明，其他人仍然無法理解這類話題。

“今枝火腿”除了辦公室兼店鋪的樓房外，在距離新潟市不遠處還有一塊三十米乘以三十米大小的土地，這里就是公司的小工廠。因為必須出貨給美軍，所以衛生管理相當徹底，地板鋪上水泥，機械設備也都是現代化的生產器材。為了生產煙熏火腿，還設有專門的煙熏室，工廠監督們也都穿著白袍。在工廠內工作的工人，大都是新潟當地居民，男男女女都忙于工作。戰爭之前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沒吃過火腿，即便在戰前日本高速發展期，大概也只有魚肉火腿比較普遍，從這點看來，戰爭結束后就開始生產真正的火腿，也算相當前衛的嘗試。預測到美軍的需要與日本民眾戰后飲食習慣的變化，這家公司可以稱得上是創業投資公司（venture company）。

處理辦公室業務時，偶爾會收到法蘭克福香腸的樣品。謙二本人也沒嘗過這種食品，但也不排斥嘗試，吃過之后甚至覺得相當好吃。這些香腸火腿在當時都屬于高級品，以謙二的薪水還購買不起。不過銷售狀況似乎相當好，工廠幾乎是不停運轉地拼命生產。

與工廠的繁忙相對照，辦公室員工的工作就顯得有點詭異。謙二說：

我的工作，就是為了逃稅制作兩本賬冊。至于曾在銀行工作過的那位員工，大概十點半上班，傍晚露個臉后便下班。他的工作，是從A銀行戶頭領出款項，再存入B銀行戶頭。之后再由B銀行領款，存入A銀行。這么做可以增加實際交易業績，能夠幫公司獲得更多融資。不過公司仍是負債累累，這些不過是讓經營上更好看的粉飾工作。

不怎么工作的白領階級，與拼命工作支撐他們的藍領階級，這種組合正好反映出戰爭之前日本的身份歧視的狀態。在江戶時期，農民的勞動時間從黎明到日落為止，大概十到十三個鐘頭（冬天與夏天有所差異），與此相對，在薩摩藩服勤的武士，工作時間大約三小時。明治維新之后，仍然沿用這種“武士工作時間”的舊習，廢藩置縣后的政府部門每天只工作六小時，即便到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采用八小時制度后，夏季午后仍帶有午休時間。[[2]](#m2_4)

在這種習慣之下，工作時間短卻可領取高薪資的“官員大人”生活，一直是小老百姓羨慕的對象。二戰之前承續政府部門工作形態的許多大企業，不僅在白領與藍領的待遇和工作形態上采取不同安排，甚至連進公司走的門都不同。二戰之后勞工運動追求的目標之一，就在于撤除這種“歧視待遇”，這點就如同我們描述謙二為富士通信機工作時提到的一般。

其實這個時期，一些本身沒有技能、只依賴既成秩序生活的白領階級，也開始嘗到地位沒落的經驗。日本戰敗之后記載自身地位沒落的回憶錄，大多都是由都市中產階級與他們的下一代寫成。

在這種狀況下，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日本開始采取被稱為“逃逸線”（Dodge Line）的金融緊縮政策，經濟因此進入不景氣期，原本大量雇用歸國復員者的企業，開始整編、裁撤冗員。

謙二也收到富士通信機寄來，說明希望他自行退職的信件。當時面談后請謙二回家等候消息，卻再也沒來消息，負責人擺明了要棄謙二于不顧。謙二心想“反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就答應了離職。公司雖然也支付了退休金，但仍依照謙二入伍前的月薪基準來計算，因此這筆金額根本不敷生活所需。

到了四月，這次輪到“今枝火腿”這家公司開始搖搖欲墜了。經營散漫，雇用不認真工作的辦公人員，財政上不斷以杜撰的賬務魚目混珠，終于嘗到惡果。

工廠全面趕工，火腿販售也很好，但還是發生了薪水遲發的狀況。當時我騎著腳踏車去工廠，聽到工人們紛紛向我抱怨：“商品賣得這么好，我們也拼了命地工作，為什么薪水還會遲發？”

因為公司經營太過草率，似乎無法長久經營，薪水也逐漸無法正常發放，所以謙二開始找尋下一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通過工廠中層管理人的太太介紹了一個新潟市內證券公司的工作，謙二再度以辦公人員的身份就任于該公司。那位太太也是從中國東北返回國內的人。

只不過，雖說是“證券公司”，但只是大戰之前日本傳統股票中介的“株屋”，換個名稱繼續營業而已。在新潟有處理稻米行情的證券交易所，有不少“株屋”就是專門在處理此類稻米交易行情。

公司的辦公室，就設在“株屋”的“社長”個人家中，里邊座位上坐著生病中的社長，社長座位前到屋子廊緣之間有塊泥土地面的“土間”，空間里排放著掌柜、采購、聯絡人以及事務員謙二等人的桌子。掌柜負責判斷米價行情，把指令發給派遣到證券交易所的采購，由他進行交易。介紹謙二這個工作的“今枝火腿”中層管理人的太太，也在這家公司擔任辦公人員。

八月前后，因為與公司的社長吵架，謙二便辭職了，他說“吵架理由已經忘記了”。在同一家公司長期工作，按照年功序列領取薪資的現在日本企業制度，當時僅限于一部分的大企業辦公人員與政府部門的職員。對工作再久也不會調漲薪資的中小企業員工而言，與公司之間發生不愉快便走人，是極其自然的事情，更何況能夠長久持續下去的公司也不多。

下一個工作機會還是通過“今枝火腿”的工廠去尋找。當時謙二在同父異母的姊姊家中吃過早餐，拿著午餐便當，便到處去找工作。因為與火腿工廠的工人們還算意氣相投，辭職之后還是得以進出工廠。工廠一直有相關買賣的從業者出入，等于是一處情報交換中心。

在該處，謙二與賣豬給工廠的中介交情還不錯，之后開始幫著這位牲口中介做起生意。牲口中介是采買牛、豬的中介買家，他們前往農村采購牛、豬，之后運至屠宰場處理，再賣給肉店或工廠。

謙二跟著牲口中介四處前往農村與屠宰場。這個牲口販子會看準農家不注意的時候，在測量重量的砝碼上涂抹牛糞，讓牛只重量看來較輕，趁機賤價購入。另外他們也在屠宰場前的水池，用水清洗解體后的動物內臟。在“今枝火腿”工廠為了制作火腿或香腸，會將內臟翻過來徹底清洗，但在進貨的時候，這些貨品均已在屠宰場中做過簡單的初步處理了。

牲口販子除了在各農村走動，其間的空閑還會兼差當黑市買賣的助手，幫忙搬運黑市稻米。即便其他物資逐漸開放自由買賣，但政府依舊管制稻米的流通。

雖說是黑市買賣，不過就是從荻川農村的農家買米，拿到“今枝火腿”工廠販售，只有這種程度而已。新潟車站的月臺上有經濟警察監視，所以背著裝了米的背包時，也不能讓人看來覺得很重，得假裝背包很輕盈的樣子。對于這種小規模的黑市稻米，警察原本就不會一一取締。畢竟光靠國家配給的稻米額度根本活不下去，警察們也理解民眾們的苦處。

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在牲口販子的斡旋下，謙二干起“坐豬仔”的工作。工作內容是將二十頭左右的豬趕上國鐵（國家鐵道）貨車，搭夜車把豬運送到東京。火車貨車的單側架有一塊木板，區隔出上下，人坐在上段，下段則放置豬只，所以才被稱為“坐豬仔”。

如果豬的狀況不好，感覺快死掉時，必須立刻割斷豬頸動脈將血放掉，所以要我身上帶把刀。因為豬死掉后內臟會迅速開始腐敗，那么這頭豬只就算浪費掉了。從西伯利亞之后，我已經相當習慣搭貨車旅行，但那股臭味與豬的叫聲實在太過嘈雜，讓人難以入睡。

大約黎明時分，搭載豬的貨車便會抵達東京。搭夜間列車打瞌睡時，會被連結器發出“喀嗆”的聲響驚醒。當列車進入芝浦的支線后，把豬卸下交給東京方面的中介人和他的下屬。之后便由中介人將豬送往芝浦的屠宰場。

芝浦的中介人讓我到他家休息，洗完澡后還提供早餐，吃完后拿取豬領取收據。中介人的住宅位于屠宰場附近，當時家中還能擁有澡堂，已經算得上驚人的奢華了。從戰爭期間到戰爭之后，我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活，當時只覺得“有錢的地方還是有錢啊”。之后回到新潟，把收據交給牲口販子，就算完成了一回工作。

在糧食不足與物資統制的狀況下，造就了部分物資流通業的商機。此時，“黑市買賣者”便一轉升格成為“戰后暴發戶”。

原本謙二就沒打算太過深入這個業界，“雖然做過幾回‘坐豬仔’，但都屬于牲口販子臨時委托的工作，之后也就沒有下文了”。

這個時期的謙二，只是拼了命地想要賺錢活下去。謙二說：

當時的服裝大概就是類似寬松夾克服之類的，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幾乎沒什么印象。至少幾乎沒穿過西裝。也沒有從事過需要先面試才能就職的工作，所以沒有穿著西裝去面試的記憶。因為生活層面與心理層面都非常窘迫，原本很喜歡看電影，當時也幾乎沒再看過，也不記得假日的時候干過什么事情。

從早到晚過著這種日子的謙二，一九五〇（昭和二十五）年正月回到家中，請父親雄次幫忙介紹工作。謙二自己說：“當時心想一直幫牲口販子打工，也不是個辦法。”在此之前的工作，都是靠自己的人脈，或者偶然間找到的，這是第一次通過父親介紹工作。

這份工作，是因雄次的外甥正好在龜田的點心店工作，所以介紹謙二也到那邊“修業”工作。“父親只有小學畢業，從沒想過靠學歷就職，加上戰爭之前有句俗話說‘做餐飲絕對不會失業’，我自己也是聽外祖父這種論調長大的，因此便接受了這份工作。”

雄次在龜田的妹妹，育有四個兒子（雄次的外甥）和一個女兒（雄次的侄女）。四位外甥當中，長男在戰爭中死亡，次男已經結婚，經營一家點心店。三男從戰地回家后，便娶了長男的遺孀，繼承家業，繼續經營腳踏車店。另外尚未獨立成人的四男與最小的女兒，則與三男一家一起生活。

謙二的妹妹秀子，一九四九年三月從新發田的師范學校畢業，成為新式中學的教師，并前往龜田就任。于是便在雄次外甥，也就是那位繼承家業的三男家中住下。謙二也住在此處，并到次男的點心店工作。

那位三男的住處是幢舊宅邸，房間數量較多，但除了三男夫婦與他們兩個孩子外，再加上四男與小女兒，以及我和秀子，算算也擠了八個人。三男與長男遺孀結婚，是為了存續家名，過去經常有這樣的事情。在龜田這地方，稱此種狀況為“名折”[[3]](#m3_4)。

那家點心店的外甥，會自己制作內餡。當時砂糖價格仍高，所以他混合使用了稱為甘精[[4]](#m4_4)的合成甘味料，因為混合比例掌握得宜，味道頗獲好評，連近郊的商店都會來訂貨。因為這家點心店需要人手，所以謙二才能前往就職。話雖如此，謙二說：“那根本稱不上什么就職，不過就是以二十四歲的‘高齡’，為點心師進行‘奉公’[[5]](#m5_3)服務罷了。”

謙二在該店，花了大約半年時間學習揉捏糕餅內餡與豆沙包的外皮，積累自己的修業。可惜這個職業也未能持續長久。

那個外甥酒品很差，而且每天都要喝酒。喝的量愈來愈多，最后從白天就開始喝得醉醺醺，喝到酩酊大醉之后就倒下，一整天都在睡覺。等到酒勁過了，酒也醒了，又開始下一輪，從頭喝起。逐漸地連工作都無法處理，最后甚至妄想我與他的太太“有染”，到處亂說，結果我在割野的父親還特別訓斥了他一頓。當年因為年長者還具有相當權威，外甥嘀嘀咕咕地向我道了歉。不過這種情況委實令人不悅，當年五月，在取得父親諒解之下，我便辭掉了這個工作。

無計可施的狀況下，謙二只好前往職業介紹所，通過介紹所覓得一個小制版公司的工作。當時出版業正值復興時期，制版公司的效益相當不錯。這家制版公司有三個職工，謙二擔任辦公事務員，加上社長，這次又進到一家全公司只有五個人的小企業。

謙二搬進制版公司的二樓居住，每天自己做飯。因為是制版業，為了使用藥品與火，所以備有自來水、瓦斯與淋浴間。“全部的家當只有棉被、少許衣服、鍋與稀少的餐具而已。房間的角落塞著紙箱，里面不知裝著什么。雖說自己做飯，不過就是煮點味噌湯而已。”

只是，在這家公司也無法專心擔任事務員工作。社長企圖擴大燃料業的業務，比起辦公，更多時間都在忙于燃料業務。因而謙二還得兼任外送薪炭與采購燃料的業務員，甚至為此還取得了機動腳踏兩用車的駕照。騎著小摩托車，上邊堆著一俵[[6]](#m6_3)、有時候甚至是兩俵的木炭，到處送貨。

在這個時代，進入類似謙二就職的這種三十人以下的小企業，如果工作量上無法達到讓公司會計整天埋首于辦公桌的程度，那么讓企業僅就會計業務便支付一個員工薪資，是絕無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處理辦公桌業務的工作，只有在大企業才看得到。

另外，謙二回國后的就業過程中，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時刻成為政府統計上的“失業人口”。離職之后總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職業介紹所，也只有一九五〇年進入制版公司就職這一次。

二次大戰結束時，日本總人口約有七千七百萬，其中一般勞動力約有三千三百萬人，軍隊約四百萬人。日本剛戰敗的這段時期，歸國復員軍人、軍眷、從國外撤回者，以及被軍需工廠大量解雇的人，總共高達一千萬人。即便如此，卻沒有出現失業人口暴增的事態。一九四六年四月這個時間點上，一整個月完全沒有工作的失業者，統計上只有一百五十九萬人。

日本失業率低于其他先進國家，原因大概是擁有大量自營業、中小企業，以及被稱為“家政助手”的工作，這些公司及行業吸收掉市場上過剩的勞動力。因為沒有失業保險保護，可以說許多人不得不找臨時工作過渡，或依靠家庭照顧生活下去。

經濟學者東畑精一與野村正實認為，這種狀態與先進國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張應該稱之為“全部雇用”來做出區別。[[7]](#m7_3)日本的失業率，即便在謙二為了生活苦戰惡斗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現出未達百分之一的狀態。

## 三、無論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不只謙二，他周遭的人們生活都非常窘迫，大家幾乎都沒空談有關政治狀況的話題。雖然如此，謙二也不至于與當時政治狀況毫無關聯。

謙二還在“今枝火腿”上班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占領軍美軍寄來一封傳喚信件。謙二從西伯利亞返國抵達舞鶴時已經回答過美軍有關赤塔周邊蘇聯軍事設施的詢問，這些人當中，有時為了確認當時記憶是否正確，會再次召集一部分人進行問話。謙二回國之后，也好幾次都發覺，自己的信件有遭占領美軍檢查的痕跡。

傳喚的信件中附有占領美軍發行的乘車通行證。戰爭之后日本國內運輸力不足，物資運送不及，許多都市居民都得搭國鐵火車到郊區購買食材，有段時期處于列車老是客滿、車票也難以入手的狀態。不過許多時候列車會加掛占領美軍專用的客車，而這些車輛往往都還有空位。謙二拿到的乘車通行證，雖然只是普通的三等車廂車票，不過也是張前往東京的免費車票。

他靠著這張車票抵達東京，前往占領軍接收的丸之內郵船大樓報到。日本郵船大樓，是日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經濟景氣時蓋起的大樓。

他被帶到房間內，日裔第二代的負責官員開始詢問，給謙二看赤塔建筑物的航空照片、蘇聯軍裝的圖繪，問他穿著什么軍裝的人會進出哪些建筑。詢問口吻很溫和，并不讓人感到恐懼。因為從各地征調不同戰俘營的人聚集一處，偶然遇到當時一起拘留赤塔的人，還稍微交談了幾句。

趁著這次到東京，他也造訪了早實時代的朋友。一位與他同期進入富士通信機的同學，轉職到占領軍相關工作。當時通貨膨脹相當劇烈，大家都說那是一個做黑市買賣比當白領還賺錢的時代。

這位同學與謙二同年，已經結婚并抱著一個剛出生的女兒，有點滄桑感。謙二并沒有與同學進行太深刻的談話便道別離開，通過當時占領軍于主要車站都有設置的RTO（鐵道輸送事務局）引導，搭上還有座位的蒸汽火車，返回新潟。

謙二回國后，偶爾仍會閱讀新聞。雄次家中訂閱的是《讀賣新聞》，不過謙二不常在家，大多是在工作場所閱讀。他外出到新潟市或龜田任職時，也沒余錢可以自行購買報紙，而是在上班場所等處閱讀。

雖說有看報紙，但當時謙二并沒時間能夠仔細閱讀。對當時知名的下山事件（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遭謀殺）或松川事件（東北線松川附近列車疑遭破壞出軌）報導，他仍保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但也僅止于此。“中學時期開始關心國際情勢，比起內政新聞，我習慣先閱讀國際消息，與戰爭之前相比，新聞顯得自由得多，外電報導增加是好事一件。”

這個時期的選舉大概都投給誰，謙二也不太記得。他說：“大概是共產黨，或者是社會黨吧。并非對政治完全不關心，只是沒那份余裕。內閣如何輪替，那完全是上位者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謙二所在的選舉區位于新潟一區，但不管自由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的選舉運動，他幾乎都沒有留下印象。他曾經看過已經成為教員的妹妹秀子，在“教員組合”的動員下，為了支援選舉而走上龜田街頭的狀況，不過并沒有特別的感想。

只是，雖然投票給共產黨或社會黨，但謙二說那“也不過是為了牽制保守政黨而已”。

我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都不抱什么幻想，因為自己在蘇聯看過共產主義社會的現實狀況。比起蘇聯，還是覺得美國比較好。

但最敬謝不敏的，還是大戰之前的日本軍國主義。日本政壇的保守勢力，完全不考量戰爭責任，我自然不會投給他們。所以不管是社會黨還是共產黨，都好，只要不是保守政黨我就投給他們。投票給這些人后，心想無論如何他們也無法取得政權。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大選，共產黨“躍進”三十五席，取得這種程度的席次，大概也無法改變整個大局。

另外謙二說他對日本國憲法也不太關心。

可能是因為公布憲法時我人也不在國內吧，沒留下什么印象。我既沒讀過憲法，對憲法也沒什么記憶，周圍也沒人在談憲法，說到憲法，大概就是，喔，“那又如何？”的感覺。總之不會成為吃飯聊天的話題。

實際上，謙二的說法，正是當時一般民眾的反應。在日本共產黨主導的一九四六年五月“糧食國際勞動節”中，游行標語牌上出現過一句知名的訴求“先給米飯再給憲法”。

總之，共產黨反對留下天皇制與容許資本主義的憲法，社會黨則有不少議員認為社會福利規范不足，抱持需要改正的意見，而所謂的“革新陣營”則揭起“護憲”大旗。但這些討論要引起廣泛的關心，大約得等到一九五〇年之后了。

比起這些，當時謙二更關心的是自己親身體驗過的戰爭問題。“我其實不太關心國內政治新聞出現什么冤獄之類的報導，不過報紙上刊登有關東京審判的判決消息，倒是會去理解閱讀。”

A級戰犯的那些人，在審判上遭受那些判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發動戰爭，把父親與外祖父母的生活搞得一團混亂的家伙，絕對不可原諒。什么廣田弘毅身為文官與其他戰犯不同，我認為問題根本不出在這里。但對于不追訴天皇責任，卻怎么都不能理解。

因為生活壓力所迫，幾乎沒有機會與他人談起戰爭體驗，但對自己體會過的戰爭真相，謙二一貫都保持關心的態度。從西伯利亞回國之后，最初買的一本書，是美國軍事歷史學家費爾德（James A. Field）所撰寫的《雷伊泰灣的日本艦隊》（日本弘報社，一九四九年）。

生活上沒什么余裕，本不應該買書這類東西。但對于把自己、外祖父母與父親都卷入的戰爭，無論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因為在戰爭中政府只發表虛假的資訊，完全無法得知戰爭實際狀況，所以更加令人想要搞清楚。

雷伊泰灣的海戰，是自己被征兵之前印象最深刻的戰爭，甚至還發動提燈籠游行慶祝勝利的事情。我不想閱讀日本人所寫的那種充滿英雄主義的故事，只想閱讀書寫客觀事實的書籍，所以才買下費爾德的著作。之后，也在書店站著閱讀，陸續看了一些書。

讀到吉田滿的《戰艦大和的末日》，大約也是在這個時期。不過謙二讀到的，是刊載于一九四九年《沙龍》雜志六月號，改以新日語假名排版的《軍艦大和》版本。

《戰艦大和的末日》是服役于大和號的少尉吉田寫下自身經歷的作品。原本以日語的文言文體寫成，預定一九四六年刊載于《創元》雜志，但因為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檢查而被全文刪除。這個文言文版本，在一九五二（昭和二十七）年占領期結束后，由創元社以單行本方式出版，不過在這之前，有另一個把可能會遭受檢查的部分刪除后修訂發表的版本。而謙二所閱讀的正是這個修訂版。

自己還在中學的時候，就聽說日本有大和與武藏兩艘巨大戰艦的傳聞，連存在都是一個機密，因此它們何時沉沒于何處，就更無法得知了。雖然閱讀了記載大和沉沒前最終情況的文章，但卻是刊登在所謂的“廉價庸俗雜志”上。會在這種娛樂雜志上留下戰爭記錄，也確實相當令人吃驚。

我認為作者把自己當時的意見如實陳述，同時也站在戰爭結束后的立場，提供客觀思考的觀點，確實具有相當價值。書中有記錄到，大和沉沒之前，為了盡量修正船艦傾斜的狀況，在沒發出避難通告的狀況下向輪機室灌注海水，造成輪機員死亡的狀況。事后似乎有人批評，提出高層這么做導致士兵死亡竟然未遭斥責的說法。但身為艦橋士官，這道指令感覺上應該是再自然不過的命令，所謂的軍隊，就是這樣的世界。

這個時期，雖然對蘇聯與西伯利亞有所關心，卻沒有深入思考的余裕。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戰勝國民黨，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仍覺得“果不其然變成如此”。謙二在西伯利亞時期讀過的《日本新聞》中，有幅漫畫描繪蔣介石政權接受美國援助不斷吞入美金，但卻沒有下半身可以消化，結果紙鈔只能不斷從身體中掉落出來。

一九五〇年起，日本共產黨轉為地下活動，因為活動方針不同而形成分裂。此事件肇因于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針對日本共產黨采取和平革命路線而進行的批判。

因為我自己關心蘇聯相關事物，所以當時也讀了這篇批判文。文中指名野坂參三，且用了許多不該對人使用的污穢字眼進行批評，實在非常惡劣。這不禁讓我想起西伯利亞時期的民主運動，讓人心生不快。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戰爭爆發。“當時想，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了。七月左右，有一篇美國記者寫的通信社新聞報導，說美軍先遣部隊以反坦克火箭攻擊朝鮮軍的T-34坦克，卻完全起不了作用。讀到這邊，立刻想起在蘇聯見過的T-34坦克。”

九月之后美軍自仁川登陸，正式介入朝鮮戰爭。朝鮮軍完全敗退，眼看大勢即將底定，十月中國軍隊越過鴨綠江加入戰局。此時新潟到處流傳著“美軍將被迫撤退”的流言。因為“朝鮮戰爭特別需求”而喧囂說經濟有所好轉的狀況，謙二的親身體驗是，“完全感覺不到景氣有好轉的現象”。

為了填補原本駐扎日本的美軍被派往朝鮮半島后的空缺，GHQ在八月發出政令，開始募集警察預備隊（日后成為自衛隊）。“所謂的警察預備隊，任誰看了都會覺得那就是軍隊。因為自己遭遇過軍隊與戰爭的悲慘狀況，認為沒有軍隊才是最好的，所以對警察預備隊的成立感到很不開心。”雖然謙二的生活很艱苦，卻“從未想過要加入預備隊。到現在還要回頭去加入戰爭，根本不可能。不想再次經歷那種處境”。

朝鮮戰爭開始之后，可以看到占領軍的方針有了重大改變。在此之前軍國主義者與戰前統治階層都無法擔任公職，在這之后改為針對共產黨員、同情共黨的公務員與大眾媒體，以及工會進行“清共”活動。謙二說：“想起西伯利亞時期，知道美國容許共產黨存在，感到美國仍算是個寬容的民主主義國家。這樣的美國竟下達赤色整肅指令，實在令人不敢茍同，但既然是占領軍的命令，日本也無法違抗。”

在這種環境中，一九五〇年秋天，謙二遇到了新潟市內的共產黨員，而且變為好友。

忘記是在什么狀況下遇到的了，大概是工會的運動家之類的，說起新潟市能有工會的大企業，大概只有新潟鐵工或日本輕金屬吧。可能是這個圈子的勞工運動家。

年紀比我大四到五歲，大概三十歲，感覺是個好人，就像哥哥一般。我說自己曾在西伯利亞接觸過《帝國主義論》，對方便說自己家中有這本書，愿意借給我。當我前去借書時，對方剛好出門，是太太出來迎接的，但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突然跑來借書，確實讓那位太太相當警戒。書借到手后總算讀過了，但內容過于艱澀而看不懂。

雖然跟這個人合得來，但他找我去參與活動時我總是不參加。關于政治活動，因為吃過西伯利亞民主運動的苦，不想再有所瓜葛。再也不想遵從上面的命令了。

謙二討厭蘇聯，也不喜歡共產主義社會，在這樣的想法下，其他人或許從中國軍隊介入朝鮮半島造成冷戰態勢的現實面來思考，認為不得已的狀況下日本可能需要再次軍備化，但謙二卻不這么認為：“腦袋想法干脆，一刀兩斷的人，或許會這么想；但現實世界中的問題，從來不是明確的二者擇一的狀況。會這么想的人，都是遠離社會現實的人，只有他們才會冒出這種想法。”

雖然不喜歡共產主義，但更不愿意見到戰爭與再度軍備化，這便是謙二的想法。從結果來看，這恐怕與當時絕大多數的日本人意見相一致。

進入一九五一（昭和二十六）年后，二十五歲的謙二遇到了一個轉變。謙二在制版公司的送貨業務仍然持續，但一九五〇年的冬天，他感冒了好幾回，身體微微發燒，一直無法退燒。一九五一年一月，因為病狀一直沒有好轉，只好請假前往鎮上診所接受診療，鎮上醫生介紹他轉診到新潟大學醫院。在該處，謙二被診斷出罹患了肺結核。

收到通知時，實在太過震驚，眼前一片灰暗。哥哥、姊姊都因為結核病而陸續過世，心想：“唉，沒想到最終我也罹患結核病。”內心自忖，或許是因為一直忙于工作，沒有好好吃飯的關系吧。

新潟的制版公司工作只好先辦理停職，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經過三個月的自家療養后，六月進入位于新潟縣內野町（一九六〇年合并于新潟市）的國立內野療養所。此后到一九五六年為止，大約五年的光陰，謙二都耗在這個療養所內。

[[1]](#w1_4) 菊池育三，《巴西的小野田寬郎談日本國無責任論》，《朝日期刊》，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號。

[[2]](#w2_4) 鈴木淳，《二つの時刻、三つの労働時間》，橋本毅彥、栗山茂久編著，《遅刻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時間意識の形成》，三元社，二〇〇一年。

[[3]](#w3_4) 譯注：名聲折損，帶有丟臉之意。

[[4]](#w4_4) 譯注：dulcin，乙氧基苯脲。

[[5]](#w5_3) 譯注：見習幫傭。

[[6]](#w6_3) 譯注：一俵為六十公斤。

[[7]](#w7_3) 野村正實，《雇用不安》，巖波書店，一九九八年。

# 第六章 結核病療養所

一九五一年一月，謙二被診斷出罹患結核病。這跟自己過往的體質可能多少有關，但從戰爭期到戰后的營養不良與過度勞累，恐怕才是最大主因。

謙二說這是“人生最失落的時候”，從二十五歲確診之后到三十歲為止，謙二都在結核療養所中度過。

## 一、失去一半的肺葉

謙二被告知罹患結核病后，向新潟市的制版公司辦理停職，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中。接著申請進入國立的結核療養所，入所前先在自家過了約三個月的療養生活。“父親從過去就沉默寡言，當告訴他自己患病的時候，他也只說了一句‘這樣啊’，之外就什么都沒多說了。”

謙二給住在岡山的伊七與小千代送了封信，之后才聽說當初信送達后，該封信也讓居住在主屋的大家看過，每個人都嘆息“這該怎么辦才好”。“寄托給伊七與小千代的外孫們都患病過世了，最后活著的一個，好不容易才從戰爭中活著回來，結果又染上結核病。似乎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

在割野時，謙二每兩周到附近的診所去看一次醫生，進行氣腔療法。所謂氣腔療法，就是從體表插入針頭，在遭結核菌入侵的肺葉與肋膜之間打入空氣，把病灶連著肺泡一起銷毀的治療法。那個時代肺結核的特效藥還未普及，治療手段也很有限。謙二周圍有的治療方法，除了補充營養、靜養、轉移到療養地之外，就剩下外科手法。

當病情較穩定時，謙二會到附近散步，讓身體活動一下。不過當時，特別是在鄉下地方，大家都把結核病當作“絕癥”，深感恐懼。附近的農民害怕遭傳染，都不敢接近謙二。謙二無可奈何，只好在自家門前的河堤上沿著河川步行。“走在河堤上，從旁經過附近居民聚集處，之后就被父親警告‘不要太接近那些地方’。因為附近的歐巴桑（大媽）告狀說‘小謙鐵青著臉色，讓人毛骨悚然地走過去’。”

一九五一年六月，謙二搬入位于新潟縣內野町的國立內野療養所。新潟縣也有屬于基督教會系統的民間療養所，但位于內野與柏崎的則是國立療養所。

其中柏崎療養所的前身是設立于一九三九年的戰傷軍人新潟療養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移管給厚生省，改為結核療養所。而內野療養所則設立于一九四一年，原本為新潟縣立結核療養所，一九四七年也移管給厚生省。換言之，在二次大戰的“全面戰爭”之下建造起來的醫療設施，成為二戰之后結核療養所的緣起。



在結核病療養所中（一九五一年攝）

不管是內野還是柏崎，都是不具產業的地方。其中柏崎與青森縣下北半島并列，日后吸引了核能電廠與自衛隊基地來此地建置。

結核病療養所屬于“不受歡迎的設施”，大家都不希望設立在人群聚居的地方。內野療養所靠近海岸邊，遠離農村，是一處只能看到沙灘與遠眺郁金香花田的偏僻處。

附近的農民任誰都不愿靠近療養所。漁民偶爾會來賣魚，不過都一副不想被人看見的模樣，掩著鼻子，一種為了賺錢不得不來賣魚給結核病患者的感覺。患者們也從窗戶遞出鍋，借由鍋取魚完成交易。

前往療養所時，謙二與父親二人搭著“越后線”，從內野站下車后步行約十分鐘，便抵達療養所。謙二對父親說“那我進去了”，雄次只回了一句“知道了”。

謙二說“療養中的醫療費怎么來的，我已經不記得了”。不過，一九五〇年五月日本修改了《生活保護法》，一九五一年三月修改了《結核預防法》，此二法修正都影響了謙二的境遇。

《結核預防法》制定于一九一九（大正八）年，自一九五一年修正后，基本方針改為禁止結核病患者就業，并要求進入療養所。為了避免傳染給周圍的人，都道府縣的知事禁止結核病患者就業，并下令患者必須進入結核療養所。

入療養所后，除非醫生認定已經痊愈，否則禁止離開。相對的，進入療養所的患者其診察、治療費用，如果監護人提出申請，全都由道府縣政府負擔。

這種將患者隔離收容與扶養的原則概念，幾乎與一九五三（昭和二十八）年制定的《麻瘋病預防法》一致。與二戰前必須自行負擔治療費用的結核患者狀況相較，病患的經濟狀況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另一方面，遭到社會隔離的病患陷入“養到死”的狀態，經過數年的長期收容后，逐漸喪失社會性。療養所內的人權狀況逐漸成為問題，一九九六年先廢止了《麻瘋病預防法》，二〇〇七年則廢止了《結核預防法》。

謙二記得為了支付療養所內的生活費，接受了政府的生活救濟補助。一九五〇年修改后的《生活保護法》新設了國籍條件，必須擁有日本國籍才能獲得救濟補助，同時廢止不保護品行不良者等不合格規定，采用擴大救濟范圍的方針。實行此一修正案的一九五〇年，厚生省年度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六都花在支付生活救濟補助上。

謙二接受生活救濟補助獲得的生活費，依當時規定為每個月六百日元。岡山療養所的結核病患者朝日茂認為該金額侵害憲法第二十五條“享有健康而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權利”，于一九五七年提起訴訟而廣為人知。

在這項訴訟中，依據原告的主張，每個月六百日元連購買營養補充食品的生雞蛋都不夠，一年買不起一條內褲，兩年買不起一件內衣。這個被稱為“朝日訴訟”的案子，于一九六〇年一審判決被告方勝訴，一九六三年二審時遭駁回，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因原告死亡而裁定訴訟終了。

謙二說：“有關朝日訴訟，我是一九五六年出院之后才從報紙上得知。提出訴訟應該是必然的，我自己在療養所時，沒扔過一件衣服，必須保留一直穿用。”針對如何利用生活救濟的過程，謙二則說：“我不記得如何得知這套制度，醫生不至于說明到這種程度。或許是在確診罹患結核病的新潟大學醫院窗口得到介紹，也有可能是地區的民生委員會告知的。”

在療養所大概有四百名患者，六棟病房，編號上避開不吉利的“第四病棟”，第一到第五棟屬于舊大樓，第六與第七棟則新蓋好不久，恐怕是因為《結核預防法》修正后，面臨可能會增加隔離收容的患者，作為對應處置的一環而增建病房大樓。謙二遷入的便是新建的第六棟。

謙二在戰爭之前曾為了探望哥哥輝一去過一次結核病醫院。當時負責照護病人周遭事務的“護理婦”（大多是中年女性），一般而言都是患者自行付費雇用的。制度變革后，在內野療養所中不容許私人付費的護理婦，改由護士巡視病房。

病房為八人房，與謙二同寢的患者，計有兩名教員、兩名警官、一名勞動基準監督官，以及兩位其他病患。其他的病房也類似如此，在第六、第七棟新設病房中，大部分都是教員與公務員。療養患者年紀大多在三四十歲，像謙二這種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并不多。

日本的社會福利行政，采取由個人提出申請后才能利用福利制度的“申請主義”，只要不知道資訊，沒有進行申請，即便有這套福利也享用不到。內野療養所中教員與公務員占多數，原因之一可能是公務員們更容易接觸到這些新制度的相關資訊。沒有這些公家機關資訊網絡的貧困者，時間與生活上都缺乏余裕，即便國家有這套制度，許多人也不知道相關的利用訊息。

謙二進入療養所之后，大概接受了一年左右的PAS（對氨基水楊酸，Para-Amino-Salicylic Acid）與Tb1新藥治療。PAS容易造成胃腸不適的副作用，不舒服時只能先停止服用，等副作用過去了再重新開始。

謙二進入療養所的初期，正當結核病治療的摸索階段。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作為特效藥的抗生素鏈霉菌素（Streptomycin）開始臨床應用，但在此之前只有類似PAS之類的化學藥劑運用于治療。

以盤尼西林為嚆矢的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式開始采用。抗生素與雷達一樣，都是同盟國的新技術，在傷兵治療上發揮了絕大效用。盤尼西林在二戰之后也在民間使用，在戰爭中的一九四三年分離出了鏈霉菌素，并在戰后上市，成為有效對抗結核菌的抗生素。但在一九五一年的日本，此藥品仍屬于貴重藥物，謙二說“不可能輪到我這種偏遠地區的貧困患者”。

謙二吃了一年左右的化學藥品，緩和了病情的進展，并在一九五二年接受了胸廓成形外科手術。此手術使用與氣腔療法相同的原理，與利用鏈霉菌素等內服藥殺死結核菌不同，而是把遭結核菌入侵的病灶以外科手術的方式完全去除。

因為與氣腔治療類似，應該從過往就有這種手術的想法。恐怕戰爭中外科手術更加發達，而因為利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阻止感染化膿，醫生得以施行更大型的外科手術，類似去結核菌的大手術也得以實現。

只是，去除遭結核菌感染的部分，自然會縮小肺臟，降低肺活量。患者術后體力必定會減弱。外科手術中必須切除肋骨，當病灶肺葉去除后，只會再生如細枝般的細骨，結果便是在患者背部留下大片傷痕，并且導致身體歪曲。

換言之，接受外科手術，等于只能剩下一片肺葉。即便如此，這仍然可以治療被稱為絕癥的結核病。

接受手術后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我自然知道。但在醫生的推薦之下，為了讓病情有所進展，最終還是下定決心同意接受手術。這項手術只采取部分麻醉，且切除七根肋骨，右側肺葉幾乎全遭摘除，當醫生拿著鋸子切割肋骨時，實在痛不欲生。

對醫生而言，這等于在嘗試新的療法，帶有一種實驗的性質。因為只有部分麻醉，所以手術中可以聽到醫生們的對話。前輩的醫生們，對施行手術與旁觀的后輩醫生們說：“這樣子可不行！”有許多指導性對話。如果支氣管已經遭到結核菌侵襲，即便動手術去除病灶，也不具什么意義，因此在手術之前得先使用金屬內窺鏡插入支氣管內檢查。這也是個不怎么靈光的年輕醫生，一邊聽前輩的指導一邊操作，弄得我又嗆又痛。

順帶說明，從隔年開始，可以切除更少的肋骨便完成肺葉切除手術。之后抗生素上市，便無須再使用此類手術。這項手術等于是“曇花一現的治療法”，只有一部分的人在短暫的幾年間接受過這種外科治療。其中在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飾演電影《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

即便出院回到社會上，受過這項手術的人，一看便知。一側的肺葉遭到摘除，該側的肩膀下垂，另一側的肩膀也稍微提高。在我待的療養所，大概是我接受完手術后的第二年，才開始出現鏈霉菌素治療。如果抗生素治療早一年出現，我就不需要接受這項手術了。

手術之后，耐心服用PAS與鏈霉菌素。療養所每個月都會定期對病患采痰培養，檢查是否仍存有結核菌。如果一整年都沒檢查出結核菌，大概就可以準備離開療養所。



手術后的謙二，身形已有了改變（一九五二年攝）

可是如果仍然帶有結核菌，根據新的《結核預防法》，不論過幾年都無法離開療養所。而手術后過了半年左右，謙二的痰里又驗出了結核菌。

即便摘除了肺葉，仍檢驗出結核菌，等于說這次的手術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醫生安慰說：“耐心地繼續治療吧。”當時意氣非常消沉，之后除了一邊療養，繼續服藥，等到結核菌完全消除之外，別無他法。

## 二、最難熬的時期

此后直到一九五六年出院為止的四年期間，對謙二而言是“最難熬的時期”。一方面也是生活實在過于單調，“療養過程中的生活，幾乎沒有留下什么記憶。那是一輩子最低潮的時期”。

在西伯利亞日子也不好過，但總還有個“如果能回國”的希望。可是在療養所，即便結核病痊愈，對出院后的生活該如何繼續，完全沒有展望可言。出了院，既沒有技能又沒有體力，大概只能當個坐辦公桌的辦公人員。

而且在西伯利亞，大家都有同樣的境遇，有股同樣身為俘虜的連帶感。但在療養所因為患者的癥狀各有不同，我與公務員和教員的社會身份地位也不同，完全沒有連帶感。當被檢驗出仍帶有結核菌時，也沒有人過來說句安慰的話，也不曾一起討論過出院之后如何回歸社會才好。因為眾人的境遇皆不同，所以無法找出共同的話題。總之大家都避開太深入的談話，在療養所也沒有親近的朋友。

療養所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用餐后，便在床上靜養，或者做一點輕微的運動，都是一些病人理所當然該做的事情。因為不可以離開療養所，所以也不能到附近散步。要說有什么特殊活動，大概只是次數極為稀少，在療養所辦個煙火大會而已。

雖然有自由時間，但療養所圖書室的藏書，只有俳句或人生訓示之類的書。即便自己想購書，可是只靠一個月六百日元的生活救濟費，根本買不起。印象中自己只好找便宜的二手書廣告，買了一本高杉一郎寫的《極光的陰影下》，還記得那是一本講述西伯利亞拘留經歷的書。

醫院供應的餐點，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食用。這也屬于治療的一環，免費提供，營養上應該算是充足，但也沒留下什么印象。談不上美味，但感覺上比在割野自家吃的還好些。大家都希望吃點比醫院食物味道更濃的食物，有些人趁著五點之后醫生與護士不在的時間，瞞著留守的護士偷偷在中庭烤魚來吃。我想大概是自費從漁夫那買來的，似乎有些人的老家也會送來農產品。

病房也有報紙，通常是一份普通報紙、一份體育報紙，由病房的八個人共享。不過謙二說：“那時期的新聞大都不記得了，有印象的大概只有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休戰而已。”

在謙二接受手術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舉行了舊金山和會，締結了《日美安保條約》，但謙二也印象模糊。

我能夠理解主張全面講和的人的心情，但整個講和會議的結果，還是給人“這大概就是底線了”的感覺。關于安保條約，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副不太理解的樣子。但是發生了朝鮮戰爭，整個情勢看來美蘇之間的全面戰爭似乎也不可避免。大多數的人都覺得，弱小的日本不論再如何掙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

病房有個人專用的礦石收音機，為了不在病房中發出聲音，得戴上耳機聽。謙二聽的大多是NHK的廣播，特別是落語類（日本的一種傳統曲藝形式，與中國傳統單口相聲類似）的日本相聲節目，謙二相當喜歡落語，住在中野時還曾經去“廣末亭”聽過現場表演。

當時聽過《尋人》這個節目，主要是在尋找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親屬。但當時并不想深入思考這些事情，大部分時間還是聽《話之泉》或《二十扇門》這種娛樂節目。

有個叫作《S盤Hour》的節目，自己大概有十年沒聽過娛樂音樂了，因為從戰爭期開始到戰后這十年期間，幾乎都沒接觸過娛樂性音樂，聽到時覺得戰爭結束后受到美國影響，連輕音樂的調性也產生了變化。

當時謙二留下一張照片，是他在病房中彈吉他的樣子。彈奏的曲子，是二戰之前日本的流行歌，古賀政男作曲的《想念你的身影》。“拿著療養所的吉他，照自己的記憶彈奏，其他病患聽了之后說‘出院之后可以去當“那卡西”（流浪歌手），應該可以混口飯吃’。當然只是開玩笑的話。不過當時大家對未來毫無展望，就是到了這種境地。”

父親雄次大概每隔兩個月，會帶著雞蛋來探病，給謙二補充點營養。不過“父子間還是沒談什么深刻的話題。彼此之間也沒什么話好說”。而這段時間，雄二的生活卻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

正好在我手術期間，妹妹秀子因為某種緣故，辭掉了教師的工作只身到東京去了，而且消息不明。過了大約半年，父親才跟我說：“等你手術后的這個時機，才告訴你。”大概怕我手術中還掛心，或者因此感到難過吧。可是，父親在二戰之后失去了全部的財產，好不容易從戰場回來的兒子，過了兩年飄蕩的生活，竟然還患了結核病，可即便如此，他卻沒抱怨過一句話。不管什么事，他總是一口氣忍耐下來。

一九五三年年中，在療養所讀到《新潟日報》報導，有些巴西移民短期歸國的消息。借此謙二有機會了解姨媽美登里的消息。

如前章所述，美登里是小千代的次女，謙二母親的妹妹，她在二戰之前便跟著丈夫，帶著兩個小孩移民巴西，但二戰之后不管寫多少信過去，都沒有回音。

根據那篇報導，這些巴西移民回到日本之后，才首次知道日本真的戰敗了。留在巴西的人，甚至還有些不相信日本戰敗的消息。通過這個機會我寫信給那家報社，請對方如果知道我姨媽的消息，拜托能通知一下。在這樣的情況下，報社的人竟親自前來療養院拜訪。

當時，巴西的日裔移民們分成不承認日本戰敗的“戰勝組”，以及承認戰敗的“戰敗組”，彼此之間相互對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戰前的“神國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語，導致情報來源有限。在巴西兩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激化，甚至發生互相暗殺、襲擊的事件。

根據報社的人的說法，美登里的丈夫算是戰勝組的領導人，對于日本寄來的信件，都認為是美國的謀略，根本不閱讀就直接燒掉。戰勝組的人們好像對日本寄來說明戰爭已經結束的信件，采取不足為信的態度。

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為何美登里一直沒回信的理由。我仍拜托報社的人幫忙轉達留言給美登里，但之后還是音訊全無。從廣義來說，這也是戰爭撕裂人心的一個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岡山的伊七，因為腦梗塞過世了。當時同住在岡山的親戚們，寫信通知謙二這個消息。

回國后雖然有立刻去見外祖父，但沒想到竟然成為最后的訣別。分別之后自己也為了生活精疲力盡，沒幫上外祖父什么忙。不過外祖父已經七十八歲，而且戰爭之前就中風過一次，身體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齡過世，也算安享天年了。只有一直沒能與美登里取得聯絡一事，算是最后的掛念吧。

此外在療養所時代還記得的事情，就是內野療養所的患者運動。

結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運動，在全國性組織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領導下進行。該組織團結了過往存在的患者團體，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訴訟而廣為人知。

內野療養所內指導運動的是住在第七棟一位叫作佐藤勝巳的年輕患者。一九二九年生于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產黨系勞工組織運動家，從內野療養所出院后，還參與了抵制歧視新潟縣在日韓國人、朝鮮人的運動。他還參加了幫助朝鮮人返回朝鮮的歸國運動，之后因為對朝鮮的實際狀況感到失望，因而脫離日本共產黨，轉而投身幫助營救遭朝鮮綁架的日本被害者運動。

佐藤在療養所時代，隸屬于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并不顯眼，但靠著獨特的風采與辯才，成為內野療養所的患者自治會會長。謙二說：“我還記得佐藤拿著麥克風講話，以及彈著吉他高唱田端義夫流行歌《歸船》的模樣。”佐藤不僅制作報紙，還召開患者大會。

謙二受這個運動影響的方面，就是取得了身體殘障者手冊。除了謙二之外，還有許多手術之后對身體留下影響的人。患者自治會建議他們爭取殘障者手冊，謙二因而也提出申請，得到了第五級的殘障者手冊（共分六級，最輕微者為第六級）。

原本謙二并未參加運動，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認為“在狹小的療養所進行煽動演說，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亞戰俘營中進行民主運動一樣”。

在療養生活之中，父親雄次偶爾會來探病，除此之外謙二沒有其他客人。他不參加運動，在療養所內也沒有稱得上朋友的人，對未來也不抱期望。在都廳上班的早實時代朋友曾經寫信來過，除此之外不記得有其他來信。天涯孤獨又沒希望，問謙二是否想過自殺，他如此回答：“沒想過這種事情。不管在什么處境中，人永遠會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亞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殺那種事情，實在太對不起父親了。”

在這樣的生活中，手術之后三年之間，驗痰時結核菌總是時而出現時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總算穩定下來，結核菌不再出現，盼到醫生可能發下出院許可的時刻。

接著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謙二終于得以出院。雖然對未來沒有任何期望，但“離開療養所時還是感到非常開心”。

出院者離開療養所大門時，其他病患、醫生與護士們都會聚集起來，就像在監獄里也經常出現的場景一般，大家齊聲說“不要再見了”，這種歡送場景已經成為一種慣例。穿著唯一的一套西裝，拍一張留念照片也是慣例。出院時并沒人來迎接，謙二便自行返回父親住處。



慶祝出院，特地著盛裝拍照（一九五六年攝）

謙二此時已經三十歲了。他二十多歲的這十年期間，就在戰爭、西伯利亞與結核療養所中消磨殆盡。

## 三、無能為力的小市民

接近可以出院的時候，謙二獲準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尋找住處，也能為出院預做準備。但他已經失去半邊肺葉，又沒有什么技能，對于已經三十歲、不能再自恃年輕的謙二而言，還不知道自己接下來應該如何生活下去。

結核病患者當中，有許多出院之后仍因貧困與營養不良，造成體力衰弱又過度勞動，然后復發重回療養所的“回鍋”例子。他們在看不到未來的貧困生活下，過量飲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結果成為復發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療養所回歸社會后，便完全戒除煙、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狀況。謙二也想著，“總之要留心不要復發，萬一再次發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后一邊工作一邊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許多時候不得已仍得強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只剩兩千毫升，只要稍微勞動便會氣喘不已。”

雖然領有殘障手冊，但謙二屬于輕度等級，“搭乘國鐵超過一定距離后能夠獲得半價優待，大概就這種程度而已，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好處”。順帶一提，謙二這種等級在汽車購置稅與汽車重量稅上都可以獲得減免，不過等到他知道這個訊息，已經是二〇〇九年的事情，加上他之前并未申請減免，所以現在也無法享受這個政策。

出院之后，謙二先到剩下小千代的岡山。這是一趟前往東京與靜岡拜訪親戚的旅行。

到東京之后，他先與從新潟移住東京的妹妹秀子碰面。此時秀子已經寫信給父親，并在東京的學藝大學擔任職員。

在北海道、新潟、東京之間遷移，小熊家的成員都是所謂的“漂泊者”，對他們而言，已經沒有家鄉。雖然小熊家的本家在割野，但關系卻不緊密。況且新潟沒有什么好工作，也無法達成想要照顧雄次的目標。謙二與妹妹商量，希望不久自己也能在東京找到工作，至少可以照顧雄次與繼母，全家再次一起生活。

七年之后再訪東京，已經看不到戰爭災害的痕跡。謙二到東京的一九五六年，流行一句話叫“現在已經不是戰后了”，日本開始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因為石原慎太郎的小說而被稱為“太陽族”[[1]](#m1_5)的年輕人受到矚目，西武、東武以及三越等百貨公司都爭相在池袋開張。“我已經五年沒踏進這個大千世界，宛如浦島太郎[[2]](#m2_5)一般。與東京的繁華相較，自己就像是被挑剩的人一般落魄。”

在東京，謙二前往探望曾經寫信到療養所的早實時代的朋友，并逗留了幾天。

療養所待了五年，連社會規則都忘記了，來看朋友連伴手禮都沒帶，實在是很抱歉。他雖然也遭征兵，但只是在千葉縣挖掘了一些本土決戰用的戰壕，大戰結束后立刻復員，并在東京都廳上班。與他相比，自己在西伯利亞待了三年、療養所五年，好像只在各種拘留所或收容所中生活一般。

東京之后，接著謙二前往靜岡，拜訪在今枝火腿上班時照顧自己的同父異母的姊姊，以及在日本輕金屬上班的姊夫。一九五二年日本輕金屬在靜岡縣的清水開設了新工廠，姊姊一家人移居到靜岡。在姊姊家叨擾了幾天后，謙二動身前往小千代所在的岡山。

外祖母還是一樣住在離開主屋的小倉庫里。接下來兩個月左右，我再次陪著外祖母，一起居住在狹小的倉庫中，外祖母依然溫柔地叫喚我“小謙”。親戚們的生活雖然相當辛苦，但大家也知道我得了結核病，并非故意不照顧外祖父母，所以沒有擺出一副“你事到如今才跑回來，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態度。

雖說住在庭院一隅的倉庫，但主屋就是小千代的老家，小千代的妹妹也住在里頭。與日本剛戰敗的時期不同，目前生活多少較為穩定，而超過八十歲的小千代與妹妹的感情也很好。“既然已經在這里住習慣，外祖母年紀也大了，還是別再搬移住處較妥。這趟來看過外祖母，內心踏實許多，接下來只要擔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照顧爸爸就可以了。”

回到新潟后，謙二仍回住院前上班的制版公司工作。離開療養所之前獲準外出做些生活準備時，謙二回訪了一下公司，公司方面也答應讓謙二再回來上班。現在公司已經不再處理銷售燃料，專心于生意興隆的制版業務。然而，在這家公司上班也只持續了大約兩個月。

公司還是以辦公人員聘我回來辦公，仍讓我住在制版所二樓。可是老板卻愛上喝酒，隨意亂花錢，晚上喝醉了還會爬上二樓我的住處，要我一起喝。因為這樣，所以辭職了。我酒量很差，大概體質本來就不適合飲酒。

可是，辭職之后就沒了住處。離開制版所后，謙二找到一處聽說原本是水族館的二層公寓，租了其中一個房間。因為自己也沒帶什么家具，借了一臺拉車，自己把棉被搬運過來，一眨眼就算完成了搬家。

這個公寓，房東還提供早晚餐。房間大概有十疊那么大，不過入住的大概都是新潟市內來路不明、上不了臺面的人。從旁人的角度來看，我原本就是個“上不了臺面的人”吧。房客之中有一位學校的老師，大概算是其中最屬善類的一位。

辭掉制版所工作沒多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左右，偶然在新潟市街角遇到了療養所時代的熟人。他名叫原健一郎，是位立志成為作家的年輕人。通過這位年輕人的介紹，謙二找到了一份工作。

原的父親，原本是舊式中學的英語老師，因為在廣島受到原子彈轟炸的影響，在原高中一年級時便因為核爆后遺癥過世了。之后父親當醫生的弟弟收養了原，期望他未來也能當個醫生，提供他生活費。不過原本人卻志在文學，所以進了京都大學文學部。不過經濟上卻因此出現問題，后來他輾轉來到母親所在的新潟，不久又感染上結核病。在療養所內，原便在佐藤勝巳的底下，幫忙寫患者運動的新聞稿。

與謙二重逢時，原健一郎因為自己父親的學生是《新潟日報》的記者，通過這層關系，自己得以進入一家小出版社工作。雖說是出版社，不過就是采訪新潟的地方政界、財界名人，把他們自吹自擂的故事，做成數十頁的報導，并制成小冊子刊載其上，靠此賺錢營生。“好好寫出褒揚的文章，便可獲得對方的大量購買，還能讓對方愿意登廣告。內容則完全都靠原一個人撰寫。”

原與謙二碰面后，知道謙二住的房間很寬敞，便央求謙二讓他搬入一起居住。謙二答應之后，原就帶著自己的棉被搬入謙二公寓，開始共同生活。“原被房東趕了出來，眼下沒地方可住，另一方面我雖然有地方可住卻沒有工作。與原合住之后，也通過他的介紹在那家出版社獲得一份工作。”

那家出版社位于新潟市內，在社長自己家兼辦公室進行編輯工作。公司是兩層樓的民宅，一樓出租給商店，二樓的一個房間當作編輯室，另一個房間，則住著社長的兩個女兒與社長的姊姊。社長大概五十多歲，靠房屋租金與編輯工作討生活。他也是志在文學，原本就希望從事出版業。

我也試著撰寫有關出租車業界的故事，可是卻不像原寫得那么好，自己大概不太適合這種工作吧。制作名片時印上假名，應該說是筆名更恰當，結果就發生過這么一件事。某天與原一同前往一家公司索取廣告刊載費用時，該公司要求出示名片，出示后卻被對方質疑：“這名片上的名字，與通電話時報上的名字不一樣啊！”最后還是有領到費用，不過領到后兩人也趕緊逃離那家公司。

出版社的辦公室，經常有些來路不明的人進出。選舉的時候，這些人會往來各陣營的辦公室，接受對方的宴請，從他們口中聽到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不過倒是沒有見過黑道進出，也沒遇到過黑道。當時日本還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前期，大概黑道還沒開始四處鞏固自己的勢力地盤吧。

這段時期對謙二而言，是人生中少數例外、多少可以享受點樂趣的時期。

與原的職場、住處都在一起，下班后回公寓前，兩個人會在新潟市內漫游。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賭馬等，賭馬還曾經中過大獎。那時候全拿去請原吃飯了。還去過位于新潟市鬧街“古町通”上的“朵利絲酒吧”。我不能喝酒，算陪著去見見世面。

經濟高速增長的浪潮，也波及到新潟。新潟市內的百貨公司，也開始安裝過往沒有的自動扶梯。不過謙二的生活還是一如既往的貧困。

雖然去了百貨公司，說到購物，也只有為了抵擋新潟晚秋的寒冷，買過一件外套而已。外出服裝只有那么一套西裝，平常穿些什么完全不記得了，應該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衣服吧。衣服都靠手洗，內衣褲則沒那么常換洗。另外因為不能像住在療養所時期那般放任頭發亂長，所以還是會定期去理個發，大概就是這種程度。

新潟市內的街頭也出現了電視，但信號接收不良，所以影像總是亂跳，看不清楚，也不記得有熱衷于觀看運動直播的狀況。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與蘇聯恢復邦交，但謙二并沒有特別關心這件事情。一九五五年自民黨成立，與社會黨聯合，鳩山政權與石橋政權誕生，對謙二而言仿佛都是發生在遙遠世界的事情。不過因為身為“西伯利亞歸國者”，對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的新聞，還有印象。“一方面覺得蘇聯的鎮壓實在太過殘暴，同時也對蘇聯體制下，民眾可以自然發起抵抗感到訝異，畢竟根據自己過往的體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雖然這么說，謙二選舉時投票，照舊投給革新派的候選人。雖然不喜歡共產黨，但謙二更討厭日本的軍國主義與保守派。

當時記得的新潟政治家，是新潟四區的社會黨議員豬俁浩三。他以追查人權及貪污問題而聞名，也是一九七〇年創設國際特赦組織日本分部的偉大人物。在同一選區，另一方則是自民黨的田中彰治，因為私下販售國有土地、炒地皮等，有恐嚇與欺詐的嫌疑，正被追查中，大家給他起了個“放火喊救火”的渾名，解嘲他自導自演、從中獲利的行為。田中角榮，名字是聽過，但并沒那么引人注目。

國際特赦組織是一九一六年發祥于英國的人權團體，他們以其活動主旨是要求釋放遭不當逮捕、拘留的“政治犯”而為大眾熟知。冷戰期間蘇聯的勞改集中營也是他們訴求的對象之一。多年之后當謙二生活安定下來，也在一九八〇年代加入該組織，在組織附屬會報上持續撰寫要求釋放“政治犯”的信件，不過那是后話了。

一九五七（昭和三十二）年二月，二戰開戰時的商工大臣、原本是A級戰犯的岸信介成為日本首相。可是苦于生活的謙二只留下這樣的印象：“只感到厭惡，好像反動派大張旗鼓反撲的感覺，而自己身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卻完全無能為力。”

另一方面，謙二上班的出版社，在他進公司大約四五個月后也開始苦于資金不足。“工作內容本來就馬馬虎虎，加上新潟這行的市場規模很小，所以難以持續。”反復地換工作與公司倒閉，這就是中小企業勞動者人生路途的最佳寫照。

一九五七年四月左右，謙二辭去了出版社工作。通過職業介紹所的中介，他受雇成為一家工具店的事務員。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產生了許多中小型工廠，特別是汽車零件工廠增加數量最多。這家工具店就是在這些中小型工廠間跑業務，銷售扳手等工具爭取訂單。

工具店由社長、謙二以及四個業務員組成，一樣苦于資金周轉。公司設在一戶兩層樓的房子里，一樓是倉庫，二樓是辦公室。謙二照樣與原合租一處，只是自己改到這家工具店上班。

但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謙二辭去了該工具店的工作。離開的理由，則是自己盜竊被發現。

利用自己身為辦公室職員之便，偷了公司的錢。雖然自認是個認真的人，卻還是敗給金錢的誘惑。不過，也只是偷了一張百元鈔。社長似乎有所察覺，對我的態度有點改變。雖然沒有直接追究，但繼續待著氣氛也很難受，所以便辭職了。

在某種意義上，這也算是個“時機”吧。謙二正好趁著這個機會，離開新潟前往東京。那期間，在雄次割野家中的繼母，因為衰老，也是風中殘燭的狀態。

這樣下去，留在新潟也沒什么發展。為了能夠與父親同住一個屋檐下，只剩下前往東京打拼一途。在東京還有妹妹秀子，而且她工作也有著落，靠著兄妹兩個人的薪水，總是能在東京找個據點，迎接父親前來團聚。

在東京的工作尚無著落，謙二先與妹妹取得聯絡，拜托能讓他借住一陣子，確保自己的住處。一九五六年五月離開療養所時，一直接受生活救濟，在這個時間點上自己完全沒有存款。“從離開療養所到前往東京的這一年期間，雖然有工作，但手邊卻僅剩一點錢。”

因為決定前往東京，所以也離開了原，不再共同生活。告訴原自己將前往東京后，原說了一句“就此別過了”。身邊幾乎沒什么行李，只有一些手持的物品，除此之外，就是把棉被一起送給了原。

辭去工具店的工作后，十二月中旬的某個夜晚，謙二從新潟車站搭上夜間班車，出發前往東京。雄次年紀也大了，沒體力到新潟車站來送行。工具店的同事們與謙二吃了頓餞行酒菜，之后順便到車站送行。離開新潟時，謙二已經三十二歲了。

[[1]](#w1_5) 譯注：太陽族一詞來自石原慎太郎小說《太陽的季節》，描述二戰之后出身富裕家族的年輕人，過著毫無節制、欠缺倫理，連情感也物質化的生活。“太陽族”指的便是與謙二類型完全相反的年輕人。

[[2]](#w2_5) 譯注：日本古代傳說中浦島太郎因為救了神龜而被邀請去龍宮游玩。回到地面后人間已過百年。

# 第七章 經濟高速增長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謙二只帶著手提行李，便從新潟出發到了東京。謙二已經三十二歲，既沒有特殊的技能，也沒有顯赫的工作履歷，手邊也幾乎沒有存款。接受結核病手術后只剩下半邊的肺葉，也無法從事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

前一年的一九五六年，社會上流行一句話叫“現在已經不是戰后了”。可是謙二卻說“完全沒有這種實際感受”。

電影變成彩色了，市面上也開始販售電視機，這種怎樣都無所謂的變化，我當然知道。但是自己的生活處于不安狀態，對于這些事情，也只是“即使改變了又能如何”這樣的感受。聽到“太陽族”這個詞，感覺上是跟自己完全沒有關系的話題。

沒有人迎接、獨自一人來到上野車站的謙二，前往位于武藏小金井站附近的東京學藝大學。他的妹妹秀子，目前正在此擔任職員。

## 一、下層的下層

東京學藝大學，是由東京原本的六所師范學校（教師培訓學校）合并，于一九四九年設立的大學。畢業自新潟師范學校的秀子，五年前從新潟來到東京，在此被雇用為職員。

謙二在學藝大學與秀子碰面后，沿著五日市街道來到妹妹居住的小平市喜平町。一邊借住在妹妹家中，一邊在東京找工作。“在農家庭院前搭蓋的兩層樓出租公寓，二樓的正中央是走廊，兩側有三疊大的房間十余間，秀子租用了其中的一間。其余大概還有一兩戶房客，幾乎都是空房的狀態。一樓除了一間既小又臟的廁所外，其余都是空蕩蕩的儲藏室。后方主屋住著農家主人，秀子在此處繳納房租，取得房東的諒解后，便讓我住了下來。”

當時小平市大部分都還是旱田，正在都市化的過程中，在這段經濟高速增長期的初期，周邊地價逐漸上升，這點謙二也曾耳聞過。

謙二與秀子一起住在三疊大的房間里，至于家具，只有放在窗邊的石油鍋爐以及一張小書桌。房子既沒自來水也沒瓦斯，生活用水需在主屋附近的水井打水，再搬到樓上倒入自己房間內的水缸中使用；煮飯則在石油鍋爐上處理；做飯后的生活廢水，直接從窗戶往外倒。

因為房間狹小，只放得下一套棉被。鋪棉被時一個人得先到房外等候，躺下時只能兩個人蓋一條棉被睡覺。

雖說是兄妹，三十幾歲的男女同蓋一條棉被睡覺的生活，竟然也過了四個月。煮飯不是用炭爐而改用石油鍋爐，是唯一與戰爭前不同的地方。做飯都是靠秀子，記憶中沒吃過什么好東西。早上因為沒時間點火煮飯，大概都只吃吐司面包而已。

垃圾大概只有做飯之后的蔬菜屑，我們也沒訂閱報紙，而且當時的商品也沒那么復雜的包裝。垃圾不是直接丟出窗外，就是外出時拿到垃圾場丟棄。

那年的四月，繼母過世，秀子回到新潟去參加葬禮。我自己與繼母沒什么深厚的緣分，但對秀子而言，繼母卻是將她一手帶大的母親。回到新潟時，有人聽到她在東京住處的狀況，好像還說了句：“沒有自來水也沒瓦斯，這樣也算在東京嗎？”可以知道即便從當時鄉下農村的觀點看來，我們在東京過的也是極度貧困的生活。

戰敗后的日本，租房業呈現衰退的狀況。發生衰退的背景在于戰爭時期施行修改后的《地租、房租統制令》《租地法》與《租房法》。因為全面戰爭的緣故，國家必須確保流入工業地帶的勞工能夠有房可住，但也因為這項房租限制，戰爭之后地租隨著通貨膨脹上升后，房租卻無法隨之上漲，無利可圖之下導致租房業無以為繼。

后來，日本政府廢除了戰敗后對流入都市人口的限制，當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后，大量人口流入東京，因而導致東京人口過度密集，住宅不足的情況進一步惡化。

隨著經濟高速增長，民間租屋的供給雖有增加，但根據一九六五年的調查，東京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勞工，平均居住空間不滿三疊，十七至二十四歲的勞工有五成寄宿在工廠宿舍。[[1]](#m1_6)

換言之，謙二來到東京時，正好是東京住宅租賃狀況最差的時期。而且他們的居住狀況，更是惡劣中的惡劣。

我們的住處，恐怕是戰敗之后居住條件極度惡劣的時期，農家蓋來作為出租用的房子吧。沒有瓦斯也沒有自來水，甚至連公用廚房都沒有的租屋，在這個時期已經鮮少有人愿意來住，所以大部分都是空屋狀態。

無論如何，謙二在工作有著落之前，先在學藝大學打工，大約整理了兩周的文件。工作內容很簡單，只是拿鉆孔器在文件上打孔，再以線穿過綁起。“公家單位的工作，沒有勞動基本定額，工作非常悠閑。”

對謙二來說，這是他首次踏入大學這種地方。經濟高速增長期之前的文章，許多都把大學教授與大學生描寫成生活悠閑的特權階層，一般人面對他們都帶著自卑感等等。但謙二說“完全沒有那種感覺。可能對我而言那完全是另一個世界吧。我處于‘下層的下層’，根本沒想過要跟這些人比較”。

因為戰爭與西伯利亞拘留而失去了大企業的工作、年輕時又罹患過結核病的謙二，并沒想過自己能有離開“下層的下層”的機會。“日本的社會，脫離過正軌一次之后，就永遠無法回歸了”，這是當時他對社會的率直印象。

但從結果來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仍給謙二帶來了正面的影響。當日本社會全體向上提升之際，謙二偶然抓住了一個新興的商業機會，這也決定了他后半生的境遇。

## 二、最重要的是判斷誰有權限

謙二抓住的契機，是在一九五八（昭和三十三）年一月，被“股份公司立川商店”這家新興公司雇用。負責該公司體育部門的是一位叫高橋的人，當時正好在東京學藝大學跑業務，進而認識、雇用了謙二。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初期，首先開始流行登山，其次便是滑雪。在此之前提起運動，直覺那就是中產階級以上的活動。一般大眾根本與專用體育用品無緣。

但在經濟高速增長之下，擁有某種收入程度的階層，便開始過起大戰之前中產階級的生活樣式。一般的勞工階級也從戰前的《少年俱樂部》等雜志上，得知一種極度理想化的都市中產階層生活方式。

在少年少女雜志的插圖中，也描繪中產階級的家中，客廳擺設著鋼琴、吊燈與沙發等家具，書架上擺滿百科全書，平常享受高爾夫與滑雪的生活狀態。勞工階層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模仿對象，當他們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獲得一定的收入之后，便開始購入各種必要的商品，來實現這種想象中的生活樣式。

雇用謙二的高橋，本身是立川商店的休閑運動用品銷售主管。高橋的工作內容是以擁有穩定收入的大學教職員為行銷對象，在大學內舉辦用品展示會，吸引他們購買。

秀子曾在出生地佐呂間滑過雪，因此跟高橋聊了聊，接著秀子也順便提起謙二的事情，這也為謙二進入立川商店提供了契機。

高橋畢業于法政大學，當時大概四十歲，過去好像是網球選手。網球這種運動，在二戰之前只有學生參與。戰爭結束后他自己經營了一家體育用品店，卻因為支票跳票，連夜逃跑了，聽說有兩三年時間行蹤不明。等風頭過了之后他才出現，到立川商店上班，擔任體育部門的主管，雇用我的時候正是這個時期。那個年頭隱藏自己行蹤數年、躲避批發商與交易客戶借以賴掉賬款的行為，不在少數。

立川商店的公司位于東京都立川站南口，僅需徒步數分鐘即可抵達的精華地段，是一棟兩層樓的建筑，二樓住著社長一家人，一樓則為店鋪。大概有十名員工，以販賣文具與辦公用品為主。女性員工包含了社長夫人與社長長女共五人，她們擔任店面銷售人員也兼任辦公人員。其他的男性員工則負責外出跑業務。

社長名叫渡瀨萬里，大概五十五歲，是一路磨練上來的甲州商人[[2]](#m2_6)。員工中許多也都是甲州出身，很多看來都像是社長的學徒。社長在甲州被視為成功人士，因此雇用不少地方上的親戚與朋友。不過社長并沒有參加縣的同鄉會，而且聽說戰爭之后他還是共產黨員，“是相當粗暴的一個人”。

立川商店靠著業務員在外推銷文具與辦公用品，通過這樣的商業手法獲取成功。那時的文具店不少，但大多都是在店鋪等顧客上門購買。不過渡瀨社長卻派出業務員前往市區公所、學校與各企業等看來會有大量需求的單位推銷，如果能夠在某單位接到大額訂單，還會提供優惠折扣，采用這種方法搶攻市場。這種策略，一方面除了延續日本傳統的“御用聞”[[3]](#m3_5)手法，在當時也算是一種少見的銷售手法，甚至可以說是文具販賣業的創業投資公司。

立川商店通過這樣的經營手法獲得急速成長。此外，需要大量文具的單位，通常也需要體育用品，加上當時對體育用品的需求處于不斷上升的時期，社長為了展現新的經營態勢，創立了體育用品銷售部門來專攻這個領域。而社長為了達成這個目標選擇雇用的人員，便是高橋。

至于進用謙二，則是先由高橋進行判斷，決定采用后才取得社長的認可，以這樣的形式錄取。這種任用形態雖然與大企業由人事部決定采用何人的方式不同，但在中小企業中卻不乏其例。

在歐美系統的企業里，如果需要雇用車床工人或會計等這類專門人員，應先由工廠的第一線負責人判斷“我們需要一位車床工人”，之后企業人事部再追認這個需求，這是歐美企業的常態。從這層意義來看，日本大企業人事部統一采用剛畢業的人，之后再分配到各部門去訓練任職，這種做法反而是一種少見的特例。

謙二前往立川商店一看，店面陳列著滑雪用具與棒球手套，但主要的銷售方式仍然依靠業務員跑外勤。謙二是急速擴大的體育用品部門第二個雇用的人員，月薪約一萬二千日元，比當時剛畢業的大學生起薪稍微高些。

謙二沒有業務行銷經驗，原本也不是運動選手，對運動不關心也沒有相關知識。為何能被雇用，謙二如此說明：

外勤業務需要從客戶那邊收取、處理金錢，所以身家經歷清白的人更受青睞，大概因此才雇用我。后來社長還曾經說過：“當我看到小熊先生的經歷時，還認為大概不會堅持太久。”確實，立川商店后續聘用的外勤業務員，許多都堅持不下去。

不過謙二卻拼了命地工作，因為考慮到年齡等種種原因，這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機會。

立川商店的文具客戶主要以學校與市區公所為大宗。體育部門也先從學校開始推展業務。學校為了上體育課，所以有正式預算用來購買體育用品，而這就是他們搶攻的目標。

高橋負責巡回跑一橋大學、學藝大學等多摩地區的大學，謙二則負責開拓初中與高中，而他負責的區域包括了以立川為中心的國立市、國分寺市、小平市、昭島市等地區。

就這樣，謙二拿著體育用品型錄，通過電話黃冊查出各處的學校，然后騎著小摩托車到處拜訪。最初他騎乘的是山葉125cc的小型摩托車，后因載貨架過小，所以改換成富士重工的速克達（Fuji Rabbit Scooters，一款帶腳踏板的輕型摩托車）。一九六一年左右開始，再改為富士重工的微型面包車Sambar（Subaru Sambar）。

最初很不習慣這種外勤業務，特別是訪問學校的體育老師，通常得先通過閑聊打開話題。我不關心體育賽事，沒辦法聊這類話題，只好從“今天天氣不錯啊”開始。或者找屋內比較顯眼的東西，例如從問“這是什么盆栽？”開始。總之沒話找話說，但對方仍會感到困擾。當然也會遇到客戶趕人的狀況。許多老師都比我年輕，但也只能毫不在意地向對方低頭推銷。

對體育不關心，而且也沒打算學習體育用品的資訊。為了配合對方話題，多少看些報紙上的比賽結果。我是把這工作當作“飯票”，以這種心態跑業務。銷售的商品包括棒球用品與排球等。如果跟對方套好交情，體育老師可能就會說：“那，給我五個排球。”先訂購一些上課時的必需用品。我接著到總務處報備，繳交商品之后，再統一收取貨款。

一段時間后，我們終于累積出一定的銷售量，讓批發商出貨給我們時愿意提供一些傭金（營業獎金）。例如對某個批發商一年訂購一千萬日元的商品時，批發商就會提供百分之三到四的批發商價格折扣，從中能再切割出多少利潤，則由各商店自行裁量，如果獲得訂單，便在這個范圍內決定我們出貨時該給客戶打多少折扣。

當然，起初因為不習慣，遭遇到不少失敗。“最初開始跑外勤時，還發生過進入學校時遭事務長叫住，警告我：‘進出學校時要打聲招呼，這不是最基本的常識嗎！’結果當場向人家道歉。”“在校方看來，我就是一副來路不明的闖入者模樣吧。”另外也出現過與私立高中棒球隊隊長談妥，讓學生繼續訂購用品，但學生卻付不出款項變成呆賬的情況。

即便是這樣做生意，外勤業務也還是成功了。主因之一，就是這個經營方式相當罕見。“當時在這個地區，還沒有任何業者進行外勤業務推銷，只是單純地被動等待學校傳來訂單。自己到學校去拜訪時，許多學校都說我是第一個主動來推銷的人。”

主因之二，是謙二本身具有相當的觀察力。通過先前的描述應該可以看出，謙二不管是在地方社會還是在俘虜營，都能冷靜觀察周遭社會關系，擁有分析背景狀況的能力。以謙二的例子來說，雖然這不是在教育機構里學到的，但仍能活用于外勤業務上。

學校中能決定是否購入體育用品的，不是體育老師就是總務處職員。至于由誰決定，各學校狀況都不同，最重要的是判斷該學校的權限握在誰手中。如果權限握在體育老師手上，與老師套好交情就可獲得訂單。如果決定權在總務處，因為總務處沒有與商人見面的理由，所以得先與體育老師打好關系，再拜托“能否幫我轉告一下總務”。接著才前往總務處，告訴對方“因為老師已經這么交代了”，借此獲得對方認可。因為這是種官僚組織，所以不能得罪任何一方，否則工作便無法推行。

當然這種說法，本來就是業務員的基本行為準則，但腦袋中能夠理解，并在各種不同狀況的現場分析應用，那就是個人能力與適應力的問題了。

此外，外勤業務這種工作形態，對謙二的健康狀態來說，算是種幸運的方式。謙二的肺活量只有常人的一半，很容易喘不過氣，但跑業務只要能達成營業額度即可，可以依照自己的體力來調配工作。之后在外跑業務時，還能擠出時間午睡，這是謙二自我維持健康的每日常規功課。

自從交通工具換成小貨車之后，可以從自家帶著便當，把綠茶裝進保溫瓶中，在拜訪地用餐。用餐完畢還能稍事午睡。體力勞動的工作自不待言，即便店員或上班族都不可能有這種時間配置。吃飽飯后午睡，這是從結核療養所時期開始每日常規，現在只不過是延續了這個習慣而已。

當業務逐漸上軌道后，除了學校之外，也開始拜訪一些企業。小平市有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廠，主要生產半導體，擁有大量的員工。此外小平還有普利司通輪胎工廠，武藏村山市則有王子汽車（一九六六年與日產汽車合并，二〇〇四年工廠關閉）工廠。

王子汽車的前身，是在立川擁有工廠的中島飛機和立川飛機，與日立制作所一樣，在戰爭之前都屬于軍需行業的企業。日本的制造業在這個時期轉換為以民間需要為主軸，并呈現高度增長狀態，各處都接二連三設立新廠房。

這些工廠的廠區內有公司蓋的體育館。工廠方面把這個當作釋放員工壓力的福利政策，鼓勵大家從事運動。

當客戶是公司的時候，就與已經建立關系的立川商店文具部門一同進行行銷業務。在這些公司中有棒球社或排球社，這些社長從社員處收取社費，加上從公司領取的補助款，用于購買運動用具和制服。社長向人事部門說明，謙二等人便可獲取訂單。另外也有拜訪工廠福利科人員，與之建立關系，因而獲得體育用品訂單的例子。

當時的公司等地方，人際關系比現在寬松得多。一般來說也不需那么兢兢業業工作到深夜。從后來自己的營業經驗來說，大企業延長上班時間，大概是從一九七〇年后半開始的。我自己大概八點半離家上班，開公司車約二十分鐘到公司，下午六點半至七點左右回家。

這些工廠由當地雇用的廉價女性勞工撐起。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廠、日產王子汽車武藏村山工廠等，都因為一九六〇年代重大的勞工爭議而廣為人知。獎勵體育與福利一樣，都屬于勞務管理的一環。

工廠用地之外設有男性員工宿舍，我們在該處舉辦滑雪用品等的展銷會。大學畢業者是高級干部的預備人員，高中畢業生屬中級干部預備人員，他們各自有不同的宿舍。至于工廠員工，汽車工廠中男性較多，半導體工廠則多為當地聘雇的女性，從周遭農村的住處來工廠上班。

在工廠工作的女工并不稱“工員”，而與白領一樣都稱為“社員”。不過白領候補干部叫“事務職”，而工人則稱“現場”，實際上還是有所區別。

已經結婚生子的女性也在工廠工作，所以在日立武藏工廠的旁邊，就有被稱為“幼兒園”的托兒所。因為是公司私設的托兒所，未達政府規定的官方標準，所以不稱“幼稚園”而稱“幼兒園”，由二十五歲以上的單身女性擔任保姆。

女性員工之間盛行打排球。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廠的女子排球隊，在業余隊伍中算是強隊，相當出名。日本的女性工廠勞工們靠著排球，還在一九六四（昭和三十九）年的東京奧運中獲得金牌，許多人都知道當時還出現過一個別名，稱她們“東洋魔女”。當時正好就是謙二在這些工廠銷售體育用品的時期。

## 三、當時就是可以賣出這些商品的時代

在立川商店上班大概四個月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前后，謙二與秀子搬家了。契機是謙二跑業務時認識的立川市私立高中總務長，閑聊時問起了謙二家人與住宅的情況。“老實回答之后，對方竟然提議，在立川站與國立站之間有一處平房，問我愿不愿意免費去居住。”

那里位于現在立川站與國立站之間的空地，有單線鐵道通過。這條鐵路是戰爭期間日本陸軍還駐扎于立川機場時，為了從中央線鐵道運輸物資到機場而使用的支線。戰爭結束后該地成為美軍立川基地，美軍與立川飛機（之后改名為立飛企業，變成不動產公司）為了搬運物資，接續著使用。

通過這條支線運入的物資，大多是美軍戰機的航空煤油油罐車。一九六四年一月，油罐車在立川車站發生火災事故。當越戰正烈的一九六七年八月，新宿也發生油罐車大火。因而這些被稱為“美國油罐”的輸送列車，也成為反戰運動的反對對象。“當時有人發起居民運動，想在立川與國立之間增設新車站。自己租借的這個房舍位置，只要鐵路完工地便可高價賣出，所以地主暫時保持空房的狀態，房主并不想靠房租賺錢，愿意讓我免費居住，似乎只是圖個防止房子老朽而已。”

從至今為止的敘述來看，謙二從未通過房屋中介公司找住處。他或是通過親戚朋友，拜托對方讓自己留住或住在公司樓上；又或偶然之下聊起房子問題后獲得入住機會等等。這種狀況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前，在下層庶民之間并不少見。

去了一看，是一棟戰爭時期建造、可容納四戶人家的連棟長形木造房屋，房子已經相當老舊，門與鑰匙基本上都還在，但怎么看都很容易入侵。第三戶與第四戶已經因為老化半毀，下雨時會滲漏，沒辦法住人。

這連續四戶的第一戶，住著總務長在公司上班的兒子和正在讀大學的女兒。總務長家在更西邊的青梅，必須到東京市區上班、上學的兩個孩子嫌遠，所以才入住于此。但因白天家中沒人，這種老舊住宅又容易遭人入侵盜竊，總務長希望搬入的人最好能夠幫忙看守，因此才提議我搬來居住。

當時的立川基地，處于朝鮮戰爭與越戰之間的空檔，算是最安靜的時期。即便如此，飛機起降的噪音仍不少，讓人覺得這果然是在軍隊基地附近。特別是美軍外包的飛機公司，大半夜也會進行引擎測試，噪音非常嘈雜。

即便是這種狀況的房屋，因為免費，怎么都比謙二與妹妹當時居住的只有一間三張榻榻米大小的租屋強上許多。四月繼母過世，父親雄次一個人留在新潟，剛好可以趁此機會接父親過來同住。“這算是水到渠成，我們立刻就搬家了。秀子也說‘這樣很好啊’，贊成這次搬遷。當然我與秀子都得出門上班，所以白天只有父親在家，但這樣剛好也符合幫大家看家的條件。”

當年十月，從新潟把雄次請來。

父親把住宅與土地都處理掉了，因為是鄉下土地，大概也不值多少錢，我也沒問賣了多少。一家人終于可以住在一起，內心非常雀躍。家里雖有帶著傘狀燈罩的外露燈泡，卻沒有瓦斯與自來水。所以還是照樣得去屋外水井打水，以石油鍋爐煮飯。不過比起之前寬敞許多，也算小有進步。

大約在這時期，原本在新潟出版社工作的原健一郎也來到東京。他跟謙二一樣，都認為留在新潟沒有發展，為了趕搭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波潮，終于也來到東京。“在東京他也沒有住處，所以輾轉到我這里來，朋友有難應該互相幫忙，所以也讓他留宿了一周左右。”

另一方面，立川商店的體育部門急速發展。渡瀨社長干勁十足，根據謙二的說法屬于“沖沖沖的性格”。這位創業家型社長的信條是“我把柱子豎好。有柱子之后，房子就能蓋起來”，當時不斷提出各種可行的想法，持續擴大公司事業。

體育部門除了高橋、謙二之外，一九五八年三月聘了第三個職員，一位叫大木的人。他負責謙二擔當區域的更外圍，也就是府中市與調布市等地。

大木大概比我小十歲，是三兄弟的長男。日本戰敗之后沒多久，父親便過世了，為了幫母親，在雜貨批發店工作。聽說當他拉著人力拖車裝著雜貨、沿著青梅街道從府中走到青梅時，遇上了高橋。高橋的體育用品店惡性倒閉連夜逃跑時，讓妻子開了一家小雜貨店維生，而大木為了賣雜貨也出入過高橋太太的小店。

大木一邊這樣工作，晚上還到高中夜間部上課，當他進入立川商店時，正好在夜間大學經濟學系上學。與不關心體育的謙二不同，大木喜歡登山，朋友也教過他如何滑雪。謙二與大木兩個人一起負責東京西部三多摩區域，跑外勤業務推銷體育用品。

不過一九五九年開始，逐漸出現來自其他商店的競爭。

當謙二他們把業務范圍推廣到立川外圍時，等于打亂了各地從業者的商業領域。原本等著學校與各機關行號訂單的當地從業者，發現立川商店的業務員搶走了他們的訂單，也開始派出防御性的業務員。這時期開始，因為當地的同行們也開始跑業務，所以不能像當初那般不斷攻占各個下訂單的客戶。

不得已之下，謙二只好增加拜訪次數，并采取削價競爭的方法搶訂單。強硬的高橋社長，進一步雇用更多業務員，嘗試以擴大業務的方式與其他商店對抗。

比大木更晚期進入公司的業務員，便負責更外圍區域的部分。此時也開始做出更細致的分工，還有專門負責網球的業務員。但因高橋與我已經先開拓了不少區域，他們即便跑去更遠的地區也無法有效提升業績，加上和其他商家的競爭漸趨白熱化，提升業績難上加難。

在中小企業中，即便年資增加，薪水也不會隨之調漲，這是很普遍的狀況。立川商店雖是月薪制，但會依照業績增加獎金，這種系統會幫助有經驗的人提高薪水，也就是所謂的“成果主義”，不過“社長胸中自有一把尺”。“業績即便無法提升，也不至于要求業務員離職，因為如果自己察覺業績無法提升，對將來不抱期望，許多人自然而然就會離職。”

謙二在各處跑業務時，也把東京西部的道路都摸清楚了。這個時期立川的主要干道或干線道路開始鋪設柏油，其中連結橫田基地與立川基地的五日市街道和國道16號，屬于《舊金山和約》后專為美軍優先整備的所謂“行政道路”，柏油鋪設品質特別好。

一九五九年秋天前后，謙二在甲州街道發生了交通事故。

摩托車右轉前暫停時，遭到后車追撞，當時大家都沒戴安全帽的習慣。頭撞上地面失去意識，被扛到立川醫院。倒在地上的時候，好像聽到另一個自己站在遠處對我說：“喂！你為什么躺在那里！”當時發生重大車禍導致死亡的事件，數量好像不少。

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瀕死體驗”。如果因為這場車禍又留下新的后遺癥，謙二的人生又將跌回最谷底吧。

所幸，經過醫院診斷并無大礙。追撞謙二的一方也沒向警察報案，自行把謙二扛到醫院，付了醫藥費。“之后好像有送來慰問品。明顯是對方的錯誤，大概對方也自認問題搞大了可能不好收拾吧。當時大部分的人都沒有購買汽車事故保險，事故處理也相當馬虎。”

從這個時期開始，滑雪逐漸盛行，開始有人會到店面來買滑雪用品。不過那都是在大企業或公家機關上班、擁有穩定收入的“月薪族”男性，還沒到家人帶著小孩來選購體育用品的時代。體育部門仍然得依賴外勤業務。

因為競爭日益激烈，謙二他們為了促銷，也計劃辦理滑雪的游覽車觀光。當時提到旅行，大概就是團體旅游，都是公司招待員工前往箱根、熱海等風景名勝處游玩。去京都或奈良旅行還不普遍，至于滑雪團就更稀有了。

何況當時會企劃旅行團的旅行社本來就不多。日本的旅行公司，源自為了到高野山與伊勢神宮參拜而規劃的團體旅行，最早創設于一九〇五年的“日本旅行會”（“日本旅行公司”的前身），另外還有針對外國游客于一九一二年創設的“Japan Tourist Bureau”[[4]](#m4_5)。旅行社普遍提供規劃好行程的旅游團，尚得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

謙二自己到當時為止都沒有觀光旅行的經驗，只有在一九五九年前后，跟著立川商店的員工們共同出資，前往箱根度過兩天一夜的員工旅游假期而已。當時自然沒有通過旅行公司，而且為了節省經費，還是用公司汽車把大家載去觀光。

因此當時還找不到規劃滑雪行程的公司。不過隨著滑雪客的增加，各鄉下地方把這當作“可賺錢的工作”，陸續增設了滑雪旅館。雖然旅館與旅客彼此需要，但仍缺乏把雙方連接起來的服務。

提出這項企劃的原因，是大木從立川市的滑雪聯盟處聽說希望提供滑雪旅行團。從這個意見獲得啟發，謙二他們開始與旅館和巴士公司直接交涉，規劃起團體旅行。

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次出團，在謙二公司兩名員工的率領下，大概有四十人參加。“包括滑雪靴及其他一整套設備，參加者每人花了兩到三萬日元購買，算是相當不錯的業績。大概都是職場上的同事，幾個人一組共同來報名參加。”

當時既沒有網絡，也沒有旅館目錄，謙二等人既沒時間也沒預算先去查看旅館狀況，只能依靠電話聯系所有相關事宜。實際到達現場時經常發生與當初談妥的條件不同的狀況。

我們因為業務上的理由，計劃在季初的十二月前往。而我們預約的滑雪旅館是滑雪熱潮下正在興建中的旅社，對方答應十二月可以完成施工，但入住之后卻發生大雪滲入房間的狀況。又加上那次與我同行帶隊的年輕同事自己滑雪的時候竟跌斷腿骨，還得把他運到山腳下的醫院，那真是一次痛苦的經驗。

立川商店雖然是間小公司，不過還是有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險，那位年輕員工的醫療費用就從保險中支付。渡瀨社長原本是共產黨員，對這方面還相當留心。雖然如此，從醫院回到旅館后立刻傳來客房滲雪的抱怨，又趕去努力道歉，做后續對應處理，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時的狀況。

印象中當時的顧客，對于稱不上豪華也不至于讓人抱怨的餐點，似乎沒什么人埋怨“你們上的什么菜”之類的。應該沒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過自己并不覺得負責旅行是什么肥缺，我對滑雪完全不感興趣，幾乎沒下場去滑過。

日本的健康保險制度從二次大戰下的全面戰爭時期開始擴充，針對大企業與公務員等擁有經濟能力的團體，以“保險合作社”的方法開始推展。中小企業的員工們會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險，但未加入的企業也不少。一九五八年起日本施行全面修改后的《國民健康保險法》，并于一九六一年實現了全民皆有保險的目標。

這項巴士滑雪團只辦了兩年便喊停了。因為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潮流之下，不需辦理滑雪團也會有顧客前來購買滑雪用具。“帶團非常辛苦，大概做了五六次便不做了。來店面光顧的個人顧客逐漸增加，但最有效果的，還是到公司或工廠辦理展銷會。”

接在滑雪之后的，就是高爾夫熱潮了。“到各公司拜訪，利用口頭推銷爭取高爾夫用品的訂單。很多時候先向科長口頭推銷，接著課員們也會跟風一起購買。當高爾夫開始流行后，賣出了不少球桿、球桿袋、球鞋等等，這也是一項還不錯的生意。”

不管是滑雪還是高爾夫，都是一年只使用幾次，但卻需要昂貴工具的活動。“那就是一個能賣這些商品的時代。人們不會覺得這太奢侈了，購買時不會有抗拒感，大家生活逐漸好過，因此我們也能做些買賣。只是，我自己既不買這些用具，也不玩這些運動。”

當時的立川，從日本戰敗之后的美軍基地小鎮，隨著三多摩區域人口的增加，逐漸發展成附近的中心商業地帶。有掛著英語招牌的美軍專用酒吧，除了美軍之外，還可以看到所謂的“街女”，不過謙二倒是沒接觸過這些女性。

我晚上不會去這些繁華地段，即便看到這些女性，也只想，“啊，真的有呢”，僅此而已。我和體育用品、黑道都沒什么緣分，也跟那樣的人沒什么交集。

我沒想過向美軍推銷體育用品，或者以他們為對象跑業務。畢竟我們賣的體育用品全部都是日本尺寸。頂多就是偶爾會有美國人帶著一家人來買兒童用的棒球手套。另外只有一次，為了避免盛夏日曬來了一張訂單，要購買前后都有帽緣的棒球帽，當時只想“美國人真是講究實用”。

這個時期立川的農地已經逐漸減少，大概剩砂川地區還有一些。謙二在立川商店工作的時期，正好在“砂川斗爭”運動反對美軍擴張基地后，是美軍放棄基地擴張、斗爭告一段落的時期，因此謙二對基地擴張斗爭幾乎沒有印象。“飛機的噪音很吵，不過因為在基地附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也不太在意。”

## 四、搬入都營住宅

一九五九（昭和三十四）年九月，謙二再度搬家。他申請了位于東京都昭島市的低租金第二種都營住宅，抽簽之后獲得入住資格。因為這個原因，謙二終于脫離了居住上的困境。

當時是公營住宅的擴張期。日本的住宅政策并非由厚生省主導，而是由建設省管轄。因此與其說公營住宅是一種社會福利，其實這項政策更具有刺激經濟發展的傾向。這種傾向也表現在比起由國家擴充公營住宅，更鼓勵吸引民間投資用于新住宅建設的政策上。

不過在一九五〇年代，民間還沒有充足的經濟能力進行住宅建設。因此建設省為了提高住宅完工件數的實際業績，才催生公營住宅建設。這項為了解決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都市住宅不足這一問題而實施的制度，以及一九五八年導入的全民保險，都象征著社會福利政策的信念。

也就是說，當謙二搬入都營住宅的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段，公營住宅處于暫時性的擴張期，等一九六〇年代正式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后，倡導由個人自行負擔新建住宅的政策也正式開始實施，公營住宅規模也隨之縮小。

當時的都營住宅，依據所得不同分成幾類，謙二申請的是適用于低收入階層的第二種都營住宅。謙二能夠獲準入住，是因為正好遇上公營住宅擴張期所帶來的好處。

而謙二在體育用品業能靠外勤業務獲得成功，是因為在一九五〇年代后半這還算是新興經營模式，所以尚有發展可能。如果謙二提早五年或者延后五年來到東京，便沒機會遇上這股整體大環境上升的潮流。

謙二的上班狀態，在申請都營住宅入住許可時也起到了一定的幫助作用。根據謙二的說明，“因為跑外勤業務所以有機會進出公家單位，在閑聊之中偶然得知都營住宅的申請資訊。之后仔細看過報紙，發現已經公布入選者的名單”。

正如前一章的說明，日本的福利行政采用個人申請之后方能享受福利制度的“申請主義”。許多人，尤其是生活上或時間上都缺乏余裕的貧困者，無法得知相關資訊，因而無法申請利用。因著外勤業務能夠進出公家單位，也給謙二帶來相當的好處。

謙二申請第二種都營住宅時落選了兩次，直到第三次申請才于一九五九年三月獲選。但是獲選時該住宅仍在建設當中，所以等到當年九月才能夠實際入住。“還在建筑施工中的五月，我到現場看了一次，建地原本好像是農地，長滿雜草，那時周圍仍舊是農田。不是木造房屋，而是樓板房，這是當時留下的印象。”

提供免費房屋給小熊居住的私立高中總務長正好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突然過世。“他突然過世，代表著原本還住在青梅的妻子與小女兒，應該都會搬來西國立這幢房子居住。所以我們自己也考量，這下非得搬走不可。總務長的葬禮辦完，我們也確定獲準入住都營住宅，正式遷入之前只需先搬到一處臨時住處，于是便委托屋主，暫緩幾天讓我們找到臨時住居即可。”

一九五九年五月前后，他們搬到位于國立車站前沿著“中通”馬路旁一棟公寓的二樓。八疊大小的房屋沒有任何設備，不過有水槽與兩臺瓦斯爐的公用廚房，也有公用廁所。搬家時由公司部下騎著電動三輪車來幫忙。謙二、秀子、雄次三人，在此一同度過了三個多月的時光。

這是從西伯利亞回國以來，第九次搬家了。除去療養所的五年時間，平均一個地方居住時間不會超過九個月。無論用什么方式計算，更換工作次數都超過十次，平均在職期間大概只有半年多。

一九五九年九月，謙二終于搬入位于昭島市的第六都營住宅。“搬家時，立川商店的年輕人們前來幫忙。年輕員工不斷進入公司，自己雖然只待了三年，已經算是老前輩了。”

隔年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到六月，報紙版面上大幅報導反對“日美安保條約”斗爭的消息。對謙二而言，雖然與反對者有相同感受，但卻也覺得那仿佛是發生在另一個世界的事情。

參加游行的大概是工會的勞工與學生。自己因為工作緊張根本無暇休息，而且也沒想過要特意從立川跑到國會參加。原本我就討厭岸信介，《日美安保條約》怎么看都是與和平主義相反的產物。如果能夠在半路上遇到游行隊伍，我應該也會走入隊伍參加游行。

諷刺的是，第六都營住宅附近，就是依據《日美安保條約》駐留規定，由美國第五空軍駐守的橫田基地。都營住宅正好在美軍軍機起降航路的正下方，旁邊緊鄰的就是國鐵青梅線，噪音非常驚人。因為是新建的第二種都營住宅，因此不會選擇什么太好的地段。

第六都營住宅有點類似英國提供給勞工階級居住的公營住宅，以相同規格建造連續的四戶住房，住宅沿著劃分區塊的道路連綿興建，整個住宅區約有兩百戶，而周圍仍多為旱田。

謙二搬入的四連棟，鄰居分別是自衛隊隊員、警官與巴士司機。好像居住者都是下層公務員，或者約略相同階級且擁有穩定職業的人。謙二說：“住戶大多都是給人質樸善良感覺的人們。巴士司機與曾任巴士導游的人結婚。住在邊上那戶人家的男性，好像頭腦比較差一些，但下雪的時候就會不斷幫大家鏟雪，是個善良的人。”

一九六〇年左右為止，個人住宅若非“資產家”便無法擁有電話。一般人不是靠直接往來，就是有急事時利用電報或快信取得聯系。第六都營住宅的狀況，則是入住的東京都廳職員家中會有電話，并由住在這里的幾家人共同使用。這種都廳職員，在第六都營住宅中大概配置了三處供他們居住，當有打給其他居民的緊急電話時，他們便會通報居民來接電話。

大概這些都廳職員是被都廳選拔出來、負責照料全體居民的，應該也有給他們一些津貼吧。為了廣為傳布政府下達的政令，他們還組織自治會，也在都營住宅的空地上舉辦夏天的盂蘭盆會跳舞祭典。我因為工作忙碌，沒時間擔任這種照料居民的角色，自治會也是倉促間成立，我想也沒有什么通過大家投票選出的程序。

房子隔間只有四疊半與六疊兩間房，但廚房有自來水與水槽，有鍋灶也有鋼瓶式的瓦斯爐。數代人的房間都設有旱廁，之后還增設了可由柴薪或木炭燒水的浴室，也有一塊小庭園。雖然是適合下層民眾的儉樸都營住宅，但總算生活上有了安定感，謙二感到相當開心。

感覺終于找到屬于自己的住處了。雖然仍是租賃的房屋，但這是第一次住在無須配合房東、不怕隨時要被趕走的屋子里。雖然是筒子樓式的集體住宅，但與隔壁都隔著水泥預制板，與只有木板墻的老式筒子樓不同，聽不到隔壁的聲響。而且前后還有空間，感覺就像獨戶一樣。

不僅能與父親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而且住宅終于擁有瓦斯與自來水，父親也感到開心，終于可以從“下層的下層”爬到“下層的中層”了。雖然住宅緊鄰美軍基地與鐵軌，噪音很驚人，但也不能再多加苛求了。

謙二在戰爭之前租屋時就住過有瓦斯與自來水的房子。對謙二而言，他的戰后復興，終于在一九五九年完成了第一個階段。

搬家之后，飲食上不僅可以吃到魚肉，也開始食用火腿與香腸。謙二把公司的微型面包車停在都營住宅的空地，開著這輛車大概二十分鐘便可到立川商店上班。“當時住宅周邊有大量的棄耕空地，根本沒想過要租停車位。更何況，當時在第六都營應該無人擁有家用汽車。我的汽車也是公司車，可能有少數人也持有公司車，但在第六都營我沒見過自己那輛以外的其他汽車。”

搬家后沒多久便購入了黑白電視機。緊接著也買了沒有甩干功能的單缸洗衣機與電飯鍋。“在立川商店附近的電器行以現金購買。我不用分期付款購物”。

至于其他的家具，大概就只有衣柜、茶幾、木制的小書架而已。不過在謙二的印象中，“來到昭島之后，雖然只維持最低限度，但至少有些像樣的家具了。在此之前因為經常搬家，為了能夠盡快遷移，總是過著只有手提行李加上一床棉被的生活”。

房租兩千五百日元，搬入時謙二的月薪已經提升到一萬八千日元。在青梅線的昭島站前再過去就有一處市場，秀子即到此處購物。家中也能夠訂閱報紙，延續戰爭之前訂閱《東京日日新聞》的習慣，繼續訂閱同家報社改版之后的《每日新聞》。

停電的狀況不常見，但蒼蠅很多。放食物的盤子如果不罩上半球形的網罩，便會聚集大量蒼蠅。垃圾收集不完善，加上沒有下水道，都可能是原因。

當時東京人口激增，垃圾處理速度卻跟不上，只能將垃圾運到東京灣岸的掩埋場“夢之島”丟棄。第六都營住宅每戶外頭都有水泥制的垃圾箱，雖然有把垃圾載走的回收系統，但沒有分類，而且回收速度似乎也很慢。因為沒有下水道，所以定期會有化糞車來回收糞尿。不過“因為過往一直沒有冰箱，有食物便全部吃掉，而且當時沒什么包裝紙，幾乎不用丟垃圾，所以也沒感到太大的不便”。

## 五、結婚生子

生活問題告一段落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秀子的婚姻了。“雖然讓超過三十歲還單身的秀子工作回家后幫我們做飯，但仍然希望她能早日結婚。”因此，謙二也希望趕快結婚娶個太太，一九五八年連續相親了兩次，但結果都不如人意。“一位我不太中意，自己拒絕了。另一位的親戚是醫生，要我把肺的X光片寄給他看，送去了之后對方就拒絕這樁婚事了。當時感到一陣震驚，再度痛切感受到自己是傷殘人士。”

不過，緣分總是出乎意料。一九六一年春天，秀子帶了一位客人到第六都營住宅家中。那是秀子在佐呂間時期的小學同班同學熊岡寬子。謙二后來便與這位女性結婚了。

謙二時年三十七歲，寬子三十二歲。寬子是佐呂間小學校長的次女，已經結過一次婚，離婚后帶著一個五歲的兒子，名叫剛一。寬子的家人在戰爭結束后舉家遷往廣島，寬子把剛一留在老家，自己一個人到東京工作賺錢。可是寬子的父親于一九六〇年十月突然過世。“寬子的母親好像嚴格命令她，要在剛一上小學之前找到新的結婚對象。我自己也想找結婚對象，秀子也想離家獨立。剛好三個人的利害關系完全一致。”

以謙二的條件而言，說不上是好的結婚對象。與父親一起住在第二種都營住宅，就職經歷相當不穩定。實際上只剩下半邊的肺，健康方面也有很多顧慮。可是“對方的親戚們，因為母親非常著急，所以贊成我們的婚事”。

即便如此，寬子結婚后，洗完澡看到謙二背后的手術痕跡，聽說“看到嚇呆了”。“雖然有說明過，但大概沒想到這么嚴重，如果結婚前就知道的話，或許這樁婚姻就告吹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謙二與寬子結婚了。同一個月秀子搬出第六都營住宅，隔年一九六二年（昭和三十七）六月也結婚了。對象是過去一直交往的大學職員同事，秀子之后也繼續擔任大學職員。

謙二與寬子的結婚儀式，在東京都一處叫新宿生活館的場地舉行，謙二跑業務時從立川涉外勞動管理所的監督官那邊知道這個地方。這個立川涉外勞動管理所，是專為在立川基地工作的日本人基地勞工而設立的，屬于東京都勞動局的設施。

因為那是人進人出的場所，許多業務員都會前往推銷。在那里偶然與路過的勞動管理所的人聊起，對方說想要便宜舉辦婚禮的話，那地方很適合。我這邊的媒人是渡瀨社長，又邀請了早實時期的朋友、靜岡的姊姊等親戚若干，再加上父親與秀子。寬子方面的親戚，感覺總是比我們身份高一些。我這邊邀請的客人很少，所以連原健一郎也一并叫上了。

結婚儀式沒有采用任何宗教儀式。兩個人宣讀“結婚誓言”后，生活館館長再祝福獻辭，大概就是這種形式。在公共設施舉辦無宗教結婚儀式，日本戰敗之后某段時期相當盛行。

原本日本的結婚，只是兩家人碰面，開宴席吃飯而已，沒有什么宗教儀式。現在舉行的神道式“神前結婚式”源自于一九〇〇年當時的皇太子（之后的大正天皇）結婚時“創造”的宗教儀式。經濟高速增長后庶民的購買力上升，提供神道式或基督教式婚禮的場所逐漸多起來，之后類似謙二在公共設施舉辦無宗教儀式婚禮的場地，便隨之逐漸消失。

新婚旅行是到伊豆度過四天三夜的旅行。謙二的足跡雖然從北海道到東京、中國東北、西伯利亞、新潟，之后又回到東京，流轉過不少地方，但除了參加過一次立川商店員工旅游之外，這還是他首次個人旅行。“旅行回來后，秀子離開家里，家中換成了主婦進駐。”

結婚后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剛一的外祖母從廣島把剛一帶來，寬子到羽田機場去迎接他們。六歲的剛一或許因為長時間不在母親身邊，所以比實際年齡成熟，是一個相當伶俐的孩子。

雖然一切看來一帆風順，但“世間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寬子結婚后不久就懷孕，精神上陷入不太穩定的狀態。住處狹窄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我們決定先把雄次托給靜岡的同父異母姊姊照顧。

這位姊姊，過去與丈夫一家人住在新潟的日本輕金屬公司宿舍，謙二在新潟工作的時代，曾經跟他們居住過一段時間。之后姊姊一家人隨著日本輕金屬的靜岡清水工廠開設，一家五口一起搬入了靜岡的公司宿舍。

這位同父異母姊姊理解狀況，也愿意接雄次過去照顧，但公司宿舍過于狹窄，因此為了照顧雄次得另外租住處，需要一些時間準備。這段等待的期間只好把雄次暫時委托給住在山形的另一位同父異母姊姊。這位山形的姊姊還在喂乳時便寄養在其他人家中，但此時仍細心照顧生父，父女間仍有相當深的牽絆。



謙二三十六歲，寬子三十三歲，剛一五歲（一九六二年十月攝）

一九六二年七月，雄次在秀子的陪伴下離開了第六都營住宅，前往山形。十月，雄次在同父異母姊姊的長子陪伴下，暫時回到第六都營住宅，住了大約三晚，再度遷往靜岡。雄次從前年起就因心因性高血壓身體狀況不佳，如果沒有人隨侍在側，便無法長途旅行。

靜岡的姊姊特別租了一戶獨立的小房舍來照顧雄次。一九六四年五月，雄次因為腦梗塞離開人世，享年七十九。“雖然知道一直有高血壓的問題，可接到靜岡姊姊的電話，說父親身體狀況很差時，還是有些意外，匆匆忙忙地趕過去，趕到時父親已經過世了。整個人只感到一陣茫然。”當時東京正在舉辦奧運，但謙二說他“完全沒留下印象”。

無論如何，雄次離開之后，寬子的精神安定許多。一九六二年九月，產下了對謙二而言唯一的一個兒子。因為寬子已經帶來了剛一，所以給孩子起名為英二。第二年夏天，謙二帶著英二前往岡山，小千代看了非常開心地說：“這是小謙的兒子啊。”

身為校長的女兒，寬子十分熱心教育，會買圖鑒與繪本給剛一與英二，也會購讀《小學一年級生》等教育雜志。結婚之前母親寄給寬子的信件中，也寫到要為孩子們先存好上大學的學費。與伊七和雄次一樣，謙二的成長過程中并沒有接受過這種文化，都把孩子的教育交給寬子處理。

剛一進入昭島市的小學，很快就拿到優秀的成績。英二則開始在附近新開的私立幼稚園上學，因為附近尚沒有托兒所，寬子便在家專心于家事與育兒。謙二偶爾也會負責照顧英二，帶著小孩一起跑業務，不過這只限于寬子不得不外出辦事的時候。

一九六五年左右起，孩子們的生日會開始吃蛋糕點蠟燭。對謙二而言，這是他不熟悉的習慣。“戰爭之前的庶民，以虛歲為準，每次正月大家就往上加一歲。只有知識分子或上層階級才會慶祝生日。寬子的家屬于知識分子家庭，因此好像有慶祝生日的習慣。”

謙二因工作繁忙，賺來的薪水直接交給寬子，也不過問如何使用。寬子自己記賬，也存下一筆可以買下新家、搬出公營住宅的資金。

翻開寬子記下的賬本，一九六二年謙二的月薪大概是三萬多日元。不過金額并不固定，許多時候會晚一周發薪水。在薪水遲發時，也出現過家中只剩下數十日元的狀況。“渡瀨社長每當公司稍為寬裕時，立刻就想擴大事業。這種時候給員工的薪水就會遲發。英二出生的時候我向公司借了四萬日元。”

一九六二年時，小熊家一天的餐費大概是三百日元到四百日元。理發錢一百三十日元、房租每個月兩千五百日元、電費每個月五百到八百日元、牛奶配送每個月一千四百八十日元等。這一年比較大筆的支出，有吸塵器一萬一千二百日元、電風扇一萬日元、相機六千日元、剛一教育費兩萬三千七百一十三日元、英二出生費用兩萬一千八百日元等。不過這一年也騰出了郵政儲金五萬零兩百一十八日元、人壽保險一萬日元。

一九六二年小熊家的總收入，計有謙二的薪水四十萬八千四百七十七日元，以及謙二談成大生意統籌獲得報酬四萬日元、公司股票分配五千零六十一日元等，總計五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七日元。家庭生活支出四十三萬兩千四百一十六日元，股票增買一萬一千日元。“如果談成大筆的生意，批發商就會發獎金。保持立川商店的薪水之外，這部分就當作副收入。股票是寬子受在證券公司上班的弟弟影響，所以也購入一些。”

順著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生活上逐漸寬裕。一九六一年“休閑風潮”蔚為風尚。不過根據謙二的說法：“說是休閑，不過是在英二出生的第二年，使用公司廂型車Sambar，一家四口到羽村的河堤上看煙火而已。隔年則是到神代植物園賞花。簡單來說，就是不花錢的娛樂。其他就沒什么記憶了。”

即便經濟高速增長，但庶民生活仍然相當謹慎。一九六八（昭和四十三）年，舉行過“過去三個月體驗過的休閑、娛樂”調查，根據這項調查，排名第一的是讀書；第二為超過一晚的旅行；第三是手藝、裁縫（只在女性中擁有高得票）；第四是在自家飲酒；第五是看電影、戲劇。[[5]](#m5_4)

一九六〇年代，戰后一代的生活風俗雖然成為熱門話題，但就社會整體而言，當時仍是以類似謙二這種戰前一代為主導的年代。高速經濟發展期下的經濟循環命名，例如“神武景氣”“巖戶景氣”“伊奘諾尊景氣”[[6]](#m6_4)，以及把冰箱、洗衣機、黑白電視機稱為“三種神器”，等等傳統詞匯的使用，說明了這個時代的主要發言權、詮釋權，仍操縱在受戰前教育的一代手中。

一九六八年，居住于岡山的外祖母小千代，以九十一歲高齡過世了。謙二最后與小千代的見面，是在一九六五年帶著英二搭乘有臥鋪的急行列車到岡山拜訪的時候。迎來明治一百年之際，謙二的長輩世代全都離開人世了。

對謙二而言，在七歲到二十歲這段所謂人格形成期，陪伴他成長的小千代，算得上是他實質上的母親。葬禮依照當地風俗舉行土葬。幾年之后，為了遷入伊七于戰前在東京購買好的多摩墓地，再次把外祖父母的遺體挖出火葬。伊七與小千代的遺體都在地下腐朽了，只有小千代下葬時穿的化纖質地的壽衣完全未遭腐壞，很漂亮地保存了下來。

## 六、自立門戶

謙二的生活雖然逐漸穩定，但立川商店的經營卻逐漸出現問題，因為與其他商家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外勤業務已經難以擴展更多業績，再加上渡瀨社長采取的擴張方針有問題等等。

經營危機的征兆，大概出現在一九六一年剛落成的“高島屋百貨”開設門市時。當時立川的百貨公司只有伊勢丹一家，高島屋則聯合當地商家共同蓋了一棟五層樓的建筑。一直采用進攻型經營策略的渡瀨社長，提出用交租金的方式在高島屋百貨開兩家新門市，分別銷售體育用品與飾品，其中飾品商店由社長夫人負責。

但也因為如此，資金調度開始出現困難，接著就如小熊家的家庭賬本呈現的一般，薪水開始遲發。

如果是外勤業務，只需要針對銷售出去的商品進貨，一兩個月之內便可產生利潤并轉換成現金。但在門市售賣時，需要砸錢在門市陳列商品，但實際賣出之前，資金都無法回收。因此開張門市什么的會遭遇困難，我自己立刻知道。可是，社長無論如何就是先“沖沖沖”。

而在這種狀況下，體育部門的管理者高橋，與立川商店劃清界線，自己獨立創業了。在薪水不隨年資增加的中小企業界，長久于同一家公司工作沒有任何意義。通過進入公司學得一身本領，之后考慮獨立創業，是極其自然的想法。

高橋的個性比較剛烈，是自尊心很強的人。對于自己能把立川商店的體育部門擴大至此，心中有些自負情緒。逐漸地就與社長出現意見分歧，當薪資開始遲發的一九六一年，他與社長吵了一架后便辭職了。兩個人好像去喝酒，在那樣的場合下發生爭執。

高橋問我和大木，他要獨立創業，我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干。他似乎認為我們必定會跟著他離開。但我考量到，如果就這么跟著他離開，大概永遠會被他當小弟來使喚。另一方面他問大木：“你怎么想？我認為自己現在就獨立創業實在有點困難。”大木回答說：“我也這么認為。”所以當時還是選擇留了下來。

之后高橋在小金井開了大約三年的運動用品店，結果還是失敗了。他有太太與兩個孩子，之后完全沒有他們的消息。畢竟他是個人脈廣闊的人，應該還是有辦法解決吧。

立川商店的經營危機，隨著新門市經營上軌道后，暫時得到緩解。但一九六五（昭和四十）年，山一證券陷入經營危機，也出現了被稱為“證券恐慌”的經濟不景氣。而這一年的十二月，立川商店倒閉了。

倒閉的最直接原因，是渡瀨社長于一九六三年秋天，除了立川站南口的公司之外，又蓋了一棟三層的鋼筋水泥建筑。一樓與二樓當作倉庫與辦公室，三樓則是社長的住處，而這個舉動讓公司資金周轉再度陷入困境。接著又開始出現嚴重的薪水遲發狀況。

當初蓋樓的時候，原本以為社長內心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盤算。但與我交易的批發商卻問：“你們這樣沒問題嗎？”這個時期許多順應經濟高速增長發展順利的小店鋪，只要蓋起宏偉的公司大樓，資金周轉就會出現危機，接著就是倒閉。批發商會這么問我，大概因為他也知道這種狀況吧。

除此之外，倒閉的根本原因，還是出在社長一味只圖擴張的經營戰略上。跑外勤的文具業務獲得成功，接下來就是體育用品，然后是辦公機器，再接著是樂器，全都反復采用同樣的戰略。當在某個領域競爭對手增加，外勤業務效率無法提升時，就往其他領域進行擴張，不斷重復這種操作。接下來選擇樂器事業，某種意義上仍具有先見之明，但問題出在沒有先看清自己的立足點。

創新投資企業的進攻型經營，是否能押中賣點，差異頗大。如果是大企業的某個部門投資失敗，還能靠其他部門的收益彌補度過，但中小企業的情況，只要押錯一次，就是倒閉。

不斷重復貸款來擴張事業的戰略路線，等于手邊一直處于缺乏資金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還增建樓房，導致從東京奧運左右開始經常發生薪水遲發一個月的情形。從我進入時的十名員工，目前已經增加到三十人左右，人事費用大為增加。加上這次遇到不景氣與倒閉的外在狀況，公司經營肯定會出現狀況。

公司倒閉之前，謙二已經成為立川商店的“二把手”（Number Two）。高橋離開后謙二接手管理體育部門，加上有會計經驗，也負責資金的調度周轉。“一九六〇年左右雇用的會計，在一九六五年被開除。因為在增蓋公司樓房時從建設公司拿了回扣，被社長發現了。此后社長與他的長女一起負責會計，公司經營的最后半年，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只好出手幫忙處理會計業務。”

謙二為了避免公司出現拒付的情況，到東京市中心的大型批發商等債權者那里，懇求延期支付。立川商店對批發商開出的付款支票，延到下一次再行結算，也就是“跳過一次”的處理方法。

某個月的結算日，四處拜托可能愿意幫忙的批發商，請他們讓我們延遲。拿“因為長年的交情”這借口拜托人家，有些地方愿意幫忙，有些也愛莫能助。 接著，下一次的結算日快到時，趕緊又去拜托其他的幾家公司，這樣總共搞了兩回，簡直就是地獄啊。某個批發商的對口負責人是這行的老手了，看到這種狀況還對我說：“到了這種境地，還不如不要這么辛苦，干脆跳票比較好。”

這期間，公司員工開始對薪水遲發感到不滿。其中一個員工直接向立川的“地區勞動組合”（簡稱：地區勞）告發公司的狀況。接著在一九六五年夏天，當渡瀨社長在朝會訓話的時候，“地區勞”的活動家終于跑來談判了。

朝會的時候，以往都是社長的經營報告與精神訓話。社長也有過共產黨的運動經驗，所以能夠理解勞工運動，并且愿意接受“地區勞”活動家的建言，讓立川商店組成工會。不過工會組成之際，公司已經處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缺乏能夠運作的資金。

最終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謙二開始處理倒閉程序。“因為銀行已經來了通知，說明無法繼續延長貸款償還日期，而且批發商也說不能再接受欠賬的狀況。”

最終由主要交易銀行與最大的交易批發商取得主導權。他們已經得到立川站前公司房屋的土地抵押，其他小的債權者接著也取得了較小的抵押，剩下的也只能放棄催收欠款了。最后舉行債權者會議時，與主要債權者達成交涉協議，大勢便大致定了。

在東京市中心的批發商負責人，因為嫌太麻煩，不可能為了低額的債款特別跑來立川討債，所以放棄今后的債款追討。當時的中小企業倒閉，超過一個月之后，碰面聊起來大家就只會說句：“真是一場災難，吃足苦頭了吧。”然后理所當然地覺得專心致力于下一項可以賺錢的工作就好。

債務的優先支付對象，首先是員工的薪資，接著是稅金相關費用，第三便是銀行。這大概是這種情況的既定處理順序。銀行當然打著類似“朝廷錦旗”般冠冕堂皇的理由說：“銀行接受國民存款，除了稅金之外，也對社會負有責任。”而在我的努力之下，既不損及銀行，也能處理好其他債權事宜，銀行的對口負責人甚至對我說：“你們的倒閉處理得很漂亮啊。”

謙二幫著社長一家人，保住了“高島屋百貨”內的門市店鋪。因為他沒把高島屋開有門市的事情傳達給債權者們。雖然有些批發商知道這件事情，但這個門市店也抵押不了多少錢，所以也就“睜只眼閉只眼”，不多追究。

對我而言，我認為該門市還是由社長家族繼續經營最穩妥。家人自己經營，即便不付薪水也無妨。原本甲州出身的同鄉們，除了兩三個女性店員之外，大概都解聘了。換句話說，社長一家人繼續在火車頭上，后面的列車完全切除分離，大概就是這種狀況。

社長希望謙二繼續留在店里工作，但謙二拒絕了。接下來謙二與大木兩個人獨立創業，在一九六六（昭和四十一）年一月，謙二創立了“立川體育股份公司”。

立川商店或立川體育，雖然名稱上都是股份公司，但其實也只有名稱上而已。立川體育的股權持有者，就只有我與大木兩個人。只是像是給信用鍍層“金箔”一樣，新公司在名稱后加上“股份公司”字樣。立川商店倒閉時已將債權清理完畢，在銀行與大批發商之間建立了自己的信用，所以往后的交易也不成問題。

昭和三十年代后半（一九六〇年代前半）開始，商業秩序開始穩定化，與戰爭剛結束后不同，進入了頭銜說話的時代。換句話說，就是遞出名片自我介紹的時代。第一次做名片，是在新潟的出版社工作時，曾經以假名做過一次，在立川商店開始要跑業務時，才以本名做了名片。公司名稱需要加上“股份公司”，也是因為這種大環境風潮的緣故。如果只是印上“小熊商店”，既沒氣勢，也沒信用感。

謙二他們在離開市鎮的地方，租了個五米乘以五米大小的房子，開張了新的店鋪。此處只當作接聽外勤業務下訂單的辦公室，店面不展示售賣。謙二與大木把立川商店時代外勤業務部門的客戶，原封不動地接收過來。也就是靠著老顧客們的路線，獨立創業。“立川體育的新店面，距離社長一家人開店的百貨公司大概只有兩百米。還記得之后社長跑來喃喃抱怨的樣子。我對于其他人怎么想并不太在意，無論如何總得先求能夠活下去。”



謙二于一九六六年創立的“立川體育股份公司”

立川體育的員工，當初只有謙二與大木兩個人。一小段時間后，雇用了一位出身甲州，先前在立川商店工作的女性，請她擔任辦公人員兼接聽電話。謙二自己擔任會計經理，至于記錄與老客戶交易的賒銷賬簿，則請寬子幫忙處理。這位女性辦事員后來與大木結婚，變成兩個家庭聯手工作。而對兩位女性，也針對她們的工作分量，發給相應的薪水。

掌管外勤業務的兩個人，賺取的業績已經無須再與其他員工分配，等于是把立川商店時代不賺錢的部門都裁撤掉一般，自然經營上好轉許多。謙二的月薪，在立川商店末期大約有四萬日元，至一九六六年底已經拉升到接近十萬日元。

過了一年左右，這樣的經營達到一定的成功，便將公司法人化。自己開始新公司的時機非常好，如果再晚個幾年，經濟高速增長結束，很可能就無法獲得成功。即便繼續待在立川商店，為了照顧社長一家人只會累壞自己，而且永遠屈居人下，無法更上層樓。



體育用品商美津濃招待旅游（一九六六年攝于岐阜縣）

這期間，在第六都營住宅中也出現搭上經濟高速增長這班車與沒趕上這波潮流的人，彼此間開始出現經濟上的落差。謙二家在一九六七年申請了電話，一九六八年購入彩色電視機。附近來家中玩耍的孩子們，看到彩色電視機都驚呼：“有顏色耶！”

當時向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申裝電話時，因為申請數量大增，一直無法通過。何況要申請還必須從電信電話公社購入一定額度的電話債券。因為寬子在家幫忙會計業務，所以利用“立川體育昭島分店”的名義，以法人事業申請。大概在第六都營居民中，我應該是第一個擁有個人電話的。為了拉來電話線，甚至還特別立了電線桿。

但同時附近的鄰居，似乎也有人尚且買不起洗衣機，有些婦人只能拿著臉盆在房子前面洗滌。比實際年齡成熟的剛一，聽說有人把這個原本就是要提供給低收入居民的第六都營住宅稱為“貧民窟”。

此時剛好進入越戰最激烈的時期。住處附近的橫田基地，美軍的大型運輸機頻繁地低空飛過。起降時的噪音讓人無法聽清彼此對話，連電視機的畫面都會受到干擾。寬子的妹妹來訪時，帶著一個五歲的兒子，還曾被這種噪音嚇哭。“差了一歲的英二，從出生起就很習慣這種噪音，一臉若無其事的樣子，不過對外來的人而言，這種噪音音量應該非同小可吧。”

一九六八年，大學學生運動開始。對謙二而言，大學是另一個遙遠的世界。

日本大學的秋田明大等學生追究大學會計上的違法行為，應該是最初的發端吧。東大從醫學部要求改善實習醫生待遇開始，這部分我還理解，之后到底在吵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到后來，不管哪里都有新左翼的政黨加入運動，搞得一團混亂。

對于當時發生的事情，另外還留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曾在蘇聯戰俘營經歷過民主運動，我很清楚被那么多人圍住斗爭、批判是什么感覺。看到新聞報導后，想起了過往的回憶，心情很惡劣。”

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一月，謙二一家人搬出了第六都營住宅。因為在武藏村山市的新興住宅區“三藤住宅”中，已經蓋好了他們的新家。

“三藤住宅”是“東京都住宅供給公社”作為住宅地開發的區段。土地出售的介紹資料也傳閱到同為東京都經營的第六都營住宅，寬子讀了資料后，選定了搬家的處所。

如前所述，公營住宅的營建規模此時逐漸縮小，一方面也是為了刺激經濟發展，開始推行鼓勵大家自行購買房子的政策。謙二處理立川商店倒閉事宜時，在銀行間擁有相當高的信用，所以能夠獲得蓋新房所需的貸款。

鄰居的自衛隊員和巴士司機，后來仍繼續住在第六都營住宅。自衛隊員的家中好像有三個小孩，生活上大概很不輕松吧。巴士司機一家年紀還小的女兒，不慎跌落都營住宅的排水溝身亡。現在大概會上電視新聞，但當時這樣的事故卻層出不窮。

只靠老實工作想要存錢蓋一棟自己的房子好離開都營住宅生活，大概沒那么簡單吧。我只是剛好趕上這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機，運氣好罷了。搬離的時候相當開心，不過這種開心實在不適合表現出來，所以特別謹慎地收斂心情。我們應該是周遭最早搬離都營住宅的一家人。

武藏村山的新家，是盡量配合寬子期望而設計的鋼筋水泥建筑。當時謙二已經四十三歲，有股終于走到“大富翁”游戲終點的感覺。但這個新居不過只住了三年便放手離開了。當然，當時謙二還無法預知這件事情。

[[1]](#w1_6) 結城清吾，《過密·過疎》，三一書房，一九七〇年。

[[2]](#w2_6) 譯注：指出身山梨縣的實業家。

[[3]](#w3_5) 譯注：隨時候令為老客戶提供商品販賣服務。

[[4]](#w4_5) 譯注：直譯為日本游客局，是JTB的前身。

[[5]](#w5_4) 上村忠，《変貌する社會》，誠文堂新光社，一九六九年。

[[6]](#w6_4) 譯注：神武景氣（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巖戶景氣（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伊奘諾尊景氣（一九六五—一九七〇年）

# 第八章 戰爭的記憶

一九六九年一月，謙二新居落成，舉家搬出都營住宅。新家是一棟兩層的鋼筋水泥建筑，擁有屋頂露臺并附中央冷暖空調，可算是現代住宅了。

房子四室兩廳，有寬敞的起居室及和室房，兩個兒子都有個人單獨的房間。負責設計的是跑業務時認識的東京都職員的弟弟，一位在建設公司上班的設計師。

盡量滿足寬子要求設計的新居，安裝了吊燈與沙發。寬子非常開心。

## 一、“一億總中流”的社會想象

謙二搬家的所在地，位于東京都武藏村山市的新興住宅地，名稱為三藤住宅用地。這是由東京都的住宅供給公社購買農業用地，整合、統一規劃后分賣給民眾。

王子汽車自一九六一年起在武藏村山市開設了汽車工廠。但住宅區附近，仍留下許多農村的養蠶桑田與蔬菜田。“三藤這個地名，是將舊的兩個農村部落名稱連在一起，成為新的地名。電車沒有通過武藏村山市，交通不算方便，不過東京都的土地分賣大都如此。我自己開汽車到立川上班，沒電車不會有什么問題。兩個孩子剛好都入學，剛一上國中，英二進小學，所以寬子上午與下午各出席了兩個人的入學儀式。”

位于武藏村山的新家，在當時算是設計嶄新的定制化住宅。在大學剛畢業薪水約兩萬多日元的時代，記憶中這套住宅花了超過一千萬日元。但不隸屬于大企業、只開了一家小公司的謙二，不可能獲得銀行房屋貸款。“土地以現金購買。建筑的部分，從立川體育的交易銀行，也就是日本相互銀行（此后曾合并成為太陽銀行，現在則與三井住友銀行合并）獲得貸款。我身為銀行客戶，大概因為過往的信用，才能貸到這筆款項。”

隨著遷居，謙二也把汽車從微型面包車換成一般轎車，車種是日產的Skyline。“因為得到武藏村山的日產王子汽車工廠跑業務，不開日產的汽車不行。如果開其他廠商的汽車，守衛不放人進入工廠。”

寬子非常喜歡依照自己期望設計的新居，但謙二并沒有那么雀躍。“太過豪華了，總有一股不協調感。說實話，與搬入第六都營的時候相較，當年反而更開心。家里變得十分寬敞，讓我不禁想著，如果還能把父親與岡山的外祖母都接來同住，不知道有多好。”

三藤地區的新興住宅區與第六都營一樣，都是棋盤狀的規劃。在這個區域內有幾百戶新建住宅的家庭。“兩側的鄰居分別是學校的老師與在東京市中心擁有蔬果店的老板。對面住的似乎是某演藝制作公司老板的‘二奶’，以及一家什么公司的中堅干部。附近也住有畫家，整體住戶都比第六都營住宅更高階，不過因為此地交通不便，估計應該沒有到市中心上班的人。”

這個時期立川體育的經營相當順利。托經濟高速增長之福，滑雪、高爾夫、保齡球等運動陸續成為風潮，各種運動用品也隨之熱賣。

除了保齡球以外，其他的運動都是戰爭之前布爾喬亞階級的活動，人們對此都充滿憧憬。保齡球風潮興起時，許多人都希望擁有自己的專用球，我們店里也放了一個樣品球，讓顧客可以確認自己手指的鉆孔位置，我們再交給專人幫顧客鉆孔后出售。我自己并不購買這種東西，不過感覺有錢人真的多起來了。

不過立川體育的主要經營項目，仍專注在外勤業務上。謙二與大木一起開創的立川體育，于一九六九年加入第三個叫作竹中的外勤伙伴。“是一位比團塊世代[[1]](#m1_7)更年長一些的年輕人。出生在建材行之家，只有中學畢業，不過因為是工匠家庭出身，所以這樣的學歷應該已經算很好了。他很喜歡山，經常跑去攀巖。”此后公司員工繼續增加，規模最鼎盛的時期大概擁有十名員工。

一九六〇年代是“團塊世代”成長到升學年齡的時代，此時初中、高中與大學不斷增設。立川體育最初的服務對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創立）、國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創立，位于國立市的高中，非國家設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創立）等等。之后附近區域又增設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創立）、國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島高中（一九七八年創立）等，謙二也針對這些新設學校展開行銷業務。

高中與初中剛成立時，是最需要爭取的目標。創校時擁有整筆的預算，他們會先與市中心的大企業談妥購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業者群只能瞄準之后不足的部分或補充用品。大企業并不會介入這部分事務，所以大家都很賣力競爭。而當時的學校覺得相互比價非常麻煩，所以會直接向方便聯系的企業下單，委托企業相關的人員去處理。

學校在四月初開學，因此得提前到辦公室去拜訪體育老師，拿名片與產品目錄給對方。之后一邊輪流拜訪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面一次，向老師們推銷些商品。從四月一日才開始拜訪，因為擔心不斷出現會引起對方的厭惡，所以得留些空檔才能再度拜訪。我們公司特別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務。不要招人討厭，不要樹立壞的風評，這是獲得訂單的秘訣。

從立川商店的下半年開始，謙二的工作逐漸“成為一種中介公司般的角色”。從學校拿到訂單，發包給體育用品商或體育器材安裝商，從中賺取一些利潤。

在東京都或各市的預算范圍內，爭取訂單與交貨，這些都是從立川商店時代就延續下來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開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訂單逐漸變成要在校園里安裝多少單、雙杠或者籃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維修管理的形式。安裝與維修管理當然我們無法自行處理，得外包給器材商，我們只擔任中介的角色。不過，如果只是單純負責戶外器材的涂裝維修，并沒有困難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們會接下訂單自行處理。

即便是學校的運動設施，如果是牽涉土木建設業一類的大型物件，政治勢力就會介入。小型企業因為沒有這些政治實力，只能彼此合作性競爭，成為各種不同的從業者團體。特別是都立高中新設校時，大量訂單都會先通過都廳等級的大企業先行處理，中小企業只能搶食除此之外的訂單。市立中學等部分，則由立川市公所的財務科進行業務分配，因此會直接與財務科交涉。如果能與訂購單位打好關系，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獲得長期合作。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后，新興商業的競爭狀態與一九六〇年代相較，狀況有些許改變。原本謙二他們處理的外勤業務，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舉辦展銷會，為了獲得整筆訂單，必須到學校或企業中巡回推銷。但之后為了取得學校或公家單位的訂單，原本的業務風格在不知不覺間，轉變成只需專注于維持與公家單位的關系。

這種轉變與社會上的風氣變化有所關聯。在戰后廢墟、黑市的時代，比起大學畢業或白領階級，握有糧食的農民與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勢力。到一九五〇年代為止，都還留有這種實力比頭銜更重要的風氣。

當謙二開設立川體育的一九六六年，一開始只是想給公司名稱鍍層“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樣，但此時期開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稱逐漸變得重要。營業重心逐漸轉移到爭取公家單位的訂單，與這種傾向同時并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后（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漸“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漸減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著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飯的人。大木就屬于這種一路磨練上來的商人。

我自認是個“上班族”。說起來，因為富士通信機是一切的原點。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帶有領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識。直到立川體育創業之后，因為角色轉換，變成由我決定是否聘用員工，那時才被稱為社長。

謙二的人生路途，距離我們聯想“上班族”這個詞匯是指在大企業中受到終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遠。而謙二自認“上班族”的自我認識，也反映出一種奇特的心態。只不過自我認知這種東西，往往受到大環境的主導印象影響，因而與實際狀態有出入。

從統計上的實際數據來看，大型企業的雇用形態，只占日本就業人口的兩成不到。可是這種“上班族”形象卻比實際狀態更加普遍，它創造出一種這個時代日本社會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種“安定的生活形象”。連謙二這樣的人也認為自己是“上班族”這個事實，正好從深層反映出這個現象。

會產生這樣的情況有幾個原因。在大眾媒體上班的高學歷階層，把自己與同班同學的生活形態，當作社會全體的共同想象，并且在媒體上不斷擴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為沒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參考，即便只是表面形式，大家仍會模仿這種“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詳細考量當然還有其他的影響因素，但不管怎么說，這個時期正是“一億總中流”[[2]](#m2_7)與“單一民族國家”這一“日本社會平等化”的觀念被固定下來的時期。

謙二搬出都營住宅的一九六九年，根據總理府的調查，回答自己在社會階層中屬于“中”等級的人，超過了九成。原本這個調查在詢問自認的社會階級時，只設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等選項，所以很容易產生廣義“中”產階級膨脹的調查結果。以同樣的問題進行國際性比較調查，在美國與印度同樣會得出廣義的“中產階級”超過九成的結果。[[3]](#m3_6)連謙二也說：“如果當時被這么問及，大概也是回答‘中’吧。”

不過，在這種社會的制度化過程中，也有帶來社會安定的“功勞”部分。其中對謙二而言起了相當作用的，就是立川體育也引入了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就是公司必須繳納社會保險費。因為會對經營造成負擔，大多數個人自營企業往往只愿意采用國民年金。我們最初的兩年也是這么處理，但等經營穩定之后，便轉換成厚生年金。當時并沒有太深入的考量，只是覺得這樣做與給公司名稱加上股份公司一樣，對公司而言具有鍍層金箔、往臉上貼金的加分效果。

當時的我，仍延續戰爭之前的想法，也就是把工作時存下的錢，當作退休后的養老金。因此，并沒有靠領年金來過生活的認識。不過，因為當時那樣的判斷，才讓我現在有厚生年金可領。但只領國民年金的人，即便領到滿額一個月也只有大約六萬日元。有一位經營個人商店的同行，過年我們會彼此寄賀年卡，他在卡片上就寫到退休生活非常嚴峻。

這種感受等到可以領年金時就能夠體會了，不過早在立川商店時，公司就加入了厚生年金。可能當時社長原本就是共產黨員，還是有考量到員工的福利吧。自己的年金從富士通信機時代開始，歷經立川商店、立川體育等上班時代累積而來，現在能夠享受厚生年金之利，大概就是在這種偶然情況下發生的。只是社會上的狀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日本官僚機構卻無法改變制度加以回應，這種弊端讓人打從心底里產生一股不公平之感。

## 二、安定還是停滯？

在這種一帆風順的狀態下，突然一片暗云籠罩下來，事情發生在一九七二（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中學三年級的剛一，因為意外而身亡。“公司辦了員工旅行，帶大家到長野的茅野去滑雪。好不容易有一次旅行，所以順便帶上了寬子與英二。剛一為了準備高中考試，所以一個人留在家中。滑雪旅行后回到家，看到附近的人們聚集，才被告知剛一從屋頂上跌落下來死了。”

隆冬中從屋頂跌下的剛一，躺在地上意識不明，就這樣體溫不斷降低，最后凍死。剛一成績優秀，比實際年齡更為成熟，雖然還是中學生，已經開始閱讀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看家的兒子意外死亡，寬子因而陷入極度的抑郁之中，全家都籠罩在憂傷的氣氛之下。“當時剛好發生了‘淺間山莊事件’（日本‘聯合赤軍’在淺間山莊挾持人質），電視上不斷播放警察與學生間的槍戰，以及在山中發現尸體的消息。剛一的葬禮恰好就在這個時期，更添加了一股晦暗悲慘的氣氛。”

喪禮在自己家中辦理，遺體與祭壇都安置在客廳，供來客憑吊。翻閱當時的奠儀賬冊，有致贈奠儀者共一百一十三名，只來憑吊未贈奠儀者有六十八名。包含剛一的中學同學，憑吊客人超過兩百名。謙二生意關系上的來客不多，大部分都是親戚與鄰居。與現在的普通喪禮相較，當年的憑吊者顯然多上許多。

寬子心情低落，到最后甚至無法繼續住在這個房子里。無計可施之下，只好搬出生活了三年的武藏村山。

花了大筆錢建起的家，本來以為會在這里過一輩子，沒想到竟然如此。因為是有人意外死亡的“瑕疵商品”，雖然找到了接手的買家，但對方為了重新蓋自己的房子，等我們搬走后便拆毀了舊房。因為是鋼筋水泥搭蓋的堅固住房，拆房時大概費了一番功夫。對方買下房子時好像只花了購置土地的費用，已經不記得賣了多少錢。是賺是賠都不重要了。

沒辦法，只好在公司附近的立川市買了一戶大樓一家人遷入。那是一棟新建的十二樓大廈公寓，謙二一家住在十樓，隔間只有兩房一廳，面積只有武藏村山房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從十樓往下看，對面是廢棄物回收站堆積如山的鐵屑，以及大概是從立川基地買來的美軍戰斗機副油箱，壓扁堆在一旁。同一層樓對面一戶住著東京都的職員，讓人意外的是，大樓居民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或者中年人，與他們并沒有太多交往。

這算是謙二回國后第十一次搬家了。此時謙二四十六歲，寬子四十三歲，當時唯一的兒子英二只有九歲，距離他獨立自主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

寬子失去剛一之后非常憂郁，連帶地身體狀況也不佳。為了排解寬子的憂愁，謙二會開車帶著寬子與英二外出旅行。一九七四年，謙二與寬子一同回到共同的出生地佐呂間拜訪，與遠房親戚只簡單打過招呼，之后他們再也沒回過佐呂間。

立川體育在經營方面雖然增加了員工，但此時已經逐漸失去優勢。一九七三年發生石油危機，宣告經濟高速增長期結束。此時學歷社會（依賴學歷的社會）發展更加穩固，中小企業很難找到優秀的人才。

一九七〇年，一位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廠的員工轉行進入我公司，是一位高中畢業的中堅員工，聽說因為工作現場的意外事故，開始討厭自己原本的工作。當我跑業務巡回各工廠時，他向我說：“希望在小熊先生的公司上班。”因此雇用了他。他喜歡音樂，也喜歡吉他與音響。這個人跑的業務，成績馬馬虎虎，因此薪水未曾調升，而且大概理解到零售業的生活不如他的想象，最后自己辭職了。

在竹中的介紹下，公司雇用了專門的會計經理。他的頭腦很好，也有經理的手腕，比我更熟悉稅制。可是七〇年代后半公司經營出現狀況時，他也選擇早早脫離公司。

其他的人也雇用了幾個，大家都待不久。我自己也屬于這類或多或少走在社會常規之外的人，大家也不是真的熱愛體育才從事這工作。我的這一代是為了生存、為了吃飯而拼命工作，與之后的富裕一代工作風氣也有所不同。不過，說這些并不是想強調什么精神論之類的東西。

一九七五（昭和五十）年，立川體育開設了八王子分店。雖說是分店，并非真的開設店面，而是所謂“吸收合并”了一家商店。“合并的是一家原本由兩個人經營、位于八王子站南口的運動用品店。他們經營出現困難，一個人卷走借款趁夜逃跑了。剩下的另一位拜托我們，才以合并的形式接收他們的商店，但借款的部分我們并不承擔處理。這項合并，是因為公司業績在石油危機下無法發展，想試著借由增加店面的方式，看能否打開新的局面。”

當時謙二五十歲，仍然盡心努力做生意。可是大環境的狀況，已經轉變為低速增長與市場秩序化發展，情況已不再類似經濟高速增長期。至于體育用品，大型超市發展起來，顧客更喜歡超市豐富的選擇和便宜的價格，中小型店鋪在競爭中迅速處于不利的地位。“八王子店位于車站附近，五年之間生意還不錯，但隨著競爭對手出現，業績逐漸停滯。銷售額不如當初預計，赤字卻開始增加，因此把經營權交還給原本的負責人，八〇年代雙方便拆伙了。”

在八王子店經營不如預期之后，立川店遷移到更接近車站的地點，目標仍在擴大店面銷售量。可是這仍舊不如預期。“雖然距離車站更近，但店面位置卻不是人潮經過之處，房租又貴，最后仍無法成功。因為過去沒有花費太多心思經營門市銷售，所以才無法看清整個狀況。”

在這種狀況之下，除了努力維系一直以來靠外勤業務獲得的老顧客外，也別無他法。這個時期公家單位的訂單，一方面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格局，會優先交給大企業處理，另一方面競標機制的引入仍不夠充分。因此理所當然地，既無政治勢力又無財力提供大幅折扣的中小企業，只能走上私下商量、彼此串通這樣一條道路。

同行之間彼此商量的狀況不少。一九七〇年代后半，竹中出席市政府的投標說明會，根據他的形容，當時在市政府的入口附近聽到幾個友好的同行聚在一起討論，有個人說：“我在這家學校已經打好關系，這一塊分給我。”這件事情遭其他同行向市政府檢舉，大家因為串通舞弊的事情被市政府傳喚約談。這種情況下我建議竹中就裝作不知情，我們公司也因而度過這場危機。

這種狀況中，業界都知道哪邊的學校是哪個同行的勢力范圍，彼此間形成一種私底下的默契。包括學生入學時買的整套體育服裝等，只要是自己建立好關系的學校，就能將合作關系持續下去。

維持著這種停滯與安定的狀態，謙二在一九七八（昭和五十三）年，搬到八王子市的新興住宅地。該處是由住友不動產在多摩丘陵鑿山整地后分賣土地，一處叫“南陽臺”的住宅區，謙二依舊通過長期往來的日本相互銀行取得貸款，并且一如既往，把房子的設計交付給寬子。

落成的新家，是由手藝精巧的木工師傅打造的六房兩廳木造房屋。搬家時謙二已經五十四歲。客廳裝潢有波斯地毯和吊燈，還從秀子上班的東京學藝大學購入了一臺學校淘汰下來的鋼琴。房貸計算與新居設計謙二都沒過問，金額計算下來，總共讓謙二繳了十年又幾個月的貸款。謙二搬來此處后，仍與過往一樣開車去上班。

雖然是位于丘陵上的新興住宅地，但有巴士到京王線電車站，因此有許多人是到市中心上班的上班族。右邊鄰居是住友輕金屬的工會干部，后來也升任管理職務。左邊鄰居則是建設公司的員工，私底下還兼任在日韓國人的律師。“因為是住友不動產的土地分賣，所以入住的人好像多少都跟住友集團有些關聯。”居民大部分都四十多歲，像謙二這種五十幾歲的小企業主則不多。

買下新居，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之后，謙二似乎轉趨保守。這個時期，在立川體育里地位僅次于謙二與大木的竹中，針對經營方針提出了新的意見。因為外勤業務與門市銷售都達到上限，他主張可以接單幫制服與體育服裝繡上校徽等標記，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可是，謙二并沒有接受這個意見。

想要實現竹中的計劃，必須投資電腦控制的縫紉機與壓燙機等設備。我雖與大木私下商量過，但他總是遵從我的意見，所以也無法依賴他。我自己判斷與其背負債款，還不如不要擴張來得安全。這是我從立川商店的失敗中學到的經驗。

竹中年紀不過四十出頭，自己的提議不被采納后，便自行創業去做這個繡上標記的生意。最后我們還是商量了一下，打算讓他圓滿實現創業夢想。他與太太只有兩個人，在自己家中接受訂單，好像沒有做出太多的成績。那種工作，反而不適合租辦公室雇用員工來處理。

一九八五（昭和六〇）年，謙二六十歲了。這個時期的立川體育，由他與大木二人繼續維持著小店鋪，接受長期合作的顧客訂單，延續這種日常性的營業形態。他們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后累積起來的商業模式，在十年多之后便老舊陳腐，整個環境都轉變成只能依賴公家機關固定需求的狀態。

## 三、是戰爭我就討厭

謙二說：“外出跑業務時，大概都聊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不記得有講政治或戰爭的事情。”但并非已經忘記戰爭時代，毋寧說，隨著生活安定之后，反而有余裕回頭思考戰爭記憶。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謙二讀了日本的戰爭文學名著，五味川純平的《人間的條件》。內容描述一位被送到中國東北的士兵，如何抵抗日軍內部的壓力，在西伯利亞成為戰俘之后又如何在嚴寒的荒野中歷經九死一生的故事。剛來東京、在學藝大學找到一份打工的工作時，謙二就在大學圖書室看到了這本書。

根據謙二的說法：“雖然是長篇大作，但容易閱讀，也有真實感，很能引起共鳴。”但即便如此，讀過之后卻不怎么感動。“因為，如果照書中所說，實際上那樣抵抗軍隊，大概不死也剩半條命，主角承受的非常人所能企及，算是一個講述‘超人’的故事。”

至于野間宏的戰爭文學名著《真空地帶》（一九五二年刊行），謙二在離開結核療養所時也還是拿到一本。故事描述新兵受到私刑，逐漸喪失了人性，超過一定限度后，整個人就像在真空中被壓力擊垮的狀態。可是謙二說：“那書程度太高，讀不太懂。是一部不適合快速瀏覽的作品。我因為太過忙碌，實在無法細讀。”

謙二也閱讀過由東京帝大集結學徒兵戰死者的遺稿而成的《傾聽海神之聲——日本戰歿學生手記》，“印象不太深刻。感覺是頭腦太好的人，所以煩惱也特別多，差不多是這種感覺吧”。比起這部作品，讓他更有印象的是大岡升平的《俘虜記》（一九四九年刊行），“因為關心俘虜的境遇，所以在療養所時代就讀過這部作品”。

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起，制作了大量描繪戰爭的電影；但謙二對這類作品幾乎毫不關心。

六年〇代還是七〇年代，在電視上看過《二十四之瞳》（一九五四年），感覺太多愁善感了。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一九六八年）之類，充滿英雄主義的戰爭電影，完全與自己體驗過的戰爭經驗不符，看了只感到無稽與無聊。戲劇沒有辦法真的表現出好戰思想和反戰思想。

搬到武藏村山市之后，多少有點買書的余裕。不過謙二并沒有購買擺著好看的大部頭百科全書，反而購入美國人撰寫的有關太平洋戰爭的書籍。他想閱讀的是沒有英雄主義、能以客觀角度描述的歷史書籍。

早實時代的朋友中，有一位酒商的兒子叫作河田，非常迷海軍。中途島海戰的時候，這個男人敢在班上說：“實際上（日本的航空母艦）沉了兩艘。”戰爭前他住在新宿，戰爭后在大久保經營一家肉鋪。我搬到武藏村山后，經常參加早實同學會，間接聽到他的消息，特別去造訪了他的店鋪。在他家拿到了羅伯特·夏洛特（Robert L. Sherrod）的《太平洋戰爭史》（一九五二年發行）、塞繆爾·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的《太平洋戰爭美國海軍作戰史》（一九五〇年發行）、漢森·鮑德溫（Hanson W. Baldwin）的 《勝利與敗北》 （一九六七年發行）等書。

河田因為經營肉鋪，所以不出席早實的同學會，會參加同學會的只有一些出人頭地的人。我自己也是事業上軌道之后，才開始參加。通過同學會上遇到的朋友介紹，才知道河田的住處。

對于越戰，謙二說：“總之，是戰爭我就討厭……我雖然反對蘇聯勢力的擴張，但也反對以戰爭的形式去防堵。”

一九六九年，前一年美軍虐殺越南居民的事件被報導出來。與當時日本許多人一樣，謙二也想起了過往日軍在中國的行為。

從新聞報導上知道美軍的殘酷行為，不過與日軍的殘暴性相比，美軍干的事情簡直就是小兒科。我在中學的時候，同班同學偷偷給我們看過，據稱是從中國戰線回國的士兵手上拿到的照片。那是一張拿著軍刀、正要砍下中國俘虜腦袋瞬間的照片。或許現在會想中學生怎么有機會接觸到這種照片，不過這在當時的日本并不稀奇。

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時期，《日本新聞》有刊載過南京大屠殺的事件。當時同一班中有位《“滿洲”日日新聞》的記者告訴我們：“這件事情在日本雖然被壓下來了，不過在國外可是舉世公開的事實。”在戰俘營中，曾經前往中國戰線的老兵高橋軍曹，當大家談完情色話題、接著聊起暴虐行為時也說過，日軍發現了為躲避戰火而只有婦女與小孩躲藏的場所、進而集體施暴的事情；另外也從其他老兵們的傳聞中聽過。所以日本兵究竟干過什么樣的事情，大體都知道。

所以當出現“根本沒有南京大屠殺”的論述時，內心只想著：“竟然還有人這么認為？”這種人因為只從書本吸收知識，才會發出這種論調吧。干下殘暴行為的人，在戰場上是頭野獸，但戰爭結束回國后卻閉嘴不談，把秘密藏在心中過他的日子。

一九七〇（昭和四十五）年，三島由紀夫自殺。謙二對此的感想是：“集體制造像軍服那樣的制服，完全搞不懂他們究竟在想什么，也沒有興趣知道。對于他自殺時的所作所為，除了說是失去理智的狂熱分子之外，不知道該如何形容。”

一九七二年，在關島“發現”了原日本兵橫井莊一。戰爭結束后過了二十七年，出現了一個一直潛伏的日本士兵，引起了很大的話題。“對于橫井，我感到非常吃驚。能夠躲藏這么長一段時間，還能夠活下來，實在驚人。當我聽到‘帶著恥辱’成為俘虜或者回到皇宮繳交步槍等新聞時，只覺得這個人的想法還完全留在過去。這讓我深切思考他所遭遇過的悲慘命運。”

一九七四年，在菲律賓的盧邦島（Lubang）救出了原日軍少尉小野田寬郎。他與菲律賓警備軍發生槍戰，與他同行的原日軍上等兵小冢金七因而死亡，只有小野田一人獲救。與橫井相比，小野田回到日本時的敬禮等行為，良好地表現出原日本軍官的風范，因此造成一股旋風，被當時的日本視為英雄。可是謙二對小野田卻抱持著嚴厲的看法。

小野田被當作英雄一般歡迎，那小冢死亡的責任又該如何追究？戰爭早就已經結束了，明明可以生存下來，但小冢卻被迫配合小野田的妄想，最終仍舊死去。對小冢的遺族而言，大概不會開心吧。把小野田當英雄般迎接的大眾傳媒，就像在歡迎當年的軍國主義精神一樣，看了就一肚子火。

盧邦島這個地名，當我一九五四年待在療養所時，因為讀過一則一個日本兵遭當地警備軍射殺的報導而得知。雖然當時為了養病搞得精疲力竭，但仍然留有印象。

另一方面，寬子對小野田卻率直地覺得感動不已。寬子的政治傾向較為保守，喜歡石原慎太郎、中曾根康弘、撒切爾夫人等政治人物。謙二則依舊投反自民黨的票。謙二與寬子相處大致都很和諧，只有在這點上意見不相合。

一九七〇年代，謙二生活較為寬裕之后，買下了索爾仁尼琴的全部六冊《古拉格群島》。

以特殊的文體，在集中營這種特殊的狀態下書寫而成。書本的字體很小，排版又密集，讀起來相當辛苦，但還是忍耐著全部讀畢了。

在最后一冊的譯者后記中，寫有“即便在蘇聯，終究會有全面接受此書的一天（而且這天或許會意外地提早降臨），而那也將是蘇聯迎來真正自由的日子”這么一段，我還留有印象。這篇文章寫于一九七七年九月，當時對于蘇聯體制終將結束一事，還完全無法想象。

同時，謙二也開始更加關心起蘇聯體制下的匈牙利、捷克與波蘭的情勢。謙二說：“之后八〇年代發生‘團結工聯’民主化運動時，因為自己相當關注，所以經常閱讀相關的新聞報導。”

除此之外，也讀過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等。《伊萬·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中有主角在集中營內負責堆磚塊的描述，讓我想起了自己的戰俘時代。書中描述主角看著自己堆砌好的磚塊，竟然油然而生一股歡快感。在奴隸勞動的生活中，所謂感受到勞動喜悅的時刻，大概就是這么回事吧。

大約同一時期，過往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敦睦會“赤塔會”，開始活躍了起來。依謙二的說明，“赤塔會”的組成經過如下：

一九五九年，當我去申請都營住宅時，竟然巧遇十年前在同一個戰俘營的安田。之后一九六三年左右，在擔任主辦者角色的森山召集下，東京都內大約集合了十個人，在上野一處名叫“聚樂臺”的餐廳碰面，大家一同回憶戰俘營時代的事情，相當開心。以此為開端，第二次大家集會時便命名為“赤塔會”。森山是當時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因為徹底動員才成為日本士兵。

森山后來成為“赤塔會”的領導人，一個人負責所有實際業務，“赤塔會”正式啟動了。當時謙二與安田也會幫忙，最初在東京大約每半年集會一次，之后也發展成兼有敦睦觀光旅行，或者前往各處觀光地召開集會的形式。一九七六（昭和五十一）年起，還發行了《“赤塔會”會報》。

在“赤塔會”，所有人只在姓名之后加上“先生”，全員平等。在電信第十七聯隊、航空通信第二聯隊應該也有類似的戰友會活動，卻完全沒接到過他們的聯絡。大體而言，各部隊的戰友會大多是該部隊所屬地區的人們互相集合，大家還是維持過往的階級秩序。所以他們不想邀請像我這種浪跡東京討生活的人，我也不想去參加他們的集會。

“赤塔會”的話題，都集中在過往的回憶，并不牽扯到現今的政治活動。各地的戰友會，許多還會動員大家在選舉時集體投出保守票，“赤塔會”則完全沒有這類動員。

“赤塔會”在一九八〇年代，也到關西舉辦過集會，但活動逐漸停頓下來。原因之一是參與者的高齡化，之二則是會內產生了紛爭。

有些中途跑來參加，不知道整個活動經過的人，抱怨森山過度獨裁，出現想要摘除森山領導地位的人。森山因而逐漸失去熱忱，之后也不再出席了。原本森山就是一個責任感強的人，所有事情都一手包辦，他自己的負擔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誤會。

每一處的戰友會大概都是如此，八〇年代后半，大家上了年紀后參加者便逐漸減少。“赤塔會”最后在九〇年代中期辦了一次熱海旅行之后，便就此落幕了。當時的主辦者曾與我商量過，我建議他還是就這么曲終人散會更好。

各地的戰友會大概都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時展開，一九九〇年代逐漸沉寂，最終完全停止活動。“赤塔會”的特色是排除了舊軍隊的階級秩序，但整個發展軌跡仍與其他戰友會相仿。

與此同時，從七〇年代生活安定后，謙二內心逐漸煩惱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死于西伯利亞、與他同期的士兵京坂的事。“隨著自己生活逐漸安定、富饒之后，開始對自己活著回來感到一股罪惡感。對于已經過世的人們，總想幫他們做點什么。”

謙二在工作空檔，于一九七九（昭和五十四）年打電話至厚生省，詢問有關京坂的事情。厚生省資料調查室的女職員，根據“京坂吉二”的全名，告訴謙二一九四六年當時京坂在富山縣的地址。“可是，他家人目前的住址不明。而那位職員問及‘時至今日，請問您為什么還要調查這些事情？’時，謙二只好模糊曖昧地搪塞對方。畢竟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簡單說明的。”

考慮了幾個月后，謙二還是寫了封信給富山市公所，說明自己想知道京坂的遺族是否還住在一九四六年時的房子里，如果還住在該處，自己想傳達京坂死前的狀況給家屬知道，謙二說明意圖后，請托富山市公所代為中介。“雖然有回信，但在信中只寫著對方的住址如‘住民票’所記載，請自行直接聯絡，完全是官僚式的回答。京坂的雙親已經過世，家人中似乎還有大哥夫婦還活著。”

接著謙二又再次躊躇起來，不知是否該寫信給對方，遲疑之間又過了兩年。到了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秋天，謙二終于下定決心，寫信給京坂的哥哥。“信寫好寄出后，大概過了兩三天，便接到了電話。之后沒多久，京坂的哥哥來到東京，雙方約在立川站附近的咖啡店見面。”

京坂的哥哥原本也是日本兵，曾在菲律賓被俘。與謙二見面的時候，把弟弟的紀念照片也帶來了。謙二詢問對方：“這張照片您是如何取得的？”對方回答，其實這張照片原本收在老家的佛壇內。

那張照片，是新兵在三個月的教育訓練中必須拍攝的軍裝照片，為了表示自己在軍隊一切安好，軍隊命令所有人都得將該照片寄回家中。照片的反面，有京坂于西伯利亞過世時，在一旁驗尸的小隊長與軍醫中尉的簽名。

這只是我的推測，大概小隊長田下少尉整理京坂遺物時找到了這張照片，為不讓蘇聯軍隊發現，秘密地保管著，之后帶回日本。當時我們的私人物品都是一些破爛的東西，京坂的遺物，大概就只有那張照片吧。

當時因為蘇聯的情報管理非常嚴格，會讓其他人了解戰俘營狀況的東西都禁止帶回。要把死者的照片帶回，應該也得躲過蘇聯軍的身體檢查才行。曾經聽說過一九四七年時，作業團長西田把一份大約寫有三十名死者姓名的紙張捻成細條，藏在內衣褲的綁線當中，秘密地帶回國內。

在離開西伯利亞的撤退船上，也有在上船之后立刻請所有人把記得的死者姓名趕緊寫下的調查。恐怕田下少尉就是在那個時候，或者在舞鶴登陸時提出那張照片，之后經過政府官廳，把照片寄達京坂位于富山的雙親住所吧。這張照片應該就是這樣被收起來的。

謙二對京坂的哥哥說明京坂過世時的情形，哥哥聽完說了句：“這樣子啊……”

只有淡淡的回答。因為彼此都是體驗過戰爭的人，所以不需多言也能理解。沒有又哭又喊，也沒有情緒激動的表現。雖然什么都沒說，但彼此都能了解。表現激烈的感動、哭泣，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會做的事情。

京坂的哥哥也在菲律賓當過俘虜，如大岡升平的著作中所寫的一般，應該也有過相當痛苦的經歷。我沒詢問他是在菲律賓何處遭到俘虜，雙方也沒怎么討論彼此當年的境遇。京坂的哥哥當天就搭車回富山了。

謙二后來將發表于《“赤塔會”會報》上的《對某位青年的追憶》文章寄給了京坂的哥哥。文章中寫了京坂過世時的情況，與本書第三章中引用的文章幾乎相同。之后，京坂的哥哥也回信并寄來贈禮。在回信中有如下記述：

讀了你的《對某位青年的追憶》后，不禁熱淚盈眶。弟弟受到你許多的照顧，閱讀文章后內心獲得些許撫慰，這大概就是我弟弟的人生吧。

我在菲律賓的時候自認生命將結束于該地，甚至想引爆手榴彈自盡，但經過一年半的戰俘生活之后，還是回到日本國內。

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長壽，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敬呈弟弟小時候經常吃的魚板，請您品嘗看看。

感謝您這次的聯系，再次向您敬上最高的謝意。

通過這次將京坂過世前的狀況傳達給家屬的經驗，謙二發現自己“托此之福肩上重擔好像因此放下了”。原本謙二打算借此與自己的戰爭記憶做一個了斷。但就在十年之后，謙二與原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朝鮮族日軍士兵開始通信，甚至以日本政府為訴訟對象，參與了戰后賠償訴訟。

[[1]](#w1_7) 譯注：泛指二戰之后第一波嬰兒潮中出生的人。

[[2]](#w2_7) 譯注：日本一億人口全都是中產階級。

[[3]](#w3_6) 橋本健二，《“格差”の戦后史：階級社會日本の履歷書》，河出BOOKS，二〇〇九年。

# 第九章 戰后賠償審判

一九八七（昭和六十二）年，謙二已經六十余歲。兒子英二從大學畢業，進入出版社工作，謙二自己也開始領取厚生年金。

立川體育延續靠著老主顧維系訂單的特殊經營方式，經營規模逐漸縮小，而且大部分都移交給大木處理，謙二逐漸減少到公司處理業務的次數。雖然謙二的薪水因此減少，但房貸已經繳清，生活也相當穩定。

此時謙二在一連串的偶然之下，卷入了戰后賠償審判之中。

## 一、社會性活動時代

謙二從一九八〇年代起，開始參與一些社會性活動。自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起成為國際特赦組織會員。謙二于一九七〇年代讀過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又了解到一九八一（昭和五十六）年波蘭民主化運動的興起，由于這兩個契機，他又重新深入關注集中營的人權問題。

謙二參與的社會性活動，可以分成地區性活動以及與戰爭記憶關聯的活動兩類。其中地區性活動的參與背景，起因于謙二居住的八王子市南陽臺居民站出來反對設置車輛監理所（汽車檢查登記事務所）的運動。

如前章所述，南陽臺是切削多摩丘陵山坡斜面而開發出來的新興住宅區域。至二〇一三年三月底，大約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居住。

一九七二年起，開始有人遷入南陽臺居住，這個地名源自于過去的農村名稱。一九八六（昭和六十一）年起，因為土地分賣數量增加，由最早入住區開始往后劃分為一丁目、二丁目與三丁目。謙二住的房子位于最早分售土地的區域，也就是后來被劃成一丁目的地區。

南陽臺雖然是新居整齊排列的新興住宅區，但公共硬件設施的建設卻十分遲緩。這個區域最初甚至沒有下水道，家庭廢水與排泄物都得通過位于南陽臺內的污水處理廠凈化。因此居民運動的重心，便是通過住宅區自治會，向有關行政單位要求安裝下水道。

一九八二年，南陽臺發生了另一件環境保護運動。因為運輸省關東運輸局提出計劃，希望在南陽臺對面的山腳設置一處車輛監理所。

南陽臺附近保留了自然的丘陵地帶，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京王電鐵等在此修筑過適合徒步的道路。這條從高幡金剛寺越過野猿嶺的路線，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為市中心附近的熱門休閑地段，當時的皇太子（之后的平成天皇）也曾到訪過。

多摩動物園在一九五八年開幕，大學聯合研習館（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在一九六五年開館，道路鋪設、土地開發持續開展。不過當南陽臺剛整頓完成時，周圍仍保存了多摩丘陵的自然景觀。

周圍丘陵地帶中，南陽臺北側的斜面于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成為都立長沼公園。而南側的山腳地帶，則屬于明治大學附屬中野高中所有，設有一座棒球場。前述提出的監理所建成計劃，就是打算購買棒球場一帶的土地當作設置場所。

當時東京西部只有國立市一處有監理所。運輸省內的機構因此決定在八王子市另設監理所，南陽臺成為候選地區之一。謙二說：“附近屬于舊農村地區，恐怕有些利益集團也涉入當地的開發計劃。”

對此，南陽臺居民發起了反對監理所設置運動。根據謙二的說明，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同世代的南陽臺居民，出現了不同的反應。

反對運動的中心成員，是土地分售較晚的二丁目、三丁目的年輕新居民，當時他們大概三十到四十歲前后，這些人是“團塊世代”的主要組成者，接受戰后教育的一代，對環境問題相當敏感。據謙二說：“運動最主要的推手，是白天都在南陽臺的全職家庭主婦。因為大家會互相幫助、送小孩上小學，因此形成了相當好的溝通網絡。”

另一方面，最早購買分售土地的一丁目居民，主要都是戰前出生的一代，年紀大概都在四十五歲以上。他們對環保問題不太關心，對行政單位也都采取配合的態度。

“一丁目居民年齡較長，包括我自己在內，警覺意識較遲鈍。曾經擔任自治會干部的一丁目年長者們，態度傾向：設立監理所，附近會更熱鬧，這樣不是挺好的嗎？”八王子市的行政機構端出許多優厚條件，表示如果車子能掛上八王子的車牌（即在八王子設立監理所發牌），就會在南陽臺設立一所小學，借此引誘年長者們同意。

當時居住在南陽臺的學童們，大約需步行二十分鐘才能走到原本就設立在鄰近農村地區的小學。公部門看穿居民的不滿，企圖提出小學增設案來拉攏居民。

一九七〇年代是各地反對公害與胡亂開發、居民運動萌芽的時期。在此之前的反對運動，主要是以農民和漁民為中心，抗爭原因主要是各種開發破壞了他們賴以為生的自然環境。但自七〇年代以降，接受戰后教育、人權意識較強的新一代年輕都市居民變成了主要推手。

特別是從一九七〇年代后半至八〇年代，“團塊世代”全職主婦成為主角后，日本各地進入環境保護、自然食品、消費者合作社運動的興盛時期。這些主婦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卻受阻無法在社會上一展才能的人。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各種集體住宅與新興住宅區的分售，成為這些人發起各種運動的土壤。[[1]](#m1_8)

南陽臺的監理所反對運動，可說也屬于這類運動。而且最終結果，這個運動獲得成功，監理所的設置因而中止。成功因素包括了居民的熱情，以及戰略性的計劃。

以年輕主婦們為主的居民運動，加上住在南陽臺的律師擔任顧問，并以動員市議會議員為運動指南。監理所的設置計劃，在八王子市內還處于挑選土地的階段，正值市政府努力說服居民的時期。如果能讓市議會否決該案，或許能夠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戰略上采取集中游說中間立場的公民黨，因為只依賴原本便不贊成的社會黨與共產黨，尚無法成為多數派。

南陽臺的這些年輕媽媽們，在市政府召開環境委員會時，大家共同包巴士前往旁聽，相當團結。在這種壓力與游說動員之下，保守派的市議會也開始動搖，一些議員轉向反對設置，最終市議會的環境委員會否決了這項提案。一丁目的年長居民完全無法想象會發生這種狀況，眾人驚訝不已。就算當初跟市政府達成交易，建了小學，現在應該也會因為人口減少而面臨廢校或被合并的命運吧。

這次運動的成功，保護了周遭的自然環境。只不過監理所的建設計劃，很快就轉移到了八王子市別處場所。“該地也屬于新興住宅區，但剛成立不久，社區間的團結力量薄弱，在還未形成反對力量之前，監理所建設便已然開展。”

謙二自己與自治會并無多大關系，只有在二〇〇〇年起因下水道已經完工，原廢水處理廠址將改建自治會館時，曾經擔任過評議委員長而已。但那也是因為“與住在附近的自治會長有點交情，因為他的拜托才去幫忙，只是擔當協調的任務。會長過去曾是住友輕金屬工會的委員長”。

謙二參加的，是稱為“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的居民運動團體。在監理所反對運動成功之后，參與運動的人們成立了“南陽臺自然守護會”，這便是謙二所參加團體的前身。

雖然成功阻止了監理所設置，但后來南陽臺附近仍持續有土地與住宅開發。日本泡沫經濟開始的一九九一（平成三）年，東京都立大學（二〇〇五年改名首都大學東京）遷移至鄰近的南大澤，這期間土地開發達到最高峰。

此時因為丘陵地住宅開發造成環境的破壞，動畫電影《歡喜碰碰貍》[[2]](#m2_8)甚至以此當作主題，成為當時重大社會問題之一。南陽臺周邊的丘陵地中也有貍貓與野兔，因為持續的住宅開發計劃，壓縮了動物的生存空間，“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即是因應這種情況而誕生。

謙二是從一九九〇年左右在立川體育的工作量減少后開始加入這個團體的。當時有十幾名成員，以監理所反對運動以來的女性成員占多數，但也混有幾位像謙二一樣上了年紀的人。“參加者大多都是喜歡大自然或動植物的人。我過去并不怎么關心環境問題或自然保護，開始注意這些事情，是從實際退休后才開始。我對植物沒興趣，連名字都記不住，即便教我也很快就忘記，不過倒是很喜歡在大自然之中散步。”

“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的定期活動之一，便是到都立長沼公園進行巡邏。在公園管理事務所中，有參與運營自然公園的市民職員，謙二參加的這個會，也成為當地的協辦團體之一。“一組兩個人，每周的周二、四、六會到公園巡邏，確認自然狀態與被破壞的狀況。為了保護住居附近的山林，也從事采伐與除去樹下雜草的工作。”在一九九〇年代，東京都針對這些活動會撥出一些津貼補助，但從一九九九（平成十一）年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后，就把這筆預算刪除了。

謙二另外也參加了“蒼鷹保護會”。監理所停建之事告一段落后，接著住宅都市整備公團又帶來了住宅地開發計劃。約略同時，“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成員發現附近有蒼鷹筑巢。蒼鷹在日本屬于稀少野生動物，發現它們的筑巢地就必須限制開發，作為自然保護運動的手段，這是深具效力的一招。因為從一九九三（平成五）年起日本政府公布了《環境基本法》，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已經義務化。

為了守護巢中的雛鳥不遭盜獵者抓走，大家輪流從遠處監視蒼鷹鳥巢。從鳥巢周圍選出五個地點，兩個人一組從早上八點看守到傍晚五點，是需要長時間站立的監視作業。我連怎么區別蒼鷹或黑鳶都不知道，但似乎需要相當的人數，心想自己多少可以派上點用場，便報名參加了。雖然這么說，當我找到鳥趕緊通知熟悉鳥類的同伴時，卻被告知：“那是黑鳶喔！”

在外包環評公司的協助下，我們也進行過蒼鷹的覓食痕跡調查。也就是調查蒼鷹抓住小鳥或小動物后，在地上進食的痕跡。環評公司里面也有真的很討厭胡亂開發的人，所以能跟他們建立互相協助的關系。不過，一路下到谷地去找蒼鷹進食痕跡，確實是件苦差事。我只有半邊的肺，很容易就氣喘吁吁，所以只參加過一次。

其他還有，同行運來產業廢棄殘土填在附近的谷地（丘陵間的低谷），因此向東京都與八王子市提起訴訟；將谷地附近遭丟棄的休耕農田再度開發，阻止建設公司的開發；并與荒廢水田的地主商量，大家除草伐木，重新筑起田埂。這類勞力工作需要男丁協助，我也去幫忙除過草。

因為這些活動，大家組成了“蒼鷹守護會”與“谷地守護會”等，許多參與成員也都是“多摩丘陵守護會”的會員。

即便如此，附近的丘陵地區仍逐漸被開發成住宅地。雖然住宅開發持續推進，但泡沫經濟結束后人口開始減少，許多都成為賣不出去的空地，只留下對環境的破壞。

但通過大家的努力，南陽臺南側的住宅開發計劃，確實規模縮小許多。從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成功地讓幾處谷地與野生動植物自然生長地，成為東京都認定的綠地保護與山林保護指定地。[[3]](#m3_7)“‘多摩丘陵守護會’的中心成員，大多是中央大學多摩校區的教授夫人，以及南陽臺的鋼琴老師們。在反對設置監理所的運動中，她們只是普通的參加者，但持續不斷地參與運動，這些女性逐漸成為主要成員。在這些運動中，經常只能達成一部分最初的目標，但她們踏實從事運動的態度，確實獲得大家的尊敬。”

此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南陽臺的主婦們也發起了其他的運動。其中為老人家提供食物配送的勞動合作社（works’collective）“加多廚”，便是一例。

這個運動發生的背景，是包含南陽臺在內的幾個周邊衛星城市不斷地老齡化。一九七〇年代入住的居民，雙親往往年事漸高，另一方面因為到市中心上班不方便，孩子們都遷出此地，在這種情況下，連外出購物都困難的老人家庭不斷增加。

當地主婦們組成的合作社團體“加多廚”，便是為了幫這些老人家庭提供食物而組織起來的。她們與生活俱樂部合作社（日本提供國產食材的合作社）有合作關系，而自一九九八（平成十）年起因應《NPO法》[[4]](#m4_6)規定，改為法人組織。因為她們配送便當時也順便巡回關照老人住居，因此獲得八王子市提供的活動津貼。

這些NPO創始者們，與謙二的妻子寬子相當熟，因此謙二多少也參與了該組織的活動。謙二除了出資贊助而成為該NPO的正式會員外，每周一至二次也會擔任便當配送車的司機。由于謙二為了體育用品生意經常開車四處跑業務，所以駕駛技術相當高超。

成為正式會員后，也出席過會員大會。我對這類運動算是外行，所以幾乎都不發言。正式會員出席大會的人并不多，類似我這種上了年紀的人來參與，只讓人想起“枯木亦為山增色”這個諺語而已。參加那些活動的人，如果連大會都不來參與，大概也會失去活力吧。

如前所述，此時期各地因為自然保護與消費者合作社等活動盛行，這些團體作為非營利組織，有一部分也取得了法人資格。活動的主要參與者雖是戰后一代的家庭主婦，但一些領取年金過生活、在時間上有所余裕的銀發族也有不少參與其中。謙二參與運動的軌跡，也可以說是此種狀況的例子之一。

退休的銀發族，許多都擁有在職時期積累下來的技能，例如駕駛汽車、處理會計事務、掌握法律知識等。許多致力于增強地區活力的有志之士便屢屢指出，若地區活動能夠活用銀發族資源，運動將會更有成效。

只是這些擁有知識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帶著不必要的優越感，看不起參與的女性。這種情形在地區性活動中經常發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礙運動發展的瓶頸。謙二因為長久生活在社會底層，即便在上述活動中也自認是“底層的參與者”，這種性格相當程度地幫助他在退休后，仍能順利參與區域性的運動。

## 二、非戰兵士之會

從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謙二到立川體育上班的次數降到每周幾次之后，他也首次給報紙投稿。事情起因于謙二在當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聞》的讀者投稿欄上讀到一篇由十九歲學生所寫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衛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會賭上性命為國作戰，因此“有事立法”[[5]](#m5_5)并不違憲。當時我只打算反駁這位學生的發言，試圖讓他理解真實的戰爭究竟是什么情況，希望他至少要讀過一些戰死學生的信件，大概把這些內容寫下投稿給報社。原以為報社會幫我把信件轉達給那位學生，沒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讀者投稿欄上。

大約與此同時，謙二也從報紙上得知一個“非戰兵士之會”的存在。對不提及戰爭真實情況的風潮感到不滿的謙二，寫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報紙上刊登的該會地址。很快該會的中心成員小島清文回信給謙二，之后謙二便加入該會。

生于一九一九年的小島清文，從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后，在海軍兵科做預備學生，后成為少尉軍官。小島于大和戰艦上擔任密碼員，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轉移至盧邦島的基地航空部隊。而隔年二月美軍登陸后，他立刻被任命為陸上戰斗的小隊長。

小島與基地航空部隊員，在既沒有陸上戰斗經驗又缺乏相應裝備的狀態下參與作戰，最終遭追擊躲入山中，部隊陷于饑餓狀態。小島最后斷然決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隊主動投降。身為日軍軍官，小島成為少數主動投降的例外。小島的父親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義者，小島于學生時代也學過美國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軟的態度對應戰爭。

日本戰敗之后，小島在島根縣的地方報紙從事發行業務，一九八七年六十六歲時，他在《朝日新聞》上投稿發表了自己的體驗經歷。原防衛廳長官官房長竹岡勝美讀到這篇投稿后，便與竹岡、小島及其周邊友人開創了此會。生于一九二三年的竹岡，雖然擔任防衛官僚，但以和平主義者著稱，曾經反對過當年討論實施的《國家秘密法》。以此會為契機，由原日本兵們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集結而成“非戰兵士之會”。

在這個時期，因為戰爭結束已經超過四十年，開始有人討論“戰爭經驗淡化論”。加上曾經親身體驗過戰爭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齡，終于迎來他們回首人生的時期。對他們而言，也終于有時間上的余裕可以參與社會性活動。謙二向報紙投稿，也與這個大環境的動向相吻合。

謙二應小島之邀加入此會，并且每個月都前往參加例行集會。集會上曾邀請過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如自民黨議員宇都宮德馬、鯨岡兵輔，以及社會黨委員長石橋正嗣，推動反核武運動的物理學者豐田利幸等前來演講與回答聽眾疑問。

謙二參加之時會員約有三十名，不過在一年之內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會者不問思想信條，都是有著戰爭體驗并贊同“非戰”旨趣的原日本軍人。不過三分之一的成員大概都是像小島這樣的原學徒兵，而原本的職業軍人卻無人參加。[[6]](#m6_5)該會的代表，是經歷過菲律賓戰爭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會的牧師。副代表為小島與另一位畢業自早稻田大學的海軍預備學生，日本戰敗時以中尉身份駐扎于安達曼島上。

根據一九八八年八月的會員名冊大致可以看出，會員身份以戰時屬于下級軍官，現在職務為公司職員、教師與醫生者占多數。僅從名簿來看，約七十名會員中，包括謙二在內從事“自營業”的只有兩個人。據謙二的說明：“有各式各樣的會員，并非只有軍官或高學歷者。”會員平均年齡六十八，無論“現職”為何，似乎許多人都依靠年金過生活。

小島是國際文化會館的會員，因此最初的例行集會都在該處舉辦。之后移往青山大都會會館，更之后則是澀谷的勤勞福祉會館。包括小島等一些從事和平運動的人，也在各地老師們的協助下，前往學校講述自身的戰爭經驗。

例行集會也邀請過東大教授藤井省三做過演講。聽教授談過“對亞洲的戰爭責任”與“由被害意識轉換為加害責任”等內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論性的東西，內容也太過艱澀，聽完只覺得：“原來如此啊！”

時間來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惡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過世時，謙二這么思考過：“因為自己當過兵，我認為天皇身為大元帥負有戰爭責任。表面上不想說什么，但造成大量人員死亡，還是負有責任的。昭和天皇還有意識的時候應該道歉，也希望他能夠道歉。”

昭和天皇從病情惡化到死亡大約經過三個月，日本國內出現許多所謂的“自肅”行為。“自肅”包括神宮球場棒球賽中止，綜藝節目改換其他節目，帶有“生之歡愉”的文案、廣告海報全部撤換，最后連民間的年終聯歡、新年聯歡會都停止，甚至賀年卡也不寄了。更嚴重的還有十二月時，日本戰敗時曾為陸軍見習軍官的保守派長崎市長，在市議會中提及天皇的戰爭責任時，遭右翼團體成員槍擊而身負重傷的事件。

此時“非戰兵士之會”針對“自肅”風潮發表了抗議聲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該會也開始支援原屬“滿洲開拓團”、當時仍居住于中國的女性渡航返國。后者，NHK還制作了關于戰后這些遭留置中國東北的女性的節目。

謙二雖然贊成這些活動的主旨，但對于該會的進展卻多少抱持著疑慮。

許多組織活動都是采取由中心成員決定方針，之后才傳達給會員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會中，發言者也大致都預先決定好了。自己是認為戰爭經驗不應該遭到遺忘才加入此會，但卻不善于面對政治運動與“論客”們，所以才產生了疑慮。

接著在一九九三年，“非戰兵士之會”會員在會報《非戰》上發生了論爭。小島于同年一月號中寫下提倡“絕對和平主義”的討論，但于塞班島戰役中遭俘虜的原士兵會員們，卻在會報上寫下批評的言論。

批評的主旨在于，反對法西斯的戰斗是“正義的戰爭”，并非純粹的和平主義，為了達到更理想的社會，戰斗仍是必須的。我不認為蘇聯是“正義”的一方，而對他們的論爭，也只認為他們在我不理解的部分爭吵不已。

因為實在不擅于寫文章，所以只在會報上投過一次稿，希望停止這種論爭（《非戰》一九九三年四月）。在這個問題上，我也擔任過一次例行集會的議長，但之后便逐漸遠離集會了。我相當討厭對其他人采取嚴厲態度的人。

謙二與“非戰兵士之會”逐漸保持距離；與此同時，他也展開了另一個活動，那就是重訪赤塔戰俘營。

## 三、重訪赤塔

昭和天皇過世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墻倒塌，東歐各國逐漸走向民主化。對經歷過蘇聯體制的謙二而言，這些變化讓他感慨良多。“因為自己當過戰俘，所以對波蘭的‘團結工聯’與蘇聯、東歐民主化運動深有同感。不過我從沒想過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柏林墻倒塌。”

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時間的謙二，在冷戰結束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往波蘭旅行。他關心波蘭的民主化運動，他過去也自行閱讀過有關波蘭歷史的書籍。

這是謙二首次出國旅行。雖然之前在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曾受立川體育的交易批發商招待，外出旅行過一次，但那次只有寬子一個人前往中國臺灣旅行。謙二相當喜歡東歐，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段還曾前往捷克與南斯拉夫等地旅行。

雖然謙二夫妻也曾一同到歐洲旅行，但因為彼此關心的事物不同，之后謙二便只身一人到東歐、俄國與中國臺灣旅游。有著不服輸性格的謙二，甚至能在國外結交到朋友。他多次與在波蘭認識的日語口譯通信，甚至一九九〇年代也招待過從英國來日的留學生到自己家中進行寄宿家庭訪問。

從一九六四年起，日本人開始可以自由到海外旅行，在此之前如果沒有明確的商業目的或為了留學，便無法出國。一九六四年擁有日本國籍者的出入國人數有十二萬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六九年則有四十九萬二千八百八十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已經超過一千萬人，一九九五年更超過一千五百萬人。謙二開始出國旅行的時期，正好與日本這種國際化的腳步相吻合。

出國人數到了一九九六年之后就達到了上限，之后至二〇一四年為止，人數大概都在一千四百萬到一千八百萬之間來回擺蕩。這又剛好與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日本經濟與薪水金額停止增長后的軌跡一致。

一九九一年四月，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日，并與當初的戰俘營團體見面。當時戈爾巴喬夫帶來了蘇聯保留的三萬八千名戰俘營死者名冊，并承諾剩下的兩萬四千八百人，待調查完成便會轉交給日本政府。

這份名冊也在日本公開，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死者名單也在其中。雖然日本人的姓名通過俄語發音寫成不太確定的片假名列表，但謙二仍可從中找出當時死在戰俘營的伙伴名字。

雖然如此，當時前往蘇聯旅行的限制仍很多，想到赤塔這類軍事城市訪問絕非易事。不過謙二得知愛知縣知多市青年會與商店會，作為社區營造的一環，打算前往訪問與知多市名稱發音相同的赤塔市，因而謙二偕同兩位“赤塔會”的同伴，申請與知多市訪問團同行。

他們一行人從秋田機場搭乘專機，先飛到伊爾庫次克（Irkutsk），接著再轉飛赤塔。時間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距離前蘇聯解體還有五個月。

這是謙二事隔四十三年后再訪赤塔，“火車站幾乎與過去一模一樣，街道也幾乎沒變化”。接著謙二也前往位于市郊的戰俘營所在地。“搭巴士從當年被放下來的火車站到戰俘營，距離竟意外地近，當年步行時感覺相當遙遠。外貝加爾山脈軍區司令部、軍醫院等，以及從戰俘營走到外出工作場地的路旁墻壁，也與過往相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第五師團留下的‘忠魂碑’仍在原處。不過戰俘營已經拆除，成為一片空地。”

之后謙二一行人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秩序井然的俄國人墓園一隅，對方介紹該部分屬于日本人的墳墓。謙二與“赤塔會”的兩位成員，一起于該處獻花。接著謙二拿出在日本預先準備好的硬鋁制板，在旁挖個洞豎立起來。“因為立川體育生意上的關系，認識了制作優勝獎杯的板金商，與那位工作人員商量之后，做了這塊刻有文字的板子。我沒有與其他人商量過，當然制作費用完全是自掏腰包。雖說是硬鋁，但放在戶外風吹雨淋，到現在應該已經腐蝕消失了吧。只是一個自我滿足的動作而已，這樣就足夠了。”

鋁板上刻印的文字如下：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來此地、不復歸故國的戰友的靈前獻上回憶。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文字內容是謙二自己構思的。板子上有謙二與“赤塔會”兩位同行伙伴的名字，碑文也并記俄語翻譯。會想要一并記上俄語，理由是“如此才不會被惡作劇破壞”。“雖說是戰友，但其實是戰俘，我們不曾一同戰斗過，不過也沒有其他詞匯可以說明。說戰友，似乎給人一股軍國主義的感覺，但以歐洲的語言來說‘Kamerad’大概只有伙伴的意思。而日軍幾乎不使用‘戰友’這個詞匯。有一首叫作《戰友》的歌，內容說留下倒下的戰友，繼續前進突襲，之后感到哀傷而哭泣，但這首歌被認定內容表現懦弱而遭禁。”



離開四十三年后重訪赤塔，附近是戰俘營遺址（一九九一年七月攝）

來自知多市的團體中，有位丈夫死于赤塔近郊的諾曼雅戰俘營的女性，因為她想給丈夫掃墓，因此一同搭巴士到諾曼雅，但最終沒找到墳墓。“說要去掃墓，卻連墳墓都沒有，當初只是被埋在戰俘營附近的土地，所以預計應當是找不到了，結果果然如此。無計可施之下，只好在小鎮外燃起線香，那位女性應該就此了卻了一樁心愿吧。”

回到赤塔的旅館，旅館內負責室內工程的泥水工雖是個蒙古人，卻以日語跟謙二搭訕。只是附近有俄國人時他就閉嘴，俄國人離開他才又開口。“問他為何會說日語，他說戰前他還是小孩子時，曾住在內蒙古，當時與日本殖民者的小孩們一同玩耍，所以記得日語。因為當時還在蘇聯的體制底下，所以應該很難與外國人交談。”

那位蒙古人邀請謙二到他家，順帶也邀請了“赤塔會”的兩位成員，但他們拒絕了。因為當時還處于有秘密警察的時代，日本人仍對接受當地人招待有所疑慮。

到了夜里，那位蒙古人的兒子開車來接謙二，他們一家人住在國宅公寓，蒙古人有一位俄羅斯太太和一個兒子。雖然過著中產的生活，但家中電器商品卻很少。“他說非常懷念日本，聊了好幾個鐘頭有關日本的話題。他說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與中蘇對立的時期，越過國境來到蘇聯的。”

聽對方說，亡命蘇聯之后還成為對中諜報要員。當時亡命的人，都遭蘇聯秘密警察監視，據說如果不協助蘇聯，就難以生存。

會與我這個素不相識的人搭話，大概是他想起歷經這些苦難前的年少時代，喚起了當年與日本相關的記憶吧。日本在他十五歲左右戰敗，在此之前他可以說是日本皇國少年一代，“文化大革命”期間，應該被打成了親日派吧。

我問對方，當時他都讀過些什么書，他回答：“讀過櫻井忠溫的《肉彈》。”這是本描繪日軍攻占旅順，給兒童閱讀的忠君愛國故事。或許是因為之后的生活太過勞苦，所以才在腦袋里把戰前的日本理想化了。

那位蒙古人對謙二說：“想要知道二戰的戰史。”謙二回到日本之后，將羅伯特·夏洛特的《太平洋戰爭史》寄給對方。“不過比起這種客觀的歷史書籍，或許對方更偏好英雄式的故事吧。對方也不太會寫日文信件，之后就失去音信了。”

赤塔回程中，謙二也順帶前往烏蘭烏德與伊爾庫次克，之后才返回日本。謙二打算讓自己的西伯利亞記憶就此告一段落，不過卻事與愿違，之后事態又出現新的發展。

## 四、只撫慰、不賠償

一九八八年，針對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亞的人，日本政府開始實施“和平祈愿事業”并發放“慰問金”。而這也成為謙二涉入戰后賠償審判的契機。

擁有申請資格的人，是服役期短于三年而無法領取軍人退休金者，或是無法領取共濟年金（付給國家公務員的年金系統）的人。慰問內容包括給予十萬日元的國債、慰勞品銀杯一只，加上一張首相頒發的“獎狀”。申請者先到市、町、村單位領取表格，填妥后向這個經由特別立法而成立的和平祈愿事業特別基金提出。

要理解施行這項政策的背景，就得先理解戰后日本政府如何對戰爭受害者進行賠償。

簡單來說，戰后的日本政府，對戰爭被害者采取不賠償的態度。至于不賠償的立論基礎，在于“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如果只針對特定被害者進行賠償，將會造成不公平的狀況。不過實際上，日本政府擔心的恐怕是，即便對一小部分受害者進行賠償，往后便像掀開冰山一角，來自國內外的賠償要求將永無止境。

因此，對于陣亡的軍人、軍眷及其遺屬，或者遭空襲、原子彈轟炸的受害者們，日本政府一貫的立場都是不予賠償。取而代之的，便是擴充戰前即已施行的軍人退休金制度。

軍人退休金制度在日本戰敗之后曾經一度被廢止，直至一九五三年起又再度恢復。可是軍人退休金與厚生年金制度等一樣，如果沒有在軍隊服役超過一定時間，就沒有資格領取。關于服役時間，士官以下需要超過十二年，準尉以上要超過十三年。

此外，因為服役時間長短與位階高低的不同，能夠領取的金額也不同。恢復后的軍人退休金有個傾向，那便是在職業軍人中，位階愈高者就能夠領到愈多額度。其金額，上將每年可領取超過八百萬日元，校級據說也可以年領五百萬日元左右。政府支出用于軍人退休金的預算，二〇一四年度因為領取者減少，共支出四千二百一十七億日元，但在之前的一九八八年，則高達一兆七千一百六十六億日元。

類似謙二這種大戰快要結束時才受到征召的人，幾乎都沒有領取退休金的資格。就算采取特殊的加算制度，替派往激戰地區的人增加服役年數，整體狀況還是無甚變化。前面提到的，蘇聯拘留者的“和平祈愿事業”以無法領取軍人退休金者為對象，便是基于上述原由。

那么，這樣的事業為何采取“慰問”或“慰勞”的形式？這也是前述日本政府基于不執行“賠償”的原則下所采取的措施。

除了軍人與因公死亡者的賠償請求之外，還有一類空襲被害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原子彈爆炸的受害者。一九九四年，《原子彈爆炸被害者援護法》完成。不過這也只是把過往由各區域行政單位負責執行的健康管理與醫療保障更加制度化，其立法主旨并不在“賠償”，至多只是一種醫療援助的形式而已。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對原“從軍慰安婦”的“補償事業”啟動了。不過這并非由國家出面，而是由民間籌款的“為了女性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負責支付“補償費”，再搭配政府的醫療、福利支援事業一并施行。

換言之，日本政府采取的原則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國家不會“賠償”。如果面對強烈要求時，便改以“慰勞”“慰問”“醫療援助”等方式執行，但并不由政府直接支出費用，而是采取設立民間團體或外圍團體、由該團體的基金支付的形式；通過這種方式，多少可以更有彈性地處理這類問題。某位新聞記者扼要地形容這種做法是“不賠償、不道歉，但撫慰對方。這就是日本的國家立場”[[7]](#m7_4)。

必須留意的是，從這個原則可以看出一種態度，那就是并不只針對其他國家的戰爭受害者不賠償，而是不管是否擁有日本國籍，基本上都無礙于此原則的貫徹執行。只不過沒有日本國籍的人，更容易被排除在“慰勞”“醫療保障”的適用范疇之外，說穿了，就是這么回事。

有一種論調說，日本一直不愿面對亞洲的戰爭受害者，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政府對擁有日本國籍的戰爭受害者就會給予充分賠償。如果有人認為上述原則只適用于其他國家的戰爭受害者，那可能是因為，這些人對日本政府提供國內戰爭被害者的賠償認知不清。

如眾所見，一九八八年對西伯利亞拘留者們的“慰問”，可說之后也為其他國家的戰爭受害者，塑造了一個如何應對處理的原型。政府另外成立一個“和平祈愿特別基金”，通過由該基金會支付慰問金的形式來處理，稍后的“為了女性的亞洲和平國民基金”便與此非常類似。

以下概略地說明，曾遭蘇聯拘留的日本人如何展開賠償要求運動的過程。

遭拘留者的賠償要求運動，其實早在戰后便已展開。但根據一九五六年《日蘇和平條約》，日本政府放棄對蘇聯的賠償請求權。包括與韓國政府于一九六五年達成的《日韓基本條約》，以及在其他亞洲諸國一連串的邦交恢復談判上，都放棄對日的賠償請求權，同樣地，日本政府也放棄了對蘇聯的賠償請求權。

因此，在西伯利亞遭拘留的人，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對日本政府發起要求支付勞動工資的運動。這項要求的依據在于，國家有義務支付軍人生活費與薪資，即便成為俘虜，依照國際慣例，俘虜所屬國的政府仍須負擔他們的生活費用與薪資。

一九四九年，依據《日內瓦公約》（第三條，日本于一九五三年批準），俘虜的勞動工資，依照俘虜國發給的勞動證明書，須由俘虜所屬國支付。實際上日本政府對于南方戰線遭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俘虜的日本人，其付出的勞力，在戰后都已發放全部工資。可是蘇聯即便提供了勞動證明書，日本政府卻未對遭蘇聯拘留者發放相對應的工資。

一九八一年“全國拘留者賠償協議會”（日文原文“全國抑留者補償協議會”，簡稱“全抑協”，以下簡稱照用日文原文）的原告二十六人，在東京地方法院對國家發起“償付未發放的勞動薪資”的訴訟，但東京地方法院于一九八九年判決原告敗訴。判決理由是，原告大部分都在國家批準《日內瓦公約》之前回國，所以不適用于該條約，而且“原告提出的損害，系國民應共同忍受之戰爭受害”。

對此，“全抑協”于一九九一年戈爾巴喬夫訪日時，要求發放勞動證明書。一九九三年訪日的葉利欽總統也發表“我代表俄國政府、國民，對此種非人道行為表示道歉”的論述，之后發放了勞動證明書。[[8]](#m8_3)

蘇聯解體后，從蘇方公文檔案中可以找出，日本即將戰敗之前曾經與蘇交涉，由日本政府與關東軍提議，將日本俘虜供作蘇聯勞役的資料。因為這件事的緣故，許多被拘留者都對日本政府抱持著不信任與憤怒。

“全抑協”因對地方法院不服，繼續提起上訴。但東京高等法院在一九九三年、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都判決原告敗訴。但最高法院也說明，對于原告們的“不滿心情，并非無法諒解”，因此敦促由“立法機關裁量”賠償。[[9]](#m9_2)

另一方面，在這些運動與法院判決之外，也有通過與執政黨的協調，爭取賠償的舉措。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政府與執政黨的協議之下，總理府總務長官設置了非官方之私行咨詢機關“戰后處理問題懇談會”。在該會中檢討了西伯利亞拘留者、無資格領取軍方退休金者，以及“滿洲國”與其他各處撤退回日者的在外國資產，能采取何種方式進行賠償。

檢討會于一九八四年提出答辯。其中關于西伯利亞拘留者部分，他們批評道，西德政府曾對自國軍隊的俘虜進行賠償，但日本卻不對俘虜付出的嚴苛勞動支付相對應的賠償，故檢討會提議，應該提供某種形式的“慰藉”作為補償。只是，“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因此針對某些特定對象采用新的措施，將出現不符公平原則的問題。

另外在一九八六年，自民黨針對西伯利亞拘留者擬出了《特別給付金支付法草案》，但并未提交立法。一九八七年，前述的《和平祈愿事業特別基金設置法案》獲得通過，一九八八年基金會展開其業務；但謙二當初并未對此和平祈愿事業提出申請。

日本政府的態度，竟然是打了一場毫無道理的戰爭卻不追究責任，即便戰爭輸了，只要維持制度的合理性就好。很快便給高階軍人退休金，事到如今才給我們十萬日元，還帶個銀杯。這些竟然還是由中央空降官僚主持的基金會來處理。

我認為這根本就是在敷衍塞責。即便金額不多，如果戰敗之后立刻支付，大家應該會心存感激，畢竟國家在這么艱難的處境下還撥款下來。事到如今，我不想要這筆錢，也不要這份心意了。

不過，謙二仍然在一九九〇年四月申請了這個慰問金。申請的原因是，與他待在同一戰俘營的朝鮮族中國人雖是舊日本兵但卻沒有資格申請，謙二知道后以自己的名義申請，并將款項分給了對方。

## 五、殖民地征兵問題

謙二知道吳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戰兵士之會”后沒多久的事。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會報《非戰》上連載了吳所寫的手記《不帶槍的士兵》，內容講述日本戰敗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關東軍，連武器都沒配備便上戰場作戰，結果身負重傷，成為蘇軍俘虜，之后在赤塔的陸軍醫院接受治療，并輾轉于各處戰俘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區第二分所的故事。

謙二讀過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個轉移來的俘虜名叫“吳橋秀剛”。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當時幾乎沒說過話。不過很少發生只有一個人轉移過來的情況，當時還想大概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記憶中只知道他很能講俄語，是個朝鮮族。這篇文章說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記的許多描述都喚醒了謙二的記憶。吳雄根出生在現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野戰醫院時偶然拿到一本日語的《俄語讀本》，于是一面在戰俘營勞動，一面將俄語學到精通。之后要求他擔任翻譯，配屬在赤塔的火車機關車修理工廠工作。蘇聯的“政治軍官”要求他密告“前職者”（擔任憲兵或特務機關的人員），但遭他拒絕，蘇軍因此免去他的翻譯職務，并將他送至第二分所。

謙二思索“吳橋”這個姓，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在朝鮮施行“創氏改名”，所以才換成這種日本式的姓。稍后謙二向《非戰》的編輯部詢問作者住址，接著寫信給這位在中國的吳先生。謙二寫了當時許多戰俘營的情況，內容也問及對方是不是當時的“吳橋”。

過了一陣子收到回信。“當然他不知道我是誰，但回信中說明他確實是當時的吳橋。”此后兩人之間開始持續數次書信往來。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隊中，當時被視為日本一部分的朝鮮半島出身者共有軍人十一萬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軍屬（為軍隊工作但非正式軍人）十二萬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樣的，臺灣也有八萬零四百三十三名軍人與十二萬六千七百五十名軍屬。朝鮮人當中戰死或者行蹤不明者共有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為蘇軍俘虜的朝鮮人原日本兵的數量，有各種說法，大概有一萬人。他們回到韓國之后，也因“原日軍士兵”身份遭到歧視，并帶有“共產主義間諜”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發生過大約五百名韓國人俘虜越過“三八線”回國時，遭韓國士兵誤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m10_2)

他們回到韓國后，遭到公安警察訊問、警察監視與就業上的歧視，處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韓國政府重新修正歷史觀，才恢復了他們的名譽。[[11]](#m11_2)

中國臺灣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亞者。根據其中一人的回憶，因為國民黨的持續壓迫而無法返回臺灣，最終只能留在日本[[12]](#m12_1)。即便他回到臺灣，恐怕處境也不會好過上述韓國人拘留者。

吳雄根雖然回到了中國，但他還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從延邊大學畢業成為醫生，卻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檢舉是“日本關東軍思想反動分子”[[13]](#m13_1)。

吳雄根并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與和平祈愿事業，并且無日本國籍者，無法成為和平祈愿事業的申請對象。

但謙二考量，“這種慰問金更應該支付給類似吳這種處境的人”。謙二說：“朝鮮人被當作日本人征召，現在因為是外國人所以不支付慰問金，這太奇怪了。”

謙二申請了自己的慰問金，領取了十萬日元國債，并將其中的五萬日元送給了吳雄根。“本想全額都送給對方，但一方面考慮對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傳達彼此相互連帶的想法，所以采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戰結束前，朝鮮人、臺灣人都擁有日本國籍。日本戰敗后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發出“外國人登錄令”，擁有日本國籍者，如持非日本內地之朝鮮、臺灣戶籍，“短期之內”將“視為外國人”。接著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領期結束后，立刻片面剝奪這些人的日本國籍。

在此之后，想要取得日本國籍，就得通過正常的“歸化”手續，申請“歸化”必須接受財產、納稅額等的審查，能否通過完全取決于法務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簽訂《日韓合并條約》時，日本就未給當地居民選擇國籍的權利，單方面賦予日本國籍。且對他們而言，連脫離日本國籍的方法都沒有，因為日本政府懼怕亡命中國東北從事抗日運動的朝鮮人，會借由脫離國籍使自己處于日本警察管轄范圍之外。[[14]](#m14_1)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對華《二十一條》與《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中，主張當時中朝邊界的“間島省”朝鮮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轄權及于他們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戰爭白熱化時，日本政府在朝鮮也發布了征兵令，最后連間島地方居住于中國東北的朝鮮族人也成為征兵對象。就這樣，類似吳雄根這樣的朝鮮族人、臺灣人原日本軍官兵，從未擁有過國籍選擇權，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軍征召，又在不知不覺間失去日本國籍，無法領取退休金等各種補償。

一九九〇年五月，謙二送了五萬日元給吳雄根，并寫了如下的信件[[15]](#m15_1)：

幾年前，日本政府針對原來在蘇聯成為戰俘的軍人們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給這些軍人十萬日元。但該法不適用于外國人。因此，我把自己領取到的一半，五萬日元轉送給您，當作是一個日本個人所表達的道歉之意。

很快吳雄根便回了一封誠摯感謝的信。但他對沒有日本國籍便無資格申請一事，似乎感到無法諒解。他認為自己應該也擁有領取慰問金的權利，因此順便通過信件爭取謙二意見。“老實說，收到信覺得很為難。”謙二說，“從一般常識來思考，他無法支領慰問金這件事處理方式確實不當，但同時日本政府的防衛心又很強。”

謙二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調查。接著將日韓、日中恢復邦交時，政府之間互相放棄賠償請求權，以及如要發放慰問金給吳，勢必得修改關于和平祈愿事業的法律規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說明。

但吳雄根似乎仍無法接受。謙二又進一步寫信說明，即便擁有日本國籍，日本政府仍拒絕支付原戰俘們的勞動工資。謙二自己也申請了勞動證明書，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資未領的證明；但即便有勞動證明書，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沒有改變一貫態度，這點謙二在寫給吳的信中也詳細說明。

接下來一陣子，吳雄根未再來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態卻朝著想象不到的方向發展。吳雄根到日本來發起訴訟，并邀請謙二一起成為共同原告。

## 六、我完全不在意別人的評價

吳雄根等朝鮮族原西伯利亞拘留者們，這個時期也展開了他們各自的活動。

一九九一年，俄國與韓國恢復邦交，韓國的原蘇聯俘虜們組成了“西伯利亞朔風會”。他們前往位于首爾的俄國大使館，要求發放勞動證明書。這個活動的時代背景，包括了韓俄恢復邦交帶來的冷戰結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韓國已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韓國民主化之前，對日本要求戰后賠償的聲音，都被壓制下來，原因在于韓國政府依照《日韓基本條約》已經放棄對日的賠償請求權。換言之，對日本的戰后賠償要求，在韓國政府看來，帶有某種批判政府的傾向。

韓國的太平洋戰爭犧牲者遺族會會長，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訪談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犧牲者集會中，說出‘應該追究日本責任，大家前往日本領事館吧’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對我們的阻礙，一直持續到一九八八年盧泰愚總統推動民主化為止。”[[16]](#m16_1)

不僅韓國，類似的狀況在亞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當普遍。臺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遺族協會會員，也證言道：“如果采取政治手段，會立刻遭逮捕下獄。他們根本不把受過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里，我們對日本的要求，遭到來自國民黨的阻撓。”殘留于庫頁島的朝鮮人，在蘇聯時代被禁止參與一切政治活動，他們也陳述過，當時根本不可能發起返國或要求賠償的政治運動[[17]](#m17_1)。

但隨著冷戰結束與亞洲各國的民主化，這些壓迫獲得解放，亞洲各地區陸續提出賠償要求。在韓國，原蘇聯俘虜們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發起運動，韓國的原日本軍人、軍屬三十五名，于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婦”，這也成為“從軍慰安婦”要求賠償的開端。

與一些人的認知有落差，事實上由所謂“從軍慰安婦”發起的賠償要求，在這個時期只占全體的極小一部分。那些來自朝鮮與中國臺灣地區的原日本軍人、軍屬們，要求與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與其他各種要求的運動，在更早期便已存在。電影導演大島渚也曾以這些人為題材，于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制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卻的皇軍》的紀錄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亞拘留戰俘的在日韓國人李昌錫，發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確認訴訟。對此京都地方法院于一九九八年判決，認為《恩給法》[[18]](#m18_1)的國籍規定條例并無違憲，戰爭受害的賠償應由“立法機關裁量”為之。

對此，李則說明：“戰爭時賭命作戰……如果是日本人早就獲頒勛章了。我不要錢，只要平等對待。”[[19]](#m19_1)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決他敗訴。二〇〇三年，韓國“西伯利亞朔風會”的會員們，對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與賠償的訴訟。

如前所述，吳雄根于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謙二的五萬日元。根據林永大的描述：“這件事情立刻在延邊的西伯利亞相關人士間傳開。為何日本政府的慰問金十萬日元只給日本人，大家都說我們也有權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20]](#m20_1)

依照林的說明，與吳雄根一樣遭拘留西伯利亞、之后返回中國的朝鮮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吳雄根為了與日本政府交涉賠償事宜，開始聯絡散居中國各處的西伯利亞返國者，并制作人員名冊。

最后終于以五位原戰俘為中心組成了“中國前蘇聯拘留者協議會”，由吳雄根擔任會長。根據他的調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虜本人及其遺族。他更進一步與日本的“全國拘留者賠償協議會”交涉，使協議會成為其分會之一，接著由日本向俄國政府遞交發放勞動證明的申請書，并負責收取證明書。

但該團體的活動卻在一九九二年終止。當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復邦交二十周年紀念，適逢日本天皇訪中期間。

不管有怎樣的大環境背景，吳雄根等人的活動暫時停止了。根據林永大的說法，一九九五年的時點上，吳雄根對林如此說過：“就算只有我一個人，也想從俄國政府拿到勞動證明書。”“如果能拿到俄國出示的勞動證明書，就能證明一個朝鮮族人確實進過西伯利亞戰俘營，可以依此為證。”[[21]](#m21_1)而吳來訪日本，則是翌年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邀請吳雄根來日本的，是“要求對朝鮮與朝鮮人公開道歉賠償審判促進會”這個團體。該會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宋斗會的“在日朝鮮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宋斗會，一九二〇（大正九）年來到日本，成為京都日蓮宗寺院的徒弟，并于該地生活。一九三四年前往中國東北，從事過各種各樣的活動。

戰后，宋在中國東北遭到國民黨拘留，一九四七年才“歸國”回到日本。但隨后在日本政府剝奪國籍的政策下，失去了國籍。對此，宋于一九六九年發起“日本國籍確認訴訟”。接著一九七三（昭和四十八）年，他在法務省前燒掉了自己的“外國人登錄證”，聲明自己擁有日本國籍。[[22]](#m22_1)

之后宋輾轉日本全國各地，住在當時京都大學學生自治會自主管理的熊野寮一室。他與日本的協助者結成集會組織，支援“浮島丸事件”的韓國人存活者與遺族們共同發起的“違反安全管理義務和賠償請求訴訟”。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艘返回朝鮮的船只在舞鶴港海面發生爆炸并沉沒的事件。一九九二年對此事件提出訴訟，二〇〇三年國家承認應當負擔部分責任。

宋所屬的團體，于一九九六年三月邀請吳根雄來日。除了在九州、京都、東京等地集會發表演講，也向國會議員、政黨、總理府等處陳情。

吳陳情時，也邀請了謙二。謙二也“叫上同分所的朋友們，以支援的形式”一同前往。

不過謙二對這類活動并不抱持太大期望。在吳雄根寫給謙二的信件中，說明在中國推進的這些運動也不見成果，因此希望發起訴訟。但謙二則回信：“我非常能夠理解您的遺憾，但如果給您提供充滿希望的資訊或觀察，從結果來看反而是一種罪惡。”說明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對運動成果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即便如此，謙二仍與吳一同前往拜訪國會議員與總理府。根據謙二的說法：“遭到對方虛與委蛇又毫無效用的對待。我會一同前往，但只是想幫忙帶路，帶他到各個要提出訴求的地方而已。”

在這個過程中，對方委托謙二共同作為訴訟的共同原告。這個委托，也通過無償幫助吳雄根進行訴訟的律師傳達給謙二：對國家提起訴訟，要求提供損害賠償與公開道歉。

宋斗會讓人很難理解，因為在大家看來這樣的訴訟也不可能打贏。老實說收到委托時，有點不知該如何是好。不過我認為對方的說法還算正確，如果要干的話，也不是不行。自己身為一個日本人，應該為吳先生做點什么，帶著這種想法接受了委托。

當時完全沒想過諸如牽扯上了這種事情很麻煩或擔心周遭的眼光等問題。反正我自己生來屬于“下層的下層”，別人對我的評價、說三道四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

亞洲各地區對日本發起的戰后賠償訴訟，幾乎沒有任何擁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同列共同原告的例子。在西伯利亞戰俘問題上，有各式各樣立場的“原日本兵”同樣都是受害者，日本的戰俘團體雖然協助過韓國或中國的戰俘，但從未出現并列共同原告的例子。

一九九六年九月，終于向東京地方法院遞出訴狀。“日裔日本人原俘虜”與“朝鮮裔中國人原俘虜”，在本國保守派的支援下，發起史無前例的訴訟。

## 七、國民的良心

謙二他們的訴訟，于一九九七年一月開始第一輪公審。但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并非損害賠償、應屬于行政訴訟的發言后，便宣布退庭了。更換法官之后，于五月十三日舉行第二次公審，原告終于獲得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天謙二與在“非戰兵士之會”結識的兩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寫有部隊名與軍階名的白色肩帶，從地鐵站走向法院。這是宋斗會提議的宣傳訴求手法，但卻沒有大眾媒體前來采訪。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團體，以及謙二的家人而已。

吳雄根在法庭上說明被送至西伯利亞的經過。律師要求“希望唱出征時聽到的軍歌”，吳在法官面前唱起當時的軍歌，歌詞如下：

代天行道討不義

忠勇無雙我軍兵

歡聲雷動相迎送

今當出征為家國

事后吳雄根自己如此寫道：“我當時的心情根本不想唱這首歌。但（律師）如此要求下，于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邊境的石硯鎮，飄然飛舞的日之丸國旗與母親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車時聽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書》，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終于輪到謙二站到證人席敘述遭拘留的經過，以及如何與吳根雄相識。當時他準備了“意見陳述書”，在法庭上幾乎全部依照該書宣讀：

我成為本次訴訟的原告，目的并非金錢，只想為吳雄根的控訴進行代辯。又希望通過本次訴訟，看到日本能夠成為真正尊重人權的國家，這是我對此次審判的期望。

戰后我在戰俘營待了約三年時間，當時吳雄根也與我同在戰俘營。他生于一九二五年“舊滿洲”的延邊地區。

他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十日他于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卷入戰斗中并身負重傷，被送到蘇聯境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兵的事實使他遭受了許多歧視待遇。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認為他的情況不符合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著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合并朝鮮，一度使朝鮮民族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身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征兵，成為關東軍士兵之后又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補償、慰勞，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被征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賠償，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

在這樣的問題上，不能僅思考一個日本國內通用的做法，更需要考量一種國際上通行的做法、邏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本一樣，歐美各國也有殖民地，其他民族、外國籍的人們也成為軍人，為宗主國而戰。在戰后補償上，沒有國家會因國籍不同而采取差別待遇。作為戰勝國的美國、英國、法國自不待言，戰敗國的意大利、德國亦然。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蘭、厄立特里亞、利比亞等殖民地軍人皆進行了賠償。即便沒有殖民地的德國，在此舉一個例子，我讀過一本叫作《在波羅的海海濱》的書，由戰前拉脫維亞大使館陸軍武官的太太撰寫，內容描述一位拉脫維亞陸軍中尉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他為了謀求當時遭蘇聯占領的祖國獨立，加入了德軍的拉脫維亞人部隊，之后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待德國戰敗后他便亡命到瑞典，至一九八〇年過世為止，一直以德國軍人的身份領取年金。另外也有烏克蘭人同樣加入德軍，戰后亡命至美國，卻仍舊在德軍的賠償范圍之內。

這樣的舉例應該很清楚了吧。他們從來不曾是德國的國民，對德國而言，他們也始終都是外國人。

身為日本國民并服兵役的吳根雄，日本國對他的處置，是否有錯？

何況，為國而戰是一種可能喪命的行為。不管是受命或自愿，都屬于國家和個人的一種契約，一種雇傭關系。

在這種狀況下，國籍根本毫無干系。

這是一種近代國家的常識。日本對人權的思考，在國際上既不通用，也談不上是文明國家或現代國家的做法。

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后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代。

最后是對法官們的期望。去年三月吳雄根來日本時，我也與有志一同的伙伴們共同前往國會、議員、政黨、總理府等處，為此事來回奔波。

確實我們獲得了同情。但什么狀況都沒獲得改善。

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都不作為的話，我們除了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別無他法。或許我們的想法過于單純，但我們相信法律的精神，仍會保障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權。同情，已經足夠了。無論如何請看清事實本身，希望能正面面對事物的本質，依據論理做出合情的判斷，以上，是我個人的期待。

對于在法官面前朗讀這份陳述書，謙二這樣表示：

我沒想過能打贏官司，只是在口頭辯論能夠利用的二十分鐘內，闡述我自己想表達的話。為了沒必要的戰爭出征，被迫從事沒必要的勞務，造成大量的親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戰爭讓存來養老的財產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許多苦難。向法官陳述這些事情或許毫無幫助，但總是要把心里想說的話一吐為快。

口頭辯論結束后，謙二帶著訪日的吳根雄在日本旅游。“到伊豆半島搭‘日式榻榻米座位列車’，一起去洗溫泉等。他也從中國帶了伴手禮來，十分樸素的一個人。”

如前所述，開庭當天并沒有大眾媒體前來采訪。事前有一些報紙訪問，刊登了一些周邊報導，但也僅止于此。當時的戰后賠償審判數量很多，這次的審判并不如“從軍慰安婦”問題一般，能夠獲得公眾廣泛的關注。謙二如此表示：“我沒怎么意識到同時期在打的其他戰后賠償官司。報紙刊出的報導也鮮少有回響或支援。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多想也沒幫助。與我有往來的‘非戰兵士之會’舊會員們，倒是一路陪我走到最后。”

之后的訴訟，幾乎都是由律師與法院以書面往來，在謙二沒有機會發表證詞的狀況下進行。二〇〇〇（平成十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做出請求駁回的判決。判決主旨有：一、關于損害賠償，因為“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所以無法進行賠償；二、關于公開道歉一項，屬于“立法機關的裁量性判斷”。

已經回到中國的吳雄根接到判決通知后，據說“充滿失望與憤怒，在滿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吳根雄在稍后的上訴書中也表達：“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訴我，我身為朝鮮族為何要為日本國與日本人民承受這些損害？”“人性與正義根本不適用于日本法官！”（前揭“上訴書”）。

這樁訴訟案后來仍繼續上訴，但二〇〇一年遭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之后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駁回定讞。對此謙二如此描述：

當最高法院宣告駁回時，法院的態度只有“結束了，請由此離開法庭”，類似這般草草結束的感覺。那個時候甚至還有人發出不滿的叫嚷。

跑去干那種事情，要把自己說成好事之徒也無不可。不過還記得宋斗會的支持者事后打電話給我，說過“雖然訴訟結果如此，但在書面上留下了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意義啊”這么一段話。當時聽了才想到，原來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理解，能在法院堆積如山的案牘中留下資料，確實有一定意義。

發掘堆積如山的案牘資料并賦予其意義，屬于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域。擔任這場訴訟的律師，在訴狀中如此描述謙二：“即便國家缺乏良知，但在無意之中，與國家的不義相對照，這個國家的國民卻仍表現出了良心。”這樣的評價是否恰當，套用一句陳腔舊調來說，就是“留待歷史評價”吧。

## 八、只要還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吳雄根的訴訟起于一九九七年，當時謙二已經七十二歲。這一年，謙二也從每周前往立川體育一兩次，轉為完全退休了。“立川體育完全由大木一個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歲可以領取年金后，公司便關閉了。創立公司只是為了糊口，因此事業就此結束也沒有特別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駁回謙二與吳雄根的上訴后，謙二因腦梗塞而倒下。當時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認識的主婦們邀約下，前往自治會館參加英語口語課，一陣暈眩下竟無法站立。“在場的人立刻幫我叫了救護車，緊急送往醫院。當時自己還想，我這么一把年紀了，還叫救護車來，未免太夸張。不過當時聚會中的年輕婦女們，有人曾有為自己孩子叫救護車的經驗，不見得要什么重大傷害才動用救護車。若非如此，延緩送醫可能就導致我半身不遂了。”

謙二左半身還留有輕微的麻痹癥狀，不過在復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愈了。與周邊居民有著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這種狀況下得到非常多的幫助。

不過腦梗塞倒下時，謙二已經七十七歲了。因為這次病倒，也順勢退出了派送便當的“加多廚”與“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活動。“中風之前大約兩年，巡邏長沼公園爬坡時，便開始喘不過氣了。像我這種不具專門知識的‘其他大眾’參與者，趁此退下來也不算壞事。”

二〇〇三年，這次輪到妻子寬子在庭院跌倒，折斷了手骨。之后寬子開始有憂郁的癥狀，身心狀況不佳，頻繁進出醫院。寬子因為郁悶而無法掌管家事，謙二開始接手做飯的工作。

原本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寬子因為去學習圍棋、英語口語、繪畫等課程，每逢周二與周五就輪到我負責做飯。當時寬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資料都寫成筆記。因為有這段經驗，即便從七十八歲才開始全面接管家中廚房作業，多少還是應付得過來。這把年紀的男人還懂得做飯，竟傳為佳話，在隨著“加多廚”便當配送附贈的“居民通訊”中，還介紹了一下。

在西伯利亞時下定決心，不論如何都要活下去，戰后也如此，不管什么工作都做。做飯什么的，本來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也是理所當然。而且自己做飯，可以選自己喜歡吃的東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吳雄根曾經再度訪日，當時是因為“全國拘留者補償協議會”（“全抑協”）召開集會，邀請中國的吳雄根和韓國拘留者團體的會長。吳雄根與新聞記者以及“全抑協”接待人員等，一同來到位于八王子的謙二家中拜訪。

這個時期，“全抑協”推動了最后一次的嘗試——二〇〇五年，民主黨、共產黨、社民黨三黨聯合向參、眾兩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時間長短，由國家支付三十萬到二百萬日元，但該法案于二〇〇六年遭自民黨、公明黨執政二黨否決。

但執政黨也提出妥協法案。于二〇〇一年廢止被批評為“退休高官再任職的溫床”的和平基金會，以基金余額為資金，發給遭拘留者、戰后撤退回本土者、無法領取退休金者“特別慰勞品”。這個法案獲得通過，而且也發下了慰勞品。

慰勞品可從旅行券十萬日元、座鐘、鋼筆、文書匣之中擇一，照例不發給無日本國籍者。謙二再次申請了旅行券十萬日元，并換成現金寄贈給吳雄根。

每逢選舉，謙二依舊投給自民黨以外的候選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給民主黨，并說“感覺有希望政黨輪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黨政權下通過了《西伯利亞特措法》。法案內容是過往民主黨法案與自民黨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額依照拘留期間長短，從二十五萬日元到一百五十萬日元，財源則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繳回國庫的資金當作資本。

如此，這樣的內容既可以解釋為由國家支出進行實際賠償，也可以說只是由自民、公明兩黨原案籌措的基金余額權充支付，兩套說辭皆可自行詮釋。法案中雖然沒有明文記載“賠償”字樣，但有說明今后的方針將會朝推動調查、記錄當年拘留實際狀況而努力，提案說明中也陳述了道歉與賠償的主旨。依據這項法案，還活著的賠償對象共有七萬人左右，但一樣排除無日本國籍者。獲得此項成果后，“全抑協”也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宣布解散。

我從一九八〇年代起便意識到“全抑協”的活動，但并未參加。在“赤塔會”中，我們也不提這類運動的話題。正如軍人退休金一般，國家只支付金錢給有權力的人，不支付給無法發聲的人。雖然“全抑協”的活動還算有道理，但我在最高法院上訴輸掉后，便放棄不去理會這些事情了。之后他們還能重新振作，發起運動，而且得到這樣的成果，我覺得相當了不起。

雖然如此，但我內心還是十分不滿，所以一開始并沒有申請。因為那是拿“退休高官再任職的溫床”——和平基金會解散后剩下來的錢來發放。我自己對國家有所怨恨，所謂的國家，與人心不同，只是一種無機的物質。

不過，最后謙二還是申請了這次的發放。雖然已經不與吳雄根聯系，但他也找到別的寄贈對象。

申請期限只有三年。在截止期限前大約半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三月，讀到一篇刊載于“全抑協”會刊《極光》上的文章。有個女兒撰文提到想為父親立紀念碑，他父親從庫頁島被送至極北地區的諾里爾斯克戰俘營，并且死在該處。她為此募求費用，為了響應她，我申請了二十五萬日元，一半送給這位女兒，另一半捐給了“全抑協”，這也是最后的申請了。

一次性的慰問金也好，道歉也罷，戰后立刻拿出來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著“賠償！賠償！”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筆錢。從這種國家機構領到以這種態度支付的賠償費用，一點都不想感謝國家。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因為當時是民主黨政權，所以才能辦到這件事情。

二〇一一年三月，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與核電廠爆炸事故。“關于核電廠的事故，從之后的新聞報導才知道，那是原本該發生的事情終究發生了而已。從這次事故也可以看出，政府出事就只想著大事化小的本質。核能電廠還是不要為好。”二〇一三年起，謙二開始在自己家屋頂裝設太陽能發電設備。

二〇一二年開始，謙二腰腿越發無力，連孫子的運動會也沒辦法參加了。根據護理等級評定，已經屬于“需要護理”的等級（需協助打掃與打理部分周遭事物，除此之外尚能自理）。二〇一五年一月，妻子寬子過世了。

謙二居住的南陽臺，也與其他新興住宅地一樣，不斷朝著老齡化邁進。一般稱一定區域內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老齡化率”，南陽臺一丁目于二〇一四年達到44%；周邊的北野臺達到43%，三井臺達到40%。雖然這些區域都屬于東京都，但已經確實接近“極限聚落”[[23]](#m23_1)的水準了。

謙二住處周遭的空屋已經多到無法忽視，過往開在南陽臺附近的商店逐一倒閉，甚至無法購得一般日常用品。謙二雖然已達八十九歲高齡，但尚能獨自開車購物，已算萬幸。

謙二對整個大環境仍然有許多不滿。

政客們反復去靖國神社參拜，或者仍有人主張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的論調，對這些人我已經抱著放棄的心態了。但內心一直有股“寧靜的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錄，充滿了各種排外的謾罵叫囂，深感歷史的真實性已不再受重視了。

過去雖然許多人也一輩子都生活在底層，但仍有句話說“只要愿意追求財富，就不至于貧困”，但現在呢？一大堆非正式聘雇的臨時人員，不管再怎么努力，仍得活在無可救藥的社會中。雖然不是只有日本才如此，但大家都不再抱持希望。雇傭方不再具有勞動道德，只能說現在的年輕人處境堪憐。

當我二十歲時，在不知世道險惡與社會真實的狀況下成長，既無法獲得資訊，也不能選擇政權，連批評的自由都沒有。現在的社會，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總有辦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許多人不愿面對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于學習。我想再過個二十年，社會狀況應該會變得更糟吧。日本經濟因為國債的利息上升，最終或許仍得面臨經濟上崩潰的危機。

雖然謙二如此批評，但八十九歲的他仍然操持家務，每天自己過生活。他會閱讀關于冷戰后的南斯拉夫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等學術性書籍。他也支付“國際特赦組織”“獨立生活支援中心‘共同’”“白沙瓦之會（Pershawar-kai，支援巴基斯坦醫療活動的組織）”、“加多廚”“無國界醫生”等非營利組織的會費并且出資捐贈，而且也寫英文明信片給世界各國抗議對“政治犯”的壓迫與逮捕。

國際特赦組織的會刊寄來時，會附上印刷好的信封信紙。信封上會有各國政府達官要員的姓名地址，信件則以英文寫成，包含抗議哪些人遭到逮捕入獄等內容。雖然說我曾寄信聲援，但我做的也只不過是在信上簽名，丟進郵筒寄出而已。不過即便寄達，對方大概也會無視這些信件。不過我仍擁有“自我良心”，所以才會持續這么做。

謙二在腰腿有力時，仍會自己做飯，一個人在自己家過生活。回顧自己的人生時，他如此表示：

剛從結核療養所出院時，曾暗忖自己的人生大概只能活到五十歲。我人生的前半段都處于谷底，不過從中途開始，逐漸趕上大時代的發展時機，之后終于可以過著與常人一樣的生活。只是，我生命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人，并不見得都如此幸運，許多人還沒達成任何成就，便走完人生旅途了。與他們相較，我現在算得上過著相當舒適的生活。

在回答各種問題后，接著詢問在他經歷豐富的人生路途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什么？亦即，當在西伯利亞與結核療養所等看不見未來的時期，他覺得對人而言，最關鍵的究竟為何？

希望吧。只要還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謙二這么回答。

[[1]](#w1_8) 原武史，《団地の空間政治學》，NHKBOOKS，二〇一二年。

[[2]](#w2_8) 譯注：又譯《平成貍合戰》，高畑勛導演，一九九四年上映。

[[3]](#w3_7) 多摩丘陵自然守護會編輯、發行，《永續保護多摩丘陵的自然》，二〇一四年。

[[4]](#w4_6) 譯注：NPO意為“非營利組織”。

[[5]](#w5_5) 譯注：遭遇戰事時國家有權進行緊急立法的制度，可以成為日本動員自衛隊進行戰爭的法源根據。

[[6]](#w6_5) 茶本繁正，《非戰兵士之會》，《大眾媒體市民》，一九八九年四月號。

[[7]](#w7_4)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8]](#w8_3)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9]](#w9_2)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10]](#w10_2) 林永大（音譯），《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梓書院，一九九五。

[[11]](#w11_2) NHK，《遙遠的祖國——皇軍中的朝鮮族士兵》，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播出。

[[12]](#w12_1) 紀錄片，《臺灣人生》，二〇一三年。

[[13]](#w13_1)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14]](#w14_1) 小熊英二，《“日本人”的境界》，新曜社，一九九八年。

[[15]](#w15_1) 小熊謙二，《遭西伯利亞拘留的原日本關東軍士兵吳雄根先生事略》，《極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號。

[[16]](#w16_1) 朝日新聞戰后賠償問題采訪班，《戦后補償とは何か》，朝日文庫，一九九九年。

[[17]](#w17_1) 朝日新聞戰后賠償問題采訪班，《戦后補償とは何か》。

[[18]](#w18_1) 譯注：即日軍所用的退休金支付法令。

[[19]](#w19_1)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20]](#w20_1)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21]](#w21_1)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22]](#w22_1) 宋斗會，《滿洲國遺民——ある在日朝鮮人の呟き》，風媒社，二〇〇三年。

[[23]](#w23_1) 譯注：日本稱在人口過稀化的情況下，居民有50%以上屬于超過六十五歲的老人，已經難以維持該區域如婚喪喜慶等社會一般共同生活基礎的聚落。

# 后記

本書根據生于一九二五年、體驗過西伯利亞戰俘經驗的親歷者的訪談寫成。本書有兩個特點，可以與至今為止的“戰爭體驗記”有所區別。

其一，不僅止于戰爭經驗，本書還描繪了從二戰前到戰后的生活史。大部分的“戰爭體驗記”都欠缺戰前與戰后的記述，因此無法得知主人公是“從什么樣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參與戰爭”，以及“從戰場返回后又過著什么樣的生活”。

與此相對，本書描繪了戰前與戰后的生活史，串接起了完整的戰爭體驗。通過這樣的書寫，可以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戰后的和平意識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

其二，是本書導入了社會科學的觀點。關注同時期的經濟、政策、法制等狀況，通過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描繪出當時的階級流動、學歷取得、職業選擇以及產業結構等狀況。本書不僅是單一人物的生命軌跡，同時也融入了法制史與經濟史的視角，也就是所謂“活生生的二十世紀歷史”。

此外，本書描寫的對象屬于都市下層的經商者，并非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記錄的高學歷的中產階級。因此，才能記錄到與“從學徒兵到上班族”這種一般戰爭體驗記不同的軌跡。這部分加上社會科學的觀察視角后，應該能對日本現代史研究做出一些獨特的貢獻。

近年來，人們不僅關注戰爭的時代，也開始關心起戰后史以及經濟高速增長期。如果我們考量到社會的中流砥柱已經轉移到經濟高速增長期后出生的世代，這似乎是必然的趨勢。此外，伴隨貧富差距的加劇與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束，昭和年代的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帶給民眾何種影響，又給社會秩序帶來何種變化，這些也都成為大眾所關切的問題。

本書嘗試將這種對現代的關心與對過去戰爭體驗的歷史關懷聯系在一起。即便是描繪戰爭體驗，若能通過單一人物的生命軌跡串連起戰前史與戰后史，應該能夠獲得較過往更多的關注。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本書既是口述歷史，也是民眾史與社會史。從社會性的角度來看，本書在處理“戰爭記憶”的同時，也表達了對社會結構變化的關注。

＊

本書描繪的對象，是我的父親。此處想要記下撰寫本書的動機與過程。

構成本書基礎的訪談，是從二〇一三年五月開始，一直進行到當年十二月為止。與我一同進行訪談的，是一位曾經采訪過印尼殘留日本兵，并將其經歷寫成傳記的新進現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殘留日本兵的實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畢業論文。當時擔任他指導教授的我，對曾經寫過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親曾有過西伯利亞的戰俘經驗，當時提議，請他務必聽聽我父親的故事，這便是本書的開端。

第一次的訪談，在稍微不得要領的狀況下結束了。最大的原因是我父親訴說的內容，涉及范圍太廣。當時不僅對父親的西伯利亞拘留情形十分感興趣，而且對于他對戰爭之前的商店街生活與戰后不斷輾轉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實的記憶，更感到訝異。

因此我便考慮，應當訪談各個不同時代，如果能加入政治與經濟的背景說明作為補充，對歷史研究而言應該會具有相當的意義。在這個想法下，我對林氏提議，開始進行正式的訪談，而林氏也迅速答應下來，之后每兩周我們便前往父親位于八王子的住處，每次大約進行三小時的訪談。

我自己曾于撰寫《在日一世的記憶》[[1]](#m1_9)（集英社新書，二〇〇八年）時，做過進行訪談的計劃。而林氏本身也訪談過幾位原日本兵，因為兩人都有過采訪經驗，所以實際執行時并沒有遇到太大困難。

訪談作業的具體內容與程序如下：由我對父親進行提問，林氏負責以電腦記錄；接著當天我會針對林氏制作的筆記進行潤飾整理，之后再與當時的錄音相互對照，做成原稿；而后再將原稿交給父親過目，確認相關事實并加以訂正。

父親實際上缺了一邊的肺，長時間說話容易疲勞；不過關于這點，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卻是不可多得的敘述者。父親的記憶不僅鮮明，談話內容也相當有系統，不至于偏離主題。而且他又是心思異常縝密的人，沒有竄改自己的記憶，能夠把當時的實際感受與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飾地告訴聽者。甚至訪談過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見過類似的受訪者。

而父親具備的觀察能力，往往令我們感到驚奇。例如本書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輝一，在談到高圓寺的祭典上配合《東京舞曲》慶典歌曲敲擊太鼓的話題時，父親說：“這種曲調的風行，或許也說明了東京市內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各地方的人們吧。”“配合《東京舞曲》敲擊太鼓”這個事實，與“已經聚集了許多來自各地方的人們”這樣的社會背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加上對于自己哥哥的回憶，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敘述中抽離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觀事實，并非一般人所能辦到。父親并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具備這種能力，只能說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訓練出來的吧。類似這種觀察力與客觀的態度，在本書中隨處可見。

在某種意義上，父親是個性格淡薄的人。對于悲慘的經驗，以旁觀者的語調述說戲劇性的經過時，絕對不會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貫冷靜客觀的態度，偶爾摻雜著幽默談論事實。

借用父親的說法，就是“實際經歷過這些的人，就是如此”。然而是否任誰都會這么表現，我無從判斷。只有談到軍隊入伍、和外祖父母道別時，表達上有些停頓，除此之外沒有出現類似的狀況。這些事情對父親而言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即便在爭取戰后賠償之際，他也都是以淡淡的口吻闡述自己的回憶。

這種性格的人物作為口述歷史的主述者，相當值得信賴。可是，類似這種人物，也很少寫下自己的切身體驗。會留下個人史記錄的人，往往是擁有相當學歷與文筆能力的階層，特別是擁有自己強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敘述往往只能表達某一階層的觀點，后者則又欠缺客觀的視角。父親不屬于任何一類，而且實際上，對于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幾乎完全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記錄。

如前所述，首次進行訪談時，我還沒有計劃要把訪談寫成文章，但在一連串的談話后，我的初衷改變了。之后我取得林君的許可，開始撰寫本書，并先于《世界》雜志二〇一四年十月號至二〇一五年六月號進行連載。如此一來，幫助不書寫、不曾留下記錄的人，為后世留下他們應被傳承的記憶，我認為這是一位歷史研究者應當扮演的角色。

＊

本書中描寫的我父親的經歷，稱得上當時普通“日本人”的人生經歷嗎？這也牽涉本書的學術性意義，但確實相當難回答。暫且不提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戰后的賠償訴訟中與朝鮮人原日本兵列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沒有第二個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有人會評價說“這并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謂的“普通人”究竟是什么？在日本的話，或許是所謂的“上班族”吧。可是，從統計學的意義來看，這個族群在日本歷史上從未成為最多數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狀態，這樣的錯覺仍流布于整個戰后時代。

舉一個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后改拍成電影，由山口瞳撰寫的小說《江分利滿先生的優雅生活》。男主角與我父親一樣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年齡設定與昭和年數一致（昭和幾年就是幾歲）。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滿”[[2]](#m2_9)。

而小說內容描述的卻是住在大型電機公司的員工住宅，過著大企業正式員工生活的人。如本書提及的，能過這種生活的人，占當時勞動人口的一成不到。將這種生活想象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為購讀該書的人多屬都市中產階級，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大學畢業后成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許就這么簡單。

另一方面，與都市中產階層相對照，還存在另一種印象，也就是位于地方的農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階層。但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農民在統計數字上也不再是人數最多的族群。此外，如果單純把居住于農村的人都稱作農民，那我父親在戰后的某一時期也曾經居住于農村。

如本書內容所闡明的一般，父親走過留下的足跡，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識到，但大致都沿著同時代日本社會的發展軌跡邁進。即便如此，父親也屢屢做出與同時代多數人不同的選擇與舉動。如此說來，父親的行跡，與“多數人”或“平均”有著什么樣的相對關系？

對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場合中都屬于“多數人”的人，并不存在。社會學上稱脫離“多數人”的行為為“異常行為”（deviance）。但是，一輩子從未做出異常行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們大體上都過著不顯眼、可稱之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總會經歷幾次危機，并且做出英雄式的舉動。只是同時從大范圍來看，仍受到同時代社會性脈絡的規制。

而這樣的情況，才是所謂“平均”的多數人。從這個意義來看，本書中刻畫的父親軌跡，屬于非常“平均”的一群。

換個說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機時的經驗，或者英雄性的瞬間來看，不論描繪的對象是個人還是集團，都無法描繪出時代整體的樣態。當然，只描繪日常性的生活，也無法刻畫時代整體狀況。只有通過綜合性地把握全體，在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中找出定位，才可能完成立體性的歷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書描述的人物，并非擁有高學歷的都市中產階層。從此點看來，本書便屬于“不被記錄的多數人”的生活史。但同時本書內容也沒有僅注重戰爭與訴訟等戲劇性的部分，而是將其當作整體的一部分，做出綜合性的記述，這也是本書值得一讀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動搖與偏差，但同時又受到全體結構的規制。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正是父親個人體驗過的動搖，以及規制他行為的東亞歷史。這里所指的東亞不僅是日本，也包含了蘇聯、中國大陸與臺灣、韓國。即便在日本，也與許多地方、各種階層、諸般政策有所關聯。本書的意圖，即在嘗試通過單一人物的細部描寫，借以窺見整體樣貌。

＊

實際上，我在二〇〇三年也曾經對父親做過訪談。但當時只請教了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過。對于戰前與戰后的生活，當時還不關心。此外雖然問起西伯利亞拘留經驗，但仍缺乏探究戰俘營經營、蘇聯方面社會背景的視角。這部分雖然也是父親的經歷，但卻不是當時的我能通過訪談引導出來的回憶。

所謂的記憶，會在敘述者與聽者間產生相互作用。如果聽眾沒有提問的能力，便無法引導出敘述者的回憶。如前所述，本書受益于優秀的敘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過另一方面，作為提問者的我，因為擁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識與更廣泛的關心，大概也起到不少互補作用吧。

要說理所當然，也確實如此，通過本書的訪談，更加拉近了父親與我的關系。彼此間共通的話題增加，也讓我更容易理解父親言行背后的意義。而且通過講述過往的事情，那段時間父親的臉上又閃耀起了當年上班時的光輝，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單純的喜悅。大概對父親來說，能夠有人熱心傾聽自己的經驗，他也感到相當開心吧。

不過這種情況，缺乏聽者的努力也無法發生。這不僅是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許多人的經驗與記憶，都在缺乏傾聽者的情形下就這么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親戚，或者近鄰、同事，光是愿意側耳傾聽這些回憶，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而且對聽者而言，可以獲得比敘述者更多的收獲。因為人類存在的證據，就只存在于與他人、與過去的互動之中。

對人類來說，不明白自己為何生存于此，便會產生不安。市場上雖然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商品來撫慰這種不安，但通過與周圍的互動、對話，建構人際關系，比起被動的瞬間性購買行為，能夠提供更多收獲，也是可以讓效果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復強調，所謂的記憶，是通過聽者與敘述者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謂的歷史，也屬于此類相互作用的形態之一。將傾聽對方的聲音、努力賦予其意義的行為，稱之為“歷史”應該也不為過。

對于過去的事實與經驗，通過聽者的努力，賦予其意義，才能使其長久存續。如果不這么做，事實與經驗便會消失，側耳傾聽這個聲音的人，也會失去自己的立足點。此二者中該選擇何者，應由活于當下的人擔負起責任。

父親終將過世，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能夠做的，便是傾聽父親的經歷，賦予其意義，使其長久存續。這是生活于當下的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處理的事情。我的愿望便是，讀者諸君們也能借由閱讀本書的經驗，開始試著參與這樣的努力。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五月

\* 本書經作者授權略有刪節

[[1]](#w1_9) 譯注：書名的意思為“在日本的第一代的回憶”。

[[2]](#w2_9) 譯注：日語可以讀成エブリマン，也就是英語的every man。





